目录

一、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文件（1963年6月）…………………3
  1. 公报………………………………………………………………………3
  2. 重新统一的理论和政治基础……………………………………………5
  3.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16
  4. 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67
  5. 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他工人国家形势………………………………99

二、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
   （1963年7月25日）……………………………………………………127

三、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托派)特别代表会议文件
   （1963年4月）……………………………………………………………137
   1. 公报………………………………………………………………………137
   2. 宣言………………………………………………………………………142
   3. 致欧亚非洲国际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干部的信…………………………164

四、波萨达斯：中苏分歧的现阶段及其历史意义
   （1963年6月9日在阿根廷工人党[托派]全国扩大干部会议上讲话）…………171

五、波萨达斯：中国革命的成熟，政治革命的新阶段
   （1963年9月） ……………………………………………………………191

六、法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呼吁书（1962年7月）………………………………………………237
七、社会主义的世界前景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在1961年年会上通过并在以后经过修正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附录：

战争与第四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1934年6月通过的提纲草案

246

323
一、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文件
（1963年6月）

1. 公报

延續将近十年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已在列昂·托洛茨基创建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即第四国际的一次重新统一大代表大会过程中宣告终结。大会在意大利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

1958年的分裂是派别斗争的结果。派别斗争的原因是：对苏联发生的自由化进程的意义持有不同的见解，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组织问题有分歧。重新统一大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致认为这些争执现在已过时，双方今日已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

重新统一大代表大会是两个不同的大会的继续。第一个会议是加入“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大多数支部的代表所举行的大会。第二个会议是加入“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支部代表所举行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两个会议举行于6月21日至26日。

重新统一大代表大会通过几个共同文件。“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立即批准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国际委员会”代表们宣称将提交各自的组织尽速批准。

“国际委员会”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
会。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以整整一天时间讨论了密歇尔·布洛提出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报告。大会一致同意阿尔及利亚现在有可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开始起着同盟在拉丁美洲所起的同样的作用。代表大会决定尽最大力量发动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援助。

代表大会对大多数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充满窒息性的官僚气氛的会议作出鲜明的对照，出色地严格遵守民主法制，存在于两个主要倾向之间的分歧得到了广泛和清楚的讨论。经过投票，少数派在各代表团的支持下，在新的领导中获得代表权。

在皮埃尔·弗朗克、厄内斯特·杰尔曼、列维奥·麦丹领导的多数派，和密歇尔·布洛领导的少数派之间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关于制止核战争方法的各种不同估计，不同地区的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中苏冲突的意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应有的态度，以及上届领导机构的工作报告。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下列文件：《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的文件研究了今日革命过程中各主要倾向的辩证法；《中苏冲突和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的形势》，的文件分析了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危机；确定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应采取的立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件阐述了当前的世界各种倾向，提出托洛茨基主义者运动的任务。密歇尔·布洛提出一个补充文件：《关于国际形势和第四国际任务的提纲》，文件简明地归纳自1961年10月以来曾提交国际讨论的许多文件中已广泛地发过的观点。

除了上述三个多数派的文件外，重新统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的一件声明：《争取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重新统一》，文件建议争取重新统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
所有力量应采取的立场和根本政治条件。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
虽然由于它本国的反动立法关系而没有参加第四国际，但对第四
国际生活表达了兄弟般亲密的关切。

在大会开会期间，代表们静默一分钟以哀悼列昂·托洛茨基
的伴侣娜塔莉娅·塞杜娃。大会对自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逝世
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色利·曼钢和弗尔南多·布拉伐
也致以同样的哀念。

大会发出一项号召，发动一次强大的运动来保卫最近遭受逮
捕的秘鲁农民领袖胡哥·勃朗科，和身系监狱的另一个秘鲁托洛
茨基主义领导人伊斯马埃尔·弗里亚斯。①

大会向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属于左派的印度共产党人表示
关怀。他们由于反对中印边境冲突中被鼓动起来的沙文主义而被
尼赫鲁政府投入监狱。

重新统一运动重新集合了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主要
力量。现在还处在重新统一行列之外的有：拉丁美洲的曾参加
过“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左派，以及“国际委员会”的英国和
法国的支部。虽然曾邀请他们派遣观察员，然而他们拒绝了。尽
管如此，代表大会仍重申它的关于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力
量重新统一的号召。

1963年6月27日

2. 重新统一的理论和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工人党”②政治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通

① 后来我们得知，弗里亚斯同志已被释放。
②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美国托派组织。]
过一项决定。“争取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重新统一”。这项决定被它认为有可能重新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归纳为十六点。重新统一代表大会接受了这项决定，作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新统一的基础。全文现在发表如下：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自1954年以来分裂了。过去各种努力对弥缝裂痕都证明无能为力。但是近来，由于第四国际，即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在数量和影响的新的发展方面存在着鼓舞人心的因素，双方感觉有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谋求重新统一的必要。

“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已指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各派统一有着一个原则性的基础。

去年国际书记处曾采取主动，坚持指出结束分裂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国际委员会”一方面建议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尽管“国际委员会”有些同志对此认为仅仅是便利共同讨论和进行有关各个方面共同利益的统一工作的一个有效办法，但是多数同志明白表示欢迎成立仲裁委员会，认为是走向迅速重新统一的一项重要步骤。

尽管还存在着若干实质性争论，特别是关于1954年分裂的原因，但是在基本共同纲领和对目前世界发展中主要事态的共同分析面前，分歧各点已成为次要，这两方面已将两派团结起来。只要有良好的愿望，有可能把所有还存在着的争论放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继续通过讨论来澄清。这样来做，现在还属于这一或那一组织的各成员的力量和才能统一起来的重大益处就有了利用的可能。

主要的事实是，双方的多数派对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基本

①“国际委员会”是英国托派于1958年同“第四国际”分裂后成立的一个对立组织。
立场已统一起来。我们尽可能简略地指出共同点如下：

（一）垂死的社会的当前危机归根到底反映了革命领导存在着长期的危机。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已使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达到更为成熟的阶段。只有实行全世界性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才能迅速地克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不发达状况，解除人类遭受被毁灭的威胁，保证世界社会取得持久的和平、无限的富裕、无限的文化发展和实现人类完全的自由。社会主义不取得国际性的胜利，腐朽的资本主义将继续大批地浪费资源，把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保持在可怕的贫困中，延长社会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支持独裁制度。为了充实这幅饥饿、不安全和压迫的悲惨图画，资本主义还不断地进行着核毁灭威胁。

（二）出乎所有我们前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预料之外，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延迟了，这主要是由于工人运动传统领导的无能，由于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宫的帮手的可耻行为。他们应对战后1918—1923年和1943—1947年主要革命危机以及1932—1937年大罪的危机的失败负责，应对这些危机本应以无产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政权为结束而终于失败负责。

（三）只有建立一批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取得政权的新的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才能胜利地解决世界危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建立这样的党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针和目的。制定一个包括各种口号和过渡步骤的纲领在建党工作中有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克服领导危机主要的问题是消除存在于群众目前的觉悟水平和客观需要的觉悟水平之间的鸿沟。群众觉悟目前停留在只关心当前的事务和当前的问题的水平上，而客观需要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以民主方式选举并以民主方式进行工作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工人国家的觉悟水平。在革命
的社会主义党建党工作中应该实行列宁方式，这些方式包括在现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核心中，同时也要在有需要或有机会可以灵活地接近而又有可能被吸引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来的各种不同倾向的群众团体的领导内部，耐心地坚持地吸收工人分子。个别吸收和大规模策略性运动的方式应该作为建党工作的补充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各有各的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党处于被孤立的情况下，在改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改良主义环境，也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行所谓“打进去主义”的策略时，凡是已打进那些特别复杂和困难的地方去的人，应该经常地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独立工作，包括他们本身的托洛茨基主义报刊，应该充分意识到，离开这个标准将会带来严重的危险。

（四）作为国际组织的第四国际和作为民族党的它的一些支部都应接受民主集中原则。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这些原则的正确性。民主集中制符合为实现革命任务而采取迅速和有纪律的行动的需要，同时它保证讨论的自由和组织各种派别的权利，没有这些自由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真正的政治生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关怀内部民主，这和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运动培养出来的官僚分子强加于他们所控制的工人组织的窒息性制度是恰恰相反的。

（五）改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器不利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去推翻所有已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地方的资产主义。他们不去关心无产阶级历史利益而首先关心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政权。由于他们的消极怠工，由于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由于他们了解到起义会把他们一起冲垮，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被迫的情况下发动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谴责和反
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孽生祸害的同时，不能把这些组织的真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叛徒领导同等看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承认，主要任务不在于单单进行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文字斗争，而是真正地把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者争取到纲领中来，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来。

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长期“繁荣”的压力下，反对斯大林主义罪行的反应中，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掀起一次广泛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进攻。必须进行一场坚决的思想斗争来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潮流。

（六）苏联的政权尽管被享受特权的官僚主义所箝制，但是它依然是个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依然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不独它有多大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比起资本主义来它依然是进步的。通过巨大的工业和文化革命而实现的苏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内确实可向帝国主义挑战。世界历史上这个伟大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有它的巨大潜在力，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采取无条件保卫蜕化的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

（七）苏联官僚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脚印，把它的权力和寄生主义伸展到东欧的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和北朝鲜。但是为了保持它的特权地位，它必须在这些国家用官僚—军事办法摧毁资本主义。这些办法所以取得成果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当地的资本主义和地主的政权暂时垮台，加上战时和敌人占领时期大屠杀之后工人阶级极端地被削弱。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变质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保卫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要在这些国家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
（八）在无产阶级民主遭到斯大林主义摧毁的工人国家里，以及由于斯大林主义影响从未有过无产阶级民主的工人国家里，必须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或建立，为实行劳动群众民主地管理国家和经济而进行斗争。斯大林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已用政治反革命手段摧毁了无产阶级民主。因此列宁主义力量面临着这样的任务，组织一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工人阶级有领导地实施推翻官僚贵族的独裁并代之以无产阶级民主的权利。这意味着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把无产阶级民主恢复到高水平后，各工人国家首先进是苏联，将恢复斯大林之前的吸引力，从而将在资本主义各国中掀起一个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九）在古巴出现一个工人国家——它的形式还未肯定——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古巴革命是在一个完全独立于斯大林派之外的领导下实现的。7月26日运动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典型，它现在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榜样。

（十）由于世界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尤其是由于在国际范围内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的中国的伟大胜利，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帝国主义的胜利以及苏联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巨大成就壮大起来的苏联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专政所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了，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当权的贵族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作出了大规模的让步：取消了极端的警察专政（撤消了强迫劳动营，修改了斯大林的专横的劳动法），摧毁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恢复了斯大林清党运动中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的名誉，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各领域内撤除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限制。赫鲁晓夫政权并不是要粉碎官僚专政，他的目的不是要来个“自动改造”，而是要在日益高涨的人民压力面前保持贵族的政权。但是群众把这些让步只当作是偿还他们的欠债的一部分，他们力图把所
取得的东西变成新的据点以争取他们的最后的切身要求，即恢复无产阶级对经济和国家的民主监督。欧洲各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地位这种缓慢地而稳定地加强，是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一）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之间发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促成了惊目惊心的分歧的爆发，从而最后地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完整体系。匈牙利工人的政治革命的尝试加深了这种冲突。古巴革命使这个危机更加深刻化。随着中苏冲突的发生，这个危机已成为世界政治头等重要问题之一。危机除了反映各民族官僚主义之间的利益矛盾、苏联官僚主义和它影响下的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外，还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和生气勃勃的胜利的革命之间的根本不可调和性。在生气勃勃的胜利的革命中，战斗的先锋队伍力图遵循列宁的教导。因此这个危机具有非常进步的性质，它标志着重建一个全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

（十二）殖民地革命与斯大林主义世界性危机已结合在一起，在目前世界革命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殖民地革命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几乎全部的直接的殖民地统治，而代之以间接的统治，即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实行新的“联合”，即使在有些地方这个资产阶级还在萌芽状态中。但是这种制止被殖民地革命所唤醒的国家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企图，遭到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不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就不可能解决这些国家的解放和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因此殖民地革命有着发展成为不断革命的趋向，就是说，这些革命以彻底的土地改革开始，然后转到剥夺帝国主义托拉斯和“民族”资本家财产，最后走向建立工人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
（十三）在一个以仅仅要求民主权利开始，而将要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告终的革命的道路上，无土地的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力量所进行的游击战，在有一个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领导的情况下，是能够在摧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权、加速它的崩溃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从战后经验中应该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这个教训应该有意识地结合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的战略中。

（十四）第二次大战后，西欧的资本主义成功地暂时稳定了。这个强加于工人阶级的后退，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领导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转变所致。他们阻止群众在战后革命大危机中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的稳定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包含着更尖锐、从而归根到底更具爆发性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关系到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这些矛盾包含着地理上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想克服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同想把潜在的大经济危机转化为有限的衰退的必要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维护“社会和平”的期望同为了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而必须进攻工人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就业机会之间矛盾的加深。这些矛盾越来越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使阶级斗争有可能从经济斗争上升到尖锐的政治斗争，并在有优越的领导条件下，可能掀起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一次新进攻，在资本主义最后堡垒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

（十五）社会主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帝国主义有步骤地准备一次新的冲突，挑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起来反对各工人国家，其中以苏联作为主要靶子。扩充军备已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常的支柱，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世界联盟的头子美国资
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一个经济需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周围建立广泛的反革命力量。它对新的解放斗争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把解放斗争淹没在血泊中。它的军事干涉越来越具危险性。随着古巴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而发生的危机中，统治美国亿万富翁的各资本家族表明他们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武器攻击，甚至要使人类和文明冒毁灭的危险。这个难以想像的毁灭力量只有美国工人阶级才能把它从华尔街的疯子手中夺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把美国无产阶级提高到伟大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上求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历史任务即是争取世界社会主义决定性的最后的胜利。

（十六）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积极地参加一切争取单方面裁减核军备的人民群众运动，为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而斗争的同时，应该明白地指出人类到处面临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抉择，即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就是核毁灭。清楚地理解这种处境不会降低群众士气，相反地有力地推动打倒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以为不必结束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而可以通过“和平共处”来保证和平，是一个致命的幻想。打退核武器战争的威胁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社会主义。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对这些基本观点见解一致，有义务加速实现重新统一。企图延长分裂是不合原则的。重新统一也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从各方面来看，革命运动已有了新的扩大机会。古巴革命已给拉丁美洲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所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以沉重的打击。在古巴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的潮流正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寻找它们的道路，努力把殖民地革命主要的教训应用到自己的形势中。阿尔及利亚革命已对非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起了同样的作用，联系这
些向左发展的各潮流，同它们一起进行工作，甚至在不放弃我们的原则下团结它们，这一切已经成为紧迫的需要。重新统一将大大地便利我们这一任务的完成，加强我们本身的力量并赋予托洛茨基主义以日益增长的组织上的吸引力。立即可取得的后果将是，我们在帝国主义内部所进行的保卫殖民地革命的工作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效果，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团体在争取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造的一切严肃的革命者中间的份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毫无疑问延长已分成抱有各种矛盾动机的派别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局面，只能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吸引新的力量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弱。

与此并行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出现在中苏分歧中的明显的大分化，解放了全世界共产党内的巨大力量。许许多多战士被我们的列宁主义纲领和传统，我们几十年来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正确性、我们坚持保卫内部民主的行动所吸引。我们缺乏团结，我们表面上不在一个单一的坚固的组织内调动我们的力量，使他们惊异，使他们不敢接近。重新统一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将有效地推动用真正的列宁主义精神、用自己的真正的国际团结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传统去教育共产主义战士的工作。很明显，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所有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将更具吸引力。这些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分支来说是越来越具危险性，它们已准备对一个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组织能力上是严肃的运动的立场进行考察。

最后，我们应当以最大的注意力来考虑我们对青年工人和学生的吸引力问题。青年工人和学生在示威、进攻和领导革命起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巴革命主要是青年的功绩。同样，正是青年把土耳其的曼德列斯和南朝鲜的李承晚的腐朽的独裁政
府推翻了。在美国的争取黑人平等的斗争中，法国的同情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斗争中，反对日本和西德的重新武装的斗争中，英国的反对失业的斗争中，也是青年人充当了突击队。在苏联和欧洲各工人国家加深和扩大非斯大林化的运动中，青年也是站在战斗的前列。在全世界，青年高举起争取单方面核裁军的斗争旗子。我们可以用我们大胆的领导，我们的战斗精神和我们的战斗行动来争取这新一代中最优秀的分子。我们之间过去的争论对革命的青年积极分子已很少意义了，他们关心的首先是关于迫于眉睫的问题和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为了过去争论的分歧而拒绝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只能把青年往外推出去。

简言之，迅速地重新统一已成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不缺少的。当然，在派系斗争曾经是长期的和剧烈的各国，还存在着不少困难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在整个国际重新统一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解决。重新统一将使双方的主要领导人开始在目前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形势下创造新的友好气氛并扫除客观上毫无根据的害怕心理。经过了一段时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的共同的友好活动，我们确信在目前看来无法克服的地方性的问题将由同志们自己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

我们也相信，一个统一的组织有可能提出可供考虑然后接受的各种建议，以便在不涉及割断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精神的情况下，消除还可能存在的关于章程所载明的保证民主权利的一切怀疑。

我们的运动正面临同198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同样巨大和严重的责任，我们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举行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作出决定：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而这件事应该在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予以实现，而重新统一
3.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时代背景

按照经典的世界革命的纲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给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作出榜样。“先进的国家将让落后的国家看到自己的前途，”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高度的工业化基础、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劳工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只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的。

诚然，在1848年的革命之后，马克思对于这个纲领的政治条件之一曾经表示过某些怀疑：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成熟而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存在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否一定有能力实现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恩格斯更进一步推翻了这个纲领；他曾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以比较薄弱，恰恰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由于它的高度的生产能力在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

二十世纪初，托洛茨基于1905年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将发现自己被迫去实现按照历史的观点应当由资产阶级去实现的任务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列宁于1914年提出的，帝国主义的锁链将首先从...
它的屡屡弱的环节破裂的帝国主义论，都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各和彼此关联的规律所必然产生的主要结果，就是说，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身的矛盾，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最后将证明不过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是便于最后取得这种胜利的一个方法。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什维主义者在1917年10月取得了政权，并在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

革命实际经历着一个更为曲折的道路，这是这些最伟大的革命理论家都没有料想到的。我们知道，由于这种革命所走的弯路，整个人类，特别是第一批工人国家中的工人和农民不得不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的叛变导致了1918-21年德国和中欧的革命的失败，因而使得第一个胜利的革命运动出现在落后的俄国，其结果就等于于是给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严格控制的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蜕化解开了道路。由于共产国际已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里的外交活动的工具，这就使得它，最初是无意识的，后来是有计划的，阻挠了许多有希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配合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努力，使得某些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可能，甚至已经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府完全稳定下来了。

由于1919-23年和1934-48年两次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1934-37年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连续失败，世界革命的
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1949年，随着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出现，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给一系列的连续不断的殖民地革命开了先声。所有在1917年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包括在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等通过武装革命运动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早日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却反而推迟了。

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必须强烈地加以反对的，就是说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的发展情况或多或少是由于客观条件，或者说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缺乏革命热情或革命意志所造成的。谁也不能认真地否认，在1917年之后，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或甚至起义运动已经使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客观上成为可能了。这种情况出现在德国和其他中欧是1935—37年，意大利是1919—21年，德国1923年，英国1926年，奥地利1933—34年，西班牙1931—37年，比利时1932—36年，法国1935—37年，意大利1943—48年，法国1944—48年，英国1945—50年，等等。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中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无数次的总罢工、对工厂的占领、动摇本国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以及甚至威胁着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起义运动，已经一再地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重新重建社会的必要性，并表明他们要实现这一任务的愿望。这些努力的失败并非由于这些无产阶级天生无能，由于政治上“落后”或者“腐败”，而是由于领导集团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再拒绝利用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夺取政权，或甚至有意打消这种可能性。欧洲的无产阶级由于领导叛变所受到的打击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都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从德国和西班牙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18
当然，革命领导的危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国家中，也和在先进的国家中一样存在。许多失败的或流产的革命运动——从 1926—27 年的中国革命一直到不久前危地马拉和伊拉克的失败——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在斗争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很显然领导力量的不足在落后国家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敌人要强大得多不知多少倍。

面对着帝国主义国家中强有力的富有经验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力量，它必须能够：（1）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建立统一行动的纲领；（2）最大限度的可能动员工人阶级中潜在的、常常是隐藏着的革命力量；（3）战胜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各种改革来强有力地阻止革命运动的非常狡猾和机智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4）在不牺牲本阶级具体目标的前提下，尽量争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中立地位。不存在暴发性的土地问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所以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落后的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面对着一个从根腐烂而且完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统治阶级，革命力量能够使全体劳动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最穷的农民和完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彻底破坏传统的秩序和状态，对中派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的党派施加巨大的压力，最后让他们取得政治领导权。

在任何接近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之下，我们必须记住，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决不可能存在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最后总给那个国家带来某种形式的暂时的相对的经济上的稳定，甚至
促成它的新的发展。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时期内推延了新的革命运动，因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上的失败（甚至意志的消沉）再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显然是不利于立即再采取新的革命行动的。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缺点，由于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特殊的经济结构，由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在没有完成激进的土地革命之前永远处于悲惨状态，由于一方面工业化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始终停滞不动或甚至日愈下降等等情况，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不会自然地带来相对的或甚至暂时的社会或经济的稳定。因而，一个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的群众斗争运动会继续下去，正像玻利维亚在整整十年中的经历一样。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暂时遭受失败的革命，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情况相较起来更容易尽快得到恢复。

总的来说，1917年以后的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表明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旧的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先进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先进国家中的工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革命战斗性。这只是表明在这些国家中他们必须战胜的反对力量，要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不知强大多少倍。落后国家中敌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他们甚至有一些非常迟钝的武器的时候也有可能取得政权。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敌人的强大，就要求他们必须使用更为完善的工具。

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三种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殖民地革命、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组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每一种力量都影响着其他的两种力量，同时从其他力量受到促使自己发展或妨碍自己发展的强有力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一般说来，毫无疑问地阻止
殖民地革命使它不能更快地和更有意识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如果它能够受到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强有力的革命运动或革命胜利的影响，情况就会完全两样。这种推迟同样也使得苏联的政治革命不能尽快达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工人看不出来采取另一种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榜样。最后我们还必须说明，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而受到某种阻挠的殖民地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浪潮，却又反过来帮助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极力想不让革命再推迟下去。

二、殖民地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且更明显的是自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始终不停的群众运动已经使得一个接一个的落后国家走上了不断革命的道路。这一浪潮的一般的原因应该说是由于旧的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遭到了削弱；苏联的进步，特别是新中国的进步对它们产生了吸引的力量；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处的悲惨境地；民族独立运动所表现的威力以及在人民群众看来获得民族独立就可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提高他们的低下的生活水平和低下的文化水平，并消除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繁杂”结束以后，输出原料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日益恶化；在过去十年中，一切工业化国家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生活水平的变化的冲击停滞（或每况愈下）——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殖民地世界普遍发生动荡情况的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过程，殖民地革命首先表明了二十
亿的人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按照几百年的传统一直处于被人统治的状态之下，遭受着最大的压迫和最残酷的剥削，遭受着无比的屈辱。而在如果他们不被作为大量屠杀和灭绝的对象的时候，就必须完全抛弃他们的民族传统和甚至他们的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现在却忽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出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并表现了他们自己的人格。从根本上一句话，殖民地革命就是这二十亿人民至少要变成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和建造者的不可抑制的趋向。从社会的观点看，这情况是只有通过建立工人国家才有可能达到的，这就给殖民地革命的总的倾向提供了使它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的客观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殖民地革命——首先是革命的革命，接着是一系列其它地区的革命运动——已使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体系不再可能有1921年以后的暂时稳定的局面。它使得各种力量的国际关系不利于资本主义，并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防御战——而且往往遭到失败——这些战争原是帝国主义为了遏止殖民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发动起来的。这样，殖民地革命就对世界一切地区的反帝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使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使它们能够克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时期帝国主义在军事方面所掌握的优势。

殖民地革命决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摧毁帝国主义。说一句看来有许多人不会同意的话，殖民地革命甚至并不会有能够破坏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的经济稳定。完全违反1919年以后一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论断，殖民体系的垮台并没有立即给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而和它同时出现的却只是一如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对外贸易得到了最大的
相对的发展。

这个看来似乎不可信的情况所以会产生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要这些通过殖民地革命获得独立的新兴的国家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那么在这些国家中帝国主义的真正势力就依然可以说是安然无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一种直接的形式变成了间接的形式罢了。正像很早以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见到的，在向着殖民地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基本策略将是改变它的统治的形式，而竭力保存它的统治的实质。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曾使帝国主义遭受受到一些实际的损失，因而它不得不尽量避免这种具有危险性的统治形式的改变，有时甚至不惜发动不顾一切的残酷的殖民地战争。

由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改变为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就必须要对殖民地人民群众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重新进行分配，其结果是有利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同时由于这种转变必然会加速殖民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这甚至等于是要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使得生产某些工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可以从世界市场上分得更多的利润，而限制了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不能进一步扩大向外输出的投资商品的数量。

新殖民主义的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身的固有的需要相适应的，工业结构的改变使它急于想寻找新的出售生产资料的市场，而不是出售消费品的市场。所谓的“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拆穿了说，不过是从财政上来支持求得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其所能预期到的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的结果都不过只
是成功地满足主要的经济需要之后的副产物。可是这种在资产阶级把持下的极其有限的工业化的过程以及帝国主义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援助”，丝毫也没有能够满足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的需要。从根本上来看，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现在和过去处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的时候是并没有什么改变的。它们实质上仍然是生产和出口原料和食粮的国家，仍然完全受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它们的农村地区仍然有严重的失业或半失业的现象存在。甚至这种有限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在引起通货膨胀和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在进一步加深工人阶级的苦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既然直到现在为止，殖民地革命还仍然被限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范围之内，所以它对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打击，同时也并没有在那些失去旧日的帝国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触发起较大的经济危机。只有一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由于它的特殊的经济结构，仿佛是在一旦失去自己的殖民地的时候就无法维持下去了——葡萄牙。

可是这并不是说，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活动完全没有影响。它的最显著的结果是，减轻了私人资本对落后国家的输出，并迫使国家或国际的公共（政府）机构负担起在帝国主义极盛时期始终由私人资本负担的任务。从这里就产生了严重的金融、财政和经济上的矛盾。在过去十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相对的迅速发展的时期就已不愿把剩余部分向落后国家输出的私人资本，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发生，这种输出更完全停止下来，这情况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对投资的保证和保险只能减轻，但并不能完全克服这种困难。

只要极大多数新兴的独立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
範圍之內，從世界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困難還只不过是個
“較小的災禍”，這些困難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之內多少還有可能加
以克服——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如此。只有那些主要的半殖
地國家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變成工人國家的時候，殖民地革命
才會給它帶來嚴重的經濟打擊，並迅速在那些主要的帝國主義國
家中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完全從發展的情況來看，可以認為在政治革命在蘇聯取得勝
利以後，以及在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或幾個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
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前，這些國家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變成工
人國家的。可是不管怎樣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以這個不十分肯
定的假定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基礎，那恐怕是不十分合適的。要實
現這種前景不但需要殖民世界的永遠革命的過程一直延續下去
（實際情況肯定是這樣），同時需要這種過程在一定時間限制
之內（在各個地區都已取得勝利之前）得到一個勝利的結局。世界
革命的三種主要力量的发展在時間的先后上可以有种种不同，如
果任意以其中的任何一種可能性來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都可能
產生極其嚴重的政治上的錯誤。

殖民地國家進行不斷革命的客觀條件，最主要的是，殖民地資
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領導集團沒有能力，在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的範圍之內，解決由經濟和文化的動蕩所產生的一些
根本的問題。這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現是資本主義沒有力量進行激
進的土地改革。其客觀條件則是由殖民地群眾一般都不能理解爭
得民族獨立和爭得較高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之間的差別這一事
實所決定的。如果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他們就會認為，他們所取
得的獨立似乎不夠完全、不夠徹底，或者是不真實的。這就說明从
长远的觀點來看，不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殖民地國家要
想求得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短暂的时期内，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也可能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它可以让人民群众仍然认为它是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反帝的斗争，并可以成功地让人民相信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已经实际在进行之中。在这方面取得相对的成功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的尼赫鲁。甚至在这些例子中，它们的政治上的稳定实际上也是极不稳定的，并且表明，如果出现了另一种能够环绕着根本的、具体的革命目标来动员人民群众的一股反帝情绪的（这是传统的领导集团所无能做得到的）工人阶级领导机构，将会发生如何不同的情况；比方，在印度实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

由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对大多数落后的国家来说，最可能出现的前景是在那里将出现连续持久的社会革命的危机。这些危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领导力量将不顾一切地加以克制或使其转化，但它仍然将不顾一切不可避免的挫折不时跳出那些领导力量的限制之外。这种持久的不稳定的时期和社会危机并不表明无产阶级或革命农民阶级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之下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或者说，工人国家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正如把（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开始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胜利的结束完全等同起来的情况一样，任何人如果认为这一过程会自然地或者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那就势必会错误地估计各种力量的真正对比关系，并以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打算来代替科学的分析。它事先就认为，这种必须通过先锋队的主观努力（亦即对群众运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在斗争中来加以解决的任务，会在客观过程中自己解决。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且在一个比较短的
时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古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个过程也决不是必然发生的，同时如果沒有这一过程，革命就肯定会遭受严重的失败或者至少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最近的历史所表明的，例如玻利維亚、阿根廷和危地馬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要比较精确地推断每一个按种族和地理划分的大区域的殖民地革命（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可能的前景，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及他们的更确切的经济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不管怎样，某些一般的社会趋势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是大体相同的。

(a) 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够强大的。尽管从历史上讲，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得更早一些，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能力好好地利用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的名义下向他们提供的资本，以求获得预期的工业化的结果。这也许是对经济不发达国家问题采取‘资产阶级形式的解决办法’的最大的障碍。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种相同的现象：可以利用的剩余资本一大部分都从工业用途上转向对土地的投资，或者用于放高利贷、囤积物资、进口奢侈的消费品，甚至直接流出国外去。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无能并不是它的道德败坏的结果或反应，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追求利润的冲动所必然引起的正常情况。对不断革命的恐惧在这里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b) 以财产国有化的形式，通过国家机器建立重工业的下层结构。推动并具体代表这一过程的社会基础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职员所构成的。因此这个过程，甚至是必然地，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政体的发展。然而，
在私有经济方面，它可能同旧的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不仅是同传统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且甚至同工业资产阶级也有所冲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像埃及、加纳等等国家中会出现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和把资产阶级企业收归国有的情况。不管尼赫鲁和纳赛尔这两个政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国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乃是尼赫鲁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特点是下面这样一些国家中是必然会明显地存在的，只要：(1) 国家机器本身和已经国有化的部分经济仍然是私人资本积累和私人工业的培养所（通过贪污、盗窃、公开受贿和向津贴等办法）；(2) 国家的经济仍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3) 可以助长资本积累的小商品生产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c）殖民地无产阶级的战略任务。从这些国家的特殊社会和经济结构来看，我们可以说到，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产业工人，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靠工资过活的人群里实际占少数，这里，只有阿根廷是一个例外。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因而就必须包括一切完全或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力为生的人群；那就是：产业工人、服务行业工人、家庭雇工、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以及打零工和临时工的城乡劳动人口。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四种人——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和大部分时间失业的劳工——这就是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的情况。他们为数之多往往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甚至在黑非洲的一些国家中（如德西亚、南非、安哥拉、刚果），他们在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之多。在古巴革命运动中，由于首先参加游击队的都是贫雇农，革命因而得以农业工人以及农村失业人口为基础，最后才跟制糖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古巴革命所以能够很快地达到那样高的觉悟水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群众基础。
（d）农民阶级的积极作用。在扩展游击队的活动中，农民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积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没有想到的。它表现出了一种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阶级多少有些不同的社会特性。然而，为了防止误解或混淆（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会引起极其悲惨的结果的，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之间的两个根本的差异这里必须说明一下。

首先，农民阶级为争取以私有制形式占有土地（虽然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而进行战斗的革命作用和农民阶级在对农村所有制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保守作用之间的差异。东欧和中国的经验已再次证实了俄国的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地方的农民，为了使自己变成土地的主人，在反对地主、高利贷者和买办的联合势力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它作为一个阶级，只是在工人国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前，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种关系的基础只能是农民阶级中最穷苦的部分，因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如果希望避免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只能逐渐地改变。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并不是一切农民普遍都是革命的。在农民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的存在，无疑对某些东南亚国家（马来亚、泰国、甚至锡兰）的革命运动，起着巨大的遏制作用。

其次，具有数百年小商品生产历史的古老的农民阶级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他们或者已经占有土地，或者始终渴望着占有土地——和部分或全部生活在部族所有制（公社式的）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人口的集体主义倾向之间的差异。后面的这一阶级，和传统的农民不同，他们本质上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因而，他们在不断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可以是无产阶级
的同盟军。在某些国家，这一阶级的存在可以使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强有力的半无产阶级性质。可是，甚至在这种极有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对这些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加以过高的估计。由于处于悲惨的被压迫的境地，由于他们总是“除了锁链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这些群众的确可以给人类提供最光辉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榜样。然而，要使他们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特别是纪律性、自治能力和现代工业的观点等等，那就必须使他们处于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工人国家的教育下，才有可能。

为了在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中争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必须学会如何使这些劳动群众的基本的进步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严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教育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无条件地支援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的工作，必须和为殖民地革命争取物质支援的实际活动结合起来。对于殖民地国家中争取自由的战士们，主要的任务是把他们基本的革命意识提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高度，要使他们理解今天世界革命的三种力量之间的辩证的、互相影响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是不能希望它们自动完成的。在一切情况许可的殖民地国家中，教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建立各种流派和独立的政党乃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建立能够对本国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能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具体解决办法的第四国际的支部，现在的仍然是一切国家的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为了确定当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总的进程中的地位，如果光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如在什么地方曾经给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或者从经济的领域（如在什么地方还没有造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威胁）来考虑，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
注意到这一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对在官僚主义制度下蜕变变质的一些工人国家中的彼此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能够使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资产阶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变化。不过以法国的情况而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的确阻止了戴高乐的破釜沉舟的独裁政治，使它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稳定。在戴高乐于1958年5月上台时受到严重打击的法国工人阶级，终于得到了一个喘气的机会，这对于使他们能够恢复士气并重新积蓄力量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葡萄牙来说，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的革命的爆发，对于破坏萨拉查的独裁政治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革命前夕的气氛，把推翻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萨拉查的倒台势必将加速西班牙的革命，削弱法国的拿破仑式的政权，并加强西欧劳工运动的新的斗争热潮。

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还没有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运动的激进化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最多它只不过是提高了早已在某些重要层面上普遍存在的思想觉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慢慢相对的变弱了。可是它却以间接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影响，它推动了新的反抗运动，反对旧的领导集团对殖民地革命采取观望、消极或甚至背叛的态度，或者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般比较低下的政治水平发生了新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那些新的基层一向呼声极高的法国，而且还发生在某些别的欧洲国家，特别像西班牙，还有美国，在这里，由于有机会和古巴革命互相呼应，这就为新的一代先锋队打开了进行激进政治活动的大门。
同样的，由于殖民地革命，特别是非洲革命对黑人运动的影响，这就帮助了一个新的激进的左翼的形成。在上述所有这些情况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在这些新出现的先锋队中争取最出色的分子，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并使他们同左派的群众运动发生联系。

殖民地革命对于工人国家中逐渐觉醒的群众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一般说来，殖民地革命帮助克服了丧失斗志和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情绪。这些群众对于殖民地革命（主要对中国革命，还有1969年以后对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一直是极为关怀的，而且这种关怀伴随随着休戚相关的感情一直有增无已。同时，由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反革命的策略，并由于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统治集团对殖民地革命怀着矛盾的感情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促成了工人国家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分化，这首先表现在青年群众同官僚主义集团之间，后来则更表现在毛泽东派和赫鲁晓夫派之间。可是，毛泽东同苏联官僚机构中最保守的一派结成机会主义的和无原则的集团，再加上他对于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抗拒，正如我们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情况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的，使这种分化在许多工人国家的共产党中受到了限制，没有发生实际的结果。殖民地革命的另一作用则是它对殖民地学生力量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些学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一块的气氛中感到呼吸困难，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像在莫斯科和索菲亚发生的学生示威运动一样，超出语言的范围，而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情绪。由某些超出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外的党派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出现（如古巴、阿尔及利亚），对国际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极有力的分化作用，这是很有利于革命的左派势力的发展的。
如果說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我們還不能很清楚地看出殖民地革命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直接影響，中國、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國家的建立对于各国共产党以及对于整个革命領導力量的形成，却产生了强有力的部分作用。

由于許多特殊的原因，南斯拉夫和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能够使它们的“倾向”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充分的發展。南斯拉夫极力想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亲密的机会主義的联合。这就使得它很难同殖民地革命中的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进行合作。在西欧，他們对改良主义的官僚主义集团也采取了一种机会主義的道路，这同样也使他們难于同那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发生有效的联系。可是，南斯拉夫内部进步力量的发展对于工人国家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的。比如說，工人委员会的“重建”就在特别像波兰和匈牙利些国家中引起了反响，虽然由于工人委员会并不掌握政治权力，它的發展不可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中国共产党，由于北京对某些（并非全部）民族资产阶级政权怀着仇恨，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成功地获得某些影响。可是由于中国和没有改建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进行无原则的联合，并由于中国国内仍维持着官僚主義的統治，它在帝國主義和工人國家中的影响不免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是在这两个主要問題上，各大都城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以及工人國家中的工人、青年和农民感到他們不能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过，中国人对陶里亚蒂之流的人物进行的批判却在許多共产党的群众中得到了赞揚。

古巴的胜利标志了世界革命历史的一个新紀元的开始。因为，除开苏联之外，它是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一发展，不管它所涉及的国家大小如何，在世界革命中却是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它必然会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而且，正如可以料想到的，这种浪潮以殖民地，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为最高。在其它工人国家中，也是显然存在的。卡斯特罗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更证明了古巴这一发展的重要性。

除去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卡斯特罗主义在欧洲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对其它殖民主义中心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也是极有限的。其原因之一乃是古巴的领导集团现在还不十分理解，它如何才能及好地扶助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的复兴。

通过殖民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使更多的、特别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工人国家出现，将会帮助加强和充实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使人们能看到一个更长远的远景，并从而理解到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党派的国际组织的重要。这一历史可能性的任务的完成，既部分地有赖于第四国际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有赖于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能协助它取得新的胜利。

使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这个新的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密切结合也将有利于（特别是在工人国家中）自觉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发展，将帮助防止“铁托主义”的倾向，并更好地保证群众的压力和直接行动进化为政治革命的清洗力量。从历史的观点看，短期内即将成为可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也将表现出接受卡斯特罗主义的新的趋势，因而将帮助古巴人和在这一浪潮影响下的人们更充分地了解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
三、政治革命

1923年以后，苏联群众在政治上越来越消极，对政治越来越漠不关心，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国际革命失败，第一个工人国家从而陷于孤立；（二）由于国家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这样，苏联广大群众被迫日日为生计操心，无暇旁顾。苏联群众还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始终受到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严重危险，这种感觉对他们政治上的消极也不无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那时起，有利于苏联群众不关心政治的一切因素已日渐消失；有利于群众对政治发生兴趣和鼓舞他们士气的条件在日渐成熟。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孤立已被打破，不仅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整个世界。斯大林死后，群众的生活标准很快地上升——这是在技术和经济日益进步的条件下群众对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的结果——人民因而有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精力用于文化政治的目的。苏联一方面成了世界的第二工业强国，甚至还在某几个技术领域内领先，一方面生活标准却相对地低下，二者相形之下显得极不相称，这就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经济要求。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依旧存在，官僚主义集团还自觉地利用这种威胁来按时压制反对的声音。然而，群众毕竟感觉到在这个火箭武器时代，苏联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新的力量和地位，而官僚机构的领导人自己也在不住地吹嘘他们有能力给予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自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
逝世以后，那些工人国家所取得的总的进展已逐步消除了促使群众和他们的先锋队对政治抱消极态度的各种原因。在东欧的工人国家中，由于群众有一种受到民族压迫的强烈感觉，这种进展的速度加快了，虽然情况也变得愈加复杂了。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有助于促使下列事件的发生：1953年6月16日至17日，东德发生总罢工和暴动，1956年春天波兰发生华沙事件；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发生政治革命；1957年初，在中国的“百花齐放”时期，工人先锋队和共产党反对派中间的某些阶层又重新发挥了政治战斗性；苏联群众向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结果赢得了1953年的让步（粉碎了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权力，解散了奴隶劳动营，根本改革了暴虐的工厂劳动条例），随后是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由于官僚机构对经济政策的总路线作了根本的改革，从1958年起，群众的生活标准就一直在不断上升，最后是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新的政治让步（新的政治权利写入了新党纲，受到斯大林镇压的无辜牺牲者有一部分公开恢复了名誉，等等）。

在苏联，群众的压力开始于对抗斯大林破旧式独裁中最野蛮、最暴虐的制度，参加这一普遍反抗运动的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随后，这种压力开始向经济领域内分化，所有社会阶层也都参加了，但各有各的一套要求。此后运动又向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的方向发展，这种要求最先由官僚机构内部的人员提出，他们要求了并获得了一种使官僚主义者作为个人可以得到保障的稳定局面。这就是在施政方面扩大参与者范围的改革。这些改革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从农民中听到的第一阵雷鸣，是要求集体农庄中的民主，这种呼声在苏联国内到处都可以听到。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在跃跃欲试，提出艺术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这类问题，预示对政治上的民
主将要提出要求。官僚机构中的某些部门也显示已经认识到客观的需要，那就是必须放松斯大林主义对生产力上的束缚，以便更好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像工人管理工厂、通过民主选举的委员会来建立管理制度等这类基本要求还没有提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开始，这类要求迟早要提出的。苏联的官僚机构之所以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那么敏感，其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南斯拉夫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会吸引进步的苏联工人、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官僚机构中的下层人员，尤其是工会系统的下层官员，因为他们和无产阶级有直接的接触。

必须明确划分普遍的群众压力、开始采取群众行动（必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以及开展真正的政治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事件的高潮里，这种差别有时不容易明确划分，因为在事件的同一进程中，各个阶段都彼此衔接，相互之间并无清楚的界限。例如1956年的波兰事件，以及导致匈牙利革命第一阶段的那些行动，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论点。尽管如此，关于苏联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略作一些概括。

首先，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趋势是群众压力而不是群众行动。其中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伏库泰和其他奴隶劳动营的暴动可能在加速清算这一完全反动的制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某些地方性的罢工在住房和合理分配消费品方面对工人们争取到不少让步。学生、青年团体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某些行动也许有助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群众所作的政治让步。但是总的说来，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却始终停留在群众行动的水平之下。在政治生活方面慢慢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的压力，当然是使官僚机构梦寐不安而不得不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 37 ·
这些让步远不能满足群众并哄骗他们沉默下来，相反地，他们的胃口却更大了。群众对他们的低生活标准比斯大林死前更加不满，如果在程度上并不真正比过去大，至少呼声确实比过去响亮了。这种看上去仿佛是矛盾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是为人所熟知的。对官僚机构来说，让步的代价是获得一种普遍的改良主义气氛，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这种改良主义气氛使群众觉得，继续施加压力可以赢得新的重大让步。他们还没有看出有必要或者有可能采取更广泛的群众行动，这种行动的规模势必会扩展到革命的程度。

这种气氛也可能会持续一个时候，但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群众的压力和官僚主义的改良之间固有的辩证关系中潜在的两股力量，使这种气氛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第一股力量是群众倾向于将在纸上答应给与他们的政治权利变为现实。这在某一点上可能导致跟官僚机构的某些权力部门发生公开的冲突。第二股力量是群众的要求有进展到要求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的趋势。这方面的压力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联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有明显的反映。事实上，在到达公开冲突阶段之前的让步越大，苏联的经济越发达，那么冲突的性质将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发生政治革命的时候，力量的对比对群众将越有利。

二

在分析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主要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时间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即使苏联没有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它对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许仅仅是因为苏联证明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能够做到
在经济发展上和提高生活标准上使一个落后国家赶上一个先进国家的水平。万一在不远的将来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领导能在苏联执政，从而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外建立革命的团结，那么把殖民地革命引入工人国家的过程就一定会大大地加速。

这在实践中要采取双重形式。苏联的新领导要结束莫斯科目前所采取的依靠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结盟的总战略。自然，新的领导也要继续推行列宁主义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与帝国主义发生公开冲突时，要给与前者以有批判的支持和物质援助。它要制止的是那种把革命先锋队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只要去掉了这一政治和物质力量的源泉，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就会很快地失去对舆论中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的控制。这同一政策的另一面是要排斥今天控制着殖民地的大多数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它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对苏联亦步亦趋。苏联的新领导要援助那些共产党内愿意坚决向左转的反对力量，或者支持那些在传统的共产党外面涌现出来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尤其是在某些殖民地国家里，这些共产党或者是十分薄弱，或者是因为过去犯过错误或出卖过革命，在殖民地人民群众眼里已威信扫地。依靠上述两种办法，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会更容易地取得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随之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殖民地革命以建成工人国家结束的趋势就会大大加速。

政治革命在苏联早日取得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加速甚至会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如果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建了苏维埃民主一一象征着自二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次建立的有真正民主和精神自由的政权，质量上要比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高出一筹一一那么就会一举消除帝国主义国家内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共产主义所持的主要反对意见。这还会迅速
导致旧的共产党内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解体，它将会向四面八方分化，主要分化为一个左翼的改良主义派和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类国家内，共产党尽管奉行着机会主义路线，却继续控制着群众运动，如果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在这些国家里就会迅速发展起一个群众性革命政党，只要客观的有利条件一成熟，就会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国家里，也会通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被再生的苏维埃民主所吸引——和旧的共产党党员中的优秀分子的溶合，出现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样的话，革命领导的危机就能最后得到克服，而客观存在的新的革命形势就会给无产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

但是不管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后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何诱人的后果，这一过程却可能要比我们所盼望的拖延得更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如果把一切都压在一张牌上，同时却忽略了在苏联的政治革命成功之前可能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取得突破的真正机会，那当然是一个错误。总之，在早日的胜利尚未来到之前，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不断进步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可能发生的影响估计在内是明智的。

三

如前面所述，工人国家经济和文化的不断上升会对殖民地人民群众发生重要的影响，使他们对于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失去信心，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解决策略办法增加信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工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使它们有可能粉碎帝国主义从许多落后国家买进农产品的垄断，同时也使它们有力量提出一个富于吸引力的
建議，以代替帝国主义附带苛刻条件的装备租与和发展计划。工人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革命，也有利于在这一革命的痛苦过程中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割断联系的趋势。古巴的例子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显然，在华盛顿拒绝购买古巴糖的时候，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挺身而出当古巴的新顾客，帝国主义的突然封锁和迫使古巴屈膝的企图很可能更加见效。

工人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比重虽然日益增加，但在与落后国家的国际贸易中总的说来还远不能对帝国主义起更大的作用。在未来几年中，工人国家的联合经济力量似乎还很少可能超过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经济力量，除非是某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那情况当然就不同了。不应忘记，苏联和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上所起的补充作用，也远不能和西欧资本主义强国相比。同时还应注意到，只要政治革命尚未在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就不会热中于充分利用因工人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而带来的革命可能性，因为这是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结盟的方针相抵触的。

有人认为工人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进步本身就能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或者能对在这些国家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出重要贡献，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排斥。这类的进步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影响可以在两个方面看到：在客观方面，为某些工业产品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在主观方面，因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产生或引起的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偏见，会慢慢地消失。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标准与西欧越接近，这些偏见的消失也会越显著。但是，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不足以使规模较小和丧失威信的共产党复兴，也不足以使法国、意大
利、希腊等国家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官僚主义领导发生奇迹，一下子转变过来，采取革命的方针。

因此，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说，主要的贡献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收获对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这在下述这些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共产党之间内部越来越分化，真正群众性的反对势力有可能在几个共产党内部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和斗志昂扬的向左转的群众在某些共产党内部而为一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由于第二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产生的结果，许多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已迅速消失。

四、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自从战后在西欧掀起过革命高潮并在美国出现过罢工浪潮以后，工人运动以及它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预料之外，那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竟得到空前的扩展，这种扩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是就是说，差不多在半个世纪里——从未有过的。这种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加上西欧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所采取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和各国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领导，在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可能获得暂时的相对稳定。因此，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也就暂时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了。

这一暂时的发展孕育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所
抱的修正主义看法和失败主义看法。这两种观点中的无论哪一种都排斥了西方的无产阶级在未来长时期内现实地争取权力的可能性。既然谁也不可能不看到世界总的潮流是在冲击资本主义，鼓吹这些概念的人们就希望主要寄托在依靠外力来最后推翻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圈子里流行着一种理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会最后解决在西方赢得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要苏联人民的生活标准高出于西欧和北美工人的生活水平标准，那么这些工人就会被动地转而共产主义。另一种理论，由斯威齐和萨特这类理论家多少有点自觉地提出，就是殖民地革命会最后打倒帝国主义，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先锋队除了积极援助殖民地的革命者外，再也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这两种理论都基于同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认为在今后数十年内西方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随后为了冲淡这一悲观主义假设的刺激性，就提出其他的替代办法作为行动的目标。但是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替代办法都是不现实的。

即使在今后十年内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量已经赶上了美国，那就要赶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至少还需十年，因为这是当前的生产和过去积累的消费物资以及公益粮食的总和。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美国和西欧工人的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当然会改变这一前景。可是那样的话，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革命后果，显然要比苏联的经济成长所发挥的诱人力量重要得多。

即使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那么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这件事本身就会推翻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不会自动地导致萧条、经济衰退和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维护这一理论的人们是从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的，就
是假定西方的无产阶级基本上“满足”于目前的经济“繁荣”，认识不到那些渗透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深刻的离心现象。

至于说光靠殖民地革命本身就能够使西方帝国主义崩溃的理论——我们前面已经作过分析，说明这个前景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这两种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失败主义理论最后必定会引向这一荒谬的结论，肯定帝国主义的寿命还很长。

这些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的荒谬之处在于它们浅薄的机械经济定命论。其不言自喻的前提是一个工人阶级如果有相对高的生活标准，就不愿意或者不可能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这一假设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经验上，都是没有根据的。从理论的角度看，应该明白工人们的态度是由许多力量决定的，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只是许多其他先决条件中的一个。工人所享受的高生活标准究竟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因而像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果实必须予以保护呢，还是对工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伙“慈善”的主人所施舍的“礼物”呢，这二者是有天大的差别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高生活标准不但不会起阻碍作用，反而能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激发工人们的斗志；在第二种情况下，高生活标准却能起瓦解士气的作用，给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工人运动的右翼理论家所散播的阶级调和的幻想提供营养。从经验的角度看，马克思曾收集相当多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在上世纪赢得十小时工作制以后对他们自己所起的革命影响。罗莎·卢森堡曾要求人们注意工会取得的一切基本成就所产生的革命影响。最近在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所掀起的罢工浪潮——都是由薪金极高的工人们发动的——再一次证明，认为工资最高的工人都自然而然地被“资本主义繁荣”所“腐蚀”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不论理论或经验，都证明了最革命的后果并不产生于实际
工資和生活標準的絕對水平，而是產生於它們短時期的相對波動。如果資本家企圖甚至稍微降低一些經過艱苦斗争贏得的高工資，或者如果工人們普遍地擔心這樣一種企圖正在醞釀中，那麼在某种情況下，這就可能引起大規模的階級行動，這些行動還會迅速地從防禦階段轉入进攻階段，而且圍繞著過渡的口號會把客觀上具有革命先驅意義的斗爭提到日程上来。這類斗爭甚至可能導致革命形勢的形成。

西方的兩代革命家都受的同样的教育，相信工業化國家內的革命形勢是以大的經濟危機或者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因戰爭或軍事失利的全面崩潰為轉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理論和歷史又一次證明，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了，這只是導向可能的革命危機的一條道路。1936—1937年的罷工大浪潮，以及隨之而來的西班牙革命，都不是發生在戰爭結束之后或是在某個經濟大崩潰的頂峰。它們發生於1929年和1938年兩次大的經濟危機之間相對的經濟恢復時期。整整一系列的有利因素——最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威脅和工人們想要補回大經濟危機時所受的損失——使得這次罷工浪潮在美国和比利時具有革命先驅的性質，在法國則具有革命的性質。今后五年至十年內，在帝國主義國家里產生這類革命的危機和機會，其可能性要比產生1918—1919年或1944—1948年的崩潰類型的危機為大。

當然，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否认長時期的經濟“繁榮”会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带来变化。在長時期貧困中所形成的各種習慣——對消費動產的漠不关心，對共享金錢立即表示團結一致的趨勢，對日常犧牲的习以为常，對許多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整個上層建筑的漠不关心和敵意——逐漸消失了。新的習慣和思
想方式开始出现。这些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从抽象的“唯心”观点来看待这些变化是错误的——贫困、堕落以及把需要降低到纯粹的生理水平等现象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十分危险的。新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只是在它们于特定的条件下用来阻碍或者促进阶级斗争的。美国工人的汽车——不久之前还被许多人看作是“美国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已成了一个完全新的、急进的罢工战术的工具。欧洲工人的机动踏板车和摩托车在比利时总罢工时也被用来组成罢工别动队，这是未来比利时无产阶级革命自卫队的胚胎。

如果说昨天的面黄肌瘦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某些明显的优良品质似乎已在今天的西方工人身上丧失，那么另外一些新的好品质却也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这完全是西方无产阶级所赢得的更高生活标准和文化标准带来的结果。技术工人和资产阶级技术员之间的知识差别事实上已经消失，或者已经大大减少。今天，西方工人在工业技术上已比他的父辈或祖父辈更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自治了，他自己也更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起一种自觉的领导作用。

今天的工人也更容易理解一切因素之间的全面经济的相互作用，一切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的必要性和实际的目的。许多国家内休息时间的增加说明了群众参加政治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一条件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真理，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给工人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坏教师，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里，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如何产生，其要点可以简略地归纳如下。

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先经过第一阶段的迅速扩张，这阶段的主要刺激是军备、欧洲和日本的新建设需要（包括绝对和相对两方面），也就是说，重建破坏了的城市和工厂，使过时的装备现代化以及在新建设和发展计划上新世界战争的双重刺激下所掀起的技术革命的大浪潮。此后它就进入了另一阶段，这阶段里扩张的力量正在慢慢地自行削弱，经过新的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尖锐，而这个世界市场由于殖民地革命的胜利和工人国家的经济扩张，已经变得相对小了。这一日趋激烈的竞争更因西欧共同市场形成而变本加厉，最后平均利润率降低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严重。归根到底，这一趋势也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后果，换句话说，即是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带来的后果。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反应，资产阶级将会按时方方设法来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或是放慢增加实际工资的速度，或是冻结工资，甚至企图减低实际工资，特别是在工人的相对工资最高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对这些进政的回答会导致大规模的斗争，逐渐造成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只要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广大的先锋队，有充分的自信心推行社会主义方式来管理经济和国家，以代替资本主义方式。这反过来主要依靠工人运动中广大左翼力量的活动和影响，要它来教育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什么必须为社会主义方式管理经济和国家而进行斗争，要它来树立自信心并建立一个能够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局部斗争而进行革命斗争。
的机器。

这当然只是个大概的模型，里面应该包括各种特殊的灵活变动，工人阶级为反抗一个想限制或者收编其政治基本权利和工会基本权利的企图而采取激烈行动的可能性（反抗一个擅自采取"强硬"措施的企图或者反抗突然出现的法西斯危险）；对一个突然出现的财政或政治危机采取迅速行动的可能性；群众反对发动一次新的殖民地战争或者反对一般的备战政策等等的可能性。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要的一点是通过符合各国特殊情况提出一系列过渡的要求。通过与群众运动的密切联系，把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与群众联结起来。目的是尽量鼓舞和扩大群众斗争，尽可能争取在这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开始时提出最基本的要求，随后在过渡的口号指导下把这些要求发展到争取权力和建立双重权力的政体的水平。（工人执政；争取一个工人政府；一个工农政府；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以及其他的变种。）

在美国，能在国内形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战斗浪潮极其可能会按照一个类似的模型出现。支付差额上长期存在的赤字，伴随着国债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取消而产生的越来越厉害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改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想冻结或降低实际工资的企图，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加间接税，所有这一切都会迫使美国工人阶级起来采取措施进行反击，从而破坏资产阶级与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之间的联盟，掀起工人阶级斗争的浪潮。

日益增加的永久性失业人数和工会力量的相对削弱更会给这一酝酿中的斗争火上加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大的敌对行动就会引起工人阶级大规模的反抗，迫使某些工会领袖中断与民主党的联盟，最后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工党的出现开辟道路。
因此，在今后数年中最可能的变动如下：殖民地革命会继续下去，席卷一些新国家。随着更多的工人国家的出现而日益加深其社会意义。它不会直接导致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但是它会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如目前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的。工人国家内群众的压力也会继续下去，在某些工人国家内还有发展为日趋激烈的群众行动和可能开始政治革命的趋势。这两种发展都有利于鼓舞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从而加剧了由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速度的放慢所直接产生的那一趋势。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只是葡萄牙或西班牙，而且包括其他的西欧国家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在今后十年中因此是存在的。这些国家内任何一国的胜利都会反过来加速苏联这个关键性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如果政治革命还未在那里发生的话，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美国革命胜利的加速。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会对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使其经济发展达到可能的最高速度。

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起，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疯狂地准备第三次冲突。事实上帝国主义始终在发动战争，规模时大时小，目的是要遏止世界革命的前进；如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肯尼亚、朝鲜、苏伊士运河、阿尔及利亚、老挝、安哥拉等地的战争，外加一些帝国主义的干涉，如艾森豪威尔在危地马拉和黎巴嫩采取的行动，肯尼迪对古巴吉隆滩的进攻。向苏联和中
国发动核战争的主导计划在过去十五年内有几次到达了危险的程度；在冷战的开始几个阶段、在美国侵略朝鲜时期、在奠边府战役上、在苏伊士危机、1960 年的柏林危机中，以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 1962 年秋天的古巴危机中。

有四个相关但的因素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尚未发动一次全面的原子战争。在周期性的重整军备的浪潮推动下，经济扩展仍有可能；还没有重大的经济危机出现，带来迫及眉睫的威胁；通过与表面上“中立”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事实上的联盟来转移殖民地革命的希望依旧存在。（例如老挝问题的所谓“中立”解决，在这问题上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帮助了美帝国主义，迫使老挝的革命陷于停顿。)

还有其他的考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者，迫使他们把日程表上的时间推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证明是不可靠的，不能依赖他们进行其他战争。面对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和“送我们回家”的示威，美国当局不得不让他们回国，重新建立一支完全新的军事力量。此外，还得把国内可能反对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力量估计进去，并设法加以压制。实行麦卡锡主义的那些年使美国国内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受到很严重的侵犯，但是公众是否已真正适应于接受另一次战争却依旧是个疑问。朝鲜战争的经验在这方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很快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这次冒险终于被迫停止。殖民地革命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促进了美国的黑人运动的发展，使它成为一股富于潜力的独立力量进入了政治舞台，将来能轻易而易举地与工会中组成工党的任何行动以及反对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力量联结在一起。美国军队跟与他们为敌的那些力量接触以后，也有可能受到革命思想的“渗透”，使帝国主义把这一考虑估计在内以后，就更踌躇
躁不前, 不敢贸然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了。

此外, 核战争给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带来了新的因素——自杀的真正可能。一场可能自己毁灭自己的战争失去了战争的主要目的——胜利、掠夺战利品。美帝国主义者挥舞氢弹已有许多年, 可是总觉得无法与希特勒媲美, 无法在自己收集起来的火葬柴堆上点火。这样, 尽管有某些战争贩子在竭力搜罗握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们发动战争, 他们却总有所顾忌, 被迫推迟最后的摊牌。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一制度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危险, 因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他们就在一直设法在内部巩固这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重大政策的后面的是这样的看法, 就是认为要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下去, 或者延迟它的死亡, 只有通过世界规模的防御战略来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那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同那些被封锁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东南亚条约组织, 等等）紧紧拴着的卫星国家一起在担任世界资本主义警察力量的角色。

但是, 美帝国主义虽然必须动员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力量——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来合力进攻工人国家,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却远不是一块磐石。像英, 法这类旧的帝国主义强国已被降为从属于美国巨人的仆从了。在它们看来, 扩军备战、接受所需要美国布施来支撑它们的结构, 对于它们是极其有利的。然而, 经验已经教导它们, 战争本身并不一定像备战一样有利。而这一基本真理尤其适用于核战争, 因为战争的结果会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高级生物, 包括资本家在内。因此, 离世界末日越近, 它们就越表现出裹足不前的强烈倾向。像戴高乐之流所采取的一个突然行动, 就会出人意外地暴露出资本主义联盟中间很深的裂痕, 从而给西方的统治者们带来新的疑虑。
殖民地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势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但是只要这种变化并不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即消灭，两个主要的敌对阵营的首领们之间进行一次新的妥协总是可能的。只要它们并不面临一个迫及眉睫的重大威胁，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双方总是会双峰对峙，谁都企图取得更好的地位，或者避免陷入更坏的处境，谁都想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赢得新的盟友或者避免失去旧的盟友；只要一方真有发动战争，另一方总会设法妥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赌博。双方试图保留的“安全区域”究竟有多少安全可言呢？由于“错误”、“误会”或者一个愚蠢的疯狂行为，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一“安全区域”冲破。

科学家们差不多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一次全面的核战争如果不会把全人类消灭，至少也会把人类文明全部摧毁。因此显而易见，世界工人运动的主要战略目标不可能是在一场世界规模的原子战争中争取投机性的胜利。要建设共产主义，人类必须存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物质下层建筑也是必需的。认为光靠“共产主义觉悟”就可以以在放射性的废墟上建设共产主义的任何假定，其水平都已在马克思主义前的原始空想家之下了。目标必须是防止一场世界性的原子战争。

有一个时候，苏联核武器的发展对于防止一场核世界大战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如果没有苏联的原子弹，朝鲜或越南的地方性战争的结果，一定已经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到了某个阶段，防止一次核世界大战的唯一方法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来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这是办得到的，因为原子武器不能在内战中使用，否则就等于是一个整个资产阶级集体自杀——尽管出现过“宁死不变红”这样的疯狂口号，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一场核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最现实的办法是在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里推翻帝国主义，清除它的武装。这必须是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互起作用的过程所产生的最后结果之一。这一过程的发展会在帝国主义者的思想上起二重作用。随着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最后远景也就越来越失去信心，从而也越来越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作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同一过程的发展也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避免来不看将来。当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向革命乖乖地投降之外别无出路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作重大的冒险。可是在某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动力会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及时干涉，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归根结蒂，只有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胜利，尤其是美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把人类从核毁灭的梦魇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革命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第四国际就是以这种办法来反对“和平共处”和在一场核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这些乌托邦幻想的。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在今天也可以归结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呢，还是整个人类被核武器所毁灭？

这样，革命马克思主义今天给世界无产阶级的所有部门带来了一个单一的、完整的世界革命的概念，说明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解除帝国主义武装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样，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单方面的和平主义性质的过渡口号不仅不像旧时代的和平主义那样是“反动的”或者“乌托邦”的，相反地，只要它与其他的过渡口号联结起来，最后提出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这类口号还是能起极其进步的作用的。
五、第四国际

1963年是第四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离革命社会主义被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在思想上，我们的运动是结了丰富的果实的，尤其这一收获就远远超过它存在的价值了。在它的纲领性的宣言中，在它参加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它已证明自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和传播者。它的许多论点都是正确的，因此反对它的敌人不得不从它的源泉中借用武器，虽然在方式上是部分的、片面的或者是歪曲的。

列昂・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领导了使苏联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的斗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富农破坏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斗争早在1927—1928年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今天，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托洛茨基主义者为反对斯大林臭名远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所展开的斗争是正确的，正是这种开始于三十年代初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给希特勒铺平了道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人民阵线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评，也通过最令人痛心的方式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受到一连串不必要的失败，尽管客观条件已经最有利于他们取得胜利，例如1935—1937年在法国和西班牙，1943—194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等。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反对斯大林的罪行的揭露和指责，目前终于在苏联官方的教科书中得到了应有的反响。这一反响开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检讨。托洛茨基主义
者把官僚主义的性质解释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正确性，已被一切认真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所接受。它甚至在南斯拉夫政府通过工人会议和工人自治的实验所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做法中得到了反映。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一开始，一些多少带点自发性的工人会议就出现了，这充分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了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列宁主义准则而展开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从下面的情况中还生动地说明，甚至某些最老的托洛茨基论点也是适合时宜的。在1923年，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建成的工人国家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化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无任务这种官僚主义化程度加以限制，方法是发展一切主观与客观的有利条件，使工人阶级得以从事政治活动并参与国家和经济的管理。总之，不应该否认这一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党也不应该向官僚主义集团的压力屈服，更不应该使自己成为帮助官僚主义集团篡夺权力的工具。在198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古巴工人国家中刚冒头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跟着又指责官僚主义的基础在于国家和经济机构中脱离工人群众、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分子的攻击，听去很像条约四十多年以前在苏联听到的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演说的重复。

同样，不断革命的理论由第四国际作为珍贵的遗产从托洛茨基那里承继下来并赋予生命力，很久以来已在正反两方面完全得到证实。（反面的例子如革命的无数次失败，如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内资产阶级领导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土改；正面的例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历史任务——特别是土改——得以
完成，总是通过工人国家的建立，如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估计，今天已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所接受。托洛茨基对苏联的阶级性的分析使我们早在1946—47年就能预见到，甚至在那些受到苏联官僚主义集团的占领和残酷剥削的东欧国家里，只要它们的结构一旦适应于苏联的结构，那么那里显然一蹶不振的生产力不久之后一定会高涨。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就能预见到苏联工人阶级力量的高涨和斯大林主义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以及它们最后一定会导向政治革命和列宁主义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在国际工人运动内，唯独第四国际能在西欧“繁荣”的高峰和戴高乐上台执政的时期，始终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保持信心，从而正确地预见到1960年开始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新工人阶级斗争。

二

如果我们从思想领域转到组织领域，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显然不那么成功了。除锡兰外，第四国际还未在任何国家产生持久性的群众性影响。它的分支只是未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核心，而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不是那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相当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

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是正确而有力量的，但是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它的力量却是薄弱的，两者之间的罅隙早已一再受到注意，特别受到来自一些大共产党和殖民地革命组织的新阶层的注意。他们表示同意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性的观念，但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上是否能有所成就，开展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否有
可能性，却始终抱着怀疑。这个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加以慎重的考虑。

首先，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除世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之外别无其他的利益。它对于建立一个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仅仅是施加压力的集团那样的“组织”并不感到兴趣。它想要建立的组织是为了达到明确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的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采取明确的手段的组织。这就需要有尽可能高的觉悟，因而也就需要有彻底的诚实和廉洁，不管其直接后果有什么痛苦。这些品质的具备往往是同迅速建立组织相矛盾的。第四国际除了循着这条困难的道路前进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只要它代表着那一致和政治觉悟，它自己的最终命运同这个进程是不可分的。

为了更合理地对第四国际的力量与弱点作出估价，最好的办法是拿它与它的先驱者作一比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国际，从来不曾有过巨大的组织力量，尽管它在理论上成就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增加了贡献，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组织。但这一切都在1914年的大崩溃中瓦解了。为了在俄国取得胜利，左翼力量发现有必要从这个母组织中分裂出来。第三国际在布尔塞维克的好心领导下发展得很快，但是得逊大林主义的鼻息，后来终于被可耻地解散。作为克里姆林的送给罗斯福——帝国主义联盟的政治首脑——的战争礼物。显然，建立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国际并使它成功地达到目标，并不是容易的事。

只要记得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之战斗的纲领，就会发现责备运动在组织上停滞不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运动比起它刚开始
始的时候（苏联左翼反对派成立的时期和运动的创始人被暗杀的时期），已壮大了不知多少倍。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支部不到十个；出席1948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支部不到二十个。今天，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已在四十个国家内成立，这些组织绝大部分都要比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更为强大——要是那个时候还有它们的话。

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必须予以强调。第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最近几年内有显著的壮大，而且与世界规模的革命浪潮的普遍高涨多少有联系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客观需要的，它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于某些特定国家里的昙花一现的特殊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其他共产党运动中其它反对势力相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后者在开始的时候实力要雄厚得多。在这些势力之中我们可以列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德国的布兰德主义者、美国的洛夫斯东主义者、西班牙的卡塔兰联盟、日本的共产主义同盟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派别。所有这些“民族共产主义”反对势力都完全不能发展为世界性的组织，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已经消失，就是甚至在国际基地上力量也比不上托洛茨基主义势力。应该注意的是，有一股竞争的反对势力——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者——已 经执政近二十年，然而已经证明它无法在国际上作一次认真的挑战。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已一再证明对于那些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具有吸引力，不管这些青年是在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或者是在像美国和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希腊和英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就清楚地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数以千计的进步分子所感觉到的具有国际规模的强烈需要的，这些进步分子都在日渐脱离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
路线，正在寻找方法和手段来建立一个能领导群众斗争取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领导。

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正确性同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的运动在组织上的软弱性之间的矛盾不是新的。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它一般总是以提出这个疑问的形式出现：“要是托洛茨基是那么正确，他怎么会被斯大林夺去权力，后来怎么会无法把它夺回来呢？”

在这个以个人为象征的问题上，有一点是没有看清楚的，那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代表的敌对社会力量的浮沉。托洛茨基不能在1924年以后保持权力这件事，是和他能在1917年这样的形势中取得权力这件事直接联系着的。在斯大林所代表和体现的反动社会力量猖獗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因为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得不与无产阶级共命运，暂时在苏联失势。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托洛茨基的明星又开始在苏联上升了——换句话说，也就是那里的无产阶级再度开始进入政治舞台了。

三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同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要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上的衰败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包括解决运动中最困难的组织问题，即非从这个基础出发不可。

光是证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理论上正确，并不曾自动地导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壮大。托洛茨基的理论解释了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怎么会失败，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怎么会失败，希特勒怎么会在实际上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上台执政，西班牙革命怎么会失败，以及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运动的大高涨怎么会
毫无成就。可是这些失败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失败，因此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失败，而它所遭受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它的干部四分五裂，有的丧失了信心，有的投降，有的入狱，有的竟然被暗杀。世界的努力集中在最可怕的力量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到希特勒。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遭受过这样的迫害，也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像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样除了自己的队伍之外，简直从外界得不到任何支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先锋队终于能坚持下来，这是人类意志力坚韧的不朽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高涨，本来似乎可以指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在这一新的革命高潮中首先得到好处。但是它与世界革命进程的相互关系却证明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在最后和在长远的时期内得到好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苏联的胜利。这一胜利开始了连锁反应，其最后结果在目前还难以预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仍然像过去一样，转向第一个工人国家寻求鼓励和指导。但是苏联的政权却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手中。结果，这一官僚机构——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这一矛盾现象在当时就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解释。我们还预料到正是那些加强这个官僚机构的力量本身，不久将会开始破坏这个机构的基础，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灭亡。然而，直到1956年，这一进程还仅仅部分地在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中记录下来，只是在今天，这块世界磐石才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给一些趋向于通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新政治潮流开辟了道路。这
这一趋向也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工人国家涌现的形式中清楚地看出来——从东欧国家到南斯拉夫和中国，最后到古巴，它们的领导都已表现了脱离苏联官僚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独立性。

这一趋向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随着斯大林主义磐石的粉碎，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在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并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像过去斯大林那样，用制造假问题来代替真问题，用贴标签、诽谤和陷害来代替说理。例如，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点是看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大问题之一，是有些必要把扩展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唯一实际办法。显然，那些讨论者的看法，已越来越接近于截至目前为止还一直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言论的那个禁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以及最近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加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这一切都只会加强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正如目光锐利的美国新闻记者 I. F. 斯东在古巴作了一次旅行后所说，那儿的革命者都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随着这些潮流和有关潮流中间的觉悟的提高，托洛茨基主义将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潮流。

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群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出现将会给政治舞台带来一支新的生力军。甚至在这些政党尚未在各个国内占优势之前，光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开始取得的部分成就，就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形势，在三个主要部分加速革命过程的自然节奏。

四

第四国际的干部们执行了他们的革命任务，赋予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以生命力，同时按照世界形势的要求不断丰富它的内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组织不会受到长时间的孤立和迫害的影响。有两个主要问题必须经常加以关心。有一种倾向不时在各地出现，想要寻找捷径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组织。这方面的经验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样做只会带来不幸的结果，使许多从事这类冒险的人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中消失。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的倾向偶尔冒头。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背离原则以逃避来自敌对环境中的压力，宗派主义者的倾向则是躲避书堆，把书本变成教条。一个革命者受到他无法控制的情势的孤立之后，很可能不自觉地掉进宗派主义的泥坑。因此对一个小组织来说，宗派主义要比机会主义更富于潜在的危险性，因为机会主义一般地说来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建立另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即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问题不在于一再重复这一基本真理，而是具体地说明这一任务怎样完成。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包括三个具体进程：保卫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培养、教育和锻炼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替这支干部队伍赢得群众支持。这三个进程是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脱离了群众运动，一支革命的干部就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脱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沉浸在群众运动里的干部最后就会屈从于机会主义。脱离了作为群众的骨干而进行斗争的干部的实际考验，革命的纲领本身就会僵化，日渐退化为背诵教条公式的毫无内容的咒文。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很好地考虑了这样的问题。怎样从小股的力量开始去争取工人阶级，把它组织成一个能够向资产阶级的统治挑战的政党。它在组织路线上遵循的原则是那句列宁主义的名言：一个革命者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自己脱离自
己的阶级。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准则就是要加入自己的工会组织,在工会工作中起积极作用,不管这个工会的官僚机构是如何地反动。同样地,他们也应当参加一切群众性的大组织,不管这些组织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在这些组织的成员中传播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并设法从他们中间发展新党员。

在某些国家,如西欧和澳大利亚,群众在阶级觉悟和强有力的组织方面都有旧的传颂,这就给革命核心提出了特别困难的问题。由于这一传颂以及会员群众的力量,这些组织深受工人们的拥护。同时,由于过去的失败和官僚主义领导对工人运动的长期控制的结果,群众虽然极愿意走革命行动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却并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而是只有一种比较接近于偏左的中立主义观点。

此外,官僚主义的领导对于向群众散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材料还不肯提供便利。它所起的作用就跟残酷的永久性党派一样,完全忽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准备使用政治迫害和各种最不民主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宣传新观点或批评的观点的人们。

这就是革命核心必须面对的总形势。他们除了“打进去主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所谓“打进去主义”,就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群众运动的内部生活。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核心的特定作用是宣传一些过渡口号,作为群众觉悟水平不够和有客观的必要采取行动踏上革命的道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革命核心应该积极参加建立左派势力的工作,促使这些势力有可能领导越来越广大的群众采取行动。通过这些行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起了应有的推动作用,使这些中立主义势力或者偏左的中立主义势力中的优秀力量日渐转变为纯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打进去主义”的目的并不如某些批评家所攻击的那样是创建一个“施加压力的集团”，而是在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实际形势下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战术是充满危险和困难的，如果不把这些危险和困难经常牢记在心，就无法成功地施展这个战术。但是在工作的某一阶段，除此之外，简直别无出路。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战术应该有许多灵活性。在运用的时候，也必须十分灵活，不应该有任何种类的教条主义。对采用这个战术的人们来说，工作的准则是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群众工作，包括出版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在内。

不管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只要它基本上还是个很小的宣传团体，就无法起领导群众的作用。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做不少有效的工作，通过积极的、始终不渝的努力来弥补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客观形势之间的差距，以帮助群众从经验中学习。用最普通的话来说，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是必由的途径。这一道理还总结在托洛茨基写于1938年的“过渡纲领”中。这个纲领必须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办法是通过研究群众觉悟程度的变化和经常联系群众。

在许多国家内，跟建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有关的一个尖锐问题是缺少时间在革命爆发之前组织群众和积累足够的经验。在过去几十年中，这可能意味着革命的失败。然而，鉴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苏联的榜样，其他工人国家的存在（从它那里还可以得到物质援助），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的削弱，这一切都有可能使革命在某些情况下取得部分的成功，达到某种高度（他们可以在这高度上暂时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如波利维亚那样），甚至径直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不
够到缺乏执行无数迫切任务的久经锻炼的或者有经验和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其他的选择，只有整个儿地、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建党。

五

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终是主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协力完成这一工作，应该把已有的这些党的核心集合在一个国际组织里。

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最后考验是人类的行动。不经过行动的考验，一切理论都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对世界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在今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得多。有一个事实本身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卷入世界事件中，有时候情况甚至还极有爆炸性的。只有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并经常用实际行动来重新检查和考验这个分析，才有可能使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每一部门感到前进中历史的脉动。只有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国际，一方面把许多不同的势力团结在行动中，一方面却允许它们民主地互相谅解，唯有这样才能使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经验得到正确的估量，然后再纳入世界规模的革命任务中。如果对世界形势的发展缺乏总的了解，想要根据本国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或者采取正确的行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各个国家和各国的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必须互相依赖。认为革命运动可以在“一国”或者孤立的“区域”内建立的看法，在洲际导弹火箭和外层空间旅行的时代，未免太落后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建立某种机构，在质量上不同于于光是几个国家组织的总和。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每个国家的经验和意
见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比在单一的区域内能建立的任何机构要优越得多的领导机构是可能的。基本的概念并不是把一群知识分子召集在一起（不管这种做法本身是多么必要和有价值），而是把各个领导机构在国际规模上联结起来，这些领导机构都是在自己的国度里扎根的，跟本国的群众有血肉联系。一个这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就能够完成困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使理论适合时宜，一方面制定有生命力的政策，领导世界当前的重大问题上的革命行动。

鉴于目前存在于世界革命三个主要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一个坚强的、民主集中的国际的必要性就更明显了。在先进的国家里，这个国际能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创造一些方式方法来激发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在政治上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都存在的。这个国际能够帮助殖民地革命里的斗士始终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使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保持信心，学会区别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与那里的政府以及传统的群众组织里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人。在工人国家的进步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这个国际能够起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帮助他们在堆积了四十年的伪造、歪曲和谬误的垃圾中觉路前进，去寻找革命马克思主义。

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某些势力对于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产生疑问，特别是对于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这样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借鉴他自己在一个新的革命中的经验，今天都在强调在所有国家内建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产生于无产阶级争取权力、赢得权力和在胜利后执行权力时所面对的客观任务。工人
阶级的旧领导机构的无能与背叛使得这个必要性更为迫切。核毁灭的威胁更使这必要变为一个与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要赢得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除了把群众性革命政党友爱地联合在一个国际组织内以外，别无其它办法。这一任务看来好像很艰巨，但总是会完成的，而且是及时地完成的。

4. 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序言

1960 年以来，世界力量的对比继续向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古巴革命的胜利加速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革命前夕的形势。继古巴革命胜利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经过了七年流血斗争取得了独立，开辟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社会阶段，建立了整个非洲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辉煌的中心。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老挝和南越，殖民地的革命在停顿了七年之后重新向前发展。尽管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和波兰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全体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继续以高于全体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

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最近三年来，在维护生活水平的斗争中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战斗力。尽管在这些国家内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比利时、西德、西班牙和英国，但是无产阶级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却屡次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制度的政治上的稳定性。即使在法国，1958 年 6 月之后受到严重挫折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开始恢复，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时，
他們表現出来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例如工人的罷工）。

尽管世界力量的对比逐漸對他們不利（統治階級對这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世界帝国主义依然保持着經济、軍事和政治力量到这种程度，即在日益高漲的國際革命的各种力量前，還沒有失去反扑能力。在經濟方面，帝国主义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繼續迅速地增长它们的資源，虽然这种扩张已在开始严重地緩慢下来。美帝国主义克服了1960—1961年的衰退，现在美国的統治階級正竭力用力量增加国家开支办法来加速擴张，因而造成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国际地位的削弱。在軍事方面，帝国主义繼續扩充核武器的儲存，迫使苏联也不得不加速这方面的军备。在殖民地革命新的进展前，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一方面进行局部的干涉战争（老挝、南越、古巴，拉美美洲的軍事代表团）；一方面，力圖用加强财政和政治援助来勾結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印度、巴西、委內瑞拉、伊朗、刚果等）。这些办法从长远来看，是不能發生效果的，但是能把社会主义的到来推迟若干年。日益尖銳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欧洲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欧州某些帝国主义大国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把世界帝国主义削弱到在革命的进展前毫无反扑力量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是现实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只有在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堡垒内部的無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最后地排除。现阶段的殖民地革命的进展和資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的进展正削弱着帝国主义，从而准备着这个胜利。这个战争所以被推迟的爆发，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统治階級和苏联官僚主義領導人意識到一場世界核战争将造成全人类自行毁灭和自杀的巨大危險。所以有可能帝国主义非到最后关头，即它感到一切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可能性完全被切斷，它的
关键性利益受到迫切的威胁而它还保持着进攻主力时，不敢发动这场战争。这意味着革命力量还有一段时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削弱帝国主义，尽最大可能准备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胜利的可能性，以便能够及时地从堡垒内部瘫痪和推翻帝国主义。

最近的革命进展已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了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古巴革命的胜利是1917年以来第一个由不属于国际斯大林世界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革命胜利，也是从1917年以来第一个革命领导由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它本身的认识水平不得不公开地求助于革命的国际性发展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有利于重复古巴经验的条件日益在明朗起来。各国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团结已经破碎了，从而加速了以中苏冲突为代表的剧烈的政治斗争，这个斗争越来越迫切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士提出了将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就是说，不论是殖民地革命的进展，或是蜕变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进展，都开始越来越摆脱过去十多年来力图抑制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中派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势力。殖民地人民群众争取他们的革命取得社会主义出路的动向；知识分子、青年和工人先锋队力求使非斯大林化运动超越赫鲁晓夫阶段而真正地回到列宁道路上的斗争；中国企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左派，从而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取同资产阶级联盟”等根本方针重新提出来讨论的努力；各帝国主义内部新的先进队伍的出现——这一切现象表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革命领导的道路已取得进展。而建立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保证世界革命迅速成功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如果说建立和扩大第四国际各支部是这个过程的
基本因素，还有，这个因素还包括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各国革命力量必须合并的任务。

（一）世界经济形势

美国经济曾发生1960—1961年的衰退，而后又有了恢复。这次恢复虽然比预料的要缓慢，但在没有遭受很大破坏的情况下克服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华尔街的金融崩溃。目前美国经济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还不是这个金融崩溃，而是每次经济衰退后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和未利用的工业生产能力趋于扩大。另一方面，把经济危机转化为规模和时间上有限度的经济衰退，是用不断增加财政开支，首先是军事支出作代价的，这是美元逐渐贬值的基本原因。肯尼迪政府想以巨额预算赤字来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只能加剧今后几年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矛盾，再次扩大国际支付的赤字，引起新的物价高涨，从而削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从长远来看，美帝国主义被迫面临着这样的任务，既要保证经济增长以便它有可能稍微推迟苏联经济“赶上”的日期；又要不断增加它的军事费用和在财政和军事上援助殖民地和资产阶级，首先是在拉丁美洲的各“同盟国”政府。这样，它如果不是向美国工人阶级已取得的生活水平进攻，就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实行严格的工资冻结，此外别无办法。大批失业的压力，美国资金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国家外流，工会力量的削弱和政府对某些工会特权的侵犯，加上自动化的客观效果，逐渐地给上述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引起这种进攻的政治和社会不堪设想的后果。

西欧和日本(除了英国和比利时)资本主义经济在美国和加拿
大经济衰退时期，再一次成功地逃避了经济衰退（在1957—58年经济衰退时期已是这样。它们长期增长的因素，首先是工业现代化和合理化投资水平高，以及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些因素是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十年来特大“景气”的原因，也是得以逃避这次衰退的原因。

但是，这些长期增长的因素已开始一点一点地疲软下来。钢铁业受生产性投资逐渐缓慢的影响，三年来已处于真正的停滞状态。汽车工业在1960—61年已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现在虽然出现一个月短暂的复兴，但是一般估计到了1965年汽车市场将趋于平衡。同时，在资本主义欧洲，经济越来越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因而表明即使不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生产过剩现象依然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因此，可以肯定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的增长率都将逐渐下降，耐用消费品和“新产品”的市场将达到饱和点，大多数的工业资本主义大国的生产率水平将趋接近，由此资本主义之间必然会发生的竞争将趋剧烈，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也必将逐渐重新出现经济衰退和工人失业。突然兴旺的景象让路给更加“正常”的循环期的速度在各国之间是会有所不同的。毫无疑问，像意大利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还拥有大批工业后备军，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比美国、英国或西德低廉得多的工资，它们延续这例外的“景气”阶段可能要更久一些。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帝国主义工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场越来越缩小，这些国家的在世界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缩小，从而帝国主义之间的贸易成正比例地增长，特别是由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资本主义结构阻碍了本国
經濟的发展，阻碍了本国的工业化以及人民群众贫困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1960—63年这一阶段同上一阶段一样，尽管“援助”这些不发达国家之说甚嚣尘上，尽管有一切“争取进步联盟”的办法，这些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在下降，下降的原因或者是交换条件的恶化从而削弱它们在世界市场的购买力，或者是特殊现象例如通货膨胀。军事费用的增长和外国资金的外流。这样，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本来已很缓慢的资产阶级工业化的过程受到了阻碍，特别是在阿根廷、印度，甚至在委内瑞拉也是这样。最近一个时期的原料市价的上涨，也不能根本地改变这种局面。

随着大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没气接近尾声，制造工业设备的工业因而越来越焦急地寻求新的市场。无疑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要作出新的努力，用贷款方式去资助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在经济上去配合为稳定大部分这些国家中的新殖民主义制度所作的努力。即使不低估这种政策取得短期的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政策也不能消除引起群众不满情绪的任何一个因素，而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将在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继续起根本性作用。

在这同一时期，除中国外，各工人国家的经济继续不断地在发展，尽管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特别是较为发达的工人国家的工业发展（例如苏联、波兰、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这一二年来出现或多或少的显著的缓慢；相反例如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的发展却十分惊人。某些计划甚至完全失败了，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七年计划（这计划原定：“到1965年按人口计算生产要赶上西德”），捷克计划和苏联的化学工业计划。但是，苏联七年计划大体上似乎可以在1965年完成。

农业由于气候影响、储存缺乏、投资不足以及农民群众对合作
化生产不关心，继续出现一年比一年更猛烈的波动。各工人国家经济缺乏国际间的协调和一体化的后果越来越显著。苏联官僚机构因此不得不来一个大转弯，企图把经济互助委员会变成国际间经济一体化的机构，包括计划一体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和国际贸易及多边国际支付在内。在各工人国家范围内改进国际间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会使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等国家工业重新增长。这些国家受到自给自足倾向的害处最深，而这种自给自足倾向是每个民族官僚主义的计划工作的特点。

南斯拉夫克服了1961-62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歉收和过度的分散主义恶果双重影响下，曾突然地中断了经济特大增长时期，甚至破坏了对外贸易渠道，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支付的逆差。今年，在调整了中央对外贸易的控制之后，同等的甚至高于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可能再度出现。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特大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过分的作法所造成的恶果，继续三年来情况黯淡。目前似乎正在复元，这个复元是依靠彻底改变经济政策——给予农业和轻工业以优先权，大幅度放慢重工业发展而得到的；重工业的发展还受到苏联停止援助和缺乏国际援助或贷款的阻碍。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包含第四国际以前的文件所指出的几个大特点，即：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这样不断地加深了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鸿沟，从而提供了殖民地革命不断扩大客观基础。

——工人国家高速度的增长同帝国主义国家波动很大的增长速度（一般趋向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由于利润率普遍下降和市场日益缩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日益加剧。

（二）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

肯尼迪政府正是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遭受许多显著的失败和挫折的时期结束后上台的。这些挫折和失败是：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在美国大门口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美国傀儡李承晚和曼德列斯在人民示威的压力下垮台；拉丁美洲（尼克松巡迴旅行）和日本发生了猛烈的反美示威；苏联在宇宙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领先地位。此外，苏联官僚机构重新提出西柏林问题，企图迫使美国军队撤出西柏林，给人一个印象；苏联不但力图巩固乌布利希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且还想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总趋势转移到十年来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世界一个地区，即资本主义欧洲。

代表纽约财政资本和帝国主义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的智囊团所包围的肯尼迪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制止这种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局势不断地恶化；加紧扩大核火箭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用政治军事压力和加紧财政“援助”相结合的办法在古巴周围建立一条安全带，进而用军事干预、经济封锁、或者两者并举地来推翻这个工人国家；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即使因而损害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同盟国也在所不惜；对这些盟友和竞争对手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强制它们承担更大一部分的军事政治的共同负担（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援助”）。同时，这个政府很明确地表示，它随时准备好发动一场世界核战争，以阻止世界力量对比的任何巨大的恶化，尤其是如果这种恶化是由苏联官僚机构直接引起的的话（如柏林、古巴）。

・74・
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美帝国主义是依靠这种政策获得了比
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更大的策略性的成功。美帝国主义始
终保持着它在西柏林的地位，而赫鲁晓夫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
后退了一步，而满足于建立一座“墙”，以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公民的大规模外流，并可能在更换旗帜的情况下让占领军继
续在西柏林呆下去。美帝国主义迫使苏联官僚机构撤离了刚果，从古巴
撤出火箭。它暂时阻止了委内瑞拉和圣多明哥革命进一步的发
展。它在宇宙飞行方面部分地改变了落后情况，而在核武器方面
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

但是从战略性方面考察，两年来国际局势却不断地朝着不利
于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三番四复推翻古巴工人国家的企图，
包括入侵，都以失败告终。不论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由于广大
群众对古巴革命的同情，帝国主义强逼这些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
同古巴完全决裂的企图未能成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了政治
和社会严重的危机，那里的群众运动加强了，在若干国家中发生了
游击战。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矛盾在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目前比1966年11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任何时候更加紧张。苏
联的技术和经济进展继续把增长速度缓慢得多、不平衡得多的美
国经济抛在后面。殖民地革命出现了新的爆发中心，特别是在东
南亚（老挝、南越），这比任何时期更迫使帝国主义把它的军事、
财政和经济资源分散到许多地区去，而这些资源并不是用之不尽
t取之不竭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使法帝国主义手中夺得了独立，革
命的第一批成果之一是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运动重新高涨，从而直
接威胁到在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酋长国、伊拉克甚至伊朗的英美
石油公司的巨大财富。

面对着1960年以来发生的事件所包含的巨大革命可能性，苏
联官僚机构的根本政策基本上是保守的，它害怕世界革命的势头和世界革命在苏联国内的反应。这个官僚机构的总路线依然是“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它不支持革命群众，不坚决支持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中最先进的斗争运动，而以坚持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联盟和“利用帝国主义矛盾”作为长远的战略的基本因素。但是随着这条总路线在官僚机构内部越来越受到批判，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这条总路线毫无例外地不能严格地执行了。因此，如果苏联官僚机构没有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以重要的援助，而一直等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夕才正式承认；如果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采取罪恶的消极态度，如果拉丁美洲各共产党阻止了和继续阻止对古巴来说是最好帮助的群众革命斗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却不得不给予古巴的工人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它抵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第一批的侵入尝试。同样的，如果苏联官僚机构赞助老挝的“中立化”，如果它企图制止东南亚的革命斗争，那么它却不得不保护帝国主义对老挝的直接军事干涉。

克里姆林宫的保守路线在最近一个时期表现得最恶劣的是，它对中印边境的态度（供应米格飞机给尼赫鲁，赞扬“尼赫鲁的和平政策”），以及它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丹吉的赫鲁晓夫派的态度（在本国资产阶级面前实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投降）。

同过去一样，三年来殖民地革命的胜利伴随着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帝国主义反革命军事干涉或者反革命战争（刚果、安哥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南越和老挝、南朝鲜、新几内亚、也门、北婆罗洲等）。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工人国家有义务给这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革命在现阶段是最能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同时，同过去一样，尽管举行了一系列“裁军”会议，核武器军备竞赛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苏联官僚机构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核试验。这些实际促成了一个新“原子休战”的结果。从核试验威胁到人类生理状况，成为外交因素的方面来说，原子休战有其积极性。但是即使这种休战真的休迫了——特别是在符合克里姆林宫和华尔街停止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它丝毫不能成为裁军和核裁军的保证，或者是许诺这种休战实际上只不过是加紧进行核扩散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休战。在国际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还拥有原封未动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的整个时期，任何真的裁军依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说明美帝国主义力量存在多久，全面核战争的危机将存在多久。反对核危险的群众斗争是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得好。削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在现阶段对这个未来的裁军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大力地参加争取帝国主义国家任何单方面裁军的运动。

近年来越来越尖锐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殖民所取得的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英帝国主义的世界地位几乎一直在下降。相反，西欧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西德帝国主义，其次是法、意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改善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的经济地位。这种变化表现在相对的生产数字上，也表现在各列强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比重上。

但是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同经济力量的对比并行地起
变化。美帝国主义在英国放弃了“闪电”导弹计划后甚至加强了它的核武器垄断。它继续控制着帝国主义的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它毫不考虑它的盟国的特殊利益（如德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在决定性时刻甚至不同它的盟国协商就采取行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日益剧烈的紧张局势，尤其是戴高乐拒绝接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之后所爆发的法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本上表明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军事威力同经济优势在地下降之间的矛盾。

虽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斗争中各有各的打算，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团结精神在革命和工人国家的进展面前还是占着上风。真正的“反同盟”（就是说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苏联结成联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是不能想象的。一些暂时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在贸易方面，不会改变这个根本动向（如英国拒绝承认美国对某些所谓“战略”物资向工人国家出口的禁令；加拿大突破对古巴的封锁等）。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戴高乐追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个帝国主义集团。这集团将与美国的集团相等与它并起并坐。戴高乐所谓“法兰西打击力量”（欧洲独立的核攻击力量的核心）和他的拒绝扩大共同市场的政策——华盛顿希望把共同市场溶化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这种野心既不符合法帝国主义真实的具体重量，也不符合西德帝国主义者战略和经济利益，西德由于它已延伸到非洲（参加共同市场的非洲国家）早已感到它在“小欧洲”中的地盘太狭窄了。因此最可能的演变是，与其说“欧洲帝国主义集团”同美帝国主义之间冲突将长期化和深刻化，不如说，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日益参加到大西洋联盟实际的领导中去。
（三）殖民地革命的进展

自1960年以来，殖民地革命继续在各个爆发中心发展：古巴和拉丁美洲革命；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革命；南非和非洲革命；老挝、南越和东南亚革命；中印纠纷和印度革命。

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是，没有受到苏联官僚机构控制和影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这也意味着，1917年10月以后第一次由于客观需要也由于阶级觉悟，有计划地企图在国际上至少在整个拉丁美洲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革命领导取得了政权。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古巴对拉丁美洲贫困群众具有的客观吸引力，和“卡斯特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先锋队内部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逐渐的分化，古巴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拉丁美洲革命的高潮。

相反地，这个革命也导致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在1932—1957年这一段时期内，美国政策主要特点，间接干涉和经济财政的压力，即实行所谓“睦邻”政策。现在，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越来越采取直接的经济、政治干涉，甚至军事干涉。

至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它正处于越来越剧烈的分化过程中，一股力量企图用表面上适应群众反帝要求和实行绝不触犯半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若干改革的办法来抵消群众运动；另一股力量则企图对实质上威胁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群众运动实行直接的镇压。

古巴胜利影响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面对这种高涨的反应，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正是最近三年来拉丁美洲政治社会的动向。
群众运动的高涨在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和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特别突出；至于阿根廷，工人运动已屡次表明，工人运动在现政权的经济政治崩溃的气氛下（劳动人民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未发，接二连三的军事政变等）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发动大规模罢工的能力。甚至最稳定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也受到农民反抗周期性爆发的震动。

另一方面，“争取进步联盟”应该是美帝国主义干预拉丁美洲的一张王牌。但是直到现在不论在经济上（通货膨胀严重地阻碍工业化发展），在政治上都显得无能为力。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消灭革命高潮的客观原因，加上缺乏成熟的革命领导，这种情况促成了长期的危机，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玻利维亚危机已延續十年之久。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很快在过时，它正处在锻炼和不断分裂为社会主义革命或亲美反革命的过程中。但是在拉丁美洲三个国家中，即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资产阶级比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强大些，因此帝国主义还有比较宽闊的迴旋余地。在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还能够设法重新运用庞隆主义，庞隆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足以用来对抗社会主义的出路。

最尖锐的革命危机正在委内瑞拉酝酿中，那里的局势依然很紧张。但是在那里的帝国主义有着巨大利益，它势必要用一切方法来保卫。在智利由于群众处在等待大选的精神状态，随着1964年的大选的发展，正在酝酿一場巨大的较量，在秘鲁，群众运动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已达到一个非常先进的阶段。

阿尔及利亚革命在它转向社会主义进程中，对阿拉伯人民贫困群众，不论是马格里布或者已经巴尔干化为七个国家（姑且不谈波斯湾各酋长国和苏丹国和亚丁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来说，都是一
股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只是在彻底玩弄阿拉伯统一的花样，即建立面积广大和石油资源丰富（这将最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对抗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下，才有一丝希望挡住这股吸引力。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团结在纳赛尔主义周围，他们利用纳赛尔主义作为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作为严密地控制和限制群众运动的手段。纳赛尔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在埃及本身，在群众的支持下纳赛尔主义无怀疑地是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但是纳赛尔主义却把工人运动任何自发性和工人运动应有的斗争维持在窒息性的控制下，从而产生了恩格斯所用过的名詞“国家资本主义”，旧时资产阶级通过管理和经营国有化的经济日益发财致富。

因此，伊拉克、叙利亚的“统一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胜利，约旦的群众斗争和也門的革命都可以认为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初步反应，同时也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对这个革命的初步反应。正是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共产党所犯的巨大政治错误使阿拉伯统一高潮暂时地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削弱而不是工人运动的加强。但是今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以及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加强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生产力发展中的狭隘的界限，将为阿拉伯世界的工人运动新的前进创造出合适的条件；同样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展将促进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工人运动。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本·贝拉领导机构明确地表示，决心支持黑非洲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葡萄牙殖民地，主要是安哥拉、南非的革命运动。由此，阿尔及尔正在成为整个非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中心。
1960 年政治独立斗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黑非洲革命曾一度出现停顿，特别是由于新殖民地主义势力在几乎整个前法属黑非洲和刚果取得胜利，卢蒙巴和穆尼埃被杀害，新殖民主义在肯尼亚的某些进展以及加纳和几内亚群众运动的低落。总的来说，帝国主义直接的间接的干涉是这个新殖民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也得归功于部落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在刚果、加纳、肯尼亚）推迟了真正民族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真正的民族意识的树立，归功于新资产阶级势力在独立后立即超速度地出现，特别是在行政部门、政治干部方面、商业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

在这些条件下，黑非洲革命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东山再起，首先是在安哥拉，南、北罗得西亚，特别是南非。在南非，情况可以与 1954 年 11 月以前的阿尔及利亚相比，一触即发的原料已经堆积成山，而种族隔离立法和经济剥削程度的加强更是火上加油。因此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土著居民的特殊性：大部分是半无产者，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高过于黑非洲其他国家，使即将到来的南非革命成为整个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未来的中心。

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和越共分裂之后一度陷于停顿的东南亚革命，这几来由于南越的游击战运动和老缅的内战的高涨重新在前进。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压力下停止这场内战的企图遭到了北越河内内的抵制，国民党对于那些所谓“中立主义”力量所产生的吸引力的抵制。此外，南越和老缅革命的进展在泰国广大的边境地区创造了革命前夕的形势。

优越的经济地位和一批相当富裕的农村小地主，以及华人和马来亚人之间所爆发的民族冲突，使马来亚的新殖民主义者得以暂时地控制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然而新加坡革命运动的规模却
并未缩小，这迫使马来西亚买办资产阶级起草一个马来西亚计划，以便一方面抑制新加坡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更好地抵御越南、老挝和泰国革命进展的影响。但是这个马来西亚计划遭到北婆罗洲群众的顽强的反对，引起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的新发展。

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东南亚革命的关键性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革命已停滞了一个很长时期，虽然还不能说资产阶级政权已稳定或群众运动已遭到重大的挫折。苏加诺政权只是一方面依靠印尼共产党（该党实行毫不反对反而完全支持苏加诺并且绝对不考虑采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端机会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依靠巧妙地利用群众反对各种分裂运动和关于新几内亚及北婆罗洲的民族感情来维持。

最后，印度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革命社会党、社会党等）可悲的态度，使它在社会主义压力下投降和接受同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可耻的行为，使得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给印度工人运动造成严重的失败。尽管中国军队在边境战役中严重地打败了印度资产阶级军队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撤退了，印度资产阶级政府还是把大规模的国家军事化费用强加在群众身上。这种军事化并使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失败。然而扩充军备的客观后果（通货膨胀、生活费高涨、税捐剧增）将为工人运动的再起造成有利的条件，如果先进的政治力量懂得把无产阶级和贫穷的知识分子保卫生活条件的斗争同真正土地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

总之，殖民地革命的一切新的进展，将越来越把这个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这种转化已在阿尔及利亚出现）提到日程上。当这种转化达到各地理区域中的关键性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巴西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新的质的变化。“

88
（四） 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演变

总的来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导致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定期性的进攻。资本主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长期存在着相对的充分就业的气氛。在这种有利气氛中，劳动人民对付这些进攻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反击可以采取经济形式：或者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或者争取减少劳动时间和延长工资照付的假期（这是面对着耗尽无产阶级体力和精力的无休止地提高劳动强度所必需采取的自卫步骤）。但是当一个足够强大的先锋队成功地教育了劳动群众中最富战斗性的阶层必须为过渡性要求进行斗争的时候，这种反击也可以采取具有更进攻性和政治性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反击能够成为对资产阶级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创造出一个革命前夕的局势和促使政权问题迅速成熟，而反对的“繁荣”景象的消失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第一次觉醒了。无论哪一处，归根到底，先锋队的相对力量，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它提出的切身要求的水平才是，想把斗争保持在狭窄的工团主义范围之内或想把斗争提高到将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甚至在法国，那是西欧唯一的无产阶级在1958年5月没有认真地起来反对而让拿破仑式的戴高乐政府建立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遭受严重失败的国家，1963年3月的矿工罢工运动也表明，工人阶级已准备艰苦地保卫他们在“繁荣”时期取得的生活水平，表明这样的斗争甚至已创造了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政治复兴的客观条件。此外，戴高乐政府实行的政策把社会党推到反对党地位，威胁到社会党在议会制度中的原有的地位，这便利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接近，从而扩大了工人阶段的统一战线。因此，首先，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抵抗，其次，由于工人运动的若干复兴，戴高乐政权没有能够得到深刻的和持久的巩固，当它遇到经济和社会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恶化，在任何一个未解决的结构问题突然被提上日程上来时，仍然会束手无策，而这些情况反过来将会突然触发阶级斗争的火焰，为工人运动的真正复兴创造可能性。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想利用阶级斗争暂时的平息和工人阶级的若干非政治倾向来加强它的镇压力量，对罢工权重新规定，加速向“强有力国家”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却到处遭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伍的猛烈的抵抗，而工人阶级先锋队伍已有足够的影响来推迟（德国）或在很大程度上挫败（意大利、比利时）资产阶级的计划。假如这种反抗能与好几年来更加艰苦的经济斗争的潮流结合起来，那末它也将成为工人阶级斗争再度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资产阶级，特别在某些国家，酝酿了一种新方针：在不同
的或甚至表面对立的方针下，加强经济相对的健全和合理化（这对资本主义利益本身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其次，把工人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工会，逐渐地“溶化”在“新资本主义”液体中。这种政策开始于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执政时期，然后更有组织地发展于戴高乐时期，最后在意大利依靠中间偏左的势力在更大胆的形式下明确起来。但是尽管有若干传统的工人政党对此采取机会主义的或混乱的态度，这种政策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谈1962-1963年的经济斗争（意大利几次罢工带动了停滞好几年的某些工业部门，法国矿工的罢工等），更如1963年4月意大利大选那样的出色地有意义的事件，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战斗派对这类性质的新试验应该在下列两个方面继续予以反击：一方面，拒绝在“计划化”、“收入政策”等借口下的任何公开的或隐藏的工资冻结，保持工会运动的一切行动自由权，利用充分就业以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宣传诸如工人监督、工农政府（各个国家要有各个国家的具体的特殊的内容）等过渡性的要求，这样可以顺利地揭露所謂“中间偏左”解决办法的资产阶级本质。

下列两个事例特别值得提出：西德的事例和英国的事例。

十多年来，西德工人阶级的組織和政治理想出现了退化现象。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且承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政权的不得人心的全部重担，因而完全陷于孤立，降到一个毫无力量的积极分子的核心。中派主义的小集团逐渐瓦解，被社会民主党排挤出来的新的中派集团孤立于群众运动之外而大部分瘫痪下来了。社会民主党自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以来快速地向右转。那次代表大会抛弃了该党纲领中仅有的社会主义的残余，迎合了该党社会成分的变化，即小资产阶级、公务员甚至中等资产阶级。他
們这些人代替了工人，而成为该党日常工作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使该党变质为一架选举机器。然而社会民主党远不能成为西德工人阶级政治团结的一个主要中心。

但是，各工会，特别是各大全国性的工会（冶金、化学、公用事业），保持了甚至相对地发展了它们的力量。所以发生这种演变，背景是，十五年来，没有通过面对面的大规模的竞争面只是通过谈判就取得年年提高工资。1949 年起点很低的工资水平和工业特大发展促成了这样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目前已遇到越来越大的客观的阻力：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德国的工资今日已在共同市场上达到最高峰，国家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不断增长（这自必沉重地转嫁到劳动群众身上）。西德的资本方必将拒绝“一年一度”的加薪，甚至于通过生活费用的上涨使实际工资降低。最近德国西南部冶金工人的斗争导致工人罢工和资方停业，说明了这种时刻已经接近。这个时刻一旦来到，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党已参加政府，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会和资本家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工会先锋队激进化，至少这支先锋队可能迅速政治化。

这几年来英国大体上是朝相反方向发展。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反应越来越敏感了，首先是对核军备裁减问题；其次，盖茨克尔提出修改工党纲领的“第四点计划”遭到猛烈的反对；保守党经济计划破产，使英国蒙受一连好几年的经济停滞；劳埃德宣布冻结加工资；大批失业重新出现，企图损害工人阶级以实行工农业合理化——这一切造成了社会紧张和重新新政治化的气氛，使今日的英国工人运动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工党可能在群众和积极分子不能再忍受（即使不起来反抗的话）保守党仅仅继续它现在的军事和经济作法的情况下再度登台，那时毫无疑问地可能促成工党在一个短时间的间歇后重新向左转。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制度继续衰弱下去，一个是由于群众运动的真正复兴，另一个主要是因为殖民地革命扩展到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这两个政权的复灭已经指日可待。

在日本，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空前的发展，利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扩展中的私营大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960年严重危机之后成功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基本结构脆弱的特点，如现代工业和古老工业同时并存，相当高的工资和不足维持的工资同时并存，此外它承受着某些工业部门结构性没落的后果（煤炭工业、造船工业），以及来自中国革命的吸引力，群众反战感情强烈的强烈等。这些条件结合起来依旧是有利干群众运动的复兴。在美国，尽管失业数字不断扩大，但在“萧条地区”的困难继续扩大，工人运动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不时也发生一些罢工运动，其中也有时间较长、斗争较顽强的，但是这些罢工一般地是防御性的（特别是反对自动化后果），而且都是在上述的总的经济气氛中由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加强他们的反劳工阵地所引起的（冲天的通货膨胀，比起欧洲竞争对手来更加恶化的竞争条件等）。这种形势直至美国资产阶级认为经济普遍恶化到需要对美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资大举进攻之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这种进攻可能引起坚决的反击，导致民主党和工会之间联盟的破裂，导致其中一部分的工会官僚分子出头来组织一个工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的进展的速度，包括在大选方面，也将有利于美国的这个过程。

同时，如果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甚至连原来的阵地也没有保住，那么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却大大高涨。黑人居民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采取了主动，南方的工业化，向北方移民的问题，战争的后果，工业中的地位，殖民地革命的反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青
年一代討論現狀的傾向越來越大，他們組織示威，建立越來越富有
战斗性的团体。这种倾向又与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倾向结合在
一起，即民族主义願望的抬头，特别在穆斯林黑人运动发展过程中
更为明显。

在美国长时期以来的相对的“繁荣”压力下，加上这个国家空
前的对民主权利的破坏和最凶恶的搜捕，美国整个极左派的力量
已大大下降。只有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成功
地维持下来。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美国先进队伍重新觉醒了。这
种觉醒在大学里特别显著。在殖民地革命、非斯大林化运动、反核
武器的斗争和争取种族平等斗争的影响下，以及了解到美国资本
主义不可能给青年提供可靠的前途下，美国新的一代的先进力量
正在形成中。

（五）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内部的演变

1960 年以来，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内部最主要的变化是：卡斯
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中苏争论不断扩大的后果。

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但不是在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
且甚至是在反对了古巴共产党的阻力及该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
进入哈瓦那之前一贯执行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胜利
对所有殖民地共产党所执行的赫鲁晓夫路线是个十分沉重的打
击；特别是在古巴建立工人国家和苏联官僚主义领导默认这既成
事实之后，是如此。如果说这一股卡斯特罗主义潮流对各工人国家
（特别是苏联、捷克和波兰）的青年和学生是一种吸引力，那未它对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尤其发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在某些国
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古巴革命和“中国路线”的双重影响
下发生了分裂（特别是在巴西、哥伦比亚）。在另外一些国家，共产
党不得不在道路向左转，采取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危地马拉、委内
瑞拉）或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纲领和武装起义道路（南非）。此外，
一些非共产党的独立力量也采取了同样的道路（委内瑞拉的“左派
革命运动”，巴西的孙利奥等等）。

传统的斯大林主义领导要求“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
线”，甚至在民族资产阶级把他们投入牢狱还是如此。在这种令人
噁心的消极态度和机会主义的面前，卡斯特罗路线的吸引力是如
此之大，以致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先进青年都深受感动（在非洲，
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国路线”的影响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种
普遍具有爆发性的局势，如果缺乏有经验的和在政治上成熟的干
部，在有些地方（例如委内瑞拉），就可能发生考虑不周的军事行动。

一般说来，中苏争论的第一个阶段也在逐渐地发生影响，特备是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各工人国家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
共产党（特别是群众性的共产党，如意大利党、法国党），这是二十二
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使讨论扩大化并使讨
论接触到当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中几个关键性问题。两个完
全对立的潮流，很快地在有利于非斯大林化潮流内部分手了：一个
是赫鲁晓夫潮流或叫做陶里亚蒂潮流，它根本上是共产主义右派
的潮流，修正主义的和新改良主义的潮流；一个是共产主义左派的
潮流，“非斯大林化”对它来说，只是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
的列宁主义方針的一个起点。

关于中苏冲突的重要意义和原因另有专门决议来加以讨论。

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主要局限于資本主义欧洲、日本和澳
大利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除了在上述国家外，在北美保持
着十分强大的阵地，它特别受到资本主義的“繁荣”同在这种“繁
荣”之下发生的或多或少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问矛盾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不但在国际政策，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继续向右转。在国际政策方面，它们越来越迎合美国路线；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它们抛弃了马克思辞汇的最后一余，而完全站到凯恩斯式的新资本主义路线方面。

但是，在这些党的内部，普遍地出现左派，有的反对迎合大西洋公约集团的扩军政策（包括核扩军），有的反对整个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在阶级斗争越有力、越剧烈的地方，这些左派的力量就越强大，也就是说，比利时的左派比荷兰的左派强大，英国的比西德的强大，丹麦的比瑞典的强大，芬兰的比奥地利的强大，许多情况下，由于反对改良主义官僚机构同意扩军而引起分裂，从而产生了一批左翼或中间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党派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丹麦除外）。但是它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已起了一个警告和施加选举压力的作用。

这股社会主义左翼力量逐渐组织起来，同工会建立联系，吸收工会中先进力量参加，取得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投降主义政策的统一纲领，它就能为更换领导准备好基础——尤其是在缺乏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和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老传统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能够增强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对自己的斗争前途的信心，从而深刻地影响时代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1960年12月—1961年1月比利时总罢工规模的空前巨大，这个因素也能在明天在英国甚至在西德起作用，一旦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的话。

相反的，在工人运动受着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社会党没有能够照这条抛物线发展。例如在意大利，南斯的社会党这几年来更加向右转，它的右翼直截了当地与国外的传统改良主义潮流同
流合污，它的左翼受着陶里亚蒂新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法国，统一社会党是作为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力量的汇合中心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不能再忍受摩勒—拉戈斯特—勒克莱尔的领导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戴高乐上台期间所起的变节角色。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摩勒重新转到反对戴高乐行列中，以及缓慢的建立法国社会党—共产党一统一阵线的趋向，可能使统一社会党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眼中失去存在的意义。

（六） 我们的任务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关于各国工人阶级形势的特别决议中的分析，第四国际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确立如下：

（一）第四国际继续向全世界群众提出警告，从事核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把核军备竞赛作为它目前经济支柱之一，随时准备对全世界革命的进展进行军事干涉，而在它感到生存受到迫切的威胁时，这种干涉可能采取核战争的形式。第四国际向群众提出警告：一场核战争将造成一场巨大灾难，制止核战争的发生是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

今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削弱主要表是殖民地革命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削弱为未来的裁军创造了最有效的条件。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推翻了帝国主义之后，裁军才能彻底实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如果不是主动地，站在最前列，来开展争取本国资产阶级单方面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应包括反对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或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基地（美国基地、西德基地或“一体化”基地）。
这些运动应该成为最广泛的群众运动，联合一切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联合各种倾向的工人运动（包括基督教工人运动），甚至应该把运动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运动不会因为这样扩大而是因为选择错误的政治目标或者领导逐渐消极而蜕变。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同参加这些运动中的最富于战斗性的阶层一起，向比简单的示威更彻底更有效的战斗形式前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整法把这些运动引向以工人运动夺取政权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的方向；应该努力说服群众；归根到底只有彻底裁军，就是推翻资本主义，才是裁军的有效答案。

（二）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因此，“第四国际”和它的支部参加领导、保卫和援助殖民地革命，是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鉴于若干国家的客观形势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现有的力量，第四国际应该对下列地区给予优先的注意：

（甲）阿尔及利亚

无可争辩地，目前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所有国家中，阿尔及利亚是把这个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并且正向着建立工人国家前进的一个国家。第四国际的力量，首先是欧洲的第四国际力量应该为推动工人运动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而作出贡献。同时，第四国际力量继续警告阿尔及利亚和全世界的群众，在这方面如果不同帝国主义切断货币和财政联系，不用革命手段动员群众，不在城乡群众中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机器，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乙）秘鲁—玻利维亚地区

正是在这个地区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贵族的力量是最薄弱，群众运动已获得非常丰富的经验，形势继续是革命前夕的形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最有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不渝在农民运动
或工会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优势地位。用武装民团夺回被侵占的土地（按照乌鲁・布朗科传统方式），和建立一个新的工会中心是现阶段秘鲁的中心任务。我们拉丁美洲的力量对此应该通力协作。在玻利维亚，我们的力量主要应该为建立用来替代玻利维亚总工会领导的真正的左派领导，和为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统一而斗争。

一般地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古巴革命最好的保卫者，设法打进卡斯特罗主义潮流中去，反对传统党的方针，坚持革命斗争是保卫古巴最好的方法。他们应该参加贫农的组织，贫农将是保证这些绝大部分的国家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警惕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同时，他们必须支持游击战运动，首先是支持已经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发生的游击战。

(丙)南非和安哥拉

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南非的局势，目前在整个非洲中是最具有爆发性；由于客观力量（无产和半无产阶层的重要性）和主观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理论发展水平、南非有大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同时存在，大大地有利于即将到来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我们在南非的运动在武装自卫的道路上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同时对其他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各种群众运动的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即稳步地着手建立反帝反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能使我们的运动在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初期就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南非革命初期必然会采取反对国家、反对军队和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性总起义的形式。对这个斗争最初阶段的民族民主性质我们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宗派主义态度；而应该了解到斗争一开始，它必然在农村中表现为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城市中表现为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军队的斗争，应该在
这个群众的民主斗争内部和领导这个斗争中使这个斗争赋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予以实现。

（丁）第四国际也应该特别关心它的亚洲各党的活动，这些党已掌握了能深刻地改变客观形势和保证我们的运动向前跃进的杠杆。

我们的锡兰支部已逐渐纠正了1960年支持锡兰自由党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方针。当群众一开始行动起来，锡兰支部就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起来反对它昨天的大选同盟军。但是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一次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将是有益的，特别是因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过高估计单纯的大选对在锡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作用。不然的话，在锡兰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阶段中，可能产生新的另外一些错误。

锡兰平等社会党今天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建立工人阶级组织——政治团体、工会组织（锡兰平等社会党——锡兰共产党——人民联合阵线和工会组织，包括拥有绝大多数种植工人的锡兰工人大会和民主工人大会）——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政府的方案，作为改变锡兰独立以来历届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应该进攻性地实行这个方针，把这个方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它的中心不是仅仅依靠上层的谈判，而是依靠建立各级（全国、省、市、区）统一战线委员会，并赋予这个方针以明确的阶级性。在政权问题上，同英联邦的关系问题上，同各工人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关于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语言等问题方面，统一战线的纲领都应该反映我们阶级立场。抱着这种精神，锡兰平等社会党的争取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政府的运动必然只会扩大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挫败可能混进统一战线内部来的投机分子的一
切阴谋活动。锡兰平等社会党应该关心的其他任务是：制定农村
贫苦人民当前的和过渡性的具体要求的纲领，总结军事政变失败
的教训，征求党员以及对工人党员和干部进行经常的政治和理论
教育。

（戊）第四国际坚决支持南越和老越游击队推翻美帝国主义的
代理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第四国际号召抛
弃使革命半途而废的一切主张，号召拥护贫农和工人大胆地夺取
政权的方针。

在印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大
党和它的大人物尼赫鲁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他们揭露共产党的丹
吉集团和人民社会党的美国代理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人同印度资
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不但反对中国工人国家，并且反对深受尼
赫鲁政府迫害的本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将继续进行澄清和
革命力量重新结合的工作，越来越转向同共产党左派联系的方向，
制定一个符合于城乡贫苦群众的愿望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加诺民族资产阶
级政权，并批评共产党屈从于苏加诺及其政策。他们将努力开辟
社会主义的前景，制定一个导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三）在世界范围内，今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参加到共
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争论中去，以便逐渐澄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
种思想和战略方针，努力建立一股多少成整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左
派潮流，从而为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
领导准备宝贵的干部。

这种参与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旗帜下，以全部的托洛茨基主义
思想和第四国际的纲领为基础，不向任何倾向让步，因为我们深
信，只有我们的纲领，即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才能够对
在共产主义战士们面前已提出和越来越将提出的问题给予完整的答复。我们的参与有双重目的：经常地渗入真正的工人运动中去，以便取得领导地位；不断地为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领导而斗争。正是为了这两个目的，我们参与中苏争论，在对双方观点提出分析批判的同时，实行策略性的选择以便能使我方接近于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同盟。

因此问题决不是在官僚机构内部寻找同盟者，而是在群众运动内部。而这些同盟者只能是共产主义左派，即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内的卡斯特罗派和“中国”派，以及各工人国家中同赫鲁晓夫派对立的左派（他们愿意和官僚机构更进一步推进非斯大林化运动）。

除了它的原则性和始终防卫我们的立场外，这种参与的效果将取决于正确地理解参加争论的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越来越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取决于我们正确地答复他们的能力。这需要：

（甲）努力阻止帝国主义从这个争论中得到好处。为此目的，必须坚持：把共产党和之间关系同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的重要性；尽管争论剧烈，中苏联盟应当维持的重要性；制止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经济报复手段的重要性等等。为此目的，还必须坚持，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会前应公布所有文件并通过广泛地民主地讨论，举行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各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参加的讨论和会议。

（乙）应该排除讨论中的学究式和零泛的强词夺理的争论，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面临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解决的办法不但必须参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而且应该广泛地总结这几十年来大大地丰富起来的革命经验。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毫不犹豫地提
出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解答的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新问题如：武装斗争在殖民地革命中的作用，关于在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下提出什么样的新的过渡性要求，工人国家内的党和工会互相之间的关系，国际间的经竞规划等等问题。我们运动朝着这个方面所进行的理论工作今天已有保证可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广泛地响应。

（丙）二十大，特别是二十二大所造成的局势出色地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在各工人国家内的发展。我们应当组织起来，使我们有可能加强我们对在列宁主义道路上走在最远的人的帮助，并为此目的通过一批成熟和热诚的干部，一套特殊教育方法和策略，把我们的观点顺利地深入到各工人国家的先进阶层中，特别是青年中去。

争取恢复列昂・托洛茨基和所有斯太林恐怖的受害者的名誉的运动应该给以重要的地位。

（丁）在资本主义欧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继续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

一般来说，他们应该在下两个方面提出更明确的口号和采取更明确的行动，即反对核武器斗争方面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及共同市场方面。今天应该提出一系列过渡性要求来补充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这些过渡性要求应该着眼于：一方面要求同各工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和无私地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制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计划（这些计划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扩大国营经济（对在许多国家内设有分支机构和工厂的托拉斯，实行无赔偿的并置于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等）。同时还应该普遍地宣传制定一个全欧经济发展计划的观点，这计划应由各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来制定，用以抵制共同市场所要求的新资
本主义的“规划”。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该要求召开这个单是共同市场范围内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政治性组织）的代表大会，以适应工人运动制定共同战略的需要，来对付资本家和政府对群众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进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1960—61年比利时的罢工，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和法国矿工罢工中得出一切结论。它表明这些真正令人难忘的罢工所取得的经济效果，已由于国际货物比不久以前更快更自由地周转而被抵消了，从而表明，在欧洲范围建立统一的工会和有效的国际团结，越来越成为欧洲每个国家的罢工行动能否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了。

5. 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他
工人国家形势

世界革命的高涨，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各工人国家强大革命力量的解放，以及它们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影响，大大加剧了早在斯大林逝世前即已开始的进程，并给予斯大林主义，即给予莫斯科官僚机构统治群众共产主义运动，苏维埃社会和各工人国家的完全霸权威以致命的打击。

基于这种情况和一种无容置疑的指挥权，多年来，各国共产党
和工人国家一直承认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承认苏联是“领导国家”，并且一直与苏共和苏联站在一起。由于官僚机构在苏维埃社会
和所有工人国家中都再也不能恣意统治，再也无法保持穷凶极恶
的警察制度，于是对群众做出了一些让步。最近时期以来，官僚主
义制度瓦解过程规模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从前各国共产
党的磐石般一致已不复存在，尽管苏联领导机构的威望仍居统治地位，但今后它已陷入无法整个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境地了；几年来都保持在内部的分歧，现已公开暴露；激烈的论战已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甚至出现了分裂的可能性。各工人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克里姆林宫的附庸的关系，并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存在着公开的争端。近年来的两个主要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古巴和阿尔及利亚），是在独立于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之外的一些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大大损害了斯大林的或斯大林死后的领导机构的威信与权威。在各工人国家中，尤其是在苏联，“非斯大林化”——即官僚领导机构用来维护自己对苏联社会的统治的自由化——，没有解决苏联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正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各工人国家中有力地出现了真正生活民主化的趋势。

各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体系内的危机，目前阶段最显著地表现在中苏冲突上。特别是在1962年秋季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中苏冲突采取的形式是在工人运动国际政策的重要问题上（如战争与和平、不断革命、通过革命道路还是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理论和政策上的公开冲突。这个冲突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各左派在世界革命问题上趋于一极的趋势。另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的存在，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的青年中使尚未组织起来的派别汇集于一极，并开始使拉丁美洲有组织的派别各趋一极。尽管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制的贯彻程度由于缺乏工人的政治民主而很有限，可是一此试验却吸引着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最先进的阶层。

这个危机是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国内生活中突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冲突伴行发展的，而随着这个危机的发展，托洛茨基
纲领的有效性就愈发突出了，因为，托洛次基纲领的某些部分，诸如殖民地国家中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中的世界革命问题，工人国家中反对官僚机构、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都渐渐在这个危机中表现出来。

然而，尽管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已达到很大的规模，可是至今在旧的斯大林主义范围内表现出的各种派别，仍从属于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没有任何一派摆脱了官僚机构的利益与前景而提高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前景的水平。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这些派互相指责为“托洛次基主义”，一致谴责“托洛次基主义”，它们把讨论拿到基层去是迫不得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则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很有节制地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辩论。

对危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最多可以通过短期的休战使论战中断下来。官僚机构的任何阴谋都无法阻止各国共产党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第四国际参与这个进程确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革新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长中。

（一）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一致的结局

（甲）中苏冲突

中苏冲突早在1957年就已公开，1959年“雅维科”会谈后有所发展，1960年莫斯科会议达成暂时妥协后冲突再起，1962年中加勒比海事件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更趋恶化。中苏冲突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即使是在一个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所控制的，它的胜利同斯大林时代的那样斯大林主义不相容，也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不相容。
不论是世界力量对比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前时期也好，还是在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也好，苏联官僚机构国际政策的标志是不断设法保持现状，而这个现状却始终是不存在的。在战后时期中，保持现状应该理解为与帝国主义保持世界均势，这种均势不应被大革命运动所扰乱，帝国主义的主要地位也得不到危害。

随着这种力量对比因工人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苏联的武装力量而获得巩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官僚机构除在有利时机进行一些冒险主义的行动外，最经常地还是加紧它在国际关系上的机会主义进程。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苏联群众中正常存在的这样一种情感：他们对爆发一场新战争怀着恐惧心理，他们渴望他们在多年中为捍卫苏维埃制度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作出牺牲后，终于能在物质上获得补偿。苏联官僚机构把一系列右的倾向和立场系统化了，而这些倾向和立场早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当斯大林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寻求相互谅解的时代就已提出来了。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各自领导下的官僚机构的前景与意愿，而是在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条件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斯大林曾公开地，厚颜无耻地把一些革命葬送给刽子手（别的不谈，诸如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班牙革命，希腊游击队的斗争）。赫鲁晓夫也曾不得不支持革命运动，但是，他是在帝国主义或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或者在革命取得决定性成就之后，才这样作的，而且作得很不够的，畏畏缩缩的。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饱经二十余年的风霜，取得了胜利，开始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并且常常处于受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
国主义的进攻的处境。美帝国主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把它看作实现自己在太平洋的野心的障碍。中国领导人没有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提出原则性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得到的经验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何况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利益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危险，一直存在着。因此，他们不得不使他们的行动方向远不是朝向设法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而是继续奉行旨在削弱帝国主义的政策。必须进一步指出，中共领导机构更贴切地感到十四年前取得胜利的那种朝气勃勃的革命的压力，而苏共领导人则代表这四十年来已巩固了自己政权的官僚机构。

中苏冲突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两个领导机构有不同的需要，一个需要表达居于经济发达国家领导地位的十足官僚机构的需求，另一个则需要领导一个还很贫穷的，不能指望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的社会。苏联官僚机构方面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是与中国领导人方面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面前寻求越来越多的援助和更强大的国防相对立的。正是这种不同的需要出发，才产生了中国人和苏联人在当前重大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已导致中国人十分尖锐地指责赫鲁晓夫的方针及各国追随赫鲁晓夫者（如陶里亚蒂、多列士、印共、东共）的方针。这些分歧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一）

苏联人强调即使在资本主义仍旧存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确保和平，并且强调设法同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包括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某些派别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则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不应同资产阶级的某一派别和某某帝
国主义领导人抱幻想，他們尤其正確地提醒說：避免一場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唯一办法，是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努力的唯一方法是开展群众革命斗争。苏联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动力主要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义的过渡则主要由苏联在经济竞争中的胜利来保证。各地革命群众的力量只起辅助作用，而且还要避免在某些特别敏感的地方“挑起”同资本主义的重大冲突。中国人则申明：世界革命力量应起根本作用。因此，中国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捍卫的立场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方针的。

最后，中国人责备苏联领导机构没有充分利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客观形势，责备它为了机会主义的目的，高估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赫鲁晓夫和铁托指责，中国人希望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这种指责是明显的不正确的歪曲。尽管中国人有我們后面的批评是严重的弱点，但他们从来没有表示过这样的方针，也从来没有预先表示反对与帝国主义达成任何暂时妥协。事实上，1962年10月古巴危机时，他們之所以批评赫鲁晓夫，不仅是由于他的机会主义，不仅是因为他践踏古巴革命的起码权利，而且还因为驱使他在古巴领土上设置火箭的冒险主义。

（二）

苏联政府主张同资本主义进行主要是“和平的”竞赛，因此力图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某些协议，并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如有可能）群众运动都从属于它们。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表现出某些类似的态度，——特别是在对印度尼西亚方面——，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有批判性得多的态度，强调无
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强调革命的不断性。（这使他们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的孟什维克观念相对立，并使他们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念。）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倾向于支持不发达国家中最革命的运动，不受苏联犹豫不决态度的羁绊。（请看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态度）。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时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事实上支持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工人国家，正是在这样重大问题上的方针性差别的极端表现。

（三）

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甚至议会过渡的改良主义观念，这些批评是逐渐加强和明确的。尤其是对陶里亚蒂的论战，超出了一般化的范围，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意共书记——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中赫鲁晓夫主义的首领——的提法。这场论战实际上是要捍卫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尽管陶里亚蒂及其追随人口头上也接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的莫大的讽刺。

中国人的这个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这特别是因为，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也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道路观点，而这些国家，不是革命危机已经存在，就是在迅速酝酿中，任何“民主”、“和平”的前景都只会给这些国家加速带来灾难的后果。

*   *   *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三个重要问题——反战争问题、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与不发达国家革命运动的方针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完全证明中国的观点比赫鲁晓夫
观点进步，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相类似。因此，中国观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地区和左派潮流中博得了有力的响
应，中国的态度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力。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演进的意义作出评价，
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持错误和危险的
立场进行批评。

首先，他们对一场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认识太简单了，事
实上他们低估这些后果。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有时低估帝国主
义今天仍旧拥有的力量。特别是，他们不考虑一场核战争与以往
的战争相比可能具有质上的新性质问题，因为，根据大部分科学界
的说法，使人类全部毁灭的危险是存在的。

其次，我们的批评还针对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非斯大林化问题
上的落后，而第一阶段时他们似乎是想对非斯大林化作出贡献的。
特别是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斯大林主义者和对苏联的老斯大林主义
集团所持的态度，他们对苏联谴责斯大林、谴责迷信斯大林所持的
保留态度，只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首先是对苏联和东欧工人国
家中“支持中国派”的发展。世界这个地区的左派，虽然赞同执行
革命的国际政策，但只能谴责一切老斯大林主义者，谴责对斯大林
时代的任何留恋。类似的看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
首先适用于那些有很大群众影响的党（如意共）。

再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谴责中国人对南斯拉夫共产
党人的论战。这种论战常常使人想起斯大林主义的旧作风，它是以
对南斯拉夫现实和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表示的观点的明显
歪曲为依据的。诚然，南斯拉夫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国际政策方
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等）
犯的右倾偏差，从它的某些经济观点引起的、已无可否认地产生了
一些官僚主义蜕化现象的十分危险的倾向，都应加以谴责，但丝毫也不能证明指责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和把铁托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去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些做法正好不利于那些这样作的人。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人不断地要求遵守1960年八十一国声明，但这篇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折衷性的妥协文件，因此不能澄清争执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它远低于近几个月来中国文件的立场。

（乙）各国共产党中的其他分歧

中苏冲突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冲突，但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因此而没有其他分歧与矛盾。事实上不仅南斯拉夫潮流——虽然它靠拢赫鲁晓夫——保持着很大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特的特点，而且在两个“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特点也是五花八门的。

不仅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如此，他们的观点并非一模一样，而且，赫鲁晓夫集团特别是如此，事实上，该集团聚集的各党和领导机构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方针很不相同。例如，哥穆尔卡的路线，特别是对农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斯大林化等问题的态度，譬如与保共的路线就距离很远。再如，意共领导机构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态度不会接近于法共的态度，因为法共至今仍避免对官僚控制这种旧作风有丝毫的放松。再譬如关于国内政策的方针问题：多列士形式上宣称自己更忠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首先他无视任何过渡纲领的主张；陶里亚蒂则自夸为更“大胆的”革新者，公开对马列主义的国家论的某些方面提出怀疑，强调用十足的改良主义方法构思出来的过渡纲领。

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的磐石一致瓦解了，瓦解的特点是：
这是按照各国民族路线发生的瓦解，也就是说是各国领导机构之间的公开分歧，领导机构和党仍然保持着表面的政治团结。但是，分裂的规模，尤其是中苏冲突的规模——中苏冲突不可能以谋求始终可能的妥协的新尝试来求得真正解决——正动摇着官僚领导机构的威信，从而动摇着党中存在的制度。尽管至今还没有任何一党恢复了真正民主制度、承认派系权，尽管蓄意歪曲对方的立场仍然是一种流行的方法，官僚主义领导机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也开始不得不承认本党党员采取了不同于官方路线的立场，但不允许他们保持着领导地位。甚至党内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和更大的批评的可能性，这表明有一派尽管总会遇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与退却，它一定会巩固和扩大起来的。

（丙） 卡斯特罗主义的潮流

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环境中，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日益起着突兀的国际作用，当然首先是在拉丁美洲。这个领导机构不仅在于它产生的起源上、而且在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立场上，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

尽管该领导机构的某些成员在参加“七·二六运动”之前，就个人来说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但古巴领导机构作为领导机构来说，其理论修养过去不够明确，甚至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也表现出过模糊混乱的思想观点。但由于它深入联系群众，特别是深入联系古巴社会最贫困的阶层，因而逐渐懂得了革命进程的真正逻辑，尽管有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它是遵循着不断革命的道路来努力的，保证建立了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因此古巴是当代这样一种革命的第一个范例。即，领导机构本身是在斗争中并且通过这一斗争取得的经验才和马列主义观点结合起来的。
后来的经验证明这种结合是深刻的。事实上，
（1）古巴领导结构是继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结构之后，第一个有着这样的领导结构的工人国家，它在美洲大陆上面向被压迫群众，号召他们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见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2）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的讲话和声明表明，他们主要是从革命的角度来考虑拉丁美洲的革命问题的，拒绝了大多数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赫鲁晓夫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妇女大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方面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标志。
（3）国内方面，卡斯特罗领导结构强烈地感到了过去威胁过、现在仍可能威胁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危险，于是，正如左派反对派企图在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采取的作法一样，也有意识地公开号召群众进行反官僚主义化的斗争，并在解除埃斯卡兰特的职务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组织措施。
因此，看来卡斯特罗领导结构是目前所有工人国家中最先进，最政治领导结构。尽管由于它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它在投入当前这场国际辩论时非常审慎——无疑它的革命路线更接近中国路线——，但它一定会，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和各工人国家的青年中，产生日益巨大的国际影响。

（二） 各工人国家的演变情况
（甲） 苏联的演变情况：

苏联社会中的紧张和冲突，有在托洛茨基运动长期以来所概述的根本利益与倾向的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趋势。
非斯大林化有极其深远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根源。它基本上
是符合在斯大林的方法与观点可能引起爆炸的危险的情况下，来维护并保持官僚主义制度的需要的。它是试图哪怕是部分地解决涉及苏联切身需要、涉及苏联及帝国主义对峙的国际需要以及涉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客观地摆在苏联社会面前的问题的尝试。

在经济方面，苏联领导人曾面临着由于官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由于十月革命建立起的集体所有制关系特有的活力，以及特别在战后也由于苏联也分享到的技术突飞猛进，因而生产增长是相当高的。但这不等于说一切可能性都已真正利用起来了。恰恰相反，还有尚未发挥出来的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方面，这是由于群众的民主积极性的工作还很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工具利用率很低、生产不平衡和巨额的浪费等现象。

斯大林时代末期，这些现象达到了极点。赫鲁晓夫主义本身的意义，在于为这种局面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又不损害官僚主义统治本身。

权力下放是曾经被考虑过的解决办法之一。受到南斯拉夫经验启发的一股共产主义运动潮流都赞成这一解决办法。1957年的工业结构改革正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尽管这种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部分地消灭了触目惊心的流弊，但它既未能避免新的经济结构（州一级的结构等）中重新产生官僚主义，又未能避免地方上封建现象的出现。——这些封建现象与已往的封建现象是同样不幸的。所以，由于这个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在各级领导中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带来了在经济区域和经济领导机构上的重新改组。最近时期以来产生了重新集中的趋势。

苏联经济学家和领导人为此进行了讨论和论战。有一派深信
权力下放，乃寻求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另一派则认为新弊端之产生系权力下放不够所致，因而希望扩大权力下放。因此也对市场应有的日益增长的职能进行了讨论，有些人倾向于实行企业的更大自治（这也是跟踪南斯拉夫的经验）。

最后，还就经济客观规律、就制定新指数和经济核算标准以便为生产、定额提供更为精确、更可比较的指标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除在工业方面进行组织上的结构改革外，赫鲁晓夫官僚机构最近还考虑改变党的结构本身，考虑建立某些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机构。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改革党，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逐渐使党成为整个官僚社会主义控制经济的机器的一个部件。这只能产生部分的结果（节约浪费，限制经济犯罪等），但绝不能解决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刺激办法和经济各部门的平衡等问题，甚至还能引起政治危险。根据类似的经验证（生产委员会）而制定的建立咨询委员会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官僚机构本身看到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也表明，官僚机构在这方面不能走得太远，只能极度谨慎地行事。即使这些委员会真正成立起来，它们也不会拥有实权，不过是发表咨询意见而已。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苏联经济所需要的主要原动力。

因而很清楚，官僚机构无法解决过渡时期苏联经济的矛盾，因为一方面它无法深刻懂得经济规律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又不善于动员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力量——即群众的创造力。它只是不断地找到一些治标的方法，提出“技术上”的解决办法，而多采取新的官僚主义控制形式，只让工人阶级起一种完全从属的作用。

苏联经济当前的困难，在农业方面尤其显得尖锐和突出。尽管进行了许多改革，苏联农业仍很落后，农业增长率按人口计算
（虽不說沒有增长）是很有限的。苏联农业仍然落后的程度，首先表現在农业方面的生产人口还要占全部生产人口的 50% 以上，这个百分比无法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拟。其次，农业纳入计划经济遇到了巨大障碍，因为，农村中非集体的生产关系仍居主导地位。

增加集体农庄的自治权，建立更加有利于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的交换，已使得避免了保持斯大林传统路线可能造成的灾害。不过，这些措施并未能实现计划多次规定的生产增长率，因而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消费的需要，也未能消除或逐步限制集体农庄庄员对自留地的兴趣。因此，集体农庄无法指望充分利用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最后，垦荒试验证明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主要是因为收获量有很大波动，荒地上的国营农场本身中也已经提出了社会方面的問題。

赫鲁曉夫的試驗沒有为农业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沒有触及問題的最深根源。农业的困难只能靠大量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克服，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需根本改变经济方针，首先是缩减重工业方面的投資。再者，要想有一条更强调的经济发展方针，则意味着群众民主参加，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民主管理。只有当集体农庄庄员看到自己的农庄——因而自己农庄的收入——有巨大发展的具体可能性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感到集体农庄是他们自己真正领导的民主大家庭的时候，他们对自留地的兴趣才会渐渐淡薄。长期以往，才有可能考虑毫不紧张、毫无抵抗地从集体农庄形式过渡到集体管理的完善形式。

（苏联）经济发展的困难，特别是农业方面依然存在的落后状态，严重地妨碍着在充裕消费方面取得显著进步，1962 年采取的大幅度提高食品（肉类，乳类等）价格的措施，就是最明显
的迹象。

已经指出过，赫鲁晓夫曾力图使苏联社会朝着“福利国家”方向发展，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缩小到了“福利”社会的规模。赫鲁晓夫在这方面失败尤其惨重。诚然，苏联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同样千真万确的是，1962年生活水平的增长率就更加微弱。绝对讲来，它不足以满足苏联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苏联群众是期望官僚机构常常大肆吹嘘的苏联经济、技术的进步，能在消费和舒适设备方面得到反映的。

在文化方面，苏联官僚机构感到需要针对斯大林的作法来个转变，首先因为教条主义和行政的方法是一个桎梏，使科学工作贫乏，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得不到提高。其次，因为这种态度有使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公开破裂的危险。因而产生了自由化运动，其发展形式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运动在某些时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各科学学派相互竞争的主张，出现了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别的艺术流派。最近关于文学、绘画等问题的论战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些论战表现出年青知识分子阶层的沸腾的激情，他们渴望苏联文化向着高于前一时期水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突出暴露了赫鲁晓夫主义的主要局限性，这特别表现在1963年初所肯定的文化领域的某种新日丹诺夫主义形式上。显然，赫鲁晓夫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所牵涉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抽象派绘画或十二音节音乐固有的意义。赫鲁晓夫十分了解，在一个民主表现形式不存在或极为有限的社会中，最普通的政治冲突也会部分地或变相地在文艺冲突中得到表现。叶甫图申科和沃兹涅森斯基等诗人拥有那么多听众，这不仅表明苏联青年精神上的某种兴趣，而且也表明了这些活动的政教意义。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被官僚机构采纳了科学文化多流
派以及各流派自由辩论的主张，那么，它在客观上就将促进政治上的分化，这将使对一些政治问题有某种固定的看法，因而将使是自己苏联多党制权利的前奏。

之所以特别强调在文化方面进行辩论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在这场辩论中再次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和斯大林时代的罪行问题，其中包括集中营问题。事实上，在讨论文化问题和某些苏联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所承担的责任问题时，往往都提出当前的许多苏联领导人这一时期的争议问题。这对赫鲁晓夫领导机构本身来说是个极其严重危险，因而感到必须尽快地堵塞这个漏洞。

赫鲁晓夫主义的矛盾再次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赫鲁晓夫为了博得群众的支持，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以“个人迷信”的消除者自居，都以斯大林滔天罪行的揭发者自居。实际上，每逢他在各方面处境困难，遭到对手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再次求助于谴责“个人迷信”，想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即：恶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就是这个恶劣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保证。但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走向非斯大林化的每一个倡议，都会引起某些阶层提出新问题，提出新的需要，要求更彻底地进行非斯大林化。这对这个官僚主义制度来说是机会是一个危险，因而对赫鲁晓夫派来说也是一个危险，赫鲁晓夫派要么偃兵息鼓，要么不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

推进非斯大林化与后退时期的交替进行，可以由赫鲁晓夫主义的性质说明，这种交替进行甚至在最近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最近几年来由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向官僚机构提出了关于工人国家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新问题，而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尝试的同时，各工人国家经济配合的必要性也大大加强了。尤其在1960年下半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包括设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从长远来看，这些
措施将影响国际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各工人国家的经济结构。

此外，还曾考虑建立一个所有这些国家共同的计划经济结构。因此，官僚机构本身也不得不代表并表达（即使是以变相的形式这样做）各工人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即使撇开某某国家的某些暂时的抵制不论，官僚机构的存在也将阻碍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原因和在各国范围内起作用的因素相似，即官僚民族利已主义和官僚机构的利益。如果在国内不实行民主的计划经济，如果各国间不实行协调发展，那就不可能实现国际上的民主计划化和协调发展。在官僚主义管理下的各种经济内部发生的紧张和冲突，在某种国际环境下将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多。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官僚机构是不惜采用经济制裁的，它的政治需要与它使用的方法，妨碍着经济任务的完成。因此，如果工人国家的真正的经济配合排除其中某些国家参加，那么，这种配合是不可能有效的；具体来说，如果中国不得不留在这个体系之外，那么这种配合便只能是很有限的。远不该采取这样一种方针，恰恰相反，应该要求各工人国家间的这种经济配合的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大量参加敞开大门，这些国家的革命正朝着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前进（如现阶段的阿尔及利亚）。

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正不断遭到一连串各式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压力。我们曾多次指出，现在甚至在官僚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利益与方针上的冲突。最近几年来，最明显的压力莫过于经济方面的官僚机构的压力。众所周知，这是工农业的领导人施加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采纳赫鲁晓夫的某些改革。但在目前阶段，在关于市场法则、经济核算、厂长的职权、市场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中，工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种趋势的另一个反映是，苏联领导人中，受过技术教育和技术员出身的领导
人的数目在增长中。关于农民各阶层方面，他们与官僚机构的关系虽然与斯大林时代相比有了改善，但仍然是困难和复杂的。事实上，农民对官僚机构的自留地、集体农庄和贸易等的抵制和冲突，尤其表现出了经济方面的斗争与冲突。

而最引人注意的冲突还明显地表现在官僚机构同工人阶级的冲突中——他们的具体作用是不断增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当然，人们不能说现在已经有了群众大规模反对官僚机构的行动，也不能说工人已自觉地、确切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的权利要求。但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示威游行和冲突，这表明有些趋势正在深化中。只要举出奥德萨和诺沃捷卡斯等地的罢工就够了。在罢工中，工人提出了经济权利要求，提出了有关领导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某些正式文件中，甚至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都提到了工人敌视工厂中官僚机构的监督方法。这一切实际上包含着工人管理问题。

至于知识分子，如上所述，最近发生了很有意义的冲突，冲突的内在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问题。事实上，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某些高层，都愈来愈提出重新批判性地研究斯大林时代的课题。某些阶层还非常明确地关心诸如工人委员会等问题。继赫鲁晓夫最近加紧控制以后，许多知识分子进行了抵抗，这表明，不管有什么样的暂时波折，官僚机构通过行政措施和强迫作有损体面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代苏联社会的所有这些人心动荡现象，势必在国内问题与国际矛盾的刺激下，愈演愈烈和愈来愈多。（目前的中苏冲突至今尚无突出的影响，但随着冲突的继续发展，一定会有些影响，另外还出现了年轻一代对古已经验很感兴趣的现象。）官僚领导机构一
定会千方百计地力图应付这种局面，有时诉诸强制力和作一些后
退，有时在非斯大林化方面作些新的让步。特别是赫鲁晓夫领导
机构一定会力图用极端波拿巴特式的伎俩来保持政权的。但是，
总的说来，无论采用那种政策，都不会窒息革新趋势，因为这种趋
势在苏联社会中是有十分深远的根源的。因此，每向非斯大林化
推进一步，都会打开新的缺口，都将出现一些要求取得新让步的趋
势，而任何后退的企图都会遭到愈来愈明显的反抗，都将促使工人
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先进阶层对官僚主义制度的本质有批判性的认
识。

（乙） 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演变情况

中国最近五年来的发展是以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为标志
的，这些事件揭示了在这辽阔的范围内进行革命实验的矛盾面及
其目前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一方面来自中国工人国家本身实行
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则因为国际经济援助太不够了，即
使苏联政府不采取施加压力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使局势更
趋恶化——，国际经济援助也是绝对不够的。

1958—1959年是以“大跃进”和建立公社为标志的。这两个措
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因随后几年的失败而被否认或缩小。充分利用
农业劳动力对于一系列不发达国家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启示，这些国
家面临着相类似的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机构一方面想把
这一经验搬到城市中来、另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用于无限制的“大
跃进”的时候，就必然会遭到失败。他们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动员
农业劳动力，甚至采取军事方法，过分延长劳动日，不合理地取消了
必要的假期，这些都只有在非常时期、为了特殊目的才能这样作，
长此以往则损害劳力，降低生产率，虽不说是消极抵抗或暗中破
坏。所有这些，必然会影响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同样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大部分“小高炉”的产品没有用处，因此付出了无谓的代价，造成了浪费）。除此之外，还有天灾。据官方消息，实际上天灾造成的后果异常严重。

这就是近几年后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我们再重复一遍，这种情况由于苏联官僚机构所持的态度而更趋恶化，他们不仅不尽力帮助陷入非常困难境地的中国工人国家，反而撤回技术人员，要求迅速偿还债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锐减。

中国领导机构面对这些经济失败所持的态度，证明是一个经验主义领导机构的态度，但它也不是按照强迫合作化时期的斯大林方法而行事的。毫无疑问，公社运动的发展速度太急了，没有足够地考虑先决的必要技术条件；此外，把公社集体生活的条件描绘成几乎是行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夜，实际上是犯了理论上错误。这是宣传上的噱头原因。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诉诸暴力强制农民加入公社，也未求助强迫合作化过程中的斯大林方法，上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那里既没有那种曾经血洗苏联农村的屠杀，也没发生那种大量屠宰牲畜的农民的绝望反抗。

另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当所犯错误产生的后果暴露出来的时候，领导人在经历内部的激烈斗争后发生了转折，使得公社方面和总的经济路线方面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

他们懂得了调整几年的必要性，懂得了不再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因而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消费品和食品上，直到肯定优先发展农业。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机构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与群众的关系的观点上。尽管他们一向采取官僚家长制，但重点还是放在必须说服上面，而不是放在必须施加强制力上面。中国领导机构投身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个特殊性，如上所述，中国领导机构在讨论中维护了一系列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一致的致命的打击。

但是，中国客观存在的落后基础以及现任领导机构的政治素质，在中国工人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形现象。前已指出，中国工人国家的管理依然是官僚主义的，“大跃进”和疯狂建立公社时期所犯的错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应该强调指出中国领导机构对非斯大林化所持的官僚主义态度。1956年至1957年间，它似乎赞同进一步开展非斯大林化。毛泽东写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文，文中承认了罢工权；在文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学说。但是当刚开始的放松造成许多派系的发展时（其中包括公开冲突），中国领导机构就打了退堂鼓，此后就一直在这块阵地居于后卫地位。

中国的经济情况客观上是困难的，只有其他工人国家提供重大经济援助，只有民主地动员群众生产才能迈出显著的一步。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在国际方面提出问题的，对他们说来，建立在“和平共处”与长期经济竞赛的基础上的解决办法，是很难设想的。但是，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直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这样就会造成更有利于他们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无视这一点，即，他们希望把中国群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这就是强调苏联领导机构对缩减援助应负的责任，提出扩大国际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则掩盖中国情况的另一面，即，必须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真正的民主化。事实上，这种民主化可以带来以下的后果：充分利用群众的创造潜力，减少今天无可否认地存在着的紧张，减少官僚主义的管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各种困难。
目前阶段，真正的民主派别只存在于地方，而且很可能极为有限，根本政治问题和基本方针一向是由最上层、由寥寥的几个官僚层阶层决定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由于一系列因素而发展不均衡，这些因素是：1）原有水平，2）经济发展速度，3）具体的政治因素，4）国际因素的影响。

像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一些国家沿用旧有的经济结构，至少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像阿尔巴尼亚之类的某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依靠有限的生产力。在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引起了历史性冲突，例如匈牙利革命和波兰十月事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有的被公开拒绝（阿尔巴尼亚），有的人是被动地接受，有名无实地进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些国家的发展未受到国际上的牵制，而另一些国家（东德）则广泛地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

总结，人们可以指出下列倾向和问题：

——在经受某些困难和不平等之后，工人国家的国际一体化和计划化的重要性越来越肯定了。然而这种倾向同民族的具体需要和具体情况相抵触，同官僚主义的民族利己主义相抵触。

——工业化的进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合理化的任务，经济核算问题，反对浪费问题等），在某些国家中（如捷克，南斯拉夫），这些问题同苏联面临的题目是相似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像东德，波兰的部分地区），则提出确保更高和更规律的增长率的问题。

——官僚领导机构在农村的失败是明显的。不考虑必要的技术先决条件而快速发展的集体化，导致了真正的危机，例如在东德和捷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哥穆尔卡的领导机构通过的相反的
路线，即使避免了快速集体化的紧张局势和失败，但它过去和现在仍不能保证农村生产力的必要的高涨，不能保证把农业部门实际纳入经济计划化，事实上，还常常缺乏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部门。

——关于生活水平问题，好几个国家的生活改善仍然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国家，即使生活水平比较高，但由于农业发展不够和官僚主义的管理造成的混乱，在供应上仍不时发生危机。

——在文化方面，一些国家（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大，某些小心谨慎的尝试在萌芽状态就被粉碎了。相反，在其他国家（如波兰，甚至匈牙利），知识分子获得一定的自由化，自由化的程度在波兰比苏联更大。

在1956—1957年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采取新的路线之后，民族因素——战后一直到匈牙利事件为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随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逐渐消失，随着人民民主国家采用类似苏联的结构，因而苏联特有的冲突和问题在人民民主国家也就逐渐产生，尽管它们是以这些国家所特有的形式出现的。

最近时期，最可能有重大发展的局势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在波兰，存在着左翼批评力量高涨的迹象。在匈牙利，上次选举反应出不同潮流的存在，它们可以利用非常有限的合法条件来表现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甚至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引起尖锐冲突的日益紧张的局面。巴拉克事件、大学生示威游行、工人冲突等事件，提供了这种局势的迹象。

（丙）南斯拉夫的演变情况

南斯拉夫是各工人国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尽管生产在
某些情况下有的减缓，一般讲来，生产增长是很可观的。甚至在农村中，（南）领导机构似乎也制定了一个比东欧其他工人国家领导机构所制定的方针还要正确有效得多的方针。显然，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这种委员会的权力还有限，尽管官方也指责某些蜕化的现象。

新宪法——它应该被通过——的制订表明，在关于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结构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而且正在作出十分积极的贡献，超过了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甚至超过了那些赞成非斯大林化的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人们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南斯拉夫人早就提出来了，如（权力）下放、经济刺激的必要性等。

不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的趋势已经走上了极端，尤其是，允许市场的自由发展不能不带来极为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已经具体化了，连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权力）下放也未妨碍官僚主义在地方上的重新出现，并且有助于特殊化倾向的发展。

事实上，就连南斯拉夫的情况也证明，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真正彻底的民主化。但这种民主化现在没有因为建立权力有限的工人委员会而实现，因为现在没有能够政治方针的根本问题真正表示意见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

（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地对官僚机构及其制度开展革命的批评，不管这种制度目前的表现形式如何。第四
国际不隐瞒，它对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求实现1938年过渡纲领中和我们国际运动后来的文件中所阐明的纲领。此外，这些国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际的帮助下，根据每个国家群众运动现有水平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不同国家制定纲领。

总的来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官僚制度的当前危机中找到支持，以便回答正在争论的、反映（经常是以变相的形式反映）过渡时期的实质的问题。他们特别应该竭力用年青一代能够接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代即使没有被斯大林教育养成最坏的畸形，也不会因而可能了解列宁主义批判性思想的优良传统的。

在中苏冲突中，以及一般讲来，在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争论中，第四国际坚决地谴责使用国家手段来解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第四国际尤其谴责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采取的经济措施。它再次强调必须把工人国家的政策同共产党的政策区分开来。它谴责上述的事实：即，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引起了国家方面的报复与决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第四国际重申，第四国际批判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赫鲁晓夫领导机构和大部分其他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因为，它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上（如反斗争的方法问题，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不断”革命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中国路线大体上比赫鲁晓夫分子的路线进步，更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集中于一极。

但第四国际也就其他很重要的问题，如对一塌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估计，对某些不发达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所持的态度，对
南斯拉夫工人国家性质的判断，对非斯大林化问题的态度等，也对中国领导机构提出批评。

第四国际支持必须举行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进行，并且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都参加讨论，第四国际应该享有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权利。

在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现阶段为扩大和加深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而斗争，迫使官僚机构向群众和知识分子作出更大的让步。应该特别着重批评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经济中产生的不良后果，提出在企业中建立监督组织和工人管理的必要性。

对于工人享有以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的权利，不是抽象地支持，而是从经验、经验和实际进行的斗争出发来支持。

在文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日丹诺夫的观点或新日丹诺夫的观点，为各种科学学派和各种艺术流派的充分自由而斗争。

同时，他们还要求新闻自由，特别是为苏联公民享有直接和完全了解党和国家机关中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同样，也为他们享有直接、完全了解各国共产党中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

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显著提高农业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投资的必要性，甚至可占用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这种方针将确保经济更平衡、更合理的发展，同时还可能提高生产率，其结果将在一切领域中包括在重工业部门中得到表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工人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一体化，它可以确保更加合理的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有日益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和各工人国家间人们流动的自由，这将促进经验交流和日益增长的一致。
在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领导机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冲突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仍然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机构，它所领导的工人国家的特性是深刻的官僚主义畸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需要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制度，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即争取拥有实权的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争取真正的苏维埃结构，争取使处于革命后的社会之中代表工农利益的派别和政党享有自由表达权、争取使工会独立于国家之外，争取一切科学学派和一切艺术流派的自由等的斗争。只有通过一场足以在政府的政治形式中发生质变的群众性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上述成果。

现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要在本国为以下各项而斗争：

（1）为公社的有效民主管理而斗争；

（2）为在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并继而建立工人管理而斗争；

（3）为在党内享有批评权而斗争，并争取在中国实行（中国）领导机构在国际上所要求的那种少数派的权利；

（4）为恢复并发展1956—1957年间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而斗争，这一方针在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和在“百花齐放”的运动中得到了表现。

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前斗争纲领应根据与适用于苏联的标准相类似的标准来制订，同时还必须从前面已指出的十分不同的情况出发。

在南斯拉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反对对当前经济结构的离心倾向，为工人委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权力，为把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政治方面，为真正贯彻最进步的宪法新规定，为在党内享有派别权和享有自由表现、批评和反对权、为享
有苏维埃性质的多党制而斗争。在国际政策方面，他们要为反对领导机构在战争、“和平共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上的右倾的和机会主义的方针而斗争。
二、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
（1963年7月25日）

苏共和中共领导人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意识形态会议”的中断，在中苏分裂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方面打开了新的一章。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二十五点”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个月以后发表“公开信”作为答复以后，人们对这新的一章看得更清楚了。

第四国际——由列昂•托洛茨基创立的世界性的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认为有必要公开地说明它对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由于苏共的“公开信”明确提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态度，并指责中共的行动“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这封信还指责中国在锡兰的代表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并说，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给中共的一封公开信中“完全支持北京的活动”。

第四国际对中苏分裂的态度在第四国际6月21日至26日在意大利举行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文件中已经阐明了，不久前这个文件发表在杂志《第四国际》（法文版第21年第19期）的专号上。我们想概括说明一下在那件文件中提出的主张，第
澄清我們對中共的“二十五点”和蘇共的“公開信”中提出的根本問題的立場。

I

第四國際認為，由於中蘇分裂而在世界共产主義運動中出現的討論是一種健康的发展。就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和戰略進行坦率和公開的辯論，遠不會“削弱社會主義陣營”和“在客觀上幫助帝國主義”，而只會有助于使工人階級運動和殖民地國家的反帝運動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得到澄清，從而加強全世界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力量的鬥爭。

現在討論終於公開進行了。幾年來，主要的辯論是中共和蘇共之間的辯論，赫魯曉夫集中攻擊阿拉巴尼亞，而毛則集中攻擊南斯拉夫，現在這一可笑的現象也終於結束了。這的确是向前跨進了一步。

在世界革命運動內部公開討論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這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遠不是相違背的。無論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世時所有重大的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都是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公開進行的，以便讓所有工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了解情況，這樣做是符合1914年以前盧森堡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領導的鬥爭的傳統的，也是符合社會黨國際左派從1960年起（就社會黨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問題）對伯恩斯坦和米勒蘭主義進行的鬥爭的傳統的。

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共产國際四次大會上的一切討論也是公開進行的。這些大會的會議記錄都發表了。這些討論牽涉到有關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群眾性的政党的策略問
題，也牽涉到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提出的許多策略問題。

沒有什麼可害怕的

如果說，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比較弱、第一個蘇維埃國家受到敵人的包圍、陷於內戰、經濟差不多垮台的時候，它還能進行這種公開的討論，那麼，現在當它比以前不知道強大多少，蘇聯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工業國並且周圍有着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工人國家的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這種討論肯定是沒有什麼可害怕的。此外，世界力量差距已发生了不利于帝國主義而有利于反資本主義力量的決定性的變化。

有人說這種討論會幫助帝國主義分子了解社會主義陣營正在進行的事情，這種論點是不能成立的。資產階級報紙好多年來一直“得悉”中蘇分歧。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一直在隨心所欲地在推測分歧的程度，並且試圖利用這種分歧。唯一受迷惑的力量則是國際工人階級，他們被阻止參加辯論。這再一次證明，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用“密密外交”的辦法只會幫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

對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運動的戰略、策略問題的討論应当同各個工人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明確地區別開來。雖然我們贊成各黨之間坦率地、公開地進行討論，但是我們強調指出，各個工人國家在軍事、外交和經濟領域絕對需要保持行動一致。為了確保行動一致，工人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就必須嚴格地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並且斷然拋棄“領導國”和“領導黨”的理論。工人國家必須通過互相協商和談判來采取共同行動，任何國家都不得向其它國家發號施令。

斯大林為了保衛篡奪蘇聯政權的蘇聯官僚機構的獨裁利益而
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实行共产党之间的秘密外交的作法。斯大林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倡导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分节地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我们要呼呼所有共产党人，特别是声称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自称为“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果”的苏联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断然根除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

不要向你们的有战斗性的党员和工人阶级隐瞒分歧！不要用秘密外交代替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为举行一次所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而战斗！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必须包括所有共产党人、第四国际、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从各个正式共产党开除出去的“亲华派”共产党人。唯有这样一次会议能够根据过去二十年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不仅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透彻地讨论今天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切战略和策略问题。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企图把问题模糊起来，硬说中共“希望打核战争”、“对爆发核大战的危险漠不关心”。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客观上帮助了美帝的反华和反共宣传。

的确，中国共产党在从前一些文件中虽然支持苏联争取销毁和禁止对世界工人阶级造成极大威胁的核武器的斗争，但是对问题的提法有时候意味着低估了这种武器的破坏力量。苏联答复中共“二十五点”的公开信继续根据下面这种假设进行争辩：中共对核战争“漠不关心”，中国人甚至希望发动这种战争等等。很明显，苏联领导这样做是故意歪曲和曲解中共在自己的文件中的第15、
16 和 17 点中清楚地表明的立场。

实际上，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并没有也不可能围绕发动核战争“是不是适宜”这个主题进行讨论，因为除了小撮疯子以外，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也不会为这种自杀性的建议辩解。讨论也不是围绕核战争究竟有多大破坏潜力这个问题进行的。这也不是什么“策略”问题，而是一个科学事实。真正的讨论关系到的不是工人国家（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是各国共产党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政策。

中国人在自己的“二十五点”中没有哪一点要求苏联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进行武装干涉。他们所要求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用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一口号来作为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托辞，或者以此作为幌子来掩盖他们抛弃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实行彻头彻尾的改良派和修正派的机会主义。

武装斗争

中国人提醒各国注意这样一个消息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不仅在核时代以前，而且在发明了核武器之后——一切取得成功的革命，如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所显示的那样，都不得不进行武装斗争来推翻它们的敌人。

因此，把说出这种不可否认的真理的革命者同想要煽动一场核战争的人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谬误。相反地，中国人的这样的说法一般说来是有道理的，只有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必要的活也包括武装斗争——并取得成功，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最终才能解除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销毁核武器，并保证人类享有肯定的持久和平。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大致是上述的总路线，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反对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国人现在已经同意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某些共产党极右派的蜕化变质的表现提出的批评，例如莫斯科领导集团（在印度）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反对中国的工人国家而且甚至反对被赫鲁晓夫投入监狱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背叛行为；美国共产党要求黑人和工人支持垄断资本主义和最狂暴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所控制的民主党的可耻行径；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表现的可耻的消极态度；意大利共产党的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理论：可以通过“结构改革”、通过议会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无需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也无需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共产党领导集团提出的一般批评。但是同时由于北京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苏加诺资产阶级政权的机会主义的作法保持缄默，我们对中共立场的一贯性表示怀疑。

另一方面，中共提出的二十五点（其中的第二十三点）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而已经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人（在第十九点中）（应为第二十点——编者注）说，“有些人”过去夸大“某个人的作用”的问题，他们还要求对“批判斯大林”进行讨论，对此我们肯定不能赞同他们的立场。

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中共拒绝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
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斯大林统治下对苏联共产党人和工人以及对国际工人阶级犯下的可怕罪行是由于所谓的“个人迷信”造成的。中共这样做是正确的。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想“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第19点）（应为第20点——编者注），中国人这样说是正确的。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进行的这种批评，只有用来比赫鲁晓夫更进一步推行“非斯大林化”，那才是正当的。如果用这种批评来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作法，这种批评就会变成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

对苏联共产党的整个老近卫军领导犯下的罪行（这些人大多数人被斯大林肉体消灭了），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对国际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行（他们力图在许多国家破坏和阻挠革命斗争）是非常真实的，非常具体的。今天，这些罪行在许多国家首先是苏联和欧洲的工人国家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共产党人、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中仍然记忆犹新。

当我们在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这些罪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而是那一阶段整个苏联领导集团集体的责任。对这些罪行，我们只有看作是官僚阶级利益的表现，才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官僚阶级篡夺了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并压制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真正工具的苏维埃民主。为了防止这种罪行的重演，光谴责斯大林个人是不够的。必须取消官僚阶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特权，在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真正苏维埃民主，恢复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内形成各种派别的权利（因为正如中共自己说的，一个共产党内的少数也可能是正确的），并恢复工人在苏联法律许可范围内以及在社会主义宪法基础上成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权利。有必要重新确立列宁在世时的那样一个条例：“党员最高收入”（政府中的党员的
最高收人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收入。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通过工人委员会建立工人自治制度，把工厂的实权交给工人。

对赫鲁晓夫这样的批评在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间也是非常受欢迎和得人心的。苏共公开信说得对，苏联人民群众当然是支持非斯大林化的。中国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一切企图只能使他们同所有的工人国家的基层工人和共产党全党完全隔绝开来。

第四国际怎么可能也不支持中共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要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我们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批评。我们要坚决认为只有一次政治革命才会在苏联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消除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现象和他们的特权，将大大加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

我们也反对中国的反帝共的宣传以及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提法。中国谴责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极端右倾，这种谴责是正确的。但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目前南斯拉夫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个工人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其程度至少同1948年中共也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一样，如果比那时更大的话。

中共谴责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国家”代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斯大林也是如此——关于苏联已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论点是缺乏根据的，他们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指出，苏联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因而推翻了所谓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但是在中国人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摘出大量引语以证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也将存在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列宁也在《国家与革命》中发展的
这个基本真理的辩证的另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是一种“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应当由劳动人民群众集体行使。中国人似乎并不像列宁那样强调必须不断发展和增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使工人群主掌握真正的权力从而反对官僚机构滥用权力和蜕化。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这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要不然就是因为在中国就有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严重现象，而工人群众并不像《国家与革命》所论述的那样行使直接的国家权力。

IV

简单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的“大辩论”中所采取的立场。

托洛茨基主义者全心全意地、但批判地支持中国以及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中同其之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右翼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共产党左派。

我们批判地支持中国的这一主张：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革命方针是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准备核战争的活动进行斗争的唯一有效办法。

但是同赫鲁晓夫派和毛派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任何这样的图谋：把这些原则进行修正来适应任何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的眼前利益，或对这些原则进行歪曲来反映任何工人国家的暂时利益。我们致力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期在现时代人类正在经历的伟大、革命的剧变中，它能反映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类历来抱有的普遍愿望。我们再重复一遍，人类摆脱目前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

目前的危机反映出世界共运必须刻不容缓地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斗争的武器交给广大工人和农民，以应答现实时期的要求。我们再次重复我们向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具体建议：

召开一次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通过工人的民主和国际辩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再生。
三、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托派）
特别代表会议文件

1. 公报

为了讨论第四国际的成长危机所造成的形势，为了讨论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并为第四国际的成长和发展打开一个新局面，第四国际于4月间，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了特别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是在以列昂·托洛茨基同志和娜塔莉娅·塞杜娃同志为名誉主席的形式下举行的。

会议一开始，先默哀一分钟，对娜塔莉娅·塞杜娃同志表示敬意。

会议对拉丁美洲的群众表示了敬意，拉丁美洲群众的斗争，已经使他们成为殖民地革命的先锋。会议对苏联和工人国家的群众表示了敬意，政治革命正在这些国家里发展着；同时，科学、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正在从客观上导致苏维埃工人国家采取反对苏维埃官僚主义统治的行动。

会议还对拉丁美洲各支部表示了敬意，这些支部正在用他们的发展推动着第四国际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目前正在他们本国进行着重要斗争的阿根廷工人党（托派）和秘鲁革命工人党。

会议还对各支部未能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同志表示了敬意，他们正在最遥远的地区执行着国际的任务。

艾米里奥同志代表拉丁美洲局在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了这
次代表会议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路易斯同志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就布尔什维克派，在国际内部，针对前国际书记处的旧领导集团，针对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而进行斗争的意义，作了深刻分析。

已经陷入保守主义的上述领导集团，在运动的建设方面所持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知识分子观点，而不是布尔什维克观点。要建设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具有以夺取政权为斗争目标和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的真正党的干部小组，他们表现了无能。

欧洲领导集团敌视并反对了拉丁美洲小组为建立真正的、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各国支部而开展的斗争。拉丁美洲小组是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按照拉丁美洲局的观点，在拉丁美洲成立的。这种错误立场所导致的实际后果，由于前欧洲国际书记处小组的政治瓦解，在劳工界压力下，第四国际在欧洲的运动已被取消，第四国际的报纸已被停刊，机会主义倾向获得了发展。

这个领导集团尽管过去经受过政治考验，但他们终究没有为应付当前的局势作出过准备。当前的局势是：群众的革命运动无比高涨，世界原子大战正在准备中。同时，几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第四国际前欧洲知识分子领导成员，在关于世界原子大战的前景上，放弃了第四国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他们向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投降，反对战争不可避免的主张；他们反对群众就进行世界原子大战而作准备；并在对待苏联恢复核试验的问题上，滑到了反苏的立场上去。

在这种政治瓦解的过程中，第四国际前欧洲知识分子领导成员，对待当前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发展了错误立场。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根本不懂殖民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采取的是家长主义立场，最后，他们把殖民地革命从属于宗主国革命。
在对待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上，他们放弃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和分析。他们自甘适应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致敬，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官僚集体制得以为继续生存而作的一种尝试。这种态度不是别的，是否认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杰尔曼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的一篇谈论北美的文章里写道：“肯尼迪想同俄国人的谈判的愿望想必是真诚的。他知道核军备竞赛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他对某些自由主义人士的和平主义宣传不是无动于衷。他诚心诚意地打出了联合国这张牌。……”杰尔曼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表现了他的投降，他正在向和平共处的观念前进。

这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客观上，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放弃了第四国际。

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路易斯同志的报告，这份报告表达了思想上的伟大统一和对于从而产生的任务的乐观主义和伟大信心。

代表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了路易斯同志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P. 贝雷茨同志关于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报告，阿洛约同志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报告，洛素同志关于拉丁美洲革命的报告。

这些报告，加上拉丁美洲局过去的文件，将作为制定行将召开的世界特别代表大会各项预备文件的基础，并由即将按期出版的西班牙文《第四国际》杂志予以发表。

代表会议决定准备一项关于阿根廷危机的文件，一项关于玻利维亚和智利之间罗迦河边界问题的决议，一项致古巴同志、古巴工人国家以及工人阶级、群众和政府的信，反对巴布洛的尾巴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反对国际前领导机构里的投降派。代表会议把拉丁美洲局关于开除艾斯加兰特的决议和关于阿根廷革命当前情
况的决議作为自己的决議。代表会被宣读了国际亚洲各支部的来信，其中有印度尼西亚同志表示批判并拒绝前欧洲领导机构投降主义立场的信。代表会被收到了欧洲同志们的发来的致敬电文，还有在欧洲举行的会议以及这些会议的决議的通知。这些都是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的支持。

1. 葛斯塔同志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她就发展党的工作和各党的建党経驗作了总结，就拉丁美洲局的工作作了简短介绍，就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临时书记处工作计划以及将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的工作计划提出了建議。葛斯塔同志还报告了巴布洛和山登的狱中生活片断，他两人给国际留下来的經驗，以及拉丁美洲各支部——他两人获得释放的重要基础——所作的巨大努力。代表会被面了巴布洛和列維奥写给拉丁美洲各支部和国际的下流信，这些信将立即予以公布。

代表被选出了新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和临时国际书记处。以代替业已陷入瘫痪和分化的旧执行委员会和旧国际书记处。代表会被比利时支部杰尔曼领导集团、法国支部皮埃尔领导集团以及意大利支部列維奥领导集团的投降作出政治的和組織的結論之后，通过了一项关于在欧洲重新建立第四国际各支部的決議。关于前锡兰支部，代表会被面了結論，该支部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政党同第四国际和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代表会被通过了一项关于第四国际打入亚洲、非洲和工人国家的建議。在现时掌握了国际领导的国际布尔什维克派，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他们建设这个运动的能力。他们在拉丁美洲局的领导和在从事积极活动的生活中，发展了，成熟了。如果今天他们再不把运动的领导担当起来，他们就只有容忍运动的瘫痪。担当领导意味着克服危机，意味着在历史客观条件对革命、对社会主义最
有利的情况下，打开一个第四国际向前发展的新阶段。

关于組織問題的报告，像其它报告一样，也获得了一致通过。

为了恢复业已中断达四年之久的第四国际傳統，代表會議决定发表一项“五一宣言”。对于各种各样的所謂托洛茨基小组和支部，代表會議通过了一系列的決議。对于多年以前就已经放弃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會議划清了界限；对于智利、玻利維亚以及秘魯的一些小组和个人也划清了界限。

出席會議的全体代表选出了任期到下一届世界代表大会为止的临时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临时国际监察委员会。在下一届世界代表大会上将討論巴布洛和列維奧对拉丁美洲局，特别是对路易斯同志进行的下流诽谤。代表會議对路易斯同志表示了全力支持。

监察委员会还将負責调查第四国际的经费情况，并被责令向巴布洛追索这些经费。

代表會議决定呼吁全体国际干部投入世界中央集权党的新动力，以便完成使国际蓬勃成长的必要任务。

路易斯同志在代表會議上致閉幕词，总结了會議的工作，他在闭幕词里指出，代表會議通过的各项决议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这些决议，这次代表會議成了列昂·托洛茨基去世以来最重要的會議。

路易斯同志指出，在历史上，能够担当这次會議所担当的责任的集体是极少有的。这次會議所以能够担当这样的责任，是因为它的高度成熟和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信心。同时，这次代表會議对于在群众中带头并引导群众取得政权，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整个运动，特别是每一个干部，都必須负责提高自己，使自己能够胜任等待着他去完成的任务。
在继续进行国际的工作方面，促成这次代表会议的召开并使会议作出各项决议的布尔什维克派，并不抹煞国际的过去。布尔什维克派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担当起国际的领导的，国际由于一班人马的投降、保守主义和堕落腐化面面临着瘟疫和取消的威胁。国际的当前领导，为了应付目前存在的现实革命形势，曾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而前一届领导就未有这样做。通过这次代表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第四国际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

路易斯同志以代表会议的名义，向为使代表会议能够顺利进行工作并进一步展开活动作出努力的支部致了谢意。

代表会议在国际歌声中闭幕。

代表会议结束后，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选出了临时国际书记。书记决定，他的首先一项工作是把代表会议的全部文件用西班牙文、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并在短短三个月内用阿拉伯文、俄文和中文出版。

1962 年 4 月

2. 宣言

致全世界被剥削群众、妇女、儿童、老人、工人阶级、工人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农民群众、学生、以及当前阶段正在创造历史的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

同志们：

生活在历史现阶段的人类正面临着决定历史进程的两种根本现象：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

142
观察历史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发展速度，也不能根据工人国家的发展，而是要根据世界广大群众的进攻性的、强有力的和革命的爆发。几乎人类的四分之三生活在工人国家里，或者资本主义结构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中。后者正在进行革命，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独立而斗争，并且正在为独立，接近这种独立，没有任何一个被称为“中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没有跨越这个殖民地革命的过程。

不断革命正在全世界向前发展。这不是可以根据手持武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国家里的情况作出判断，不但可以根据已经存在的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取得胜利。这些胜利正在促使建立一个未来的工人国家的那些国家里的情况作出判断，而且，即使是根据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那怕是最落后的国家，群众手里虽然还没有武器，但是在他们的意识中，在他们的心里，却已经有了武器。同时，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群众无时无刻不在挺身来进行罢工、举行示威和提出抗议，这和武装斗争有着同样的意义。

在当前阶段，历史进步主要基础的特点和标志是，世界群众创造他们的自己的历史的意志，他们进行罢工，组织示威游行，以争取生活的权利，争取生活过得更好的权利。在整个非洲，在落后得像加纳、几内亚、刚果和南非那样的国家里，群众都在寻求使自己的问题立刻获得解决。他们想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他们推动他们的领导和组织去夺取政权。

这种活动标志着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这不仅是因为群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某些发展措施。反过来，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企图抑制这种革命的推动力。当前阶段的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指出了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活动、纲领、政策和前景。
革命的加强和帝国主义的不断衰败

在工人国家里，经济、社会、科学和军事，都有了不断地增长。科学进步和军事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它们是人类进步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和人类进步的前景有着绝对联系的一个部分。资本主义世界正在为解决它的历史持续性问题作准备，它企图用打一场原子战争的办法，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和平竞赛或社会共存的基础上，来解决它的继续生存的问题。

对帝国主义准备这种原子战争的回击，就是在全世界要为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就是要为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但是，单纯这样讲是不够的。因为，就可能作出估计的历史前景来看，同时进行又是政治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殖民地革命，从而束缚住帝国主义的手脚，牵制住帝国主义，或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并且通过这种办法来阻止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是不可能的。

从帝国主义的存在本身的性质来看，从帝国主义的制度来看，从帝国主义的内部关系来看，从帝国主义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机器来看，帝国主义有力量随时发动原子战争。这并不是说今天或者明天，一个月以内或者明年它就要这样做，但是它必须为随时发动原子战争做好准备。总之，不管他到什么时候才发动原子战争，这是帝国主义企图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手段。因此，在军事上作好准备是工人国家的一项无可非议的权利。对于工人国家来说，如果他们不做好准备，不试验各种最现代化武器，以便在科学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整个帝国主义，他们就等于自杀。作好科学的军事准备，是这个时代的一项至为重大的必要措施，否则工人国家就会遭到摧毁和消灭。
这并不是说我們对工人国家的官僚领导集团具有信心。在必须作好准备以应付原子战争的同时，还必须号召进行殖民地革命，竭尽全力并通诸各种方式支持这种革命。工人国家应当从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上支持世界群众。那怕这会引起战争，甚至会引起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它的生命的最后阶段，它衰弱、非常之衰弱，尽管它掌握着了不起的经济、军事和科学的潜力。如果說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会是一股绝对超过工人国家联合起来的物质力量，可是它们没有社会力量，这不仅从历史的前景看是如此，现在就是如此。

从美洲一直到北美洲，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任何一次重要的罢工，都在动摇着资本主义国家。最近美国钢价每吨上涨6元，肯尼迪立刻就有了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给予消费者群众什么利益或好处，甚至也不是使大钢铁公司的进出口竞争直接得到什么利権。这种反应的目的在于如何防止通货继续膨胀，从而避免引起社会运动、罢工等等。北美洲的帝国主义害怕就连在美国都不能控制群众的动员。它怕动员起来的群众和古巴革命站在一起，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站在一起，和世界革命以及工人国家的文化、科学和军事发展站在一起，因为这种团结会使美国的群众变得坚定，会使美国的群众产生信心，会使他们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恐惧，反映了它在维持治安方面的软弱无能。

古巴的经济力量只占世界经济力量的百分之点零一。从经济上说，丢失一个古巴，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在经济竞赛中，从任何角度来看，古巴的生产都影响不了任何人。然而古巴革命对于美国却成了比苏联还要可怕的头号敌人，因为它对拉丁美洲，对美国，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美帝国主义认为古巴可怕并不是指它的经济力量，或是它将来的社会主义，而是
指它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它今天的工人国家和卡斯特罗对他们的讲了下面这句的话的古巴人民：“必须把口粮不足和食品缺乏分配一下”。帝国主义怕古巴怕到如此地步，是因为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社会条件会使这些地区接受哪怕是小得像古巴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革命影响。因为古巴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社会上的影响。

全世界的群众都会把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个小小的国家就在美国人的鼻子尖和胡子梢底下，打倒了像巴蒂斯塔那样一个强大的军队。这个胜利激励着世界群众的士气，鼓舞着世界革命群众的意志，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成熟。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当前所处的境地。衡量资本主义政治的和社会的具体历史力量，不能凭它的经济力量为尺度，而是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帝国主义的弱点不在于它所掌握的原子武器和导弹导弹是否比工人国家少些，而是在于，世界殖民地革命、古巴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当前的和直接的效果，使得帝国主义——尽管它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感觉到些什么。北美洲的工人群众和被压迫群众接受了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美帝国主义早就已经把保卫北美洲、反对工人国家原子威胁的反古巴、反苏联运动组织起来了。任何反对苏联进行核试验的运动，美国都组织不起来，可是在它本国却有着一个强大的反对它自己进行核试验的运动。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那些胆小如鼠，犯了投降主义，因而反对工人国家进行核试验、核装备的人们的论点是如何的错误。

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斗争

世界群众，包括北美洲的群众（尽管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主要
的中心），都感到了世界革命在前进的社会、历史和具体效果。美国人民十分坚实地成熟了。

北美洲帝国主义最操心的事是让全体美国人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都来参加准备反对工人国家和反对殖民地革命的原子战争。当初，美帝国主义和德国打仗的时候，它在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对手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方面，曾经博得一股强大的同情它和支持它的潮流，然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群众也没有完全放弃罢工斗争。

当时，就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同德国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尽管某些人数众多的重要部门通过决议，举行示威并向帝国主义作了某些让步、公开支持它，美国的群众还是进行了罢工。

现在，正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原子战争并对古巴进行侵略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北美洲的群众发动了争取每个星期只工作四十小时和三十六小时的运动。九千个电气工人最近获得了每个星期工作五天、每天工作五小时的胜利。在炼钢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若干重要部门里也出现了减少工作时间的趋势。这意味着尽管北美洲的无产阶级和被剥削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低，尽管他们还不如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成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们没有上美帝国主义政治沙文主义的当，也没有服从美帝国主义政治沙文主义，支持它来反对古巴，反对工人国家的利益。这要在往年，情形就会不是这样。换句话说，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对北美洲的群众产生了影响，从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从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

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意大利和英国，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处在经济繁荣、共同市场不断上升和发展、欧洲国家之间
的商业贸易大量增加和劳动得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相信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和平共处的和解政策的无产阶级，开展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不断上升的罢工运动。这种事实意味着欧洲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保体主义化，他们不消极。他们的争取增加工资和在社会福利方面争取新的胜利的大规模运动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殖民地革命。

例如在法国帝国主义决定对阿尔及利亚政府作出让步这件事上，法国无产阶级2月13日的大示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几十万工人、小资产者、职员、科学家、学生、各行业的人举行了游行。他们游行不但是为了要求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也是为了反对法国帝国主义。这是他们表达斗争意志的间接方法，而在这以前，一连多少个月，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共产党和“群众统一战斗组织”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响应。如果在群众意识里没有感到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他们就不会走出去参加游行，不会响应这个呼吁。

在德国，二十五万钢铁工人最近争取到了重大的让步。在意大利，罢工运动在不断地发展，青年工人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英国，罢工仍在继续进行，由于运输工人停止工作，整个伦敦瘫痪了24个小时。钢铁工人、码头工人都在此起彼伏到处罢工。当然，这些罢工的规模还比不上过去有些时期的罢工规模那么大，那个时候，整个无产阶级群众都罢了工。但是今天的罢工仍然表达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贯愿望和意志。这不是政治上充分成熟的、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罢工，但是他意味着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存在着走向更大规模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些斗争在准备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各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和苏联官僚
集团背叛了革命

苏联官僚集团和各国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历史的虚伪之谈。它是一个历史骗局，是一项对世界群众的罪恶政策。在目前阶段，尽管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自感快慰，尽管它们的经济得以充分上升和突然繁荣，劳动得以充分就业，但它们无法抑制国内的群众运动，而这些运动的存在，标志着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对殖民地群众的同情。

不但在欧洲，而且在美国，都存在着摧毁世界资本主义堡垒的条件。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只要发出一项呼吁就可以粉碎北美帝国主义，北美洲的群众就会起来；而是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苏联是有可能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派遣民兵、志愿军，提供原子武器等，从军事上、科学上和经济上，直接地、主动地、全面地支援殖民地革命的。这些办法，加上占世界人口半数的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会对北美群众产生直接影响。和平共处政策从历史来看不可能存在，这从古巴的例子已经得到证明。如果帝国主义同意在世界上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它就不会反对古巴。而如今帝国主义同古巴势不两立，这就说明它目前对待苏联的态度不会持久。苏联官僚集团和各国共产党所以要这样地强调和平共处政策，是因为他们在想办法继续生存——就像第四国际一贯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它们同帝国主义一样，害怕战争会把它消灭。

战争意味着革命。和平共处政策是一种骗局，它想给群众指出一种虚伪的前景，导致群众放弃对殖民地革命的支持，同时阻止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高涨。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了反对
一切非剥削者的斗争

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投入了斗争，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斗争的原因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和需要，例如，要求同工同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而且是要求解放的深切愿望。

阿尔及利亚的群众马上就把他们的国家从法国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了。接下来的是如何解决殖民庄园主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斗争；在法国，没有广大的妇女和儿童投入斗争，阿尔及利亚人不会获得这项协议，法国帝国主义也不会被迫作出这样的让步。法国帝国主义为了使它同阿尔及利亚人签订的协议获得通过，必须同它自己的派系之一，秘密军队组织，进行内部斗争。法国帝国主义不得不攻打一部分它自己的机器，不得不采取加速它自己解体的措施，迫使它后退的措施，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压力非常之大。在这些社会矛盾的内部，不仅是在阿尔及利亚，同样也在法国国内，前进、斗争和压力的历史重量是巨大的和不可摧毁的。

在上述解释以外，如果同意或认为法国帝国主义甘心自相残杀，从而削弱自己，沮丧自己的士气，在群众面前丧失威信和力量，而不是自行内部调解，那就荒谬了。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阿尔及利亚的群众运动，是加强和增加帝国主义的矛盾。当前阶段，决定历史的命运的是世界群众。

没有什么领导，但是有一个以世界群众的解放愿望为基础的世界运动过程。在整个非洲，从阿尔及利亚经过刚果到南非，千千万万个身穿短裤、赤足裸体的人抱定决心投入了争取解放的斗争。非洲的一切问题都表明非洲大陆正在充分地向前发展，它不但有
把帝国主义赶走的能力，而且有建立工人国家的能力。

当前历史阶段的特点是：一个国家一旦独立，立刻就要求成立工人国家。它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机构的方向前进。“中立”国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就是一个证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半殖民地国家。它们在不放弃资本主义阵营的同时，是处在殖民地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说明资本主义对它们已经没有威信。它们必须寻找一种特殊的自我保护的方法，把自己放在介乎资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地位的方法。这些事实标志着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前途；反之，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对它们却有吸引力。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已经有能力建立工人国家，如果它们还没有这样做，如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在统治着他们，这主要是由于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罪恶和阴谋政策，由于各工人国家间相互统治集团的罪恶和阴谋政策。

兹值五一节之际，我们应说明我们决心把下述任务当做我们斗争的根本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际指导机构，这个机构能够成为组织和推动殖民地革命、组织和推动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组织和推动在帝国主义堡垒的美国正在孕育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这个指导机构能够胜任把迄今仍听命于叛变了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群众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能够胜任在工人国家里推动政治革命，同时也能够胜任号召并组织群众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准备群众应付帝国主义将要发动的原子战争。

为同原子战争交锋作好准备，在战争爆发前
或战争进行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为了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斗争，工人国家领
导应该用武器直接援助这些国家。它們沒有这样做，这是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得以不倒的原因之一。用大量的人力、技术人员、物资和粮食来提供援助，对工人国家有困难，这一点我们知道。但是，工人国家的存续取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发展，工人国家应该同它们共甘苦，那怕这会影响自己的生产机构。工人国家应该向这些国家提供技术人。员、金錢和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并号召进行革命，促使建立以苏維埃形式组织起来的、由群众直接控制的新的工人国家。这是缩短新的原子战争，减少新的原子战争给人类造成损失的最好的和唯一的保证。

人类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感情第一种总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平，值兹五一节之际，工人国家应该号召群众展开革命斗争。

这次的五一不是庆祝节日的目的五一，也不是呈现取得新的劳工立法胜利前景的五一。这是个记载人类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和前景的五一，因为工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国家最后清算的结果，必然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号召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争取殖民地黑人群群众与白人群工同酬，而且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群众夺取政权的纲领范围内，为上述合理要求而斗争。为了立刻夺取政权，必须援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以便推动革命的世界性发展，以便有助于阻止帝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带来的可怕的破坏的斗争。如果帝国主义用原子战争来回答这一斗争，那就必须号召进行损失最小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不这样做而是相反，那就是把主动权让给帝国主义，让它在对它合适的条件下准备并发动战争，这就会给人类带来百倍的灾难。必须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但这要在对全体被剥削群众作出世界性革命动员的策略的基础上来进行。
即便是帝国主义在最坏的条件下发动了战争——它是一定会发动的——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破坏，人类的重新建设也绝对不会开倒车，不会再返回资本主义去。重建世界将由人类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和初步形成的世界共产主义思想感情来实现。

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正在采取共同行动，企图用原子战争把人类吓倒。它们企图令人信服，原子战争一旦爆发，那将是人类的末日来临，它们的目的是想把解决问题的权力保留在它们手中，用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双方达成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就是它们所正在进行的。原子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应有的认识的第一点。我们反对原子战争，必须为反对原子武器、反对一切武器而斗争。但是工人运动无法控制掌握强大原子武器的资本主义机器（帝国主义世界财政的45％都用于原子战争预算）。认为有可以防止发生战争的可能，这纯粹是妄想。任何世界和平主义运动，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班人子，尽管它们是个小小的集团，会由于自然的需要而发动原子战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斗争将会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削弱它们在原子战争中制造核武器的手段和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些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为此目的，必须进行准备，必须对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抱有信心并作出保证。原子战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也意味着将来活下来的那一部分人类的共产主义感情的增长。必须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把原子能用于军事上的目的。必须组织要求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世界运动。但是，如果认为这个运动能够瘫痪帝国主义，那是妄想。唯有采取革命的行动才能达到上述目的。然而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眼前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
内，是不存在的。可能性最大的前景是发动一场原子战争的前景。因此，世界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为这种前景作出准备。这种准备就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在工人国家里必须进行革命斗争以支持殖民地斗争；援助古巴和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新的工人国家，向这些国家提供直接援助，号召他们夺取政权，那怕冒有帝国主义因此而转过身来发动原子战争的危险。

一切工人国家，一切共产党，一切国家的工会和工人中央组织，都必须把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纲领作为自己的斗争的重要部分，把自己的部分工资本给古巴这样的，正在建立和正在发展的新的工人国家，把自己的人、技术人员、工厂里的工人派到这些国家去，援助这些国家。这是他们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为反对原子战争，以阻止发生可以预见的灾难的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呼吁世界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呼吁世界群众不管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是自己来夺取政权。

土地革命和工农联盟

土地问题对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土地分配、土地改革和农民群众过着真正的文明生活的问发，只有成立工人政权才能解决。厄瓜多尔阿罗萨莱那的经验、加纳、几内亚和马里的经验，还有阿尔及利亚当前的直接经验证明，不进行夺取政权的群众斗争，土地改革便会半途而废，便会给人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提供新的机会。直接参加这种变革是工人国家、共产党、工会和工人中央组织的义务。革命正在震撼着整个非洲，如果说它还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如果说争取革命新胜利的斗争没有获得更大的扩展，那是因为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集团。苏联官僚集团对这些领导集团提供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援助，但它的目的是寻找同盟者来给自己的和平共处世界政策奠定基础，而不是强调和鼓励向这些国家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提供各种各样军事的、经济的和科学的援助。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和持续的有生力量。多米尼加共和国、尼瓜多尔、巴西和智利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群众运动的主要扩展地。但是，农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经验，了解了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以农民为社会基础并且有着斗争传统的秘鲁，农民在新近的运动中感到自己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是一致的。他们已经同无产阶级结成了有力的联盟。赛罗·德·巴斯科的秘鲁农民运动同矿工联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秘鲁矿工有史以来第一次支持了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工农联盟取得的进展。

巴西农民感到在夺取土地的斗争中必须转向南方，同大城市里的群众建立联盟。巴西群众用不了多久就会成立工农联盟。在广大群众经历的斗争中，作为拉丁美洲革命和非洲革命的根本基础的工农联盟正在发展。以上是这次五一节的形势。它记录了过去这段期间十分重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工农联盟取得的进展。

殖民地革命的发展

在非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正面临着殖民地革命新发展的巨大压力。

如果说有一段时期革命运动曾在几内亚和南非受到抑制，那里的爆炸却使它又整个活跃了起来。殖民地革命的地方性发展和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后果，对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政
治革命的整个过程都产生了影响。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之后，殖民地革命使得连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也发生了动摇。在铁的独裁统治之下和杀人犯萨拉查政府控制得人们连气都透不过来的葡萄牙，如今由于数千人举行起义发生了动摇。安哥拉群众在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斗争。根据报导、公报和照片，展开斗争的安哥拉群众只有石块和木棍，他们设法从葡萄牙人手中把武器夺过来武装自己。这种动摇了整个葡萄牙统治的斗争说明了葡萄牙统治的衰败和末日来临。它对西班牙产生的必然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西班牙的群众、学生和工人，伊巴尔的冶金工人，巴斯克地区的劳动人民，比尔包和贝阿散的钢铁工人和矿工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斗争，这并不等于说打倒布鲁克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不久就会发生，但这意味着就连法西斯西班牙也由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压力发生了动摇。

我们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群众，组织委员会，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英雄战士的斗争。我们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群众开展一个支持他们的世界运动。

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没受到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东角会议（按：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会议）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最大弱点。就像在亚洲和非洲一样，美帝国主义用“争取进步同盟”的政策来抑制革命的企图已经失败。它曾在东角企图把拉丁美洲联合起来以反对殖民地革命的威胁和古巴工人国家的威胁。

六个国家表示了反对意见，其中三个是大资本主义国家。这并不等于说从社会上和历史上看来，帝国主义已经被击败，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国家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利益。但是这说明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矛盾，这些国家更加直接地感到了世界群众革命斗争的巨大压力。帝国主义没有能够及时地同拉丁美洲的资
产阶级以及一切国家组成一条统一战线，以对付古巴革命。它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而是由于群众的斗争，矛盾太大。

争取进步同盟要在拉丁美洲实行没有任何可能性，一方面，美国缺乏足以使它的经济负担巨额外投，又不会影响国内稳定状态的积累，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正在加深危机，造成了日益增长的不稳定状态，使得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产生矛盾，同时每一个政府还有它自己所面临的矛盾。

资产阶级各个工业部门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这些部门，由于利益所在，想发展自己的经济，以抑制群众的社会压力。这些部门和其它部门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组织反对古巴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障碍。

殖民地革命进程对非洲的影响是另外一种情况。当前阶段这么多国家和独立共和国的出现，并不能肯定它们是新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们会建立一些新的工人国家。

在当前历史阶段，标志进步的是古巴工人国家的诞生，是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独立共和国的诞生。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通过他们的压力，正在寻求一个革命不断高涨的过程。共产党的阴险政策，即同政府订立同盟和服从政府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得以在目前阶段继续维持，尽管群众的压力非常大。从纲领角度来看，群众方面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土地改革问题。

老挝和越南标志着一个尚未完成的斗争过程，这个斗争仍在继续展开，尽管各国共产党已经叛变，尽管苏联官僚集团采取了和解政策。在这个国家里，群众的巨大压力能够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前进，而不被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吓倒。而对着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威胁，群众没有吓倒，也不会让人吓倒，他们不会
让人束缚自己的手脚。他们继续在斗争中前进，就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样，像在老挝。在非洲，在一切世界殖民地群众革命得到发展的地方一样，尤其是像拉丁美洲一样，他们获得了新的、十分重大的胜利。在阿根廷，就像在最近的巴西一样，群众通过斗争认识到就连民主选举的权利都必须拿起武器夺取政权才能得到维护。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巴西、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委内瑞拉等等，军队里的和国家的不同派系彼此之间展开的斗争和互相厮杀，至多是反映了他们的盲目火并，以便进一步——和过去一样——把自己出卖给帝国主义。正在前进的革命的巨大社会压力使它们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阻止它们获得任何协调一致。这种斗争乃是寻求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正在发展的革命的一种反映。这些斗争说明当群众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由于走向夺取政权的群众的前进和上升，有了根本的加深。

**苏联的政治革命，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联国内斗争的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这种斗争对于世界革命的进程有根本性重要意义。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指出了苏联苏维埃群众巨大压力的间接影响。苏联的苏维埃还没有找到表达压力的途径和方式。这种斗争标志着苏联政治革命的强大高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是这些政治革命和殖民地革命进程的直接表现。

赫鲁晓夫的政策间接地反映了他阻止、抑制和转移苏维埃群众巨大压力的企图，反映了他作出让步，甚至同意把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中移走，以便他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企图。
苏联国内对于过去和未来进行的讨论，表明了苏联政治革命的发展。力图在二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前景的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纲领，对于群众是一支不值的谎言。因为，除了取消国家以外，还有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不就是让人人都能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么？这只有在具备了充足的财富以后才能成为可能。为了根除国家的必要性，必须要有生产机器和一个社会组织来取消强制领导，只消有一个临时性的随时可以罢免的管理机关就够了。这就是说由整个“社会”来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单单在一个国家里共产主义不能存在，单单在几个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不能存在，而要在整个几大洲上才能存在。官僚集团的这种一钱不值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观念还表现他们在他们宣称二十年内就可以单独在苏联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需要同其它工人国家共同作出计划。苏联官僚所以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纲领，是因为它觉得有向苏联群众提示前景的必要，是因为有一股巨大的对利益和政治关心的压力正在寻找表达的途径。

看得出来，苏联的政治革命正在上升，反过来，这种政治革命的上升又影响了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这些党内的群众。这些群众对他们的领导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革命的政策。在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立刻看到了这种影响，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的势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会领导抑制不住当前时代群众的重大斗争运动。巴黎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示威游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因为它显示了群众对自已的信心。

在全世界打倒资本主义

我们在上面介绍完了当前的历史形势。重要的不是帝国主义
在做些什么，和平共处政策在做些什么，或者是联合国在采取些什么行动，而是群众的世界斗争。这是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形势。

在历史的当前革命阶段，各工人领导机构，从构成工人运动的最有力量、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的工人国家开始，其根本义务是投身于推动革命。这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全世界。如果资本主义为了反对这种斗争而发动原子战，那将是它的末日来临，将是它的毁灭。

推动革命应该是工人国家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主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阶段，有史以来第一次，男工女工，儿童和老人，用一股无穷的力量投入了斗争，他们在要求获得生存的权利的同时，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这就是国际纲领。这不是一个只在于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的纲领，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白种人和黑种人同工同酬的纲领，这是一个眼前的和应该给予支持的斗争纲领，但它必须首先同为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总前景融合在一起，并且服从这个总前景。

决定历史的地方不在联合国，而是在刚果，在南非，在古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巴西，在老挝。在前进的群众面前，世界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是苏联官僚集团、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邪恶政策。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必须对这种形势有所认識，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当前的领导者身上。

我们号召世界群众，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在街道上，在工厂里，乡村里，成立具有双重权力的荫芽机构，成立委员会，以便为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前进而斗争。男男女女，儿童和老人将史无前
例地参加到这个革命斗争中来。

在世界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革命组织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平等和民主权利。

必须号召军队里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向人民投降，号召他们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派遣他们去屠杀群众的人。在巴西、在阿根廷、在智利、在全世界，不应该像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领导集团那样去寻求和解，而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号召士兵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他们的上司。这样，人们就必然会为反对帝国主义用原子战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灾难和暴行而斗争。

对于这种反对原子战争的斗争，存在着种种的条件。首要条件是在全世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反对备战，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必须把帝国主义的道路堵住，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民族解放、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国家里把它打垮。

必须建立世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号召世界群众夺取政权。这是当前工人国家和共产党、工会和工人中央组织的首要义务和历史责任。群众必须在全世界打倒资本主义，为此，我们要全力支援他们这样做。这个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我们在这次五一节的一项首要呼吁。

同志吧，

第四国际呼吁欧洲无产阶级公开支持殖民地革命以及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斗弟兄的斗争，打倒资本主义，在欧洲建立新的工人国家，成立欧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邦。

第四国际呼吁北美洲的无产阶级支持殖民地革命，从自己的阶级组织开始，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党，作为消灭美帝国主义，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黑人的权利问题，以及一切被剥削者的
問題的工具。这样做了是为了使用同世界不断革命的不可转移的进程融为一体，把自己的命运同正在为建立拉丁美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从而建立世界联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

第四国际呼吁正在进行革命的世界各大洲被剥削群众为建立工人国家而斗争，这些国家将在那里是一个区域性范围内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解体，为成立泛亚细亚苏维埃联邦、泛非洲苏维埃联邦和拉丁美洲苏维埃联邦开辟道路。不要等到在一切国家成立工人国家。在一旦出现的工人国家的基础上，要先成立区域性联合。例如，古巴工人国家可以向中美洲群众发出呼吁，以便成立中美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第四国际呼吁古巴工人国家参加到殖民地革命中来。作为工人国家，古巴的命运现在和将来不但同苏联联合在一起，它应该同意和接受苏联的援助，而且也同拉丁美洲革命的发展联合在一起。单单在一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苏联如此，古巴也是如此。和平共处是行不通的，尽管可能有朝一日古巴革命领导集团会作这种尝试，以便在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面前表现自己不是革命的煽动者。

古巴工人国家的首要义务是输出革命。输出革命不等于派遣民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而是号召一切国家举行革命，到处去直接号召夺取政权。古巴总工会应该把拉丁美洲革命的有力基础。古巴总工会应该号召成立泛非和泛亚工人中心组织，应该表明无论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无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组织的必要性。

第四国际热烈呼吁工人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为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强制建立苏维埃，使政治革命获得胜利。

182
工人国家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及它们的社会成熟要求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性集中政治组织，群众的共产国际，以便有意识地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前景上为这种建设同第四国际的斗争和胜利结合在一起。

以上就是当前阶段为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政策和纲领。

创造历史的工具不是联合国，也不是柏林条约，而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群众。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残余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最后清算，其基本部分要在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里来进行。

展望前景，第四国际是这些过程的首要关键，是这些过程的鼓舞者、动力和组织者。

非洲的发展证明了意志坚强的、同投入夺取土地的斗争的贫农、中农联合起来以后的小组织能够干出些什么。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群众正在亲身经历发展着的斗争。

这就是第四国际开辟的道路。

第四国际必须在这一条道路上向前发展，同时立刻号召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第四国际本身的发展是和这种斗争联结在一起的。随着群众正在向着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方面前进，第四国际发展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以上就是“国际”向世界群众和一切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发出的，要求他们参加到革命进程中来的呼吁。

1962年5月1日
3. 致欧、亚、非洲国际布尔什维克

党員和干部的信

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局領導下举行特别会议，对国际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布尔什维克斗士和干部发出这个号召。它是在作出历史性决定要暂时担任国际的领导的时刻发出这个呼吁的。在拉丁美洲局的领导下举行了这次特别会议并通过了若干决议，这对第四国际生命的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国际领导机构保守派的腐化堕落的行径已经达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当时这一部分怀疑的、垂头丧气的、犹豫不决的、萎靡不振的分子经受不住世界局势的压力，正在犯罪地使国际的生命及其活动陷于瘫痪。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与殖民地革命的新的持久的高潮相结合并扎根于其中的国际，扩大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世界革命，从而把法为克服上述危机开辟道路，这无论是根据历史或具体情况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就是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特别会议的意义。

在以有限主义态度阻碍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国际书记处应包含殖民地多数这一决策的执行以后，杰尔曼、弗朗克、列维奥·麦丹、巴布洛、沙尔·山登、乔治和勒讷的保守主义的、投降主义的和取消主义的方针已使国际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由拉丁美洲局领导的拉丁美洲代表团由于驳斥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这种投降主义的倾向，保卫了关于把世界党的最重要的力量用于殖民地革命范围内的斗争这一战略。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个战略思想，指定成立一个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拥有殖民地多数的国际书记
处，以便有力地应用这个战略思想。在整整一年的期间，投降派并
没有认真地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这个殖民地多数，最后还决定要
保持领导机构不变。这就意味着把各殖民地国家的成员置于少数
地位。于是，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便受到一种官僚主义的
诡计的抵制。取消派巴布洛在他于 1962 年 3 月写的公开信里说，
殖民地的成员将在下一届的国际领导机构中拥有适当的代表等
等。这时，他是同意那个官僚主义的诡计的。

发展的危机

由于采取这种行为，并利用所称国际领导机构中的多数，这个
投降主义的和取消主义的集团已经把国际的政治生活保持在彻底
的瘫痪状态中。它在我们运动的史无前例的最有利条件下阻碍了
国际的发展。因此，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恶化以前，发展的危机
就已经开始了。当这一部分的领导人对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保持
缄默时，拉美局不能不维护国际的方针，不能不作出决议来保持
国际行动的继续。

拉美局就一些重要问题通过了决议，其中有：关于维也纳会议
的问题，关于中苏分歧的问题，关于原子战争和苏联进行核试验的
问题，关于美帝国主义侵犯古巴工人国家的问题，关于苏联共产党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关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
法国签订最近协定的问题，关于开除埃斯卡兰特的问题，等等。在
每一场合，拉美局都坚持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国际的观点。
取消派阻挠国际参与这些重大的事件，当他们干预的时候，他们只
是表现了他们的投降主义精神，像在分析苏共二十大时那样；或
者他们便是抛弃了在一个过程中击败帝国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革命
斗争路线。在那个过程中，核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后的清算，

165
而紧跟着出现的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规模的发展和胜利。这些投降主义分子已经沿着他们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暗示的立场继续前进，例如在他们关于“核战争的空前大浩劫”的想法中，或者像杰尔曼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那样。在那篇文章里，作者强行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愿意接受某些开明人士的和平主义宣传，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谈判。在这里，杰尔曼屈服了，甚至沿着接受和平共处的道路越走越远；关于苏联进行核试验的问题，情形也是如此。巴布洛公开否定工人国家有权实行自卫或准备实行自卫以反击正在打算掀起核战争的帝国主义。

战争和清算

召开特别会议的一个口号是：“当代的布尔什维克斗士是这样的一一个人：他准备毅然地承担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清算——这种清算将在核战争中获得解决；他也准备勇敢地承担它的后果。”

与此相反，杰尔曼、列维奥、巴布洛、沙尔、乔治和勒訥却屈服了。他们表示出小资产阶级对战争看法的恐慌。他们否定苏联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进行核试验的权利，也就是说，否定它的包括先动手进攻帝国主义的权利在内的防御原子战争的权利。在这一关于国际均势的演变的主要问题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国际政治决议和五一节宣言，明确地表达了第四国际对于原子战争的策略。这些投降分子却被各处发展的形势以及使他们感到惊恐并对共产主义前途丧失信心的最后决战所吓倒，把他们的沮丧情绪带到组织范围中来，放弃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屈从人们对斗士和党的布尔什维克思想所抱有的模糊的、抽象的、折衷的态度。他们的丧失斗
志，导致他们对国际离心离德，转而向过去和现在一直拥护班达拉奈克资产阶级政府的堕落的锡兰支部去寻求盟友；或者到那不仅与托洛茨基主义而且甚至与马克思主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工人党中去寻求盟友。

这些投降主义分子就是在今天硬说第四国际同社会主义工人的区分一天天地越来越少的投降分子！也就是这一伙人，他们在使国际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以后，决定要“解散”拉丁美洲局，即整个国际中最生气勃勃、最成熟和最有觉悟的部分，并决心把路易斯、奥尔蒂斯、卢塞罗和米兰达这几位同志排除于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取消主义的完整的表演。这些取消派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甚至在今天，在杰尔曼集团背弃了比利时无产阶级的英勇罢工之后，仍旧认为那个支部是国际的一部分。我们拒绝那种认为这些人是国际在比利时的一个支部的想法！这一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比利时党的看法问题，是使我们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发生分歧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必须在比利时和欧洲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支部。必须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以便建设第四个国际。这个历史任务是迫切的。因此，我们在全世界所面临的有如旭日初升的世界规模的革命进程，以及一日千里的形势发展，都需要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

殖民地革命

同志们：当三大洲的殖民地群众依靠新兴的工人国家取得胜利或准备取得胜利时；当无数被剥削的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革命行动时；当以苏联为中心的工人国家中的巨大力量助长政治革命的发展，而这种革命会同殖民地的革命在今天已经有力地影响了并且在将来会更有力地影响从欧洲到美国的一系列主要国家
时，当这些影响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时，当托洛茨基主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在这些事件的任何一件中时，当这些群众、这些过程需要第四国际的领导机构及其有组织的活动给予越来越多的帮助和向它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时，这些投降主义派和取消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控制搬到我们的运动里来，他们按照一种根本同国际相对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办事。由于不能保持第四国际一贯的思想和行动，他们采取傲慢的态度，轻视不发达国家的革命群众运动。取消派巴布洛的公开信（特别会议曾单独对这封公开信通过了一项决议）的用意就在于此，他们决定要“解散”拉美局并把国际领导机构的骨干排除出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用意也在于此，而那些骨干由于是殖民地少数的一部分，至今曾努力使国际领导机构的活动继续下去。

第四国际的会议

在世界规模的不断革命过程的生气勃勃的现阶段上，那些在政治上表现出对这一过程有所了解但不能组织群众的活动并在无产阶级中生根的革命领导人员和革命干部，既没有历史的基础，也没有实在的基础，他们势必会面临空虚和崩溃。

这次在拉美局领导下举行的第四国际的特别会议，一方面通过历史性的决议要在这次会议召开特别世界代表大会以前暂时担任国际的领导工作，一方面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深信这个决议是符合我们都对这个世界革命过程的客观了解的，并且决心要维持第四国际的领导和它的革命运动，使其不致中断，同时也感到，固然我们的世界规模的运动今天是在拉丁美洲逐日争取到新的力量和阵地，同革命群众结合在一起，并取得新的胜利，我们的运动在全
世界各地的形势也将与此相同。在拉丁美洲，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的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秘鲁，由于费蒂萨的选举阶级阵线、亚莱·欧萨科联合会（United Industries Yale Eusaco）和矿工联合会（有三万五千工人）的活动而取得了胜利；在阿根廷，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虽然在庇隆派群众投票支持工党以击败政府的地方产生了巨大的向一方的变化；虽然人们用欺骗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党，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却依然在三个地区获得了一万五千张选票；在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不断地在各工会中、特别是在矿山中赢得新的阵地；在智利，我们瓦契帕托钢铁厂（有四千工人）以及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其中从事大胆渗透工作的社会党里巩固了我们的力量；在巴西、乌拉圭、墨西哥、古巴，我们已经有了重要的进展；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们正在为发展一个新的支部而打下基础。像在拉丁美洲有这样的可能一样，我们相信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也有可能以一种积极的活动，即以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意识到现实和所需任务的那种活动，再结合争取政权的斗争经验，来组织工人阶级的活动。我们说，在未来的短时期内，我们有可能单独领导或与其他党派共同领导革命群众运动；或与决心前进的最进步最政治化的潮流联合起来。

同志們，我们抱着这种信念，已經决定要使国际的活动继续下去并使它活跃起来。我们不过是在继续进行我们从成立第四国际起一直为了国际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的成熟而从事的斗争。今天我們作出这个决定来继续推进那种同国际的活动本身混合和溶合在一起的斗争。这是克服在发展国际时所遇到的危机的不二法门，而唯一可以采取的途径是，我们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扎下根来，不管群众运动在各个国家中的现状如何；我们必须在世界规模的殖民地革命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内部，以及在我们能够参加领导下
在发出这个呼吁时，我们鼓励第四国际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干部和斗士在这些大陆加强国际的革命战斗活动；以这种方式对取消派进行斗争；积极参加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最后是响应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拉丁美洲局、第四国际临时领导机构的决议和昂扬斗志。因为这些合为一体组织已经决定要消灭前进道路上的危机，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特别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恢复第四国际的领导，使它在全世界的活动更加坚强有力。有了这次会议，就奠定了克服发展方面的危机的基础。它为推进第四国际的世界规模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62年4月
四、中苏分歧的现阶段及其历史意义

——J.波萨达斯 1953 年 6 月 9 日在阿根廷工人党(托派)全国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中苏分歧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是苏联官僚主义分子和中国人双方都并不是自觉地进行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提出了一些有意识的目标。对所追求的目标更有意意识的是苏联官僚主义分子一方，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维护保守利益。在这一方面，他们有经验，也有办法。此外，保守利益在他们身上培养出一种本能、一种嗅觉和一种巨大的感觉和反应的能力。官僚主义把对它的利益的经常和不断增长的意识与经常指导着它的感觉和本能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结合的基础上行动与发展。当它的保守利益一旦受到冲击，它马上就感觉到它所遭受的损害。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行动既不始终一贯也缺乏自觉，因为它缺乏一个一贯的自觉的纲领，也没有一套对革命的纲领性的思想意识。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讨论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之间为了解决纲领和政策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其实，从这次讨论和这次斗争中将产生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动力，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和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这次讨论中，中国人代表着两派官僚主义分子中进步的一翼、进步的利益。虽然中国人的行动暧昧，但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巨大，非常明确的。苏联官僚主义分子是作为革命政权的篡夺者而出现的。他们没有进行革命，他们篡夺了革命
的果实。他们在某一阶段（托洛茨基确定为 1926—27 年）篡夺了革命，吞取革命的果实，利用革命谋取私利而不顾革命的利益。用一般历史的说话，这可以叫是一次“热月政变”。

中国官僚主义分子组织、领导并发展了革命。他们领导了革命。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初步的主要基础。他们之所以为官僚主义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维护保守利益，而是因为他们领导国家的方式是官僚主义的。他们对群众缺乏信心，不信任群众。他们相信的是机构，是党的行政作用。他们曾依靠群众夺取了政权。但是掌握政权的是一个小集团。这个曾经受到而且依然受到农民方面的大压力的小集团最初组织了党，后来掌握了国家的领导。

中国官僚主义分子是在对革命提出革命性的政策的基础上取得政权，发展政权的。然而他们对革命却保持着官僚主义的观点。在官僚主义的观点和革命性的政策间是没有矛盾的。官僚主义分子由于赶走了资本主义而取得政权。他们曾必须用武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政策，然而他们的观点是官僚主义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群众有可能参与、监督、计划国家事务，并不是为了使他们有可能享受充分的革命民主。从开始的时候起，官僚主义分子就组成领导，制订纲领，在中国组织工人政权。群众没有参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制订。他们没有决定过政治、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他们现在通过公社参与一部分工作，但是制订和决定计划，监督计划执行的并不是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那里是用官僚行政的方法领导革命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但是，即使那里存在一些保守的阶层，存在某些保守的和官僚主义的利益，那里还没有一个维护保守利益的大规模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基础。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也不
是由于种族不同，共产党建立过程的不同而产生的。这是每个国
家革命的起源与发展产生的结果。从起源方面说，中国人为革命
所推动，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像在苏联那样走上和帝国主义讲
和平讲共处的道路，又不曾在类似苏联官僚主义者在整个一个
阶段中所处的那种历史环境——在那个阶段，帝国主义之间的斗
争使得官僚主义者有可能在革命倒退的过程中生活下去——因
此，中国人不得不采取左的立场，比较自觉，至少比较完整地遵循
革命的阶级路线。

在朝鲜战争以后事态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
动，首先是在它的政治方面，后来又在它的经济方面。事态的发展
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意识的发展。人
们要在对外方面执行接近于革命需要的政策，采取接近于革命需
要的态度，就不能不在国内承受一定的后果。对外政策是对内政
策的后果，延长与继续，正如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方式的继续一
样。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总是先有对内政策然后才有对外政
策。时当对外政策决定对内政策。自觉地执行的国际政策的需
要可能在对内政策上产生意想不到的反应。这就得出下列结果：
要就是用对外政策也已成为自觉的政策；要就是执行反映对内政策
的现代主义的对外政策。由于他们在朝鲜执行的政策，中国人在
阶级斗争史上跃进了一大步。中国人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这也
影响了中国本身。

殖民地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别的文章，别的报告中详细阐述。
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那就是1950这一年中国是具有巨大重
要意义的一年。中国显示了比别人，例如越南，坚决得多的态度。中国向对外的革命总路线前进，其目的不是要征服亚洲，而是要在亚洲扩张革命。

公社起源于1936年——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所作的关于延安农业经济关系的那篇著名报告中所表明的。在1936年，公社就已存在。1958年的公社不仅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它是革命组织、经济计划化以及中国克服落后状态等客观需要的一种表现。这是提早好几十年克服不发达状态的一种方式。当一个领导既不官僚主义也不保守，当它至少不是自觉地具有保守利益的时候，这样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这个领导的思想意识。这些因素事实上也影响了中国。跟苏联不同，中国不可能进入世界阵营，不可能参加联合国。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和中国人共处，这些因素迫使中国采取革命的路径，以代替在与帝国主义共处、和平和竞赛中毫无出路的局面。

中国革命，跟苏联革命一样，在开始的时候是群众性的革命。可是同时，今天掌握政权的是实现了这个革命的人们。这就为革命的进程影响这个领导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这个领导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全部力量。它并没有反映出它本身还能向何处发展。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意识，它不能顺利地反映出它自己还可能实现的前进道路。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今天还没有那些保守的利益，而这是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对抗性矛盾的主要基础。中国领导为自己的演变敞开大门。国内政治生活的缺乏阻碍着这个演变，阻止它取得中国革命和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客观发展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推动力。

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由于经济客观发展的原因，没有任何可能接受革命的影响，没有任何可能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演变。
世界殖民地革命的推动力在苏联官僚主义统治中得不到表现。它表现在苏联人民之中，部分地表现在军队之中。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得到直接的表现。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历史条件，随着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表现在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例如公社——这是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跃进。这并不是说这个领导现在在思想意识方面运用着马克思主义，只是说它大有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接受着殖民地革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非常剧烈、强烈和有力的。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庆祝和纪念殖民地革命，公开举行支持殖民地革命的政治示威。这些示威并不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群众性的。如果那样说，那就是撒谎。并没有上千万人的动员。如果在中国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如果群众能够参加政治，那就会动员三百万、四百万、一千万甚至两千万人。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动员至少百分之十的人口，并不是件难事。中国人从来没有动员到五百万人以上。这是他们自己提供的数字。五百万当然不少，但是对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大数目。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斗争，按照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冲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冲突并不是新鲜的东西。共产国际早就试图支配中共，把中共置于傀儡的地位。共产国际中曾经发生过重大的事件，讨论和运动。第一次大危机出现在1927年对蒋介石采取屈从政策的时候。这次对蒋介石的屈服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失败。后来又有别的一些危机：先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后来又出现在对“人民阵线”采取屈从政策的问题上。
另外一次大危机发生在1946年当斯大林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再次向蒋介石屈服的时候。中国人的抵抗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没有官僚主义分子，否则不会决定这样一个政策。一次新的巨大的抵抗又在北朝鲜问题上表现了出来。那时开始了公开的、直接的国际冲突。在越南问题上，冲突没有显示出来，因为不曾有斗争。在朝鲜，两条不明显不自觉的路线互相对立，中国人的路线是不惜自己付出代价——由于可能引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这确实是可能的——来支持殖民地革命，苏联人的态度是为了保卫他们保守的、官僚主义的利益，而不送飞机给朝鲜人，阻止朝鲜取得彻底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得出思想意识的和政治的结论，这不是由于他们的领导或某一阶层有保守的利益，而是由于他们的思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由于他们对群众缺乏信任。群众如果参预政治，原可以间接帮助他们的领导产生信心，帮助领导发展，从而帮助领导更自觉地依靠群众。领导原可以因此向前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会一些东西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表明了它比苏联的领导更接近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然而中国人总是抗拒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发展。他们所有的文件，从他们主要的理论家刘少奇和毛泽东写的文件数起，都是混乱不清，包含着机会主义的、严重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例如他们说，“应该教育资产阶级”。他们居然给自己提出教育资产阶级的任务！直到1959年，他们一直劝说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去“教育资产阶级”，去争取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给他们参加政府的机会。他们把这个政策和在国内结成争取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合在一起。把党的一切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下，不过，与苏联共产党不同，他们要求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

·176·
中国人采取了两个不相容的立场：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同时又要求阶级斗争。这并不是中国人的诡计，也不是诡辩，也不是圈套。这是理论上的混乱和缺乏经验。此外，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跟苏联不同，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在培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的训练班里培养出来的。中国没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没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也没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在苏联，曾经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的主要基础。中国没有这些基础，中国必须依靠苏联。这曾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它影响中国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中国人要求阶级斗争这一事实，表明他们逆防像苏联官僚主义分子那样对资产阶级进行有意识的屈从。

在那个阶段，许多共产党建立了人民阵线，“取消了”有利于工人的阶级斗争，使其有利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是不能取消的。取消的是群众参加阶级斗争的自觉性，那些共产党所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在人民阵线中，工人不进行罢工。他们不能把胜利果实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惟恐“他们的同盟者发脾气”。中国人抛弃了这些条款，虽然方式上不明确。他们就这样表示了对这种政策的不信任。他们继续接受阶级斗争。后来，在掌握政权以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发展中国的利益跟苏联官僚主义统治公开冲突起来。这一个表面上是经济的斗争——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试图把中国经济利益置于它自己的利益之下——归根结底，是由中国领导的发展和成熟，是由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的加深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继续具有很大的份量，抗拒对苏联官僚主义利益的屈从。
在整个一个时期中，欧洲各工人国家屈从于苏联官僚主义的利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在德国、捷克等国进行的掠夺。在中国，事情不能完全是那样子，因为存在着一个有真实、直接的、自己的基础，取得人民支持的强大的共产党。这些都是他国的共产党所不具备的，他们依靠苏联军队才取得政权。在中国，是共产党自己取得政权的，这是它能够保持自信与安全感，能够面对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而保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利益的主要基础。这就使得革命的民族意识得以发展。然而，这个发展是脆弱的，这就说明这个发展为什么是如此曲折、困难和缓慢，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中为什么充满了混乱和矛盾的成分。

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欧洲群众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一个真正的发展），新的工人国家（朝鲜、越南和不久以前的老挝和缅甸）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影响，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这些都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比对苏联官僚主义有利得多的世界历史基础。这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安全感、更大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工人国家在经济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始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开始就理论问题写文章，虽然都还是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百花齐放”的口号并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时刻提出的，它是在中国经济社会上升、加强的情况下，在殖民地革命发展历史性地显示出来的时机提出的。中国具备比较坚实稳固的历史基础，足以面对苏联官僚主义，因此敢于投入理论领域之中，虽然有局限性，但是是肯定的。他们没有一个方向。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前进步到一定程度。因此，他们后来又在“百花”立场上后退了。这个立场保护各种倾向（特别是在艺术中）存在的权利，这也是以间接的方式容
許討論，然而讓資產階級分子进行討論，可不是讓工人和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討論。“百花”這個立場是中國領導影響和爭取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夢想的結果。中國人的觀點曾經是——現在也還留有痕跡——認為可以影響和爭取落後國家中的資產階級。他們認為資產階級上了當，很快就會認識到它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中得到發展，同時認為，由于資產階級作为一个階級來說，畢竟並沒有腐朽，因此可以相信社會主義的好處。這是中国共產党的一个机会主義的幻想，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妥協。

但是殖民地革命的進展給了中国人巨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安全感，因此也使他們下定更大的决心来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对理論問題进行更多的思考。然而他們的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

中共思想意識的进步

只是從1960年起，他們才决心对有关下列問題的国际和国内政策进行充分的分析。這些問題是，战争与革命、和平共处与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分析、共处以及战争能否避免、革命的利益、和平共处与避免戰爭的可能性以及在一切資本主義国家（先进或落後）中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三者間的協調与配合、在落后国家中为了超越阶段而达到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实现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

就有一年半或两年以前，中国人还没有能討論、闡述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寫出文章来。最近，在三个月以前，具体說来是从今年3月起，他們公开走上了国际舞台来和蘇聯人討論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各项主要問題，其中有战争与革命問題、国家性质、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必要性、共处与革命之間的对抗性矛盾、避免战争而不是阻止革命的可能性。在他們看来，在
支持和平共处和支持夺取政权的斗争之间并没有矛盾（我们知道其中有绝对的矛盾和对抗）。

在不到六个月以前，中国人才采取这些立场。他们得出这些结论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中国工人国家的经济有了发展，也不表示中国群众有了政治生活。在中国跟在苏联一样，群众没有可能去讨论和解决政治问题。他们并不参预中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制订。他们并不参预经济计划的制订。他们没有决定权，没有监督权，没有参政权。决定经济进程，甚至决定分配的都不是他们。一切都在国家机构手里。群众只是有限制地参加在官僚主义控制下的工会集会。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一种态度呢？

如果把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结果、延长和继续，那么怎样去解释在国内不容许群众有政治生活，不容许有革命政党存在的中国人，在国际范围内提出有必要在全世界观夺取政权，提出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有共产党呢？是什么样的纽带把这个对外政策跟与之对立的对内政策联系起来的呢？是哪一个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呢？又是什么矛盾把它们分离开的呢？

中国领导人为何在这个阶段展开对陶里亚蒂和其他共产党的论战（这是同赫鲁晓夫进行直接论争的一种方式），提出可能防止战争而不可能阻止在任何国家中夺取政权呢？为什么他们宣称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可能和平共处而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呢？在中国人的提法中存在着对立，存在着矛盾。如果国家之间、不同制度之间可以和平共处，那么阶级之间也就可以和平共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新社会制度的世界利益。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直到历史通过经济竞争作出是比合理的裁决时为止，那么在国内也就应该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
中国人提出了所有那些提法。可是中国人的这些提法并没有任何经济方面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原因。在不到几个月当中，中国人方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改变，一个跃跃。从去年12月起，说得更具体些，是从今年2月开始，中国人公开投身对苏联、对全世界共产党的批评，而以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作为替罪的羔羊——倒是选得挺不错的。通过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他们批评苏联官僚主义的全部政策。

中国人对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批评如下：“我们同意和平共处；我们是和平共处的捍卫者。和平共处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我们同意有可能防止战争爆发；我们是这个论点的捍卫者。不过……和平共处是一回事，防止战争是一回事，阶级间的共处又是一回事。当我们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手脚捆绑起来阻止它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对殖民地人民说要夺取政权。如果帝国主义以战争来与群众夺取政权的斗争相对抗的话，我们说工人国家的责任就是要支持殖民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那是帝国主义的死亡，而不是人类的死亡。”这是一个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出发而得出的革命性的结论。矛盾不是从中国领导的保守利益，而是从他们的理论混乱中产生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机构思想水平发展的不足，是从中国群众政治水平发展的不足产生的。

相反，苏联官僚主义试图进行的妥协则是由它的官僚主义的保守利益产生的。这表现在它的政策当中，特别是在它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当中。苏联官僚主义分子声称有可能防止战争。而为了防止战争，只要执行不导致战争的政策就行了。因此，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因此必须制定一个一百年、二百年或者三百年和平纲领——官僚主义以为它可以活这么久。进行日常工作，证明社会主义在
経济上合理，正在超过资本主义，这样，全世界群众就将看到社会
主义的优越性，看到资本主义同他们背道而驰，他们就会一致奔向
社会主义。

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者摆出这一套空中楼阁，目的在于证明它
本身存在的合理。然而根本矛盾在这里：中国人说：“共处是可能
的，不过必须夺取政权；如果战争来了，就让它来吧！”这样在中国
的立场和苏联的立场之间就存在着对立。中国人是以对资本主义
体系和阶级关系所进行的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的分析，以及改良
主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的。不过他们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应该
清楚认识中国人的这个观点。这并不是他们在四年前、三年前、甚
至两年前的立场。这是中国人去年12月以后的立场，或者说得更
具体些（把今年3月作为一个分界线），这是他们在发表反陶里亚
蒂的第二篇文件《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以后的立场。

中国人对陶里亚蒂说：“你们说，在意大利有必要进行结构改
革以发展经济和意大利的世界贸易，使意大利的人民群众从中得
到好处。然而这正是对意大利帝国主义有利的东西，因为意大利
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并不对工人有利，而是对帝国主义有利。人民
群众从中得到的只是更严重的剥削，只是有利于意大利资本主义
的战争准备；意大利帝国主义这么说话，陶里亚蒂同志也这么说，因
此，陶里亚蒂同志是代表意大利帝国主义说话。”这还是中国人对
陶里亚蒂说的最客气、最友好的一句话。在其他部分，他们把他称
之为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这帮助帝国主义来反对我们，反对
意大利人民群众”，而中国人支持在意大利的革命。

中国人方面的这一改变并不取决于国内政治生活，因为中国
没有政治生活。让我们看看他们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各项文件，看
看他们接待的访问者，看看他们和外国元首、国王、亲王、公主们进
行的会谈吧。他们和所有的人都进行讨论。可是工厂里的工人却没有任何会谈政治的集会，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讨论大会。没有任何政治活动是群众所能参加的。一切决议都来自机构。中国人的这个态度是从何而来的呢？相反，又是什么东西导致他们作出正确的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呢？这是世界殖民地革命，是中国革命进展的直接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压力。然而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认识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第四国际给了他们直接的影响。是我们部分地影响了中国人，为他们提供了论据，提供了坚实的理由。

中国人说，列宁说过“争取和平是我们的政策”这样的话，以此来证明战争可以避免。中国人之所以为斯大林欢呼，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们这是在向苏联的斯大林分子伸出手去，同他们结成反赫鲁晓夫的同盟。他们认为这是跟对资产阶级分子说：“让他们到我们政府里来吧，我们会教育他们的”如出一辙的一种外交手腕。正是这样一种对党群关系和对群众缺乏信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使他们依靠党机构的力量，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依靠世界殖民地革命。

中国人说，列宁说过“争取和平是我们的根本政策”这样的话。列宁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句话？列宁是个实事求是的、懂得辩证法的革命家。当除了和平以外别无出路的时候，列宁曾经说过：“和平是我们的政策”；可是他补充道：“我们现在不能进行战争，因为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力量。工人国家精疲力竭，世界革命中止了。他们比我们力量强大，战争对我们不合宜；争取和平吧。”所以列宁，作为好的革命家，说道：“帝国主义者先生们，我们要和平”，这正如工人在罢工中看到不宜于继续罢工，而不如保存力量的时候，对老板说：“咱们谈判吧”一样。列宁既不是机会主义者，也不
是妥协主义者。他有一个懂得辩证法的革命家，他懂得当时应该继续革命，加强工人国家。所以列宁提出：“我们讲和平吧，可是我们同时要准备革命，因为我们和平是肩上扛着枪的和平，同时由于我们此刻还不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进攻，我们的和平也是进行革命和发展世界革命的号召。”

当中国人说列宁说过“我们政策就是和平”这样的话，当他们说列宁说过“苏联的根本政策就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跟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一样，也在欺骗读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列宁曾经说过这些话——托洛茨基也说过——，可是他在说这些话以前先说过：“和平对我们的合宜的”这样一句话。由于当时不可能扩展革命，由于当时除了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以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由于必须跟资本主义世界做买卖，实在必须共处。所以，他寻找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利用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的方式，以制定一个依靠某些资本主义来反对别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外交政策。无论从商业、外交和政治各观点来看，这都是完全许可的，只要能加强和发展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这就是列宁。

赫鲁晓夫说列宁说过“我们的政策就是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这样的话，中国人也说列宁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手上的列宁的文章跟我们手上的列宁的文章是一样的。他们所以挑出那几段话，是为了免得同他们在中国的同盟者斯大林分子进行斗争。此外，这也是由于他们自己政治上的混乱和他们的机会主义，因为如果他们得出列宁的全部结论，那么他们关于战争可以避免和关于和平共处的提法就要改变。在他们那里，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他们的提法是模棱两可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结论又是正确的。在估价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和这个正确的结论时，应该看到，占优势的部分，决定中国人的路线的部分不是那个模棱两可的部分，而是那个
正确的部分，那就是必须在全世界夺取政权。他们对夺取政权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他们并不是有意地组织和促进夺取政权的斗争，他们也不倡导这种斗争，但是他们支持这种斗争。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世界殖民地革命过程和不断革命过程的这样一种传播简，他们对全局缺乏认识，只是对部分有所认识。中国人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进行像他们正在对苏联官僚主义和被莫斯科收买的各共产党展开的这样的公开斗争，那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内部感觉到革命进展的巨大压力。因此，是在中国，表现出不断革命进展的一个主要方面。

同苏共的分歧只能向前发展下去

他们反对苏联官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深刻的，从历史上说是只能向前发展下去而无法后退的。他们就要同苏联人讨论，可是并不是向他们伸出手去达成协议。他们信赖的不是谈判能得出结论这样的希望，而是他们发表的许多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他们提出了同苏联人不可调和的分歧。分歧具有根本的性质。跟我们一起，中国人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革命，必须建立政党来夺取政权，国家不能逐渐转变而必须把它推翻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有共产党来组织阶级去夺取政权而不是去实行改革或是实行向资本主义（原文如此，当是“社会主义”之误——译者）逐步的转变。从而他们得出结论，如果夺取政权意味着战争，那就让战争来吧；那将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不是世界的终结。他们又说：“人类是不会毁灭的。”他们完整地引用了我们文件当中的一句话：“现阶段决定历史的不是武器，而是群众。”古巴人对我们说：“啊！你们多么强调群众啊！”中国人跟我们一起，强调群众，把他看成是决定历史过程的因素。中国人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
和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和我们也这样说），决定历史进程的
不是武器，而是群众的革命意志；群众的革命意志是编织历史的最
强大的武器。”群众是不能毁灭的。原子战争将使人类遭到一次很
大的蹂躏，但是它不能把人类消灭。它将消灭的是资本主义，因为
战争一打起来，马上就发生革命。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结论，
我们的提法。当中国人谈到意大利人的时候，他们用我们的方法，
按照我们的方向来批评他们。波萨达斯关于意大利和法国的两篇
文章对陶里亚蒂的政策作了一番描述。他阐明了陶里亚蒂机会主
义的国家改革政策，因为在意大利并没有一个足以包括群众在内
的经济发展政策。因为意大利帝国主义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接受共
产党参预或者参加政府，因为意大利资产阶级政策不是由意大利
本国的经济决定的，而是由参加世界帝国主义经济、插手于最后分
赃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决定的。陶里亚蒂之所以是机会主义，那
是因为国家不会逐步转化。必须把它推翻，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政权。中国人对陶里亚蒂作了完全相
同的批评；他们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来补充他们的论
证。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说了相当多的假话。他们在引文中删去
儿行，从而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不过，总的说来，他
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作了一番揭示特征的工作，作出了大
体正确的结论。在意大利和在整个欧洲，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国家一样，都必须夺取政权。

中国人依靠我们的文献，依靠我们的论据，在同苏联人的论战
中支持革命的政策。当他们在这些文件的帮助下准备同苏联人进
行讨论的时候，并不像他们胡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希望达成可以
消除公开论争的妥协或协议。推动中国人往前走的并不是毛泽东
的意愿，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个客观需要要求中国人
的政策有所改变。而中国人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形势的传声筒和代言人，那是因为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以巨大的步伐向前迈进。

中国人不惧原子战争。他们明确地这样说。他们说，原子战争是可怕的，但是它不会把人类消灭，它将消灭的只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中国人和苏联官僚主义分子争论的现阶段就是这样。在他们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接近第四国际的结论，越来越接近第四国际的政策。但这既不一贯也不自觉。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妥协主义者。在他们的政策中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他们估计形势和估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同他们的革命结论是无法调和的。两者之间是哪一个将取胜呢？一切都引导中国人得出必须清除资本主义，必须夺取政权这个结论。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也朝着我们的路线前进。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是要准备战争的，但是“我们能够防止战争爆发。”可是当一个殖民地国家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支持，而且以包括武器金钱在内的所有东西支持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义务。”如果这种国际主义的支援性的干预引起帝国主义方面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将灭亡。中国人得出的正是我们的结论。我们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是亚洲半土地的主人，全世界共产党有一半支持他们。他们对赫鲁晓夫执行的政策，而他们并不想从苏联官僚主义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因为他们是世界不断革命这个高涨过程的间接的传声筒。目前的形势就是如此。

如果说中国人继续保持——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将会这样做的——论证和结论间的这种混乱和矛盾，那么决定他们的政策而
且正在占据优势的是革命性结论这一方面。这也不是自觉的。他们缺乏一个纲领性的、意识形态的明确观点。不过，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无疑将发现他们的客观形势所迫，不得不协调他们的政策。要末就是由可能共处这个估计来决定总路线，从而使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从属于共处；要末就是作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这个结论，从而使共处政策从属于夺取政权的必要。

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发展，现在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今后适应世界革命的力量、进展和高涨而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的，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革命斗争的本质。

第四国际将在这个斗争中得到发展，正如它现在在阿根廷的庇隆问题上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危机中由于帮助中国人的革命倾向的发展而自己得到发展一样。第四国际将一直发展下去，直到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共产国际。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前途。现在，在被中国人采纳的立场方面，第四国际正在恢复它的全部力量，恢复它的全部影响。

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也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然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人不能后退。他们并不是为了从中取利才采取谴责赫鲁晓夫的政策。他们不得不采取这个由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客观地强制要求他们采取的立场。这就表明，在中国内部，现在出现一个政治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表现出来，或者说，只是通过这个纲领的提出间接地表现了出来。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就是这样。苏联官僚主义试图自卫。他们把菲律宾・卡斯特罗找到苏联去，把他留了一个多月，以便弄出这个有利于苏联官僚主义而不利于中国人的声明。菲律宾・卡斯特罗进行了自卫，至少是部分地进行了自卫。当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没有发表任何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中国的声明。他和苏联人
最后协议显然包括着他对苏联人所作的让步，不过这些让步和他早已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中。一般地讲，也是和他在以前采取的立场中表现出来得观点并不背道而驰。

苏联人输了，因为他们做了最重要的让步，那就是承认应该由每一个国家来决定它的政治发展路线，这种提法损害了苏联人的基本政治路线——共处。

显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混乱，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也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态度，他在同苏联人的协议上的签字，和他在妇女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采取的立场比起来，是后退了一大步。那篇演说中提出的立场是他到那时为止所提出的最高度的立场。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了赫鲁晓夫反对中国人的一张王牌，这一事实并不显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价值和力量，也不显示他的价值和能力，而是显示古巴革命巨大的历史影响。而古巴革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和力量，既不是因为古巴的经济超出了苏联，也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力量构成一个坚强的堡垒，而是因为它的社会重要性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具有巨大的影响。赫鲁晓夫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找去，并不是为了让卡斯特罗露脸，而是为了表示“古巴革命和我们一起”，为了在苏联和全世界共产党群众面前显示一下赫鲁晓夫自己，表示他跟革命在一起，没有背叛革命。

他就好像一个小偷一样，一只手拿着一张证明他是好人的身份证，另一只手却准备去偷东西。赫鲁晓夫以为可以赢这一着。正如所有官僚主义者以为机构是个决定因素一样，他以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旅行是个决定因素。事实上，赫鲁晓夫只能从中取得部分的好处。可是，单是他必须依靠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赫鲁晓夫的严重弱点；否则，他就不会依赖卡斯特罗。
世界、苏联本国和各国共产党的广大群众看到了他的弱点。

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利用捷克？他为什么没有利用南斯拉夫，把铁托找到苏联去，说：“看哪，看哪，南斯拉夫人和我们在一起！”他如果这样做，群众就会对赫鲁晓夫说：“你这是开玩笑！”相反，他把作为革命的保证的古巴抬出来，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找了去。

古巴是个在世界经济上毫无重要地位的国家，而赫鲁晓夫需要它，因为他正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地位，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

不能希望7月5日的中苏会谈会得出什么肯定的结果。这不过是一个阶段，而不是别的什么。不管他们将达成怎样的妥协，总是不稳定的妥协。没有任何历史背景使他们能达成稳定的妥协。因为殖民地革命的压力和继续，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人国家的发展不许可作出任何安定的官僚行政的协议。革命超出一切协议之上。因此，应该把将于7月5日举行的会谈和协议，看成是今后更激烈更严重的斗争的序幕阶段，这些斗争今后将在世界范围内决定“政治革命”的进程。
五、中国革命的成熟，政治革命的新阶段

——J. 波萨达斯

在历史现阶段发生的如此具有活力的事件，是为即将改变以往历史过程的基本决定而准备具体条件的标志和体现，是这些事件的组成部分。这些表面上看来是粗野的讨论，在现阶段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一般来说，好像是由于保卫一伙国家领导人的人的官僚主义利益而产生的，现在正在确定人类当前的进程，并且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开辟道路。

中苏争论，形式上是中苏之间的争论，实质上潜在地反映出一种压力，一种力量。这种压力和力量虽然尚未明确体现出来，但是它们却间接地表明打倒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残余的世界战略的必要性。

从中苏第一次争论到目前这一次为止，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到 1962 年 11 月为止，争论还是以一种经验主义的、含混不清的、绝对抽象的方式在谈论斯大林和保护斯大林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当时谈到斯大林的性格和他的政策。他们并未明确说明现在和将来应该执行的政策。

从 11—12 月到现在，中国人发表了一些文件，他们在文件中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今天生动的历史经验。为了继承这种经验，他们也提到第四国际的结论、分析和计划。他们不再热衷于遵守斯大林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也不再热衷
于探讨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是不是一个左倾冒险主义者，或斯大林在镇压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方面是不是做对了。在目前的争论中，中国人谈到我们这个社会——当代世界——的最近的将来。这一切都暗含在实质性的讨论之中。中国人还含含糊糊、不连贯地、没有条理地，然而在思想、理论、政治和纲领方面水平日益提高地谈到历史现阶段为寻求合适有利的出路所必需的一切。他们谈到应执行的政策，谈到如何解释和面对当前的历史，如何解释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共处与战争、共处与革命等课题。

看起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争论，好像是官僚主义和行政两类倾向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它却间接地反映和表明确定人类未来下一阶段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在阶段的中苏争论中，有关世界大战、局部战争或原子弹战争的争论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争论既不是由中国人也不是由赫鲁晓夫主动提出的。从历史上来看，争论是由第四国际，由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中国人参加了争论，并把争论当作他们自己的事。然而，应该指出，中国人在去年11月保护过斯大林。他们抓住斯大林，他们抓住斯大林不放。此外，他们还把阿尔巴尼亚人当作受迫害和受诽谤的人加以保护。他们当时并未采取反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立场。他们以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为依据，并给以抽象的解释。今天，他们仍然以宣言和声明为依据，但是他们却给以革命的解释。宣言和声明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中国人。中国人本来在四五年前就可以这样做的。从那时起到现在为止的这一阶段里，中国人之所以改变了立场，那是由于他们自己主动进行学习、写作并且成熟起来。从1957年到现在，中国人方面没有任何政治著作，没有任何政治工作，没有任何对于当前局势的分析可以表明在政治上准备对他们的得出的结论提出置疑。今天，中国人从1957年含混
不清、极端含混不清的立场出发——这种立场在争论的某些阶段是毫无政治内容的，而且在思想意识方面是妥协性的——，得出了有些大体来说是革命的结论。

中国同志们的理论基础

中国人的态度并不是他们采取主动的结果。中国没有公众的政治生活，没有群众的讨论会，没有集会，没有国际性的讨论会，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殖民地革命对中国人的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使他们面对现实，并且去克服这种障碍。他们的革命要求他们理解它，并且作出答复。中国的革命和其他殖民地革命影响了中国的领导。但是，对路线和方法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时所依靠的理论根据和理论基础并不是从中国人那里来的。这是中国人从第四国际的文件，特别是从波萨达斯同志的文章中，引申出来的路线，准则以及作出解释和结论的方式。去年，我们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所写的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文章中，分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纲领。我们还分析了反映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和苏联官僚主义所奉行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政策的基本点。我们当时指出，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夺取政权，还缺乏其使命在于把阶级组织起来以便夺取政权的具有充分准备的政党。但是，为了夺取政权，领导应当对国家机器以及国家机器不能改造，有着明确的概念。

人民阵线的阶段已经彻底结束

资本主义的机器是不能改造的。在逐渐瓦解和消失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机器不会失去资本主义的形式，也不会不经过革命而
为社会主义形式所代替。我們曾經指出这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這樣指出过。历史用每天发生的生动实例明确地表明必须摧毁国家，并且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我們曾經指出，如果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即使实现最大程度的改革，也不能妨碍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和继续存在，也不能阻碍资本主义制度反抗甚至取消已经进行的改革。

在某个特定阶段所必须进行的改革，应当继之以革命。革命不是改革的累积。一币项改革也不等于一次革命。但是，改革却是绝对必要的。群众的成果，在議會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无产阶级的成果，它们当前的和历史的直接目标，就是消灭、削弱和粉碎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充满信心和信念。

人民中的被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走向能够领导他们会、能够采取必要的形式和措施来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这使得无产阶级对自己所进行的事业产生信心。經驗说明，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摧毁资本主义结构、資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資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以及它赖以生存的其他种种基础；总统和总理、下議員、上議員、警察、士兵、法律以及迫使群众尊重資本主义法律的宪法。必须摧毁这一切，并且代之以反对私有财产的准则和法律，代之以实施和执行这些准则和法律的机构。

这一切我們在分析陶里亚蒂的政策的時候都談到了。我們当时指出，在意大利有可能夺取政权，陶里亚蒂的結構改革只是一种对資本主义的改革，而在資本主义不可能加以实现时、提出并且要求进行这种改革更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們当时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应当夺取政权的結論。我們指出，在意大利的斗争中，資产阶级分成了好几派，其中有一派代表新兴的工业，他們的利益和意大利大資本集团有矛盾，并且反对
大資本集団。

因此，這一派資產階級也支持電氣國有化。這種國有化並不是革命的措施，而是資本主義的措施。工業資本家不願意付出電氣設備的全部費用，因此國家就不得不通過向勞動群眾征稅的方式來支付這筆費用。陶里亞蒂的結構改革意味着對資本主義結構進行一種改革，以便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存在下去。多列士也完全是這樣。

我們曾經進行分析，並且指出，不再可能組織新的人民陣營，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了。實際上，資產階級的基本策略已經不再是設法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以便像1936年、1938年和戰前各個階段那樣來利用共產黨人从中漁利。資本主義的基本利益在于為算總賬而作好準備。因此，在意大利的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和社會黨人同共產黨的全部爭論中，總是提出一個看起來很可笑的問題，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共產黨人和南尼口口聲聲說，當務之急是放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天主教民主黨人卻加以拒絕，他們說不能放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好，別的什麼組織也好，重要的是，這是資產階級總算賬的一個歐洲的軍事、政治、社會的反革命組織。

這也說明意大利資產階級過去和現在如何利用共產黨人的政策和赫魯曉夫伸出來的手。官僚主義為了使蘇聯軍隊和群眾說明，或企圖向他們說明可以在和平共處的環境中生活，需要和平地發展，需要在歐洲尋求支持以對付中國，這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

資產階級利用一切，但是對於威脅他們的團結和影響他們在社會、政治和軍事方面準備總算賬的信念和信心的一切，即使能在財政、經濟上獲益，他們也不加以利用。資產階級之所以不利用蘇聯為他們提供的如此有利于斗争的時機和形勢，那是因为他們
认为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不是经济发展或交换，而是军事上集中准备以便迎接决定性的阶段的到来。

第四国际文件的作用

中国在做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全部文件。这些问题在两年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我们在两年前，随后又在六个月以前的4月会议中，都谈论过这些问题，而中国人当时还未提及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把这些问题搁在一边。为什么现在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呢？中国人并未主动采取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方针。是我们的文件指导了他们，并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具有信念。我们的世界组织，同共产党，同苏联的官僚机构，同中国人相比较，是要比他们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份量，但是它的理解能力，指导能力，决定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在他们之上。因此，在这些争执中，从来没有被承认过的我们的文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要观察一下中国人在争论中采取的路线，就可以了解第四国际政治方针所起的影响。我们早在两年前向中国人提出的议题，也就是今天中国人向苏联官僚主义谈的议题。

我们第四国际看来好像没有参与的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实际上，我们是大力参预的。否则，我们就应该推论出，中国人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出他们有理的结论。中国人的确是有争论过。但是，为什么不在两年前这样做呢？哪比他们先写文章呢？谁指出了方向呢？是我们。当中国人攻击托洛茨基和抓着斯大林不放的时候，他们表明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但是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当论战是在理论基础上进行时，就思想、纲领和政治立场进行争论和不追随斯大林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进步性。中国人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不提及与马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具有同样立场的托洛茨基的名字，但他们在斯大林撤在一边。

中国人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群众给他们以支持，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获得的信念。他们是从部分被迫采取这种态度的过程出发的。他们处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的包围之中，苏联官僚主义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不反对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不受骚扰。中国官僚主义看到不可能得到苏联官僚主义的帮助。没有援助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使中国官僚主义必不可免地要依靠群众。中国官僚主义终于得出依靠群众的这种结论，因为它同苏联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不一样的。中国官僚主义与苏联官僚主义的根源和利益不一样，他们的目的性也不一样。否则，中国官僚主义就会和苏联官僚主义一样，对群众漠然视之，而苏联官僚主义受到的群众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

当苏联人进入柏林的时候，占领了工厂的工人用红旗来欢迎他们。成千上万的柏林工人多年来忍受了战争和希特勒带来的痛苦之后，遭到了今天向敬重和尊敬的赫鲁晓夫这个恶棍、这个卑鄙的官僚主义者的屠杀。希特勒好像扼杀了工人们士气、意志和革命性，然而他们却有力量用红旗来欢迎苏联军队，占领工厂。这种行动只能是自我牺牲和有统一的革命信念的结果。苏联军队像他们在所有欧洲国家里所做所为那样，屠杀了这些工人，消灭了这些工人。

苏联官僚主义当时不得不打击资本主义，因为尽管有些矛盾，这却符合在一个工人国家里享有政权的官僚阶层的利益（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为了自卫，它必须在德国建立另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阶级性质与它自己不能适应的资本主义国家。

197
中国官僚主义的性质

苏联官僚主义是与中国官僚主义有区别的。中国官僚主义没有保守的利益。它不是产生于热月党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不是产生于领导吞食了革命果实、有利领导革命的阶层而不利于革命群众的利益的过程。中国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进行了革命。这个领导在过去和理论上缺乏见解，没有革命的观点，没有政治生命，国家经济落后，对蒋介石以及后来对苏联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巨大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软弱，这一切都是目前争论的根源，这种争论已经感觉到缺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法上是官僚主义的，但是它不像苏联官僚主义那样有着保守的利益。当然，在中国存在着保守阶层，但是它们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中国官僚主义就不会有这样的进步。尽管如此，政治革命在中国是必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这一革命不是非流血不可的。政治革命意味着为了工人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消灭官僚主义的领导。这在中国不必要通过武装起义的途径来实现，然而必须用这种起义来反对苏联官僚主义。中国官僚主义能够在同苏联人争论中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它是从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前景出发的。

与此相反，中国官僚主义对于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内部压力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中国人的矛盾和局限性

我们看到的事件，我们参预的世界，是由两个根本因素决定
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殖民地革命的发展是基本力量，但是有利于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发展。目前应该迈出更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即提出和制定世界革命战略。这样，政治革命将会像今天的殖民地革命那样，成为一个轴心。政治革命已经部分地成为在现阶段已经具有决定意义、而在将来无疑要决定一切的轴心和基本中心。

为了进行比较——而这样比较并不是辩证的，只是为了形象化起见——我们说，像全体拉丁美洲国家加起来所能实现的那样重要的十次殖民地革命，还不能与中国或苏联的政治革命相提并论。在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国中（或是在另一个国家中，但是程度要低一些）的政治革命，将不仅意味着全世界革命的进展，而且也意味着爆发世界战争的进展。因此，表面上看来，在两个官僚阶层之间进行的争执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为了继续取得历史性的进展，不仅需要殖民地革命的进展，而且也需要政治革命的进展。过去两年内，中国人逐渐向前迈进，但是在最近六个月内，他们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下一步将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他们将组织力量以便在思想和纲领方面适应革命进展的压力。

中国人和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

目前中国人向苏联人提出了世界革命战略问题，他们以前什么时候提出过这个问题呢？从来没有提过。而第四国际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提出世界革命战略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是在帝国主义所处的形势下产生的。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得不制定战略。它的战略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帝国主义正在通过这一战略准备反革命的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世界战略。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下，在文件中指出这
种必要性。今天，中国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马上策划这种战略。他们只是被迫用这种方式来回答苏联人。同样，他们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谈论斯大林，尽管他们早就不信他了。

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等方面，斯大林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中国人的立场之间都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全面的，因为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受阶级斗争规律支配的。现在，在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作为历史上敌对阶级之间对抗性的继续和发展的这种对抗性达到了最高点。

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和混乱，并不仅仅是理论上和思想意识上一窍不通和缺乏发展观的结果，事实上特别是由于缺乏和群众相联系的政治生活。

如果中国人有和群众相联系的政治生活，他们就会衡量第四国际的立场的正确性，并且会全盘接受这种立场。但是，目前他们只接受了一部分，只记住了某些方面和某些分析。如果他们愿意全盘接受，他们早就会和我们组成统一战线了。

中国人并不信任斯大林，但是他们对群众的革命发展也缺乏真正的信心。他们之所以谈起斯大林，那是因为他们依靠苏联国内反对赫鲁晓夫的阶层。中人的机会主义使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罪恶的立场。我们坦率地对中国同志说，依靠苏联的右派——斯大林主义分子——是犯罪的行为。我们并不是根据是否反对赫鲁晓夫，而是根据其纲领性的，政治性的内容本身来衡量一种斗争，纲领，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此外，阶级斗争的不容虚伪的原则之一，就是绝对不应该联合右派来反对中间派或
左派。不应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迫利用右派，这是两回事，而联合右派又是两回事，两者大然不同。举一个明显例子来说，右派因为政府通过一项有关新闻的法令，限制甚至禁止他们从事新闻业务，而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并不因此而联合右派去反对这项法令。我们既打击这项法令，也打击右派。右派永远也不会有任何进步的表现，不像中间派有时在革命斗争中会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一些进步性。中国人以斯大林主义为依据是由于理论上极端保守和混乱所致，是由于机会主义所致。他们试图联合反对赫鲁晓夫的各种派别、倾向和成分，以便进行反对斗争。他们认为是可以这样做的。这是一种错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向谴责任何联合右派以反对中间派或左派的行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绝对不会有任何好处。托洛茨基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同意和他们联合，但是他从来没有联合右派来反对中间派。

这就是斗争的基本原则。中国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还缺乏坚定刚毅的决心，但是他们在前进，尽管这种进步还缺乏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信念，缺乏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实践。他们采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前进。最近六个月的事态表明，他们再也不可能后退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企图后退，后悔说“我们走得太远了”，他也绝对不可能后退。中国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采取革命立场的道路。他们受到对他们施加压力的保守阶层的阻挠，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后退。中国的群众，世界上的群众和共产党的党员们，都已经意识到中国领导人的能力，意识到在什么方面间接地体现出世界不断革命的成熟。
群众决定一切

这表明提出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纲领的条件已经成熟。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全体都可能后退，但是他们却不能阻挡自己促进和推动过的进程。

归根到底，各种倾向和集团，当他们是单纯地代表某些领导集团所提出的过渡性的主张时，是群众寄望的反映——中国工人国家有七亿人口，他们在阅读，在观察，在学习，当他们是在群众运动之中的思潮，并且代表这种思潮的时候，他们并不表达自己的推翻和信念，而是直接地反映历史进程的全部的巨大压力。中国人特别感觉到力图前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压力，感受到殖民地世界革命的巨大压力。这种革命还缺乏统一的、协调的、适应规律的、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历史压力的领导。这种历史压力间接地表现在中国人身上。因此，他们能够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在既没有编写文件，也没有进行讨论，更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的情况下，跃进了巨大的一步。在战争、共处、和平和革命等方面，他们从斯大林的观点过渡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中国人最近发表的文章，特别是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文章，值得阅读和研究。这些文件是不能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的。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全部进展，看出他们所达到的水平，和他们对于现阶段的革命的理解；但是，也可以从他们企图解决不可能解决的对抗这一点上看到机会主义的残余。他们把这种对抗叫做矛盾，但是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不同阶级并不是矛盾的相互对立，而是对抗性地相互敌对。中国人谈论矛盾，却得出对抗的结论。他们在理论上的混乱，使他们力图寻求战争不可避免和革命这两种相对敌对的概念之间的接近和联系。
这是两件根本对立的事。

但是当他們必須在他們自己的两种观念之間，即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同共处的可能性同革命的必要性之間作出选择的时候，占上风的是革命的政策，而不是改良妥协的政策。他們的願望是执行革命的政策。他們在最近发表的文件中，在和苏联官僚主义进行的論战中，得出了极其重要的、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結論，他們不可能从这个結論后退。

他們基本的路線是，历史現阶段是群众参与到其事的阶段。这是我們一贯的主张。苏联人、古巴人、烏拉圭、阿根廷、巴西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回答我們說，……（此段原文排字有錯誤和遗漏——譯者）那里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那里就馬上有人称他們为狂热的群众煽动家，并且嘲弄这种观点，我們什么也没說，我們在等待，同时重申群众决定一切。

中国人也嘲弄过我們。而现在，他們在做些什么呢？他們用什么来反对苏联人呢？他們用下面的論点反对苏联人：武器決定一切就是說謊，群众決定一切。今天他們所说的，是我们二十八年以来，更具体地说是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就这样說的。十八年以前，第四国际就以群众決定一切这样的信心和信念为基础。如果在十八年以前，或者是十年以前，中国人也支持这种观点，那么今天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就不会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而会是在中国召开的一个新国际的代表大会了。

中国同志們，你们得出这个結論已經太晚了，而且你们还是用經驗主义和舍混不清的方式得出这个結論的。中国同志們反对阿里亚蒂並且全力对他进行批评，实际上他們的斗争矛头是针对赫鲁晓夫的。这种間接論战的方式表現了缺乏信念，沒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尽管如此，他們却有前进的願望。
陶里亚蒂断言：“武器可以毁灭世界”。中国人反问：“什么世界？”他们接着指出武器不能决定一切，武器可以杀害很大一部分人，但是剩下的人将建设共产主义。说武器决定一切就是说谎。决定一切的是群众，因为群众现在和将来都要掌握世界的命运。我们请同志读一读我们的文件，并且和中国同志们的文件比较一下。除了由于标点符号和重音而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以外，中国人所表达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全部思想。

他们准确地运用了我们的语言。我们在我们的文件中明确地说明，“原子战争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而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都利用原子战争吓唬和麻痹群众。他们试图用来对付古巴，但是却遭到了失败。”

群众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麻痹起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一无所失，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战斗能够赢得很多东西。他们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人采用了经验主义的方式，晚了好几年才走上了我们的立场。如果中国人从我们的出发点出发，采取我们的立场并依据这种立场，我们目前就在莫斯科或者中国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我们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将不以帝国主义会选择什么时机发动原子战争，也不以中苏冲突为基础，而以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化为基础。

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既不是一种灾难，也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负有一部分责任。我们并不指责他们采取了他们今天所采取的立场，但是我们要向他们说明历史，以便他们向苏联人加以说明。

中国人谈论共处和革命的经验主义的方式，给他们带来错误和局限性。错误的出发点和错误的思想方式，使他们得出了战争、
共处和革命可以同时并存的错误的和不协调的结論。这是不可能的。战争和革命是正在酝酿的，将由群众参与的进程的结果，是危机和政治、社会、经济行动的产品。面对着这种进程的成熟，必须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否则，我们会受经验主义和进程本身的支配。中国人的情况正是如此。

中国人认为和平共处是可能实现的，同时他们又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他们一方面准备共处，另一方面又准备革命。

这是一种绝对的对抗，它表现为一种混乱——表现为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落后，也就是表现为组织群众方面的落后。不能不顾已经得到证实的经验，也不能不顾已经由历史证明有效的理论概念。敌对制度之间的共处是绝对不可能的。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共处。中国人一方面试图得出革命的结论，另一方面却又指出共处可以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阶级之间得到实现。这是很明显的混乱。

工人国家是工人阶级的继续。然而，工人阶级却是资本主义的敌对面。资本主义要依靠私有制，而工人阶级却要集体所有制。什么是工人国家呢？如果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组织，不是在从资本主义夺来的土地上确定阶级界限的无产阶级的继续和发展，那又是什么呢?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处阶段已经结束，而当资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时，和资产阶级的共处丝毫也不是和平的。

在排斥资产阶级时，对抗性就自动增加，而且发展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之中。显然，在资本主义继续统治的国家内，资本主义不得不拼命设法想把这些国家变成保护自身的堡垒，与此同时，必然产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都想摧毁和它们敌对的制度。怎么样能够说共处是可能的呢? 它们之所以一直并存到目前，这并不是因为共处是可能的，而是因为力量对比使资本主义不能摧毁工人
国家，同时也因为苏联官僚主义那一伙流氓阻碍工人国家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消灭资本主义残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

革命输出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敌对阶级能够和平共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共处体现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明显而全面的对立。列宁在 1917 年、1919 年、1921 年和 1923 年，说到同资本主义共处的必要性时说：“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共处”。但是列宁并不相信共处是适宜的，也不相信资本主义共处有着实际的可能性；只不过是别无出路。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国家。这个国家在 1917 年、1919 年和 1921 年曾经想扩大革命和输出革命。它不仅想尝试，而且还讨论直接和全面干涉波兰和德国。可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而未行动。

1939 年，这个工人国家曾经在军事上向波兰和芬兰输出革命。托洛茨基、中国人和赫鲁晓夫都没有加以谴责。这种革命输出和工人国家的这种扩充，当时是很正确的。不正确的是，当时苏联官僚主义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芬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未能在波兰复辟，那是因为占领和战争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适应这一阶段军事上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权。

为什么中国人今天不谈论这种经验呢？他们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这样干，不应该输出革命。那么，他们谴责了在波兰和芬兰采取的行动吗？他们能不能告诉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托洛茨基的那些文章谴责过革命输出呢？没有这样的文章。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革命本身的输出。革命输出可以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通过贸易来输出。这是最简单、最缓和、痛苦最小的形式。输出的是工人国家的影响和威信。一个北美工人得到古巴的糖和烟草时，就置身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之前，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比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得更多更好。这时他就了解到这个国家正在生存，正在组织社会，正在发展。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国家赢得了威信，特别是当他看到资本主义打不倒他的时候。

第二种输出的形式是政治的。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是输出革命最好的、最有效的形式，尽管表面上看来，军事形式似乎是最有效的。从政治观点来看，革命输出会使国内变成引起全世界群众的中心。群众看到什么是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的充分民主。工人国家的群众能够而且应该号召被剥削国家的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向他们提供全面的支援，那怕因此而放慢自己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果古巴群众过去或现在能够干预拉丁美洲，那么他们就应该号召拉丁美洲的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并向他们提供自己所有的一切：武器、金钱、人员，以自己国内民主的生活为他们树立榜样，说明是他们自己决定一切，是由他们自己制定计划和实施监督，是他们自己领导和解决一切对内和对外的政治问题。这一切比起派遣一万人到圣多米尼加的义和大得多。这种共产主义榜样将激发拉丁美洲和北美群众行动起来。

这种输出革命的形式，对帝国主义说来，是最危险的。如果古巴这个工人的国家在十月危机期间，号召拉丁美洲群众起来捍卫它，并且反对撤出苏联火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战争，但是今天就不再有资本主义了。而且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总是要进一步武装自己，如果资本主义丧失了社会和政治力量，那么它就会日益集中军事和财政力量，从而在战争中可能造成更多的
損失。

第三种革命輸出的形式是军事干涉。这种形式可以是间接的，即提供武器和金钱，派遣技术人员和志願人员。这种形式也可以是直接的，即工人国家的军队和革命的民兵干涉資本主义国家，但是这并不是为了代替这些国家的群众，而是为了鼓动和激发他们去夺取政权，并且帮助他们消灭資本主义。

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十年来一直在发展世界革命，那么資本主义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储存了大量的原子武器。特莱舍船 (Le threrher)就是一个例子。我們重复一次我們在特莱舍船遇难时说过的话，美国佬正在寻找一种不可摧毁的武器，一种可以达到三百至四百公尺深度的水下武器，这种武器既不能被发现，也不会失去作用，而能在一定时期突然袭击和摧毁工人国家。这正是美国佬寻求的东西。

列宁反对共处

中国人究竟根据什么，依靠什么例子来说明国与国之间可以共处呢？他們沒有引证任何事例，也不貿然地孤立地说有關於列宁的事例。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难道有關於这种可能性的事例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把历史事实和它们发生时的背景和形势孤立开来，就不可能在理论上提出起码的观点。他們抓来证明可能共处的事例，就是苏联和古巴过去和现在同資本主義国家并存的事例。但是，古巴是依靠全世界工人国家的支持。在人們当时谈到共处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国家，而其他国家的革命已經遭到失败。由于俄国革命的扩展沒有成功，苏联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下去。当时，苏联布尔什維克党曾經讨论是继续我们的实验，还是为了美好三倍的明天留下历史性
的經驗，而冒着世界人民群众眼看我們被消灭的危险在国际上采取行动！布尔什维克党曾为此而展开讨论。

在中苏目前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中，丝毫也没有提高这个例子，然而这个例子却是最清楚的，无可争论的。

和平共处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忍受同它敌对的制度的发展。虽然它在某些时候要忍受，这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它可以暂时接受这种形势，因为工人国家那方面还没有力量，还没有下定决心，也没有采取主动来发起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共处是可能的。敌对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也可能是在法律和上层建筑方面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实现了生产资料和交换的集体所有制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

中国人并非由于缺乏历史概念而将这些观点混淆起来，但是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们现在第一次谈到这些问题。对第四国际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来说，他们已经讨论和掌握这些问题，因此这也就成为我们历史乐观主义的基础。中国人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开始进行争论。如果国家之间可以共处，那么，在同一个国家里各个阶级之间也可能共处。中国人的观点含混不清，这是由于他们的经验主义所致，由于他们对群众，对世界革命，对未臻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发展缺乏信心所致。这就是他们观点含混不清的根源。

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人依靠斯大林。他们抓住国内外的某些倾向，以便在反苏斗争中拥有一些根据，但是他们采取了行政的、机会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方式。他们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攻击托洛茨基。但是他们究竟对托洛茨基进行什么样的攻击呢？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当他们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犯了错误，他是一个左倾冒险分子”的时候，他们的确提到过托洛
茨基。但是，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在这方面，他们只字不提。所谓左倾冒险主义，就是极端左倾，也就是当时人们称之为“极端革命”的政策，这种政策要求人民不顾条件和后果地进行斗争和扩大斗争。这条路线的拥护者们当时说："我们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投入革命；我们要革命者，我们要闹革命。"关于当时在这方面采取的动作和通过的决议，我们请中国同志和全体共产党员阅读一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1917年到1923年的报告，这些报告已于1922年由意大利的里那西塔共产主义书店出版。其中有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问题的讨论。没有人把托洛茨基当作土匪、极端左倾分子或叛徒看待。托洛茨基本人也提出退出争论，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因为他需要退让。但是，退让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奥托维，托洛茨基正是为此而走开的。托洛茨基当时利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讲台来号召世界革命。德国人自己也声称："你不是讨论和平，而是号召革命"。托洛茨基反驳说："这是一个涉及标准的问题，你称之为革命，而我称之为和平。"他当时是想争取时间，而且在上面提到的布尔什维克党内讨论中，他也正是这样提出的。

必须赢得时间，时间，还是时间，以便让群众了解到人民企图通过给工人国家以和平来夺取它的土地，分裂它的人民。托洛茨基所做所为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中国人不仅不捍卫保卫的利益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而且还极不负责地攻击托洛茨基。

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请中国同志参考“中央委员会决议”和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阶段的著作中提到了的事例。托洛茨基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发表了“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一书。这是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写的。还有一些写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信。中国人不能说托洛茨基的
立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模糊两可的。托洛茨基谈过“既非和平，也非战争”。他当时说，我们不能击退德国的进攻，我们也不能
进行革命，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以便争取时间。列宁反问说：“不，我们应当跟我们唯一的国家在一起。这是可靠的、具体的。欧
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尚未为夺取政权作好准备。我们就应该捍卫现存的工人国家。”因此，转向了和平政策。列宁当时说：“我们
现在的政策，就是和平。”显然，由于欧洲革命遭到失败，当时必须
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保卫工人国家。这就是和平。
因此，列宁的声明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立场是：“当前最重要的
任务是经济建设，并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赛。因此，在最后阶
段，才是战争和革命。今天，我们不能再搞革命。我们现在要退到
经济竞赛的领域中去，以便把世界上的群众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
一直到我们有条件来发动革命。”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企图了列宁这
些话的内容，并且代之以死条文。当我们读到他们硬说列宁说过
“和平是我们的目的”时，不能不感到愤慨。但是，马克思最伟大
的学生——列宁在1913年的齐美瓦尔得和昆塔尔代表大会上，都主
张必须“准备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的和平是假和平，这是一种的和
平，他们借此来准备新的战争。只要阶级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
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是制定革命纲领的基本常
识。苏联人，而且还有中国人，他们都同意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
是因为从苏联人方面说，他们是站在保守利益方面，而从中国人方
面说，他们是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虽然他们并不没有保守的利
益。中国人的观点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致，由于
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活所致。
爭論无法挽回

我們之所以如此坚持分析中國人的立場，并不是因为我們认为这种立场是最危险的，而是为了帮助中国同志了解。我們也要分析苏联人的立场，因为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全部爭論是以經
驗主義方式进行的。無論是从自卫的苏联方面看，还是从进攻的
中国方面看，既沒有准备，也沒有客观的目的。但是，尽管中国人
沒有明确的目标，他們却不得不作出水平越来越高的結論，作出革
命的結論。

例如，他們一方面同意可能避免戦爭，可能和平共处，但是在
他們的結論中，却提出绝对不應該篡改各国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纲
領。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存在着对抗。但是，在這两种立场中间，那
一种立场占主导地位呢？对中国來说，主导的是证明：資本主義
的改良是不可能的；革命是必需的；应当着手准备，虽然战争最终
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各国夺取政权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帝国主義发
动战争，这也是可能的。

中国人并不把原子戦爭看成是人类的灾难，而把它看成是大
量破坏人类财富的根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們认为战争对資本
主義說来将是一場浩劫。他們并不是帝国主義散布恐怖的傳声
筒，可是他們沒有纲領。思想意識和政治方面的事論和結論本来
是應該用来进行斗争和制定纲領的。中国人有什么纲領呢？現在
還沒有。在他們最近一次跟苏联人的争論中，他們试图在《再論陶
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制定一个纲領。他們进行了一
系列的分析，证明近几年来的历史进程是一連串的战爭和革命。
他們用一系列的事例和事实证明阶级之间的共处是不可能的，并
且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来指出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人不仅准备在世界范围内同苏联人争夺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范围。他们还为世界范围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的下一阶段，为推进世界革命而进行准备。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并不是有意图的，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被推向这个方向。他们不能先就这一切进行争论，然后又放弃这一切。他们不能把他们的立场当儿戏。纲领决不是四五个人争论的结果，而是世界殖民地不断革命的结果。中国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停滞不前。事实表明，这场争论是在殖民地革命不断发展的，工人国家的发展和政治革命进展的历史形势下进行的。中国人对列宁和陶里亚蒂的批评，除了他们企图消除存在于战争的可能性，革命与和平共处之间的矛盾以外，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两种历史观之间必然有一种要胜利。中国人的观点是主张殖民地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而主张通过暴力摧毁资本主义。

目前这场争论不是像柏林代表大会那样以官僚主义方式进行的争论。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对于可能同苏联达成协议这个问题，还抱有许多幻想。在那次代表大会以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当时作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思潮，无论是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投降主义分子，无论是苏联人，也无论是中国人，都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对那次代表大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们把那次代表大会看成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和开端。六个月已经过去，那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已经得到证明。因此，历史上的进程已经间接地、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由于缺乏布尔什维克政党和为群众而生存的政治组织，这种上升的进程不可能有直接的体现。
政治革命的进展

如果群众今天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就不会有中苏之间的争论。群众会把苏联的领导和中国领导的半成品赶下台，以便直接取得自己所愿意取得的一切。我们并不把群众理想化。当我们谈到群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假设有一大群富有注意力的人，他们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提出理论观点。重要的是群众的意志与官僚主义相反，群众要求打倒资本主义。尽管会有原子战争，群众还是要推进革命。而官僚主义却不愿推进革命。群众要实现一系列的国有化和集体化，那怕为此受冻挨饿也在所不惜。官僚主义却不同意这样做。在害怕战争的外衣下，官僚主义掩盖了它们维护本身的保守利益和反对群众的实质。今天，群众在一天之内就能懂得过去需要二十年才能懂得的东西。例如在古巴，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游行示威，集会反对撤走火箭。等我们知道已经有点晚了。消息是我们的一个支部向我们提供的，尽管遭到破坏和镇压，这个支部仍然在工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苏联之行，有人在街上听说，“赫鲁晓夫完蛋了，他不得不把菲德尔召去”。这就是古巴的评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错误的看法。

我们之所以十分重视中苏争论，这是因为殖民地革命的全部进程必须和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进程互相配合。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争论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这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争论了。莫斯科会晤推迟了两个月，这说明双方都在准备，说明这次会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苏联官僚主义设法同中国人谈判，并向他们建议背着世界其他国家工人国家达成一项协议。赫鲁晓夫不是在一次演说中说过：“让我们达成协议，不要管别人吧!”这句话吗? 中国人拒绝了，但是我
們不知道中國的拒絕意味着他們走到了那一步。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有着自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因此，它的懷疑、猶豫和經驗主義會使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同意與蘇聯官僚主義休戰或達成協議。

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用十二种文字发表了他們的文章，相当直接地攻击了苏联官僚主义，把陶里亚蒂和多烈士称为叛徒，向烏拉圭、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共产党宣战。他們在这些国家直接設立了發售文件的中心，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相信苏亞雷斯和阿拉斯門迪会保证他們的文件的發售，而是因為已經宣战。中国人在烏拉圭周報“前进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意味着对官僚主义和共产党作战。現在可以想像，如果他們在意大利設立一个发行中心，任何人都能买到他們的出版物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智利，他們已經設立了自己的“斯巴达克出版公司”办事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也有一个地下办事处。在意大利和法国，他們也有自己的发行員。采取这样的行动，說明中国人不准备和苏联人和解。他們准备进行彻底的斗争，即使他們自己并不自觉地想这样做。有了这样漂亮的出版物，他們并不想在基本問題上往前进几米，而想大大跃进一步。他們已經用自己的方式根据他們的經驗主义和目前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爭論达到了最高点。

最近發表的題为《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的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人力图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反驳苏联的投降主义和委协改良的立场。中国人沒有指名攻击“苏联官僚主义”，而是随便用“別的人”、“某些人”等詞來影射苏联官僚主义。但是，他們却指名攻击陶里亚蒂！看来陶里亚蒂要說：“为什么单单攻击我呢?”中国人也攻击了多烈士。应该記得，中国人把多列士看成叛徒、叛徒。如果中国人不想走得更远，他們就不会这样
对待这些人了。我们认为，说中国人打算走得更远，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愿。他们只是反映了威协要强大得多的进程。如果他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愿望，如果他们有着明确而坚定的目标，中国就会成为游行示威和集会的场所，成为群众进行热烈全面的政治讨论的场所。目前在中国没有进行讨论。虽然他们文章通过电台和出版得到了传播，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生活。否则，中共领导就会向苏联群众说，有几百万工人，几百万人在讨论这些文件，你们也应该进行讨论。但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指责苏联人不发表他们的文件，并且说苏联的文件已在中国发表。这种形式上的克制不仅反映出苏联人缺乏信心，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人同样缺乏信心。但是，中国人的无信心却由于他们在出版了的文件中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和理解力而暂时得到弥补。在这些方面，后退一步都是不可能的。

革命、夺取政权和先发制人的战争

中国人迫使苏联人部分地退到他们的妥协立场，但是无论是在目标方面，还是在实质上，苏联人都没有改变立场。波诺马廖夫曾经想答复中国人，但是发表的文章是一篇僵硬不化的文章，他阉割了我们大师的真正思想。例如，他引证列宁的著作时，只引用几个字，他写道：“正如列宁所讲的，‘我们为和平而斗争’。”当然，列宁说过几百次，“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特别是在他乘坐有名的装甲列车回国的时候。当然，列宁也说过，“共处是必要的”，但是苏联人没有说明这些引言是从哪篇文章里摘出来的，引言与上下文关系如何，文章的结论又是如何。列宁是否认为什么时候都可能实现共处呢？列宁具体地说过某一时期的共处吗？和平对列宁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人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对列宁来说，和平是每个人为了击毙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而肩荷着的步枪。这就是列宁所理解的和平，这就是组织斗争夺取政权。

硬说可能出现“和平状态”，就是说谎。当阶级关系还不许可就夺取政权作出决定时，会出现一种过渡状态。伴随着这种过渡状态的是战争、革命、罢工等等。决不是什么“和平状态”。苏联官僚主义者不顾这一切，硬说列宁认为可能“为和平斗争”。巴布洛和杰尔曼之流的叛徒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们说，“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是为防止原子战争和争取帝国主义敌军而斗争”。他们给无产阶级规定了多么美妙的任务啊！他们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攻击中国人陷入了“极端主义”和“扩大狂”的错误。

中国人声明：“我们不主张单纯的裁军，我们主张落后人民拿起武器。”如果有可能在全世界实现裁军，那么就不会有革命了，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大多数人的问题。既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能裁军，那么认为可能裁军的看法就是一种幻想。当中国人谈到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时，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正义战争不仅是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国家的战争，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而且也是工人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此外，中国人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问题上却后退了，他们不再谈论这一点。我们认为，根据我们的观点，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永远是无效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我们明天就向资本主义国家宣战。如果我们认为这将使人类蒙受损失和牺牲，我们就这样主张。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至少在今天来说，不是最好的方式。先发制人的战争意味着号召群众夺取政权，支持他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例如，应当向古巴提供武器以
及鼓动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以便古巴人民得以通过自己的革命生活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作用，吸引群众的注意。工人国家应当发出号召。这一切我们是同意的。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发动战争，这也将是资本主义的消灭。

实际上，工人国家在为实现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计划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出号召而采取的行动中，就以一种最完善和最高级的形式准备着先发制人的战争，以便减少人类的痛苦。仍然生活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群众，将会理解这种行动将如何减少80%的战争苦难。为了采取这样的行动，工人国家需要有愿意这样做革命领导。为什么中国人在去年秋天侵入印度北部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力时，没有像苏联人在1917年对德国和波兰那样发出号召：“占领土地吧！我们支持你们”？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革命的战略。

相反，中国人占领了土地，前进了40公里，然后又把这些土地交还给尼赫鲁。这是一种妥协的政策。

**中国在反对尼赫鲁斗争中的不彻底性**

中国人的机会主义和革命结论并存。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在他们最近反对印度官僚主义的军事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当时可以放手地号召印度群众起义和夺取土地。在反对尼赫鲁的资本主义军队进行的军事斗争中，中国军队的义务，它在军事、社会和革命方面的需要，就是号召印度群众夺取土地和剥夺地主的财产。这在军事方面对于瓦解尼赫鲁的军队，把印度的农民和平民以及印度军队中的士兵争取到中国军队方面来，可能是最有价值的支援和行动。中国人的官僚主义政策使得他们不向农民发出号召，以求避免同印度资产阶级面对面相撞，避免引起亚洲资产阶级的反对。

*218*
在中国人这种政策和他们目前得出的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从何而来呢？这是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和政治上缺乏理解，由于思想意识上和政治上的经验主义。彻底的革命的政策应该是把已经侵占的二、三十公里地区的土地交还给农民。然后，中国可以后撤或者根据农民的要求而留在当地。如果美国佬大声叫嚷说这是侵略，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人可以回答说，我们并不是为我们自己而侵占的，印度农民得到了这些土地。

如果中国人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么这将传遍全印度，传遍全亚洲。这就可能有力地推进革命，可能引起资本主义的反作用，甚至包括战争。这是一场战争不是反对入侵，而是反对占有土地的农民。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战争不会继续多久。人们早就看见成千成百的士兵从迎击中国军队的尼赫鲁军队里逃亡。只剩下二千名印度士兵去对付红军，而且有许多人失踪。这样，中国人才能通过一般如果有人防守就无法通过的山口。只要一个人提着一挺机关枪就能够守住通道。但是，有一万中国人通过了这个山口。印度参谋部无法说明他们是如何通过的。可是问题很简单。印度军队倒向中国人，甚至给他们带路。几千名士兵能够在一个晚上通过这个山口，只能用得到印度士兵甚至军官的合作来解释。这也说明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影响。

号召夺取土地就是革命输出的政策。中国人不懂得这一点，还说他们不想输出革命。他们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当他们倾向于把革命纲领当作整体看待的情况下，他们的经验主义态度就逐渐变为革命的态度。由经验主义态度向革命态度的发展表现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问题上，表现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理解和他们工人国家的利益的问题上。
领导并不想从经验中逻辑地引伸出结论，或者局限于这些经验。但是他们采取的路线使他们不能后退，只能前进。

硬说中国人谈到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只有涉及殖民地战争时才有效，这是错误的。没有比工人国家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更为正义的战争了。为什么不就这一点进行争论呢？而我们却在争论中把这一点提出来了。

资本主义企图消灭第一个工人国家

中国人还在别的地方谈到过去两次资本主义战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不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资本主义战争。工人国家参加了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在领导、组织和目的方面还有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过，这是另一回事。工人国家维护了这一阶段最进步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中国人避而不谈这一切，也不是从经验主义来谈论这一切。表面上，他们想在争论中涉及各个方面，但是，他们限制了争论的范围，排除了最基本的部分。

苏维埃工人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依然存在，没有被消灭。而当时存在资本主义有可能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条件。这样的条件永远不会重现，因为没有这样的历史时期。

资本主义不可能在日益受到限制的世界里找到生存的办法。

在第一阶段，资本主义企图消灭工人国家，但是未能得逞。当时，世界上一半国家被动员来反对工人国家。军事上的失败后，它们妄想从经济上来扼杀这个国家，但是，它们同样也未得逞。1921——1923年，被迫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满足了由于经济十分不足而提出的需要。人们在一定的方式下重新采用了由工人国家监督的资本主义成分。列宁以加强工人国家来抵制资本主义形式。
式的重新采用。在经济上部分地回到资本主义时，又如何来加强工人国家呢？这是从政治方面，特别是从社会方面来加强。让广大群众从社会方面更多地参预工人国家，扩大苏维埃的职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讨论。群众充分享有行动、思想、言论、提议和否决的自由。开展农民工作，从政治上影响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经济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努力依靠广大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在这方面，中国人和苏联人都只字不提。苏联工人国家在三年经济匮乏时期处于灭亡的边缘，由于苏联群众的英雄主义，才得以幸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因粮食缺乏而死去，但是，他们保卫了工人国家。

当时，世界上好些国家进行征募，向苏联输送小麦。大量衣靴运往苏联。苏联群众在这些年代忍受了一切，保卫了工人国家。日益众多的群众越来越自觉地参预国事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因此，必须以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弥补经济的虚弱，列宁和托洛茨基就采取了这样做法。在中国人的分析中却缺少这种讨论。但是，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不根据历史事例就无法有效地讨论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不可能达成任何使不断革命
瘫痪起来的协定

中苏争议是我们必将参与其中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序幕。这个阶段既不是由苏联人，也不是由中国人有意地揭开的。中国人被迫投身这场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自觉性。把他们在两年前、一年前和半年前发表的文件和他们今天的文件比较一下，那是有意思的。人们看到他们在最近半年内，有了突然的飞跃。今
天，他們把斯大林丢在一边，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分析，力图根据历史上的事例得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結論。

他們想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他們的結論仍然是片面的，缺乏協調和聯貫。他們还缺乏全面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只是以經驗主義的方式得出一系列的結論。

我們強調指出，在他們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性和共处联系起来的愿望中存在着矛盾和对抗。但是，归根到底，将要取得胜利的，是革命的立场，而不是妥协的立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将矢志不移地前进，到目前为止，他們还只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斗争，因为中国国内正在对这些问题展开重要的討論。尽管对應該怎樣做沒有明确的概念，但是内部斗争正在发展，应该等待将要作出的决定，但是从我們方面来说，我們應該从現在起就參预其事。

中国人把所有有关现阶段革命发展的基本问题都提出来討論。这一切都归结于现阶段必须制定策略以組織斗争，消灭資本主义残余。中國人的全部分析都归结于这一点。他們不可能单靠他們自己得出真正的結論。我們必須干预其事。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就是这一局势的反映。

苏联人和中国人即将于7月5日举行的会谈并非是为了严厉批评、咒骂和控诉。归根到底，这直接体现不断革命的进展和中国人对于不断革命的不自觉的反映。苏联官僚主义将竭力阻止不断革命。这并不等于說苏联官僚主义能够达到目的，但是这却说明从这次討論起，不管其結果如何，如果中国人意志涣散，他們将被抛在一边。同样，卡斯特罗如果向赫鲁曉夫屈服，就得去职。这并不是反革命的行为。在古巴目前处于经济匮乏的情况下，菲德爾・卡斯特罗正在設法前进。
以革命的活动来保卫中国工人国家

炮击金门、马祖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摆脱帝国主义这两个岛上对革命的中国所实行的压力和封锁。炮击金门、马祖是中国工人国家和苏联官僚主义之间的危机和争端的原因之一。

苏联官僚主义谴责了中国工人国家这种合法的和必要的行动。尽管这一行动是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因为没有与号召群众参加相结合——但是，它却符合捍卫中国工人国家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苏联官僚主义推行的国际政策的利益相抵触。当中国群众的经济需要和他们在社会上提高觉悟的要求对帝国主义和世界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政策时，苏联官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企图对帝国主义实行防御性的、妥协的政策，实行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共处的政策，以便维护他们的保守的利益。

在中国领导的反帝和斗争中，反映出中国同古巴主张的不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苏联官僚主义的保守利益之间的矛盾。政治革命的条件的成熟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中苏争论不会在7月5日结束。这一天，将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不再进行泛泛的讨论，而要讨论具体立场，讨论这一阶段的根本问题：战争、革命、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准备世界革命战略的必要性，“纸老虎”的力量和弱点。

现在，中国人以新的方式分析、阐明和修正了他们过去的想法，因为他们现在宣称，纸老虎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不管他们的看法如何，也不管老虎是否紙糊的，归根到底，人民群众决定一切。为什么中国人现在需要讲这样的话呢？他们利用毛泽东1947年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讲到了纸老虎，因为最终来说，
群众要取得胜利。但是问题不在于得出一个基于历史分析的理论性的结论。这是一次简单的谈话，他们并不是根据这次谈话来制定纲领和政策的。否则，他们早就会根据这一结论宣布纲领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因为它必然要被群众粉碎。但是他有原子武器自卫，因此必须准备应付这种破坏力，准备夺取政权。中国人现在所以这样讲，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抱有幻想，因为他们在得出这些结论时抛掉了这些幻想，而我们干预也是他们抛掉幻想的部分原因。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会谈不可能以达成协议告终，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方或那一方绝对拒绝达成协议，而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苏联官僚主义正在设法维护自己的保守利益，对中国作了相当重大的让步。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殖民地不断革命的发展的巨大需要比较起来，他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原因。因此完全排除了达成任何使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革命瘫痪下来的协议的可能性，因为，不论他们怎样，中国人是中国和殖民地世界革命成熟的代表。

能够说明这个结论的事例就是公社的发展。中国人已就生产数字上的虚报进行过自我批评。中国人承认在某些失败的事例中犯了错误，农业生产上高估了百分之四十，工业上没有达到预期的产量。但这一切将被改正和调整。中国人开始进行自我批评，改正数字，同意后退，任何人也不杀也不流放（至少未见公开发生）。这间接表明在工人国家中，群众参与其事的程度正在提高。对领导没有很大的不满，但是也有舆论。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群众对于即进行的纠正怀有一定的信心，而且还因为他们对团结怀有信心，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公社扩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统一
的革命意志怀有信心。

中国人攻击南斯拉夫人

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人的攻击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攻击。他们在革命纲领方面无法攻击南斯拉夫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人是最靠近帝国主义的工人国家。靠近帝国主义的原因是：第一，保守领导集团的民族的和官僚主义的利益；第二，国家贫穷；第三，在整整一个时期，其她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所推行的孤立政策。当然，从资产主义观点来看，南斯拉夫人在某些方面为帝国主义起着桥梁作用。这是政治桥梁，而不是社会桥梁。

南斯拉夫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人并不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人弄错了，因为他们不能运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加以分析。如果他们正确地阐明南斯拉夫工人国家的特征，他们将被迫调整他们和群众的关系，而这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他们的分析是混乱和经验主义之大成，而且也不排除维护官僚主义的利益。今后几个月内，一、二年之内，假如没有原子战争（假如原子战争一旦爆发，有了原子战争）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对南斯拉夫性质作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可以争论的，不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而是与南斯拉夫群众的需要和关心相脱离的领导集团的政策。

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是一直存在的。由于中国领导的性质，中国的政治革命可以是非暴力的。它将体现为官僚和行政政权被革命领导推翻而垮台。这个革命领导将自己维护自己，依靠自己并且推动群众以革命的方式直接参预经济、财政、社会和国内外政治等一切问题的计划，讨论和决定。
考虑到中国人的进步，今后一两年内，如果没有原子战争（如果有的话，还会更快一些），中国人和我们，中国革命和第四国际将组成统一战线。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中国人在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归功于总的评价。在这方面，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第四国际。今天是第四国际，明天是我们号召组织群众的新国际，不論其名称如何。

苏联人试图同中国人进行内部谈判。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使谈判仅限于在内部进行，然而中国人却公开了文件。他们用这么多文字出版文件，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把真相公诸于世，而且表明他们准备把谈判进行到底，而不会在7月15日结束。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将看到在这个阶段里，政治革命的进程将飞跃地向前发展。

### 菲德尔·卡斯特罗苏联之行和中苏会谈

苏联官僚主义的这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而进行的挣扎和伪装。人们看到过关于赫鲁晓夫将被排斥和代替的消息，这也许是可能的，而且也许是在最近的将来。这些消息，虽然来自帝国主义，但有它一定的真实性。我们并不依据这些消息，而是依靠我们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依靠苏联国内官僚主义内部斗争的发展，依靠世界殖民地长期革命的发展。赫鲁晓夫的政策同殖民地长期革命所要求的实力关系发生冲突。中国人和古巴人都直接地表示了这一点。

苏古文件尽管是一个妥协性的文件，仍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将奉行它认为必要和可以执行的政策，和平道路或革命道路。如果说赫鲁晓夫没有能争取到同古巴人组成一条战线或达成一个反
华人文件，那并不是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他没有能这样做。赫鲁晓夫的文件是抽象的，充满了泛泛之论。这些文件全部内容无非是只申述了共处是可能的，战争是不可能。

中国人目前只能求助于具体的历史事例。苏联官僚主义企图依靠列宁给自己的论点找理论根据。他们从片面的分析和个别原理得出一般性的结论。1929年，当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的时候，列宁在谈到年青的苏维埃国家的形势时曾经说过：“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进行革命，对我们来说，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更好一些。”官僚主义从中得出一般的结论，即可以同帝国主义共处，从而赋予列宁的这一过渡性质的论点以准则、纲领和历史性原则的意义。列宁得出这个结论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当时不可能进行革命。这种手法不仅是别有用心的，而且是利用列宁的思想，来有意识地起反革命的作用。只有苏联官僚主义企图利用列宁的威望来加强自己的妥协、投降和反革命的立场，这是很可怜的。最近，他们还迫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到苏联访问。苏联官僚主义企图在反对中国人的争论中利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威信。工人国家、殖民地国家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对古巴这样一个国家如此热情，因为它反映了他们的感情和愿望，他们的觉悟以及斗争和革命的决心。

迫使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苏是苏联官僚主义软弱的表现，而不是强大的表现。苏联官僚主义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叫到莫斯科来并不是因为它需要给古巴革命以经济上支持。卡斯特罗并不是去讨论出售糖的问题，也不是讨论签订贸易协定的问题。签订这种文件并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赫鲁晓夫命令之下到莫斯科来的。但是我们仍然要提这个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进行这次访问不可。我们认为不是这样做的不
可。为了答复一个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可以在一次人民集会上征求群众的意见以便决定古巴人民的行动路线。如果卡斯特罗拒绝邀请，赫鲁晓夫会用减少购糖的办法来回敬。这当然会造成经济上的打击。但是事情并不会停留于此。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拉丁美洲的群众会起来干预。面对着这种报复措施，古巴人民本来可以找到不再依赖苏联购买他们的物品的办法。

我们懂得古巴存在的经济困难以及为了获得食糖市场有必要同工人国家保持经济关系。但是我们提醒一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和古巴群众，苏联曾经在三年内毫无外援，受到来自包围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三重威胁。当时，人民群众吃旧皮鞋。目前，古巴革命所遇到的困难还不及苏联人民群众所遭遇过的困难的百分之一五。应该重温苏联革命的历史。古巴人所忍受的困苦还不到苏联人民群众的百分之一五。四年半的战争，三年的资本主义包围，而且这是发生在一个消费量只及世界消费量百分之一的贫穷的国家里。苏联群众并未因短粮缺食而死绝，资本主义也未取胜，而群众却获得了胜利。全部问题在于对群众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如果赫鲁晓夫否认这一点，那我们就同他公开争论。菲德尔·卡斯特罗过去和现在都深知苏联官僚主义的立场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为此，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了苏联，为此，他在赫鲁晓夫的文件上签字，反对输出革命。尽管在文件中双方都有让步，而卡斯特罗作了更多的让步，因为归根结底，这个文件是同古巴革命背道而驰的。

反对和平共处的拉丁美洲革命

在半数拉美国家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候，文件却谈不要输出革
命。这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是极为有利的。在这个阶段，应该签订的协议是号召群众夺取政权，而不是号召他们处于被动的地位。政治上最成熟的国家的义务乃是推动和鼓励群众去夺取政权。

巴西、秘鲁、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现在就准备夺取政权。乌塔尔曼和斯韦齐已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值得我们推崇的作家看不到群众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之间的辨证关系，但是，他们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时机已成熟的现实。他们说，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群众。但是他们的分析证明了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这个阶段，在这些国家可以夺取政权。工人国家发表的文件应当充分依据这一形势，号召群众夺取政权，向群众表明他们准备支持群众。相反，卡斯特罗在莫斯科签署的文件否定输出革命，同意革命只限于本国。文件的这一部分有利于反革命。

对文件不能进行分析和抽象的评价，而要根据文件发表的历史时刻来判断。今天的历史时刻是七个夺取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的时刻，这一点不仅为我们和像乌塔尔曼这样的人所证实，而且也为帝国主义本身，为阿根廷的翁加尼阿和巴西资产阶级领导所证实。在这个国家，勒利左拉在电视台所说的一番话对古拉特是个警告。这位勒利左拉在一次土地改革的群众集会上说：“我们不允许发生瓦加斯时所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不许重演夺德罗斯下台时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要武装人民，让他们夺取土地。”与会者欢喜若狂。我们在无线电里听到这个讲话，以为是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声明。其实不然，这是巴西工党左派组织的一次群众集会，会上勒利左拉讲了话。他还说：“有人责备我们要消灭个人所有制，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消灭的，是我们在家享有这种所有制。我们要
分土地。”这是一篇激烈的，富有巴西人惯用的夸张色彩的演说，但是，是一篇正确的演说。还必须了解秘鲁和委内瑞拉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首先要说，把责任交给作为群众的组织者的共产党人是错误的。采取行动的人是同共产党的领导决裂并反对这一领导的政策的人。

这就是拉美的形势。帝国主义坐在火药库上。如果十月危机时——当时有着产生战争的危险，古巴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古巴革命号召世界人民群众打倒资本主义，那末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将得到拯救。

乌拉圭《前进》周刊和记者乌·瓦桑在纽约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均清楚表明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巨大增长和北美反对战争、主张殖民地革命的舆论的巨大发展。《新进步》杂志上刊载了对各阶层舆论的调查结果。百分之六十二的被征询人反对侵犯古巴，主张让古巴做它所愿意做的一切。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在古巴问题上表示中立，他们反对对苏作战。

瓦桑在《美国》从布宜诺斯艾里斯发出的根据北美消息所写的文章中说道，那里有一个二万人的运动，大部分人是学者、科学家、教授，即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原子弹战争，反对肯尼迪策划入侵古巴和反对足以引起战争的一切。他们同意世界上每个国家按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当有人问到他们是不是有利于共产主义，他们回答说：这对我们的有利，因为我们所要的，是不要死气，我们不愿意肯尼迪进行战争。他们的态度不是反对工人国家的，尽管他们内心深处是不同意工人国家的，但是他们的态度是对帝国主义不信任的表现。

北美的群众和拉美的小资产阶级有着一种深刻而紧张的生政治活。愚蠢的日耳曼人——我们说愚蠢并非贬低日耳曼人，而是
从政治上来说——在1962年8月写道，百分之九十的美洲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写道，百分之八十的美洲人反对入侵古巴。我们是从确定无疑和具体的推论得出这些结论的。到过纽约的第四国际的同志向我们证实曾看到墙上写着“美国佬滚出古巴去”的标语。

如果当时古巴人号召夺取政权并作出人民群众民主参预管理的榜样，那未来是会在北美和拉美产生大大加速革命的效果的。

苏古协定，对拉丁美洲革命的一次打击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访问表明了赫鲁晓夫无可奈何的立场。对此，我们毫不夸大其词。赫鲁晓夫在反对中国人的斗争中需要卡斯特罗。但是，如果认为卡斯特罗去苏联就会同意变节，那就大错特错了。卡斯特罗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试图保持一定的中立来维护自己。例如，尽管他同意和平共处的政策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并未赞扬苏联的立场。赫鲁晓夫也作了最大的让步，同意每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走自己的道路——和平的道路或革命的道路。整个说来，不能说卡斯特罗投降了，因为双方都作了让步。

就苏古文件没有号召夺取政权这一点说来，拉丁美洲受到一次最大的打击。如果当时发出这样的号召，美国佬可能会叫嚷抛弃十月妥协。但是，难道他们在准备再次入侵时，就不想抛弃这种妥协吗？他们肯定要明目张胆地和卑鄙无耻地抛弃妥协，以鼓励整个大陆的反革命活动。他们不准备，也不愿意按协议办事。阶级斗争不是什么骑士盟约。只有依据力量对比，而不是依据协定的字句，协定才有价值。如果力量对比的发展有利于革命，从历史观点来看，是可以抛弃协定，以便向前迈进。在这方面，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签字是有害的。赫鲁晓夫曾经于卡斯特罗，并非为了卡斯特罗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拥有巨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应该为革命的目的服务。首先从古巴开始，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那样，在全国举行公开讨论和群众示威游行。应该举行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大会。我们请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遵循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榜样，了解一下直到列宁逝世为止工人国家所签署的，并为群众讨论过的最伟大的历史文件。

苏联人的决定得到全体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否则，这些决定就经受不起四年来这样牺牲的考验。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应当采取同样的做法。赫鲁晓夫需要仅占世界经济0.01%的古巴，这说明政治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瓶子满了的时候，一滴水不会使瓶里的水溢出，重要的是瓶子已经满了。

赫鲁晓夫需要卡斯特罗。在卡斯特罗逗留的一个月中，赫鲁晓夫想拉拢他，但是没有成功。菲德尔·卡斯特罗拒绝交涉。在这一期间，他发表的讲话中，从未提到中苏冲突。他不要任何妥协。在这些方面，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古巴群众。赫鲁晓夫本人不得不在文件中提到美国佬，如果古巴受到侵犯，将导致斗争；他还重申了自己对内的立场，并且被迫避免直接涉及撤出火箭的事。

文件没有提到撤出导弹的正确性，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会在赞同这种态度的文件上签字。如果签字，他就不可能回古巴。这一切表明，在古巴，革命跃进的条件已经成熟。

赫鲁晓夫不得不依靠卡斯特罗，以便在反对中国人的斗争中武装自己。他正在准备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但是并不一定在7月5日采取这种行动。同时，这一切也表明，中苏会谈涉及那些方面。即使在会谈过程中，不会具体化，但却为今后的跃进准备条
件。我們確信，赫魯曉夫把卡斯特羅召到蘇聯去，以便獲得一個反
對中國人的據點。這個目的并未達到。但是，菲德爾·卡斯特羅
卻為編寫違反拉丁美洲革命利益的文件提供了基礎，即使他并
是有意識地這樣做。因為這樣的文件沒有提到拉丁美洲革命的需
要。

革命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具體的。拉丁美洲革命問題要求
作出答覆。卡斯特羅接受了這個文件，從而起了機會主義的作用。
實質上，他幫助了規模為巨大的行動，這就使他的立場更不正
確。他間接地為苏联官僚主義的目的服務，為苏联官僚主義和肯
尼迪達成的協定服務。目前，肯尼迪主要致力於阻止拉丁美洲殖
民地革命的發展，而官僚主義手中最有效的武器是能夠向拉丁美
洲提供一切東西。這個大陸是官僚集團同帝國主義進行賭博的土
牌。卡斯特羅已屈服於這一賭博。

必須批評和廢棄這種協定，因為它們在客觀上是為反革命服
务的。我們公開反對革命不可輸出的觀點。

我們主張擴大革命，但這并不意味必須要提供整箱的槍枝和
派遣許多鼓動家。然而古巴人和蘇聯人都這樣做了，他們提供了
錢、槍枝和飛機，但是，這些並不等於擴大革命；而動員群眾准
備政治斗争以便奪取政權。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可以自動輸出。
而帝國主義也是輸出反革命的；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帝國主義千
方百計地輸出反革命，雖然肯尼迪對赫魯曉夫說，他不容許侵犯古
巴，但是沒有人會相信，甚至赫魯曉夫也不相信。赫魯曉夫的的確
確不斷提醒帝國主義，說蘇聯擁有一个完善的原子軍火庫。如果
赫魯曉夫確信肯尼迪會遵守諾言，他又何必這樣說呢？假使帝國
主義要這樣行事，赫魯曉夫就不會被迫發表和他政策背道而馳的
声明。
菲德尔·卡斯特罗苏联之行的最后结论，一方面是拉丁美洲革命发展受了打击，另一方面，古巴群众不会长期同意菲德尔·卡斯特罗递送他自己的签署的文件。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发表的时候就是这样。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签署以后不久，卡斯特罗在妇女大会上的讲话又超过这个宣言。现在，卡斯特罗在莫斯科签署的文件，同妇女大会发表的演说比较，往后退了一步。

在妇女大会上，他说：“和平共处世界某些地区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在拉丁美洲，应当夺取政权。在这里，应该夺取政权，向前迈进。”

“我们的经验要求我们应当夺取政权。”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上体现的矛盾也表明他在政治上缺乏信心，在群众中缺乏真正的支持。假使他在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组织动员群众，那么他在旅行过程中，就可以像一个自觉的领导人一样，依靠群众的组织动员来参加政治革命的发展。他就可以影响中国人，迫使他们走得更远。这就是说，卡斯特罗如果依靠群众并从经验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那么，他目前所起的微小作用就可以大十倍，大一百倍。尽管斯大林主义者的投资式的威胁，托洛茨基主义者仍能在古巴活动，办报，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古巴工人国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矛盾。

我们再重复一次，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莫斯科签署的文件对拉丁美洲的革命是一次真正的打击。尽管如此，拉丁美洲的群众，其中包括古巴群众，是不会同意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超越这个文件。

世界群众要求托洛茨基

召开各种会议和群众集会来讨论这些文件，这在世界不断革命过程中，对古巴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革命条件和革命成熟的程度，对革命起十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讨论也对中国人和所有工人国家产生了影响。但是在于普群众不能参与其事的情况下，这种如此丰富生动的革命进程所表现的力量将受到很大的阻碍。

因此，我们认为，在7月5日的会议上，政治革命成熟的整个过程不能得到体现，但是将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托洛茨基的名字和托洛茨基主义在下阶段不再仅仅是被引用来谈论冒险主义和左倾主义，而且是用来制订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我们反对苏联方面以它自己的名义提出要求的任何企图。托洛茨基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发展不可分割，因此世界群众不顾中国人、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要求托洛茨基，他们将很快以托洛茨基的方式思考问题。古巴的托洛茨基党的同志们告诉我们要他们如果得到合法的地位，他们目前就可以出售六万到十万份日报。这并不夸大。这也并不等于说，托洛茨基党拥有十万党员，但是这意味着现在存在一种愿意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何思想、言行的潮流。中国人无视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把托洛茨基说成“左倾冒险主义者”，因为他们采用官僚主义和行政的方式来进行斗争。如果他们不是这样来谈论托洛茨基，……(以下一句排字有遗漏和错误无法译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取消他们的一部分官僚机构，让遵循苏联革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当前的殖民地革命等历史范例的新的革命潮流和倾向得以体现出来。

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这一争论和这一斗争虽默不言。在拉丁美洲，乌拉圭的《人民报》、智利的《世纪报》、阿根廷的《我们的信》和巴西的《新方针》周刊只提到苏联官僚主义和中国人之间的某些冲突。它们只阐述了这一争论的若干方面，并未涉及问题的本质，因
为成問題的，是在下一階段消灭資本主义惡余的策略、纲領和政策。所有这些爭論的实质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发展的客观必要性和集中领导的必要性。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利益应该相互协调，并且应该在借鑑准备和领导革命进程的各国党取得了准备这一和谐发展的经验之后，找到它们的代表和领导。目前的争論仍然是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杂乱无章地进行的。

然而，世界不断革命发展的需要經常推动这种爭論，并使之继续下去。

面对这一进程，帝国主义表现出惊慌胆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結論，谈到两个根本的方面。因此，它们并不认为，在中苏争論中，赫鲁曉夫要把自己更加装扮成一个和平主义者，而是认为，为了站得住脚，他应该装得更左。美国人在谈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通諭时說，肯尼迪将不会追随这一讲话，而是追随帝国主义的利益。

我們并不准备以观察员的身分参预这一进程，而是准备通过我們的文件与活动干預共产党的危机。我們并不从表面上参加世界阶级斗争。我們的参加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从我們的文件中取經。我們重复一次，當我們研究他們五个月以前的文件和今天的文件时，看到这些文件里沒有任何的中国群众内部的政治生活可以使人设想他們的結論是基于对世界經驗的分析的。在1960年的妇女大会上，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妥协的、改良的文件，但是他們不得不在这个文件中部分地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今后七、八个月内，如果沒有原子战争，那么1960年的声明将会同斯大林像一样被扔入垃圾箱中。

1963年9月
六. 法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第一次代表大会呼吁书

致托派积极分子、共产党人积极分子、社会
党人积极分子、工人、农民、学生和职员

同志们：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党（托派）第一次代表大会欢呼4月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的第四国际代表大会的成就，完全同意第四国际代表大会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全部决议，全力支持第四国际代表大会临时选出的其任期为到1963年第四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的国际书记处和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四国际前届领导机构的成分委员（密歇尔·巴布洛，列维
奥·麦丹，皮埃尔·弗朗克，厄内斯特·杰尔曼和乔治等），由于根
本丧失了对当前时代革命可能性的信心，放棄了建立新的国际领
导。建立第四国际各国布尔什维克支部和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党的
前景。他們放棄了第四国际自从列昂·托洛茨基建立以来历届代
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路线。他們谴责苏联恢复核试验，
从而否认了工人国家进行军事准备以便自卫并在原子战争中消灭
帝国主义的权利，而帝国主义却在准备原子战争，并以此作为从历
史上拯救自己的最高手段。在当前时代原子战争不可避免的这个
根本问题上，他們完全站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把战争
說成是“浩劫”，說成是人类的末日，說成是整个世界生产力和人力的破坏，从而接受帝国主义为维护其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战争讹诈。站在这种立场上，就必然会采纳和平共处的论调，而和平共处却是一种历史性的骗局。

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这一部分投降主义分子，从思想上、組織上滑到了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立场上去，給我們的运动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危机。但是，世界其它地区的托洛茨基革命派的存在和发展，进行殖民地革命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革命派的存在和发展，通过其全部决定和决议都是遵循着国际的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和纲领的第四国际特别代表会议的召开，已经使这种危机获得解决。

继承了托洛茨基主义为争取在世界各国建立工人政权而斗争的全部传统的国际布尔什维克派，继续在过渡纲领原来规定的国际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领导的任务。

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投降主义政策

在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企图通过放弃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主义政治和組織原則的办法，使法国支部投降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一派已放弃了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的建設的組織原則。多年来，他們在政治和組織方面，一直是停留在最严重的消极态度上，这使他們走向完全的瓦解。在組織方面，这个集团不能同无产阶级和群众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成一片，因为，他們在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上投降了。在开展夺取工人政权的斗争中，他們不能使托洛茨基先锋队发生作用，因为他们放弃了这一斗争。这个集团采用在一些政治上不成形的組織内部进行没有目标的小活动，来代替以
阶级纲领为基础的革命斗争，从而使自己在法国争取工人政党的斗争中只起辅助作用，而不是起革命先锋队的政党作用。

同他们的经验主义行动相适应，这个集团使用的经验主义，经济主义和混淆的分析方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分析方法。这个集团，一直在充当着事变的尾巴，在解释事变和采取行动上屡屡无能，只能充当既成事实的报界评论员。

这个集团和他们的机关报《国际》(前《劳动者的真理》)，已经不再属于第四国际，而是成了一种朝着法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及其和平共处政策和“革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机会主义出版物。这个集团所起的作用，是对共产党官僚主义领导和拥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工会组织和学生组织施加压力的作用。这种适应法国共产党的赫鲁晓夫改良主义路线的政策，使得这个集团(因为他们采取做共产党顾问的中间主义立场)在官僚领导发生危机时，成为取代共产党未来的领导的一部分人。这个集团不是别的，他们是让他们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影响和争取过去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他们的分析反映了他们在第四国际的原则、纲领和组织上的投降。

革命的世界形势

在我们的时代，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这些条件自史以来都没有今天这样具备——来看，建立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机构的道路已经打开了。

全世界殖民地群众都在以惊人的力量和进攻，投入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者、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斗争。这个殖民地革命的力量和能动性是如此巨大，每一个新生的独立
国家都跨入了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的过程，证明了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古巴群众的斗争使一个工人国家得以在同美国海岸相隔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建立起来。工人国家在经济、科学、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发展都对被压迫人民的巨大鼓舞。

在这些国家里的政治革命的发展，对于加速帝国主义危机的到来，和促进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重大意义。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欧洲和美国，尽管经济情况繁荣得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在他们所举行的往往是规模很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他们的战斗性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意志。

在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在进行着公开的冲突。在比利时，1960年和1961年的罢工深深地震撼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在意大利，菲亚特工厂的工人举行了十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在西班牙，在葡萄牙，无产阶级今年四月和五月掀起的罢工运动打开了这两个国家法西斯制度崩溃的序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和胜利，正在起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潮流的领导中心、组织中心和统一中心的作用。

法国无产阶级的巨大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胜利，在最为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同时，还打开了加速法国资本主义危机的阶段。尽管法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奉行了阴险的政策，尽管他们费尽心机不让法国无产阶级的合理要求运动和政治
斗争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发生联系，但是绝大多数法国工人阶级、贫苦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还是没有停止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又时常是自然而然地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彼此互相联系着。

尽管在有一段经济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施加了种种压力，工人阶级还是坚守地站立了阶级立场。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不许法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花费落到他们肩上的斗争，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争取新的增加工资的斗争，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资产阶级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1962年2月13日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戴高乐政府警察的大示威，对资产阶级政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这次示威迫使法国政府在埃维昂谈判中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作了更多的它事先并不打算作出的让步。

法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在站稳阶级立场的同时，对于当前存在的传统的工人组织领导失去了信任，他们开始认识到这些组织所起的改良主义作用。参加合理要求运动的人数十分众多，不必等待工会的事先布置，他们就自动爆发，像阿维尼昂铁路工人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运动的绝大多数都超出了领导所规定的目。但是，在显示这种斗争性的同时，参加工人中央所组织的集会和代表大会的工人却非常有限，勉强强有罢工人数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对传统的组织领导信任的危机，证明了在法国发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有着十分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现象：广大群众一方面参加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又对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采取保留态度，可以举这样一件事来说明：工人阶级找不到表达意志、提出批评和采取行动的途径，因此用消极的办法来表示他们不再信任传统的组织。

在工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对抗。支持着这种对抗的是世界
革命力量的发展，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这就是以在法国建立工人阶级为斗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基础。在法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的存在的真正可能性由这样的事实表达出来：一切愿意以革命面貌出现并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对抗力量，必须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特点，因为，凡是要坚持到底的反对共产党的对抗力量都必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在法国的潜力，证明人们渴望一条革命路线。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政策和革命纲领是互相符合的。《托洛茨基》一书在被人贪婪的阅读，有人在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在研究历史的真理，这是另一种要求重新在法国建立群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潮流的反映，也是现在存在的可能性的标志。为数众多、日益强大的派系在试图对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进行反抗，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不实行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这是在一切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内部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的基础。

缺少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党

好几个实际上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支派的所谓“托洛茨基”派和尚统一社会党派的存在反映了这两个党的持续的危机。但这些所谓“托洛茨基”派不能严重地影响两党这件事，表明了基层对领导路线不明确的队伍具有正当的猜疑。这些集团在根本政治路线上的彼之间毫无区别。他们放弃了对于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从而去推翻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工作。他们所不相同的是在这一点或那一点策略上采取一种比共产党趋“左”一些的立场。

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派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同在政治路线十分浓厚的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所有这些派别都对法国本国的群众和群众的革命潜力失去了信心，他们说是工人阶级“睡着了”，他们在等待工人阶级“醒来”。这种对客观现实失去信心，对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发展失去信心，使得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甚至从客观上去为帝国主义效劳，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朗贝尔集团就采取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政策。当时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想尽种种办法来寻求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并且反对作为反帝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组织者的民族解放阵线。它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法国资产阶级挖掘第三种力量并寻找阿尔及利亚革命代表以外的其它谈判对象。朗贝尔集团，“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工人道路”等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和工团主义反动性表现了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的群众运动。

这些集团在法国之所以层出不穷，说明了第四国际前欧洲领导机构部分成员在建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中遭到的失败。当时如果能够把这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倾向建立起来，第一个后果必然是使这些集团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这些集团当中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当做在法国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的基础。

我们要建设革命共产党

一方面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给法国资本主义带来的打击，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社会党所采取的明显的改良主义路线，因而为一个组织起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提供了一切有利的条件。尽管这个潮流在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但是由于他对殖民地革命的正确理解，由于它采取的打倒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
阶级的革命行动，因而，这个潮流正在发展着。不曾有任何一个党
派在这种基础上建设起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终止就是它们失败
的总结。然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条件却是存在着的。
一切组织里的革命分子都正在从各个领导和每个派别在阶级政策
上的失利吸取教训。这种自觉的运动就是在法国建立马克思主义
革命派的基础。通过把群众运动（它根据经验是站在具有革命内
容的立场上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传统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
政策），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中的有批判能力的革命分子结
合起来，才能使现有的潜力发挥出来，以便在法国革命共产党内建
立和组织起革命的领导机构。

我们建立我们的党并不是为了那些适应环境，借口群众运动
没有依照他们事先拟好的计划实现，因而历史上已经投降的这一
个或那一个派别进行竞争。

我们的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继承着在法国和全世界为托洛
茨基主义而斗争、为“国际”而斗争、为建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
什维克党而斗争的全部传统和全部经验。我们的党要为实行对法
国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革命纲领，为建设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党而继续斗争。

最近以来，国有企业职员的合理要求运动和被资本主义为
了自己的发展征收了全部土地但却又不为他们作妥善安排的农民
的斗争，表现了被剥削群众的最大战斗力和他们拒绝充当资本主义
法国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和受骗者的意志。革命共产党的任务是
竭尽全力使群众认识，在斗争中必须把他们的合理要求的斗争同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联系起来；这种斗争还同时牵涉到法国的政权
问题。法国的群众运动必须同阿尔及利亚革命联系起来，阿尔及
利亚革命朝着建立工人国家的方向发展这件事将会从法国无产阶
级推翻法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得到支持。这种反对共同敌人——
资产阶级——的统一行动将使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

革命共产党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认识到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
意志在短期内同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反对资本主义
性质的行动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革命共产党呼吁：有觉悟的革
命先锋队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便在法国革
命共产党(托派)内建立革命的领导机构。

革命共产党（托派）呼吁：在一切官僚主义化和改良主义化的
组织内部，在共产党、社会党、法国总工会、工会力量总工会、法国
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内部，在一项阶级纲领和一
条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派！

革命共产党（托派）呼吁：各种所谓“托洛茨基”派里的全体
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干部投入到真正的群众斗争中
去，参加到革命共产党（托派）中来，以便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
和组织规章建设党！

革命共产党（托派）呼吁：为了在原子战争爆发前或是在原子
战争进行中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
了建立工人政权，为了在反对资本主义力量而斗争的革命纲领的
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为了人类共产主义的未来，一切力量行动起
来！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党（托派）
第一次代表大会

1962年7月
七、社会主义的世界前景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在1961年年会上通过并在以后经过修正的
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1.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1. 资本主义早已结束了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贡献。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它已经不得不进入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自己中间瓜分了世界之后，彼此以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发生激烈的冲突。同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遇到了本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它们的统治的不断的挑战。由于这些情况，资产阶级社会就不能确保它的前一世纪的开明的理论家为它规划出来的那些稳定的和平发展的条件。相反地，它甚至在比较和平的时期也不断表现出一种堕落和使用暴力的趋势。尽管有代表人类精神伟大成果的不断增加着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但帝国主义却证明不能一直把这些进步用在建设的目的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给生产带来障碍，延缓和滥用人类知识方面的成就。在危机和战争的情况下，对于将来的怀疑和彷徨已代替了资产阶级全盛时期所特有的对于发展的坚定自信。

2. 当科学进步和资本主义赢利的需要结合起来时，科学进步就成了越来越多的积累资本和集中经济力量的手段，也是建立巨
大破坏潜力以保护和扩张这种资本和经济力量的手段。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历史上新时代的开始也是表现在：金融资本和垄断势力的日益强大，通过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国家机器这个媒介使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同一化，以及军事订货对于工业越来越重要。虽然在特殊时期内或在特殊国家里，这种发展可能有助于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的某些固有问题，并因此而给工人运动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一个根据，但它的最终结果是：加深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并使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增加对人类的危害。

3. 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以后帝国主义在东欧及中国的失败严格地限制了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资本继续输出，并且和过去一样迫切，因为资本主义不断需要有新的出路以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受到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威胁，亟需要和领导这些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取得谅解以便继续输出资本，或者是在取得这样一种谅解看来不可能时，就改用武力来保持这些殖民地。资本主义今天使用的手段，不论是在先进国家里的“福利国家”政策或者是“殖民地独立”政策，从表面上看都比过去温和了。事实上，这些所谓“新资本主义”的政策同战前所采取的法西斯主义和强硬手段完全具有同样的目的，并且出于同样的需要。采取制造法西斯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的下层分子身上孤注一掷的做法是一件资产阶级宁愿避免的危险的事情。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要通过议会、官僚机构、政党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来展开活动。同样，在殖民地，帝国主义者，拼命斗争以保持除用武力外就不能保持的地位，但是世界力量的对比使采取镇压手段对殖民地进行政治控制，成为资产阶级有见识的代理人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力求避免的一条路线。这种手段上的改变并不表明资本主义本身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永久
不变的，或者各国的资产阶级在必要时候不会再度依靠法西斯主义或在国际间使用武力以保持或恢复它们受到威胁的地位。

4. 帝国主义对于人类的不断威胁在二十世纪中叶更为惊人，因为现在的一次单独战争就有可能毁灭全人类。

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垄断资本家发动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的暴力和无理性的问题，不是一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遭到毁灭的问题，也不是使战争参加者精疲力尽而不使他们遭到毁灭的总体战问题。当前的形势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互相彻底毁灭的世界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完全破坏人类生活或者把它推回到几千年以前的状况中去。这里只有一点和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能卷入这样一种彻底毁灭的战争而不肯放棄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

5. 使资本主义残存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那些条件不断地在社会各級和各个方面造成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危机，而核毁灭的威胁只会加剧这些危机。

例如，在经济方面，许多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又一次地面对着必须为“剩余”资产寻找出路的问题。即使为核战争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吸收了巨大的资源，仍不能永远解决这一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输出的恢复和不断增加就是在寻求一条出路。但这一出路日趋狭窄，因此只能促成整个局势的爆发。资本主义不能有计划地和合理地使用投资力量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市场的条件不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这些资源就不会发挥经济生产能力。因此，生产这些资源的生产机构就要通过各种忽高忽低的情况，随着利润率来调整它的生产能力。但是，资本主义现在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它不能不遇到一些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虽然一般都比较贫穷，但有极为可贵的有利条件，能制定平衡发展的计划，
从而能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生产关系的不同说明了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别，因此使资本主义在两个互相不相容的体系的世界性对抗中处于越来越为不利的地位。诚然，苏、中集团国家的发展速度和一般经济效率，由于官僚统治者的掠夺和手段拙劣；以及由于这些国家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而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的较快的发展速度证明它们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得到了利益。

6. 甚至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尽管有高额的军费开支，也不能突破几乎长期存在的经济停滞状态。经济衰退现象先后接踵而至，并且在每一次恢复之后，固定的失业和停止生产的程度都要增加。虽然某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由于一些有利因素的结合，能够达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避免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它们的繁荣也只是朝不保夕的。它要依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行情的不断上涨，而这种上涨的速度现在已不如从前。在这个市场上暂时会看到激烈的竞争，市场不能无限度地扩大。任何一部分发生的震动和危机都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代的前景不是稳步的继续发展而是困难越来越大：不断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那些最没有准备的部分一定会受到重大压力。1960年12月和1961年1月的比利时事件，就是可能遇到的这一类问题以及统治阶级用来对付这些问题的方法的预演。资本家阶级和它的政府不能不随着国内形势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问题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这将会以不发生公开冲突的方式，以驯服工人阶级组织的方式来完成。在其他情况下就不能不瓦解这些组织或破坏它们的战斗力。资产阶级巧妙地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它的手段。它可能慢慢瓦解这些组织，争取它们的
领导人，或者用公开的斗争来消灭这些组织。旧派的工人领导本身对于这种策略提供了帮助。例如在法国，戴高乐政权不必破坏工人组织，不必进行公开斗争，就能减少大部分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百分之十五。随着经济问题的日益尖锐，到处都将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击败工人。

7. 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了几十年甚至统治了几百年的落后国家里，也有特殊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它在殖民地比在别处滋生着更多的贪污腐败。由于“反对殖民地化”而取得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沉醉在利己主义和打小算盘的腐败环境中。它们不想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它们大多满足于在政治上独立的和经济上不能自养的国家里享受官职俸位。这些国家今天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继续剥削提供了必要的体制。这些民族领袖至多也不过是想要分一些用日益有计划的剥削从所属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掠夺来的赃物，或者想把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利润用在“开发”计划上，以为民族资本更全面的发展打下基础而已。诚然，世界上没有一个集团给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进行活动的余地，使比较有手腕的人可以从中取得一些利益，并从双方面得到援助。但是，重要的是，这些落后国家的新兴统治阶级并没有和帝国主义断绝联系，尽管它们对此提出相互的抗议。另一方面，它们在国内不能不面对着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壮大了队伍和提高了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日益强大的压力。这里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的基础本身第一次受到威胁的新的斗争迹象，而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这一事实，这种局面就更具有爆炸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土地改革并和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决裂或者保证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广大群众被投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
的社会结构在解体；贫穷和绝望在增长。这种情况是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活动不可分割的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它将加剧帝国主义带来最后灭亡的阶级斗争。

8. 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战略就是建立在这种革命危机和这种危机在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之上。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响应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说法，认为并且希望，世界根本危机的各个征象可以个别处理和分开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联系的，因为帝国主义本身已经在这中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帝国主义由于本身隐藏着的矛盾会最后使这个制度停止发展和灭亡。这种自动灭亡的想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想法。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使人确信列宁和托洛茨基常常重复的教训，即没有资产阶级应付不了的局面。资产阶级依靠法西斯主义，在遭到两次大战期间的革命和经济不景气的挑战之后生存下来。它又依靠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这些领导保证工人阶级不会夺取政权——合谋，并利用这喘息时间来研究新的统治手段和加强经济力量，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生存下来。只要本身作为一个阶级和拥有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党和领导的工人没有及时准备好进行积极的干涉，即使是最险恶的局面也能为资产阶级所克服。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并不反映它具有内在的力量，或者证明它的存在是正当的；这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遭到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而这种失败的历史责任是要由国际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来承担的。
2. 領導的危機

1. 人類前途的唯一希望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勝利。我們必須建立起一個能使世界工人階級認識到它的偉大歷史使命的無產階級領導。這樣一種認識不能自然地產生，它產生在斗争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在出現時，理論上已經成熟，已經受了考驗並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資本主義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一直到目前過分成熟的階段，基本上是由于領導的危機阻礙了工人階級運動的結果。傳統領導的背叛為資產階級取得暫時穩定和相對發展的時期準備了必要的基礎。解決領導危機這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責任。

2. 傳統的社會民主党和斯大林主義派的政治領袖們繼續支配着工人階級運動。他們建立起强有力的官僚機構以訓練和控制工人階級，把社會主義的壯志和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變成為進行欺騙的掩護，借此遮蓋他們放棄工人階級取得政權這一目標的行為。他們成為工人階級走向政治獨立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而沒有這種政治獨立是不能击败資產階級的。為了建立革命的黨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每一個機會主義傾向，特別是對社會民主党和斯大林主義，展開不斷的和堅決的進攻。

3. 社會民主黨是根據這樣的假設行事的，即資本主義正在變成一種比較近人情的制度，對於福利和利潤抱有同樣的關心。社會民主黨人的行動由於對資產階級國家和組織的忠誠，而受到嚴格限制。他們在這些國家和組織中接受職務，特別是在危機和戰爭時期，甚至長時期擔任政府職務。他們對以推翻資產階級國
家为目的的任何运动都抱敌视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是先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中享有特权的少数。因为是这样的基础并且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所渗入，所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自 1945 年以来在过去的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证明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担任着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在西欧，它们在战争刚一结束的年代里挽救了资本主义。以后它们曾经开展从党的纲领中取消一切明确的社会主义要求的运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地作为一个积极改良类型的拥护资本主义的政党而出现。

社会民主党答应给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包括军事联盟和氢弹内——以充分的支持，而它的国内政策则是这种态度的补充。

4. 社会民主党在先进国家里的势力（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它从来没有占过重要地位）的物质基础已经逐渐为近年来的世界发展所破坏。社会民主党由于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投降和公开地投靠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帝国主义阵线而在工人阶级中间失去了威信。但是，更根本的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削弱。殖民帝国的旧的剥削方式，以及依靠这些殖民地作为市场的进行扩大投资的旧的方式，已引起越来越大的矛盾。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仍能得到工人阶级中多数的拥护，但是它们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僚主义的空架子，它们的右翼领导遭到了中派和左派的挑战并由于内部危机而陷于分裂。在法国，“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大部分已经离开了社会党。在意大利，在南尼领导下的中派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英国，左翼青年劳动运动的发展和巨大经济斗争的开始正在使机会主义者的统治越来越困难。
5. 斯大林主义在战后年代里的作用，在客观上和社会民主党
的作用是相同的。在一些国家里，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
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党，并且在其他国家，如英国和
荷兰，曾经吸引革命战士离开社会民主党。认为和战时的资本主义
盟友进行妥协最能保持苏维埃官僚机构的权力的斯大林主义观点
形成了这些党的战后方针，尽管这些党有时也采取一种轻率的极
端左倾的路线。自1944年以来，在一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法国和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全力阻止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
资产阶级政权实际上陷于瓦解的机会。有武装的游击队作为后盾
的工人阶级的群众力量，由于共产党领导正式反对任何与资产阶
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抗的行动而归于破灭。解除游击队的
武装，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以及号召尽最大努力进行生
产，这一切使工人阶级的攻势受到挫折，为一系列的背叛开辟了道
路，其结果是大儒主义的蔓延和共产党本身的削弱。

6. 在中国和南斯拉夫，国际斯大林主义所建立起来的防止革
命发展的堡垒，由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强大力量，由于不存在任何资
产阶级的替身，以及反政府的腐败和垮台，而被粉碎了。在这里，
国际帝国主义阵地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缺口。在东欧，苏联官僚机
构一般都表明自己准备同1944年到1945年的旧统治阶级和政党
合作，甚至同曾经和纳粹占领者沆瀣一气的妥协分子合作。但是，
由于这些统治阶级和政党名声太坏，十分明显地是西方帝国主义
的工具，因而这种结合难于支持下去。结果就采取官僚主义方
法或少或多地赶紧废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以作为建立
一条反对帝国主义防线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帝国主义的反苏目的在
1945到1947年期间已经更加明显了。

某些政治派别，特别是修正主义的巴布洛集团，或明或暗地辩论
解說，这些形势和托洛茨基的关于世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的分析相矛盾。它們进一步推断说，在先进国家建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作必須无限制延期，以等待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先进国家里。

中国、印度支那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并不与托洛茨基对于作为苏联官僚机构的理論和纲領的世界斯大林主义的分析相矛盾。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比起国际组织上的严格控制，所以能采取把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的比较独立的政策。但是，在为政权而斗争的每一个步骤上，这些党的领导都要同苏联官僚机构发生冲突，因为这个官僚机构为了“和平共处”的利益，希望限制或消灭这些运动，或者使之服从于这个官僚机构本身的目的。

另一方面，北京和贝尔格莱德的官僚机构，由于它们的經驗主义观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改良主义的想法，完全不能确立一种帮助欧洲工人为取得政权而斗争的纲領或者組織。这些官僚机构始终是以它们自己当前民族利益为目标的中间派，不能了解世界大势的范围和方向。最近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就是这些领导人破产的一个有力证明。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没有西欧或者美国工人阶级的帮助是不能彻底成功的。所以在西方夺取政权是合理而协调地统一和发展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7. 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苏联的改革和196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苏联官僚机构对于世界革命的态度。事实上，雅尔达—波茨坦①政策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基本

① 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关于1945年以后在欧洲解决问题的战时协定，其中包括波兰西欧革命斗争。

275
上是一脉相承的。目的仍是限制和引导每一个群众运动高潮以便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妥协。即使“支持”起义，那也只是为了在谈判中取得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

前一个时期，同资本主义妥协的政策产生自苏联内部的软弱和争取时间的必要。今天，倒是苏联本身所控制的巨大力量，使苏联官僚机构感到恐慌。俄国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潜力对世界资本主义永远是一个威胁，因此迫使帝国主义采取军事联盟和氢弹作为后盾的怀疑和反对态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追求的都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取得关于世界均势不会打乱而使自己陷入深渊的保证，借以巩固其在国内外的地位；因而不可能有扩大革命的任何意图。

8. 为了应对国内人民和为了防止全世界共产党的批评，不能不为这种立场提出理论根据。这种根据的最新形式是对于“数条主义”的攻击；这一运动基本上是修正了列宁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结束只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而组织在革命政党里的无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干涉。代替这种看法所提出来的概念是：这是一个在苏联“巩固”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计划经济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而随着这一问题的明朗化，就会出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实。同时，否定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行动，或者使之服从于建立一个广泛联盟的工作。这个联盟包括“爱好和平”的资本家在内，并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恢复一种帝国主义前期的和平资本主义！因此，真正的目的是成立1944年到1947年类型的一系列新的联合政府，以几个阶级为基础，能够同苏联谈判有效的和平与裁军的措施。必要时候，一切事情都服从于这个目的。罢工运动遭到压
制，反对帝国主义军事联盟的独立运动（如在日本）被谴责为冒险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被搁置在一边，旧的沙文主义的口号被提到最前面来。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共产党成立时为之斗争的一切完全被颠倒过来了。无怪乎共产国际的早期历史和宣言被神秘化了，并且有效地加以隐瞒，不让党员知道。

9. 社会民主党养肥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也养肥了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不断与社会民主党以支持是因为社会民主党能够采取反共路线，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史给这种反共路线提供了必要的根据。另一方面，共产党不仅从十月革命的吸引力得到了好处，而且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明显的堕落上得到了好处。当然，问题不是像某些天真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分裂，只要领导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和澄清自己来实现一个“人民阵线”，一切就都可以没有问题。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都必须清除掉并取而代之。但是这两派对于威胁着要成为代替它们的吸人的目标的任何运动都要进行顽强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甚至会结成邪恶的联盟。

10. 近年来，人们对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越来越不满。这种不满是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冷嘲热讽、漠不关心和脱离组织等等。在一切国家里，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经济战线上的雇主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和青年不断发现一些“非官方”的斗争和组织方式，这种方式一再表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已具有客观基础。在这些斗争经验中和在与传统领导的决定性的冲突中应该建立起这个领导。

11. 必须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更换领导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改组第四国际，把一切坚持正宗的托洛茨基主义根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党派重新团结在一起。在这种
改组中必须反对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是反对那些具有“客观主义”倾向的修正。这种修正不恰当地强调社会主义必然客观地实现，因而降低了有意识地建立一个革命领导的绝对重要性。

3. 现阶段的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

（1）引言

1. 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和他们的思想符合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客观需要。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不仅依靠少数先进国家的工人贫民，而且也依靠与非资本主义世界有特殊关系的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新的世界人民阶层。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巨大的工业化和金融资本的集中，军事集团化以及经济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化。经济越来越依靠国家的干涉，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包括大银行和垄断企业、政治、军事和警察机关，“社会服务”事业和操纵“公共舆论”机关的行政官员、管理人员和官僚的新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忠实地为资本的国际需要服务。在落后国家里，他们在属于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已经把政权交给了这些统治阶级）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同类。联合国及其属下机构的作用是对于这种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安全作全面的检查。

2. 现代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就要依靠在先进国家、落后国家和联合国组织里的这些中间集团。苏联官僚机构的作用是要在客观上帮助这些新兴的中间阶层及其政治代理人为帝国主义带来暂时的稳定。苏联经济的稳步发展对于帝国主义是一个直接
的威胁，但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试图用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操纵来调和十月革命及其成果与帝国主义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官僚机构控制和指导之下的苏联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表现在与殖民地新兴中间阶层的合作上，正如苏联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危机的政治后果，是工人阶级在统治的官僚机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服从于官僚机构的需要一样。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机会主义者所要依靠的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3. 因此，在目前帝国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坚持机会主义就有了客观的阶级理由。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仅是在同一个运动中各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革命觉悟是实行变革的重要因素。依靠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认为可以迫使机会主义者及其背后的阶级力量起一种“进步作用”，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和骗人的。只有那些引导工人阶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才是真正的进步的。不对一切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建立起这样的领导。

4. 第四国际永远从帝国主义时代突出的特点的角度来探讨特定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全面需要决定着各社会集团和政党派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市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以这种国际主义的观点来看先进国家或落后国家里的发展。在这种局面中，只有工人阶级能改变当前的形势，所以我们要以国际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考虑每一个问题。各国的运动和发展特点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共同类型的变种而应该被理解为是局部现象，它的真正的重要意义要在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世界战场上决定。

5. 先进国家里的形势，尽管有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背
叛，仍然表明同1918年以后的年代有显著的不同。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曾经由于巨大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失败而失去战斗能力。尽管有胆小鬼和失败主义者表面现象以及天生的悲观主义，但是，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从来没有这样高涨过，他们并不存在失败的痛苦记忆和大批人失业的挫折而受到阻碍。而且这一时期在许多重要方面对于社会民主党救和斯大林主义是不利的。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发展和胜利时期曾经得势。斯大林主义在帝国主义胜利失败的年月里养肥了自己。但是，在最近这一时期，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它们谁都也没有得到便宜。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唤起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不时表现出的真正强大的战斗能力。

6. 每一个先进国家，按照它在帝国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正在导致阶级斗争的复活和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大好机会。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危机使它们必须进行调整，而这些调整是与旧的掠夺方式不调和的，并且给传统的工业和政治机构带来极大的紧张。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这种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很明显：在比利时是普遍的大罢工，在法国是军事独裁统治，在英国是资本家阶级准备对工会组织实行必要的进攻而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危机。资产阶级企图侵犯工人阶级1945年以来得到的利益，借以解决它的更为迫切的问题，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将看到下一次的在世界革命方面的新的飞跃。没有这种飞跃就不能打破斯大林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于群众力量的目前的统治和限制。只有在先进国家里突破这种统治和限制，才能在落后国家为工人提供政治和经济条件以及他们在一旦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之后保有无产阶级政权和
走向社会主义。同样，只有西方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复活，才能给苏联工人阶级以必要的支持，使之对官僚机构进行革命斗争。

（2）欧洲资本主义为安全和稳定而斗争

1. 西欧各大国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它们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英国是用伦敦的金镑维系着一个世界帝国的十分成熟的老大帝国主义，但是它的工业组织已经呈现出衰老和僵化现象。表现为政治形式的最有力的因素是随着法国在1870—1871年的战败而兴起的新德国，它的经济是与煤炭和钢铁大王——这个国家背后的真正力量——的需要联系着的。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最软弱的是法国，它和英国一样成熟，却远不如英国那样高度工业化。它受到人口停滞现象的压迫，而它的经济可以说是属于不劳而获的性质，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和沙皇俄国及以前的敌手——英国——结成联盟以谋求安全。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和它的中欧盟友与从——奥匈帝国——的扩张。

2. 在列强彼此之间经过四年血战之后，欧洲的形势改变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改变了。三个帝国瓦解。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获得胜利并随着战败于德军而把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引离世界资本主义轨道。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得到了大好机会；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缺少革命领导，又失掉了这些机会。德国恢复了资本主义，但它的基础却遭到了削弱；第一次取得全部政权的资产阶级所面对的是一个战斗的工人阶级。法国遭到蹂躏和
人力（这是一个最不能提供人力的国家）的损失，它的统治阶级长期处于缺乏自信的危机中，因而造成了 1940 年投降的结果。在一切欧洲国家中，英国在许多方面是唯一从 1914—1918 年的战争中得到便宜的国家；它维护住帝国主义的属地和地位，没有遭到德国的掠夺，并且实际上它的帝国还有所扩大。但是，这个胜利的代价是高的。它所付出的是它的世界地位的急剧恶化。在互相混战的年代里，工业的停滯，金价为了对抗美元而不断进行斗争就是这种恶化的标志。

3. 整个欧洲是绝对地衰落了，与美国之同时上升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地位相比较，也是如此。日本作为争取大国地位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激烈的经济竞争者的出现，表明欧洲不再是全世界的中心。尽管有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歪曲，苏联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唯一想得出来的世界制度而且警告资本主义要生存就必须进行斗争。

4.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欧洲内部的国际竞争，与美国保持既亲近又疏远的关系，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就产生了国际战争外交史的复杂典型。当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在德国导致统治阶级采取法西斯主义时，英法的统治阶级感到进退两难，究竟是把复活的帝国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呢，还是在革命的威胁面前和这个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从这个两难的处境中就产生了慕尼黑会议和维希政权，但是也带来了 1939 年 9 月 3 日的对德宣战和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新战争。

5. 1889 年到 1945 年战争的直接结果是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欧和在不发达的东方的衰落。三十年代的长期的经济衰退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弱点，因而破坏了人们对这个制度的信任，从而导致一些国家采取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又加深了资本主义
国家之間的敵對，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與戰爭到處結成不解緣，這種責任是由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來負的。在被占領國家里，大部分統治階級和納粹黨人執行广泛的經濟合作，使這些統治階級進一步失去信譽。合作主義者的政權不僅在英美軍事機器面前而且在反抗運動中的武装人民面前難于瓦解，这就產生了一種局勢，使政權暫時完全脱离資產階級，回到了“軍人集團”的最基本的形態。但是，由于共产党和它的同盟者的有意選擇，在“一個警察，一個軍隊，一個國家”①的口號之下，通過英美軍政府和傀儡政府，這個政權由它們帶來的或者從社會的廢墟上收集來的政客轉交給了資產階級。因此，西歐資本主義的恢復是蘇聯官僚機構反革命政策的結果。

6. 尽管旧的統治階級缺乏自信、怯懦和能力脆弱，但仍能因此保持或者恢復它的政權，歷史上從沒有過一個統治階級有過這樣好的運氣。

誠然，統治階級接收過來的國家遭到了戰爭的蹂躪，和世界市場的聯系已經中斷多年，并且處于一種經濟匱乏的狀態中。歐洲的衰落似乎比第一次大戰后更無可挽回。

但是，在比較短的時期內，經濟生活就恢復了戰前水平並且開始超過這個水平，這證明現代工業技術的恢復力量而不是證明資本主義關係有任何固定的生命力。資本主義確已普遍療癒。它必須靠着手工業措施和靠着手工運動幫助它恢復那些不是必須絕對由國家直接接收部分的營利能力來給它以支持。

7. 這一工作如果沒有首先是以貸款，其次是以在馬歇爾計劃下幫助的形態，從美國涌來的巨大的援助是不能完成的。美國

① 这是法共党领袖多列士在1945年用来反对德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口號。意大利的珊里里蒂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采取了同樣的形態。
资本主义靠着两次大战的助力已经上升到世界权威的地位。在两次战争期间，它的生产能力有飞跃的发展，大大地足以负担一大部
分资本主义世界。它必须这样做有很多理由。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仍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但是它也
不能坐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革命或者由于苏联的吞并而被
排除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外。那样不仅要威胁美国的世界
地位而且一定意味着西欧作为投资地区和市场的结束——就东欧
来说，这种局面是在和苏联进行困难的谈判（斯大林在这个谈判中
“放弃”了西方，包括希腊和应得的百分之五十的南斯拉夫在内）中
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的。所以西欧不论作为一个军事枢纽或者一个
经济上的同盟者对于资本主义美国都是不可缺少的。况且和
与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经济以援助对于美国的能力来说，并不是
一种过度的负担；实际上，它帮助避免了一般人预料迟早要出现的
战后经济衰退。苏联的威胁使美国不能坐视西欧资本主义被削
弱，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予以援助，即使这个代价意味着冒某种经
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危险。

8. 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是欧洲的经济恢复，鼓励和帮助各国
间的合作。随着冷战的加剧，把德国的占领区合并起来成立一个
新的联邦国家，这就为在五十年代出现的德国经济的惊人的复兴
准备下了政治条件。此外还极力恢复欧洲和世界市场的联系，因
为要想给资本主义残废的身体注入新的生命，这是必要的。某些
美国的政策制定人试图把欧洲各政府自己不会选择的政策强加给
这些政府，但这些政府一旦站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讨价还价
的本钱以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同时，欧洲的资产阶级显然
和美国的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冷战的发展，通过柏林
空运和朝鲜战争，由于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和共同战略的要求，
在欧洲产生了一些超国家的组织，其中国际作用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其目的是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和“内部颠覆”，但是与十九世纪的神圣同盟不同的是，在它支配之下的有一个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和一个横跨过欧洲一直延伸到苏联集团边境的政治和经济根据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逐步地为核战争的需要服务并且为军人阶层提供了一个坚固的阵地。这个军人阶层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十几年的战争和战争准备而变得相当强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决心用强大的武力支持西欧资本主义，在这个组织里，各个国家所分担的责任在共同战略中不可分地联系着。

9.随着欧洲军事的加强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上升。战后复兴的需要给予经济的刺激、重新建立对外贸易关系的运动、新技术的发现和美元的流入，所有这些都由于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的巨大军事开支而积极地推进着。从这一点出发，在五十年代里，一个以民间投资和消费品市场巨大发展为中心的真正资本主义繁荣把生产和贸易带向一个新的高峰。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上升带来了，同时也一部分依靠着，比战前更为密切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关系不变的同时，国家作为支配阶级的工具，完成了以前属于私人企业范围的或者任凭市场随便执行的某些任务。某些重要工业，特别是那些缺乏技术和不能获利的工业的国有化和由国家控制一部分新的投资是这种新政策（自然不是全新的，但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这些措施一起也采取一些社会措施。这些社会措施，一部分代表着群众的压力，但如果资本主义要存在也同样地不可缺少的。这种“总的情况”使很多人高谈资本主义已经改变或者已经被消灭，因此就给新的修正主义派准备了滋生的园地，这些派别根据很
少儿年的经验就认为资本主义矛盾已经不存在，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来支持和说明已经确定了的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显然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下去，不管是不是在繁荣的条件之下。

10. 这里对于繁荣的现实性没有任何怀疑。欧洲资本主义又能再一次大规模地从它所能支配的人数众多和具有高度技术的无产阶级身上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即使在德国，这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奇迹。它无论如何不表明资本主义本来就比较牢固或比较稳定。事实上这个新看到的繁荣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11. 首先，整个一系列促成这个繁荣实现的方针措施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条件的，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面对着一个使安全的根本条件成为空谈的生死攸关的挑战。美国统治阶级愿意为欧洲以非军事的和军事的援助和在欧洲大陆上驻扎军队是苏联威胁的直接结果。在早期发展上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和仍然继续对欧洲经济有影响的军事开支来自这同一个原因。法国和英国政府愿意承认德国——它们在大陆上的经济方面的主要竞争者——首先是经济上的，其次是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对手的复兴也产生自这种恐惧。一系列超国家组织虽然在建立时关于设想的“欧洲”意识形态发出了大批的口头和书面的说明，然而这种建立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斯特拉斯堡某处存在过并且仍然存在着一个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那里编织一些理想的动听的词句，但是这些很快地就在冒着浓烟的工厂烟囱……和火箭基地的后边消失不见了。也许很少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

12. 欧洲政府被一个在和平时期所曾经看到过的和被牺牲的祝福过的历史上最庞大的军事联盟束缚在一起。对于这些政府来说，空谈统一欧洲的理念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产生自资本主义基础的强大而是产生自这个基础的软弱。
十年来人为的合作并没有消灭三百年的历史。旧时代的窃取政治和经济上有利地位的态度只不过是采取了新的形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经济情况表明市场可能停止扩张或者开始收缩，资本家所关心的就是在斗争中追求本国的利益。军阀和雇佣军人的人都非常愿意看到由其他国家武装和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队伍交给别人指挥。只有在他们设想苏联对他们有侵略的威胁因而暂时抱有共同目的的时候才能实行军事合作。

13. 欧洲三个大国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企图并且要在每一个适当时机，有时如戴高乐那样鲁莽地，有时如何登纳和麦克米伦那样小心地，实现这些企图。

14. 法国 法国的情形特别有教育意义。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战争给法国阴暗的社会关系带回来一种瓦解因素，使这个国家成为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的病夫”。诚然，这里有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的巨大增加，现代生产方式的普遍推行和戴高乐上台以后的收支平衡地位的加强。这些进展虽然表面上很动人，但只能进一步造成社会的紧张，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分裂的威胁并再度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革命力量，在现场进行干涉准备条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小资产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加强在他们头上的调整感到愤怒为戴高乐开辟了道路。阿尔及利亚社会革命的挑战为法帝国主义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使整个国家机器于1958年5月濒于崩溃的地步，因此使戴高乐的上台得以实现。

15. 第五共和国是一个在危机中产生的政权，那位起着军事独裁作用（这是与他的性格相适合的也是法国的社会状况造成的）的总统不能对法国资本主义问题作根本的解决。经济上的成
功——生产上升、收支两抵后的盈余、高额的利润——是从压迫或者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得来的。这里包括着：第一，贬值币值，第二，强制实行一种第四共和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基础的警察制度。总统必须在不调和的社会力量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和甚至有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国家机器的加强和总统的起这种作用只有在工人阶级默许之下才能实现。因此，军事独裁的“成就”是1945年以来长期过程的产物。事实上，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年来来的背叛所造成的，在这些年代里，工人阶级曾经屡次证明他们有巨大的斗争能力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因为没有建立一个新的领导的自发行动和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及时地提供另外一个领导，所以才导致了1958年5月的失败和以后工人阶级的漠不关心。法兰西工人阶级仍然被掌握在旧有组织的手里，即便暂时没有流于消极冷淡，但也不能从事于真正反对那个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没有给那个政权以支持，在混乱和迷惘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仍然是那个政权所恐惧的一种潜在力量。就目前来说，戴高乐愿意让旧有的领导人替他压制这些工人，他并不想解散工会或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工人在他们现在领导人控制之下不像他们原来那样地危险，同时也因为有时候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工人反对威胁他的政权的其他势力。突出的是，1960年2月和1961年4月，当这个政权受到阿尔及利亚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反抗的将军们的威胁时，工人阶级领导人在保卫共和国的口号之下竟纠合起来支持那个政权，正如他们在1958年5月支持前政权一样。

16. 戴高乐以这种方法操纵工人阶级显然是在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他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肯解散它的组织，但是他想要把工人阶级和他的体系更有效地联结在一起以取得工人阶级
将来循规蹈矩的某种保证。到现在为止，这并没有做到多少。唯
一的办法是像现在这样玩弄花招，这必须有一种高明的手腕和甘
愿冒险的精神而这大概是他的继任人所不具有的。但是，提到继
任问题，人们会感到现在没有这样一个适当的继任者，能够具有戴
高乐的一半能力，把不可调和的社会力量统摄在一起。对于这个
政权或者对于戴高乐本人的每一个威胁都表明这个政权面临着无
底的深渊。军事独裁所取得的稳定完全是暂时性的，不会比这个
更多。至于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将来各种力量之间的更为公开和激
烈的冲突。这是每一个明敏的观察家所看得到的；这是在正常的
表面现象后边隐藏着的渗透一切的恐惧，它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中间造成恼人的疑虑和不安。

17. 七年已久的阿尔及利亚斗争在不断增加的冷淡、嘲讽和不
时发生的反对中继续下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群
众为土地、面包和管理自己国家事务而进行的不可压制的巨大斗
争，使法帝国主义难以找到一种妥协方案，也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
领袖难以接受这个方案。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种族主义者集团
的殖民主义者的存在和军队的态度——如1961年4月的事件
所表明的，他们准备取得政权——减少了谈判的余地。但是法国
资本主义于在北非和在整个非洲保持权益的同时需要结束这个战
争。资本主义的眼光敏锐的代表人物，包括戴高乐在内，知道：如
果要想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掠夺，就必须对民族主义者领袖做出某
些正式让步。那就是说，欧洲人必须让出某些特权交给一定会取
得政治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此同时，如果不能从民族主义
者得到关于欧洲人土地财产、资本投资、沙哈拉油田和军事基地的
保障也不能做出这种让步。赋与这个“独立”和这些保障以确定的
内容是一个在谈判中不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原则问
题。但是任何一方都不能随便决定它的让步范围。戴高乐必须与“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军队争论；民族主义领袖们必须与战场上
的战士和阿尔及利亚农民和工人的革命潜在力量辩论。双方都需要
要一种妥协，但是由于来自他们自己那一方面的压力，任何一方也
不能在他们愿意接受的条件下取得这种妥协。

18. 在法国这一方面，那些裂痕是公开的和可怕的。军事独裁
政权的“强大国家”里有一些分子甚至对那个统治者是否支持也很
成为问题。如1961年4月事件所表明的，高级官员和军队领袖，
在紧急时刻，要知道谁将获得胜利然后才肯委身听命。每一个人
都知道在国家机关和在军队里到处都是阴谋诡计。很长时期以
来，法西斯恐怖集团就能够安然无事地从事组织工作和取得他们
的暴行所需要的爆炸物，其规模之大只有用军警官员参加了密谋
来解释。同时，农民——由于经济力量的日益集中而受打击最甚
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的大规模的骚动也加深了社会危
机。

19. 所以这个政权并没有顺利发展的前程。所能看到的只是进
一步的深刻的动荡不安，继任人选仍然是一个公开的和不能解
决的问题。即使人们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作家也觉得不会再回到议
会制度上去。警察权的建立和军人阶级的騈横使资产阶级有可能
通过某种形式的作为最后手段的法西斯主义来实行统治。这样一
种解决办法当然须通过工人组织的服从或者完全瓦解的道路来实
现。尖锐的冲突、工人阶级抵抗的重新觉醒——自然给一个新的战
斗的领导带来了好机会，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个领导的话——似
乎是法国形势中所固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轻易就可以抱乐观主
义。革命先锋队的不够壮大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艰巨从来没
有这样不相称过。如果说乐观主义有根据，那就是法国工人阶级
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尽管由于一系列的失败而耗尽了力量，并遭到错误领导人的出卖和迷惑，但法国工人阶级仍然体现着丰富的革命传统。

20. 不管表面怎么样，法国的政权是朝不保夕的，此外戴高乐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不妥协态度也增加了这种局势的严重性。现在的法国政府一方面需要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的支持，一方面却惟恐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这种态度的背景是：第一，法国有一万五千万人被牵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以法国政府惶恐自己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受到影响。第二，法国资本主义自己不敢再开刀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会引起外来者——也就是美国的或联合国的——注意，以确保阿尔及利亚不至落入苏联势力范围或者走古巴的道路，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不防止的。所以这就不仅是戴高乐的骄傲和民族主义立场问题，但是，这样一来独立道路可能带来后果（如果遵循到底的话），必已引起某些法国资本家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恐惧。因此就在法国统治阶级队伍中造成一个新的分裂根源。如在英国所归纳出的那样，有的主张自己拥有核打击力量，有的主张躲避在美国人的庇荫（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之下。

21. 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比它的各重要组成部分更强大。至少法国这一环节是成问题的。法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的外交目的是要在英德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它的同意美国计划索取最高的代价。近年来，特别是戴高乐上台以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有所改进，和英国的关系则趋于恶化。英国由于它和美国较亲近的政治地位——从拥有较大的物质力量得来的——于是企图利用这一点来阻止欧洲国家采取威胁到它的利益的政策。因此，英国的政策是防止任何强国或强国集团在欧洲大陆取得优势以至于损害到它的商业和政治影响或者削弱它与美联邦和英联邦的
关系。欧洲政府在美国支持之下企图通过关税联盟以实现密切的经济关系，因此就引起了英国的反对，虽置这个联盟有它的吸引人的特点。甚至法国人或者至少法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也在一个时期对这个联盟表示欢迎，因为看来得到重大利益的一定是德国。这种勉强的态度终于被克服，并且因为欧洲共同市场从表面上看来将使法国工业得到重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法国政府成了这个新组织的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它这样做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正如英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不参加共同市场并在以后把共同市场六国周围的国家组成自由贸易区一样。

22. 西德 但是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活动都抱有这种意图。现在可以说主要是波恩对于伦敦和巴黎有吸引力，这证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战后欧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英国政府认为西德既是一个竞争者又是对于法国称霸欧洲的一个抵制力量，这种称霸从戴高乐对于核打击力量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看来是讨厌的。不管怎样，尽管戴高乐有称霸一时的幻想，但德国的兴起和阿登纳与共同伙的狡猾已使法国称霸欧洲成为不可能。

23. 在德国反动政府统治之下重新武装西德，把许多以前的纳粹分子安置在非军事的和军事的重要地位对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是一个特别的威胁。欧洲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有动摇的可能，共产党对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做出正确的估计而西欧资本家（对于这些资本家德国是一个反对苏联的盟友）则掩饰这种可能性。共产党反对西德军国主义的宣传其目的是唤起宣传对象的民族主义的反应，这与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直接相违反。这样的宣传一方面正式解除了“德国人民”的责任，一方面对于工人阶级未能阻止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原因也没有
做出分析。我們必須以社會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所造成的悲惨的历史经验为背景来看德国工人阶级的软弱。这种背叛为纳粹主义开辟了道路。1933年以来工人运动的遭到毁灭，战争初期纳粹主义在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之下对于欧洲的掠夺，所有这些都使人們于1944年以后难以克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

24. 在战后选举中，共产党的选票逐渐减少，直到共产党——曾经一度在西德获得坚固的根据地——唤不起群众任何同情而被迫转入地下。在五十年代里发展起来的激进的反战运动失去了动力，而联邦军的出现似乎也是为群众所接受的，即使没有受到欢迎。原因究竟何在？苏联政策对以上两种情况都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共产党从来没有得到过战前那樣的支持一部分是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教训；俄国占领军的行为，从苏德合区和东方逐出德国人、东德政权的性质、避难者的不断涌入—所有这些比斯大林主义的话更有力量，和纳粹分子的宣传比起来，把人们对于工人阶级几十年斗争的追念消灭得更为彻底。其后，在1956年，匈牙利的起义——仅仅在柏林同样事件的几年之后——帮着說服了顽固的德国人：他們的统治者談到从东方来的威胁和有必要重新武装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真正带来了恶果。

25. 但是，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恶果和社会民主党以采取一个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痕迹的新纲领作为最后结束的背叛史，德国的局面仍不是完全无望的。在战后的年代里，許多德国人有很多理由证明他们应该脱离政治去重新建立他們破碎了的生活，他們这样做不知不觉地帮助了德国资本主义的恢复。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得到强大的德国工人阶级暂时的拥护。在工厂、矿山、工地和办公室里每天都可以重新看到阶级斗争。德国工
人阶級将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和摆脱掉曾经出卖过它的领导。可是,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反对整个欧洲資本主义斗争的最初行动看来不见得来自于德國。因此, 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就特別负有责任, 首先不要为克里姆林宫或他们自己的統治阶级的宣传所影响而抱有反德情緒, 尤其重要的是尽可能在斗争中给德国工人以帮助和支持。例如, 西德在五十年代里的反战情緒的销沉虽然应由苏联负贵, 但这个伟大运动的消火, 一部分也是由于未能在英国和法国得到支持。一个支持德国重整军备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氢弹的工人运动不能给德国人民以任何教育。

26. 我們不能认为德國的資本主义已经以某种方法发现 了永久繁荣的秘诀。不错, 1957年經済衰退的打击是轻微的。但是, 德国的繁荣与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不可分这一事实就意味着非常有可能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停止扩张——国内市场不能随着工业生产的速度发展, 所以出口很重要——就预告投資和繁荣将要结束。即使没有深刻的衰退危机, 一个时期的不稳定突然变动和变化, 在德国特有的条件之下, 也一定会加强工人运动的斗争意志和有助于新领导的出现。

27. 尽管有这种长远的希望, 但如果現在和在最近的将来不充分估计到西德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和密切注意西德统治阶級的方针政策, 那仍是不现实的。在大托赖斯已經恢复了旧日经济地位的同时, 它們的政治代理人从最近几十年的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得到了教训, 已经着手将为支持资木主义而想出一些新办法。“正统” 的经济政策和資本主义基础的结合, 有计划地对于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享有特权部分采取让步的社会政策, 收买工会的大部分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 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新的, 但艾哈德和阿登納都非常坚决地予以贯彻。对于工会的怀柔——给工会以共同
合作的幻想——和由工会巨头对于会员进行教育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社会民主党承认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作上公开合作，给社会上带来了一种显然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们必须对这个力量做现实的估计，只要这种力量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本身，能维持下去，想要由一个新的领导突破这种力量是极端困难的。

28. 现代欧洲最残忍的工业大王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指导着经济的上升，所以随着这种上升带来了明显的危险。今天人们在西德公认，如果没有市场的继续扩大——实际上就是为获得剩余价值寻求道路——利润率势必降低而整个繁荣时期可能濒于危险。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在论帝国主义时所分析的那些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正确。近年来，西德正在共同市场上和在更远的地方积极寻求外部出路。西德在往来交易上是一个债权国家，马克思是行情高的货币。在此同时，可能有的出路却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或者政策以及由于苏联的“铁幕”而受到了限制。诚然，西德和东欧及苏联是通商的，但这是不够的。西德资本家，为了经济的理由，不是为了爱国的热情，感到有必要恢复他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一般在东欧的主要是农业区的内地。现在在这个地区进行着的开发本身就意味着给西德托辣斯大量生产的装备和重型机器提供出路，同样也为消费品提供出路。向东方推进的内在压力已经反映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因此，西德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的姿态就不仅是在演戏或者是在迎合舆论；虽然那些控制着贪图金钱的报纸和宣传机器的人在千方百计地制造这种舆论。冒充解放者的美国人支持着这些人，对各广播电台和各种组织提供资金并从事组织工作使它们在这个战场上带头进行攻击。

29. 这些党派今天在德国没有遇到强大的有组织的抵抗。社会
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同盟互相竞争来助长这种政策。新国防军使人们对积极政策感到兴趣，同样也为这一政策制造了新的工具。柏林局势为德国内部的扩张趋势提供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焦点，使它有办法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取得支持，借此可以煽动对俄国人的仇恨和为新的扩张主义制造必要的气氛。1945年以后在群众中所看到的厌战情绪不断地处于宣传攻势之下，这是为了使1914年以前和1939年以前一样，把群众统合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机器中。

30.无疑地，柏林危机曾经被尽量利用、夸大来达到选举前的目的，在德国准备土壤并向盟邦表明，和苏联打交道，它们唯一能够采取的就是西德的政策。没有任何方面对于制造这种危机感到厌恶，完全蔑视它所操纵的群众的利益，更不必说还有引起骚动反应把人类带入核毁灭的危险。这种紧张气氛是施特劳斯和阿登纳所特别欢迎的，因为可以减少对于他们的政策的反抗，这些政策是他们作为德国大资本家代理人所希望采取和从西方国家得到支持的。

31.大战以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显然变得更为亲密了。对于英国的统治阶级来说，在共同危险的面前，和他们的同伙作更密切地联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把对方看作为竞争者。外交上的握手，伪善的笑容和措辞慎重的讲演对于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欧洲各强国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些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此完全不同。工人不能让他们的统治者在工资谈判中或者政治运动中制造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把资本主义消灭在它的策源地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经济以真正带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利（现在对于这些利益只是作了一些口头的诺言），工人在这些事情上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英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必须把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目标
号写在它的旗帜上。

32. 英国 英国很久以来就是最保守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心，这里的局面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工人运动中的传统关系正在以法国或德国没有试验过的方式被削弱，旧领导正在遭到严重的挑战。已经出现的强有力的派系，如果有正确的领导，能够永远脱离阶级合作的路线。在单方面裁减核军备运动中集合起来的群众力量与中间派和过去的托派主义的和平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反对氢弹和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意味着代表两党的外交方针随之也就和阶级合作的路线决裂。非常有重大意义的是，新的力量加入到这些斗争中，不再为冷战旁观主义、日常工作和为政治前途着想所限制。他们帮助促成的动力导向1960年的斯卡巴罗决议，为在工党中把反对盖茨克尔领导的斗争进行到底准备了有利的形势。基层党员的重要部分、大部分青年和甚至某些工会领袖积极活动在政策的后边，其中包括着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因而也就是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表人彻底决裂。不过，斯卡巴罗年会以后，左倾的动力逐渐消失，同时盖茨克尔集团靠着高明的手腕，对于年会决议的大胆嘲弄和对于党机器的支配复能重新建立起严密的控制并为正式推翻1961年的决议做好准备。

33. 这种有利局面被推翻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不能专在工人态度冷淡上，在右派的阴谋诡计上或在客观形势的变化上寻求。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原因是工党左派所提出来的代替盖茨克尔及其同党的那些人的破产。这些人不愿意从事真正的斗争，把议会事业看得比原则还重要，对于党的统一有着盲目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托词）。他们显然对于决议的必然结论、不屈不挠的斗争和不仅是对右派同僚而且也是对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非正式原则的挑战——如果他们要把会议上的胜利变成行动就必须进行这种
挑战——感到恐惧。因此“左派”民主党人所提出来的不是担任领导，而只能是与它的性质相类似的虚无的希望、无益的公式、虚伪的斗争和最后按照他们的多年的习惯所能实现的那种顾全面子的妥协。他们驯服地接受给他们的纪律制裁，从来不号召下层党员进行有力的斗争，非常满意地在左派身上找到赎罪的替身，并且寻找一些问题以便围绕这些问题恢复党的统一。无怪乎这些敏感的人物现在心安理得地承认这是右派所击败。归根结蒂，他们只是要作反对党内部的一个反对派，领导这个反对派，接受他们的声明带来的后果，所有这些声明都远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因此，从表面看来必然是秩序的恢复。但是，如果右派在议会中已经恢复了政策制定者的地位——它从来没有失掉在议会中说明政策的地位——情况也与以前不同了。1960年和1961年表明右派是能够被击败的。它的权力日益建立在党的躯壳上而不是建立在活蹦的运动上。青年大体上仍是反对它的。战斗的工人主义者同样也反对它。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左派”的追随者感到精神沮丧，但不了解有利局面被推翻的原因，于是别寻出路以解脱困境。因此工党的危机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上演了一个序幕，对于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来说，一切大好机会都在前边。

34. 英国工党内部的斗争证明，工人阶级的国防政策与垄断资本家控制军火工业的局面是不相容的。甚至下议院公共会计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新武器的军事订货不遵守任何真正的会计原则。资本家正在从导弹和它们的构件上获得巨大的不公开的利润。没收军火工业的领地可以有绝对的号召力。但是这种没收一定会在机器、电子和化学工业方面深深伤害到英国工业最获利的部分，因此必然导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而意味着革命。

35. 使各大工会支持这样的要求意味着现在要展开一个和左
派传统的照例要求完全不同的运动。二十年的充分就业已经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组织和他们的自信心，使雇主想要降低工资和生活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这种坚定的力量和某些人把繁荣看作是永久的那种满足倾向相比更为重要得多。

36. 上次选举以前和刚刚过去那一时期曾经产生一种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此后，连保守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英国经济的根本地位已经发生进一步的相对恶化现象。尽管有十年来的前所未有的繁荣，但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指出出来的那些弱点并没有像一般所承认的那样得到克服。迟缓的投资，因之带来的迟缓的工业生产和生产率，意味着要不断落后于发展比较迅速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减少世界贸易额。英国资本主义的双重性——既是一个完全倚靠世界市场的先进工业国家又是一个国际金融资本家和主要债权人——为政策制定者制造了不能解决的矛盾。为了保证英镑的国际金融地位必须不断地采取延迟工业投资的措施，因此妨碍了竞争能力。要想制定一些政策既能使工业得到稳步而平衡的发展同时又能维持和加强汇兑储备和英镑的世界地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资本家阶级的最有利的时机看来已成为过去。

37. 即使没有经济衰退，英国资本主义所经历到的紧张情况也是可观的。为了减少紧张情况对商业的影响，英国政府和雇主必然要打击工人阶级。最近的紧急措施，特别是要求冻结工资，再一次证明他们希望牺牲工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这还只不过是一种初步尝试。随着局势的恶化，特别是如果由于经济衰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迟缓而复杂化，他们将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这就要开始一个新的阶级斗争高潮。

38. 工会官僚，如工党的议会领袖，试图把斗争限制在谈判桌
上，并公开地与雇主合作来反对工厂管理人和基层组织。但是，矿山、工地和港口以及其他地方的斗士将在外交和国防方面从左派得到支持，虽然在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这两派从表面上看来是分开的和互相对立的。例如，宣布将要在克萊德河口建立北极星核潜艇基地在工人看来一定会是失业现象严重地区的一个取得工作和较高工资的来源。但是，日益扩大的反对核备战运动在当地和在全国有同样的影响。很有可能的是，工人方面反对这种政治上战略动议的行动标志着为反对氢弹而斗争的新阶段也标志着为工作和工资而斗争的新阶段。

39. 英国工厂主想要从中部地方靠得住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工厂逃到工资较低和为工作而竞争得比较尖锐的地方去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对。这种动议表明他们的生产车辆交运费越来越困难，所以要寻找方法以降低成本。所以，这些动议都是直接从英国资本主义积弊已深的问题中产生的。

40. 英国的革命领导的任务是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使反对氢弹、殖民地暴行、资本主义的经济进攻和文化堕落的各种运动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发生关系。革命的领导要积极参加下层工人的运动并把这些运动和国际斗争与殖民地斗争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在英国开展一个群众革命运动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党。特别是工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着的和通过他们的理论和宣传工作来完成的准备工作是建立一个革命的党的基础。

41. 这样革命的党，在取得群众运动的信任之后，将提出工人阶级保持政治独立的主张。具有这种希望，革命的党将批判由于理论上的混乱、悲观主义和对于无产阶级缺乏信任而别寻出路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和中间派系。当权的阶级重视氢弹和与美国联合认为是保护它的社会存在的唯一手段，英国社会主义劳动同盟认
为。为击败这个阶级而斗争是极端重要的。这一斗争将导向于夺取政权。顺着这个方向，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将号召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人进行共同斗争来反对备战。同时，它将和一切对殖民地与属地的统治断绝关系并积极支持它们击败反动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工人阶级运动将撤回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军事独裁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阻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3）美国的资本主义

1. 自上一次经济衰退以来，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中的成就远不是惊人的。196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停滞阶段，特别是在钢铁工业和耐用品工业方面。失业现象扩大是这一年中国最后一个季度的特点，一直达到大战以来任何时期未曾有过高峰。鉴于苏联发展速度之快，美国对于自己每年的经济发展未能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就更感到严重。为美国资本主义辩护的人从高额工资和一般较高的生活水平上得到一些安慰，并认为发展速度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没有继续的发展，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将减少，资本主义制度将失去它的主要源泉，而不得不靠着国家不断注射兴奋剂的帮助来维持下去。这种帮助所采取的形式大部分是通过军备计划来开辟一条实现剩余价值的道路。在美国，即使工厂的平常改装，每年也会增加生产率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因此就减少了对于劳动力的需要，而同时劳动力却在增多。所以任何经济情况的变动都会带来严重的形势，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承认，五百万到六百万的失业大军是不可避免的。

2. 大战以来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为了资本主义，必须保全欧洲。美国的经济
方针与战略方针和为世界准备条件以使美国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的目的密切结合在一起。孤立主义不再切合实际，这种关系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支持它的是紧密配合在一起的美国基地网、准备立即采取行动的飞机和导弹，以及航行在全世界大洋上的舰队。只要把世界革命阻止住和压回去，这将是一个美国的世纪。

3. 美国与欧洲被削弱了的统治阶级的联合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保全了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则是，欧洲经济复兴——虽然是美国统治阶级非常希望的——使欧洲统治阶级相对地增加了它们在政治谈判方面的力量。欧洲资本主义的较大部分的经济独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后果。一则是，美国的私人资本比以前更多地被吸引到欧洲以利用比在美国发展得更为迅速的市场和那里有的贱价劳动力。因此在1960年，一方面国内的投资虽然减少，一方面，海外的制造业投资，特别在欧洲，反增多了。此外，虽然某些美国国外的制造业工厂在美国市场上竞争得很激烈。但是，在1960年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仍有所增加。的确，这些地区的不断繁荣和经济繁荣有助于国内市场在原料方面和在资本设备方面的衰退。美国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采取了许多新形式，它的可能有的后果与我们过去所常见的不同。重要的是，美国资本输出日益增加的趋势将造成与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不同的后果和矛盾。这大部分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和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输出。

4. 这种情况的鲜明反映是美元的削弱，这是过去两年来国际支付差额不断出现巨大赤字的结果。美元的削弱一部分反映其他货币的更有力量，特表是马克，同样也反映美国战略所承担的世界义务中包括有巨额的军费开支和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欧洲中心的较高的利率也引起了资金的转移，当美元的贬值看来可
能力——如1960年7月到9月所发生的情况——进一步给美元带来困难时，这些投机的活动就更变得疯狂。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曾经缩减一些海外开支并曾试图把对外援助的责任转嫁给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同时不能不刺激美国的输出——这就意味着和已经面对着销售减少的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商做更大的竞争。在此同时，美国的商业日益依存于造成这些销路的经济情况。因此，如果西欧将来的继续发展有助于减轻美国的衰退，欧洲的开始衰退也能以过去未曾试验过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美国经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永远固定在一个特殊的模型里是错误的。

5. 但是，如果强调美国资本主义近来的困难，认为它作为一个世界力量，眼看就要衰落，那还有很大距离。研究美元的困难必须以美国的巨大生产力和它的战略地位——这个战略地位由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在先进国家里的日益增多的资本投资而得到了加强——为背景。这些困难不像老牌帝国主义的问题那样严重地威胁着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存在；这些老牌帝国主义的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比美国更为表面化。但是，美国经济不能迅速发展或者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也在危机中。每一次经济衰退都留下一个更高的无法减免的失业记录，每一次繁荣都缩小了新的投资范围。资本主义仍然以发展的比例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但发展的速度正在降低，而在日程上的即使不是深刻的衰退也是停滞。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威信也趋向于降低，因为它不能面对苏联的挑战和合理地使用这一世纪可能有的技术。

6. 同时，美国资本主义面对着的是它所必然造成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建立起高工资标准和强有力的组织，由这些组织进行谈判以在资本主义本身规定的范围内维
持和提高这些标准。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超越无产阶级身份为自己规定的界限。它有更多可用的消费资料，但仍然是工农劳动者。它没有技术，但由于技术的进步，由于整个工业的衰落，或者在经济衰退时期，这些技术都会很快地贬值。同时，大公司把工业力量大量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也正在为社会主义准备着客观条件。

7. 美国局面的突出因素是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的软弱和马克思主义的党的不够壮大。但是，为了在全世界上击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对它在西半球的主要堡垒作正面的进攻。因此美国的工人运动就担负着巨大的责任，而没有绝对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政治路线是不能完成这些责任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在一个具有许多特点的环境中，这些特点能够使个人和整个运动软弱和气馁。美国统治阶级的强大，在工贼竞争中获得胜利的人们的较高的生活标准，工会官僚的堕落，工人中间缺乏独立斗争的政治传统，遵循种族思想和种族歧视路线的各阶层和各集团之间的分裂，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渗透一切的影响，旧派领导的背叛，易于流为实利主义和调和理论——所有这些危险都在包围着那些真正希望在美国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人。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战士必须不断检查自己的政治工作以防止这些危险。处于政治上相对孤立和不断与当前趋势做斗争的地位，很可能不知不觉地脱离正轨。寻求捷径，寻求不能和反对党妥协的联合，寻求没有牢固理论基础的团结，寻求被认为是符合于美国特点的实利主义的调和——这些自1917年以来曾经不断地使美国的社会主义越出轨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必须经常注意这些危险，因为这些危险可能影响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思想。

8. 尽管如此，近年来也有一些进步，并且在社会上几个重要阶层的内部已经有了一些想要突破美国封锁的迹象。青年中间对于
美国生活方式的批评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听取各派反映他们精神荒芜的意见。从小资产阶级浪漫派中涌现出一批批判主义作家，他们把很多不满引导向个人主义的消极的道路。对于美国社会各方面批判的研究获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些研究指出美国社会怎样使人精神错乱和失去人性，但并没有指出，或者想要指出任何出路。社会悲观主义和逃避主义盛行一时，使急速的青年陷于迷惘，但同时也在引导一些最优秀的青年寻求前进的道路和积极的政治解决途径。大学在很快地接受着社会主义思想。核战争的威胁激起了一个和美国同样的反对氢弹运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那么有力。

9. 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被压迫的集团中间，特别是在黑人中间有着最重要的发展。新的力量和新的领导人已经出现在学生、青年和工业无产阶级中间，他们正在突破与“有才能的人物”——这些人正在大部分地区控制着白人种族协会那样的巨大组织——不可分的那种例外主义和妥协政策。他们采取直接行动和群众运动来反对种族隔离和维护人类尊严，以此为美国一般的工人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一运动因为没有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支持，所以只能取得微小的和部分的成功，但是，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开端，而且可以取得巨大的成果。我们曾经指出，在黑人群体中扎根有绝对的重要性。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的部分来自于黑人群体。这些部分受到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歧视，所以是新的势力和革命力量的非常宝贵的源泉。对于其他在北美土地上形成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少数民族集团，特别是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也可以这样说，在这部分人中间坚持工作是绝对重要的。

10. 美国工人阶级在各种罢工斗争——有一些是小范围的，另
外一些是像 1960 年钢铁工人那样的全国性大罢工——中表现了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卓越的牺牲与团结精神。美国工人阶级的潜力是无限的。所以当务之急是使美国工人阶级有一种政治认识以把这个潜力用在反对支持着美国统治阶级的工资制度的斗争上，这个统治阶级本身就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战略支柱。这里没有实行例外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的余地。美国资本遍布于世界各地这件事本身——其目的其中一部分显然是要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就使我们不能不采取一种国际观点。

11. 1960 年的选举运动两党以几乎分得相等数目的人民选票而更换了政府。无疑地，很多美国工人投民主党的票是希望美国改变对外政策和与反劳工法有关的对内政策。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采取第三种选择和在激烈的运动中对于那些公开地或暗地地支持民主党的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进行攻击而作出了重要贡献。

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和行动证明美国资本主义代理人没有多少自行选择的权力。这些代理人的行动方针基本上取决于垄断资本家的需要，而两个不相容的世界体系彼此矛盾的国际背景也没有给总统留下多少自由主张的余地。新总统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国内——那里普遍存在着经济停滞——和国际上日益处于困境的时期上台的。人们不久就看到，他不但无意于削减军费开支而且决心在革命的威胁面前维护美国的利益。在冷战采取干涉政策和利用中央情报局操纵下的傀儡对古巴进行无结果的侵略，使人们不能对于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再抱有任何幻想。

在处理经济衰退问题上，肯尼迪表明他既没有采取主动的期望也没有这种能力，对于失业者多给了一些施舍，但在政策上没有重大的改变。已经开始的逐渐恢复——仍然留下很多的失业
者——和对于美元压力的减轻暂时把经济问题推向背后。此外，国际局势的恶化——直到本年年中和十年来一样地没有好转——所造成的大量军事拨款给经济情况带来了活跃。但是，真正的和日益加深的生产停滞问题始终威胁着美国经济。虽然在紧急时刻，肯尼迪无疑会更快地增加联邦预算并比他的前任更大方地用政府的力量来支援经济，但这里也有严格的限制。况且共和党人也不能把从经济窘境中产生的趋势扭转回到三十年代去。事实上，军事计划以外的联邦预算是比较小的。大部分民政方面的开支掌握在联邦和地方政府手里，不一定受更替总统或者流行在肯尼迪顾问中间的肯尼迪思想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国际上的美元问题都会建立在低利率和赤字预算基础上的再膨胀政策以限制进一步从美元逃避能够造成黄金贬值或者可能造成黄金的停止流通，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的金融地位和国际威信受到打击。美国政策这种两难的处境给揭露资本主义危机带来了大好机会，借此可以把个别的斗争联系起来，使日益扩大的失业大军与他们的已就业的弟兄采取共同行动。

12. 根据美国的情况，我们没有理由把为和平而斗争和阶级斗争分开来提出。美国资本家阶级会出现一部分“爱好和平”的人，这样的希望是一点也没有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虽然就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而言，现在极端没有力量，但在急进运动中仍能看到它的存在。这表现在承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想法上，表现在沿着小资产阶级和欧洲“新右派”的路线对于裁减军备协定和联合国抱有幻想上。这些派别企图绕过阶级斗争，把信任寄托在高级首脑会谈和领袖们的协商上，希望不经过真正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就会不管怎样收回它的魔爪。迎合这些幻想的空谈和纲领式的声明必须受到谴责。同样地，如果没有任何苏联官僚机构在现阶段
段所起的真正反动作用也应该受到谴责。自然，因为退化了的社会民主党将共产主义和美国国务院对工会运动和知识分子灌输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高举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苏联官僚机构，和它的口号与诡辩，或者和它的美名妥协。也不能因此就让中国人机会主义地接受列宁主义导使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领导现在在远东也是革命发展的一个历史障碍。

13. 美帝国主义干涉全世界已经趁许多国家里引起人民反抗这一事实，对于在美国确立国际革命力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寻找并支持反动的外国政治领导人以和他们商量如建立包围苏联的军事基地、导弹基地和飞机场等一类的题目。一般说来，特别在不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就不能不依靠旧封建统治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反动的势力。但是，这些政权基本上是靠不住的，常常是腐败无能的，靠着贪婪、警察统治和压迫政敌来维持自己。所以，无怪乎在“自由世界”属地，从朝鲜到古巴，相继爆发革命运动。过去一两年里，美国在土耳其、朝鲜和古巴的傀儡政权已经被推翻。在日本，甚至在台湾也发生反对美国政策的示威游行。拉丁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汹澎湃。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现在的形势有进行世界革命的可能性。

14. 失去人心的政权之所以动摇主要是学生、青年和工人阶级的某些先进部分的领导进行斗争的结果。但是这些领导并没有接着建立起革命政府，而只是从小资产阶级、军事和行政官僚机构中选出一班新的负责人。结果表现在群众高潮中的革命运动没有带来实际成果就平息了下去。全部弱点是在这些国家里缺少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就表明当务之急是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这样的领导以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但是，这种斗争必须注
意避免反动主义的反对情绪，必须明确指出主要的敌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在此同时，美国工人阶级对于这些运动和对于防止这些运动采取反国际主义的方针所做的一些最大贡献就是加强反对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并提出保卫世界革命的口号。

（4）比利时罢工和它的教训

1. 1960年12月和1961年1月，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反对政府的总罢工。在这次斗争中，显然证明了：在那一时期，客观上需要一个坚决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和以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2. 比利时是老牌工业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利时经济是发展的并且获得了相对的繁荣。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小规模的，在未来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可能会到的化装排演场面。从这次排演中取得的教训不但极其重要而且最具有普遍性。如果及时吸取这些教训，其他工人阶级就可以避免遭到惨痛的失败，而比利时工人的牺牲也决不是没有代价的。

3. 罢工的爆发起因于伊斯梅斯的天主教社会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向议会提出节约法案，这个法案的用意是想把比利时资本主义的负担转嫁给比利时工人阶级——包括政府雇员人员和白领工人在内。比利时资本主义已经衰老并且有些动转不灵，在新的工业投资和提高生产方面保持着欧洲大陆上的最低记录。如果比利时资本主义想在共同市场内部和在世界市场上和它的对手竞争，就不能不缩减开支和提高生产率。刚果事件虽然没有带来巨大的直接损失，但使其中蔓延着的危机严重化，使资产阶级和它
的政府决心采取激烈的措施来保障利润和表明它对于国内局势的控制。这个法案在加剧阶级斗争上是一个刺激，使这个斗争发展到最高潮。

4. 在工人阶级中，特别是在华龙族区的重工业中心，强大的群众压力发展到最后一试的地步，而这是社会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人所不能阻挡的。采取罢工行动的压力不逞性象征性罢工和延期到1月3日议会重新开会的温和的号召，于12月中旬在许多工业中心和各行业里已经成为不可退步之势。这不是由上层筹划和发动的总罢工。这是自发的，在下层强迫领导人接受的意义上的总罢工，并且是随着各层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而发展着的。

5. 改良主义的领导者，就物质力量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的主人。他们突然被放在了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地位。社会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领导过比照例的示威游行或者通过议会走廊的运动更大的运动。他们现在相形见绌了。为强大的地区组织所支持着的工会领袖站在运动的先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雷纳德。

6. 不论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工会的官僚主义者，或是斯大林主义者都把自己局限在资产阶级的组织范围内，不能担任这个不可缺少的领导。他们没有提出斗争的口号，只是号召通过所提出来的法案。他们不具备表现工战斗意志的方针或纲领。从这些领袖们的行动判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随波逐流，适应当时的情况，迎合基层群众的心理并且这样拖下去直到找出一条解决的办法。

7. 在华龙族区的重工业区，罢工是坚定的，并且存在着建

---
(1) 五金工人工会的领袖，一个具有英雄主义倾向的左翼中间派。
(2) 这是重工业区，比利时南部说法语的区域，有些人在矿井里做苦工和陷于失业。
立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这里的工会领导人对于来自下层的压力是最让步的，但是他们把运动放在自己的严密控制下。这里当时曾采取一种战斗的姿态，但对于找到一种战术和要求取得政权没有必要的准备。群众在领导的箝制之下，除了举行一些显然为反映当时的一般想法和心情而计划出来的示威和讲演外，没有做别的事情。这一运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很有力量，事实上是依靠在原地转圈子，远处有宪兵、军队和政府机关监视着，显然准备随时给他们以打击。

8. 这些领袖们由于他们是改良主义者，当时采取了迟疑、撤退或者完全等待的态度。华龙族的领袖们为了寻求一条解决途径以在他们的追随者面前保全颜面和证明他们自己主张的正确，转向联合主义求救。语言和宗教的不同提供了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讲得通的现成理由。事实上，天主教会对由于讲弗来米语的北部的控制和社会党工会不能使工资较低和阶级觉悟较差的弗来米族工人和天主教工会断绝关系，一部分是因为过去的缺乏领导。在南部采取同样的依靠工人自发性的政治态度使他们有理由在天主教的北部也等待同样的自发性，因此这种理论就起了使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意识投降的模范作用。弗来米族工人被认为是落后的，是反动的群众，注定是反动教会的驯顺工具。同时，这些领袖们估计到他们在南部的优势，于是回到了更换这个国家政治机构的道路上去，认为他们会得到多数票，并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试验。

9. 在此同时，华龙族领袖们的态度是不做任何事情来打破政权主义的控制，不做任何事情和天主教工人建立起联系。这些工人很多在早期曾经表示愿意罢工，甚至因此不惜和他们自己的工会决裂。当然，这种态度会加强教会的控制和有助于对弗来米族
工人进行错误的教育。

10. 这种态度暴露了中间派工会领袖如拉马德等一贯采取的适应当时情况的经验主义的做法。尽管列纳德对于议会的局限性表示不耐烦，但他不能提出比社会党议员所提出的更为进步的纲领。

11. 领导者方面的无畏精神并没有如人们有理由预料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的团结与热情是相配合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消耗在听讲演——通常只是在星期日才有的那种讲演——游行和等待中发生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的事情上。他们不应该等待看政府如何处理，而应该占领工厂和建立起工厂和罢工委员会，应该组织起自卫队和打下扩大斗争的基础。工人的战斗部分缺少这样一个领导，由自己去寻找前进的道路，于是采取无目的的暴动，打破窗子和破坏等等手段。战斗意志消沉下去了，那些最没有坚持力量的部分，如布鲁塞尔的工人，走开了并且回到工厂去工作。

12. 那些领袖们于是退缩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他们的不乐意为窘境寻求一条出路就为政府效了劳。伊斯更斯和他的同伙使用狡猾的手段，保持着巨大的斗争本钱。他们掌握有广播电台和大部分报纸（虽然有“总”罢工但仍然出版），有宪兵和警察并从德国调回来一部分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分遣队。他们显然有很多的镇压力量，或者如一般人都知道的，在背后保有这些力量。他们注意使用这些力量的方式不激起工人阶级的愤怒，而且无疑是了解到罢工领导者可能有的反抗行动的。因此，对于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心没有进攻，罢工领袖没有被逮捕，他们的活动似乎也没有受到限制。政府的方针是让运动自消自灭。

13.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罢工时间的长短是由各地区或
各阶层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程度决定的。因此，在北部，除了两三
个地方以外，罢工高潮很快就衰落了下来。在布鲁塞尔罢工曾上
升到高峰并且是群众性的，但由于没有前途而未能坚持下来。南
部几乎完全卷入罢工且工人們一直坚持了四个星期，虽然全国
其他地方的罢工于最后两个星期内正在瓦解。

14. 如果有一个和社会党与工会机构相反的领导，在比利时显
然有非常美好的机会。除非在这件事情上坚持着做很多年细致的
工作，就不会存在或出现这样的领导或者完成这件事情。

15. 比利时共产党的立场没有提供，并且也不能提供这样的领
导。它的政策完全服从于“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要求。它的
口号没有超出社会民主党规定的范围，并且完全在左翼口号的范
围以内。它一方面尊重议会形式，一方面疲态地希望通过由社会
党和工会建立的共同行动委员会。它号召各党联合解散议会和重
新选举，除了其他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是为了保持“我们”议会制度
的威信，这是一种堕落的方案。它实行施加压力和一般追随在改
良主义者后边的政策。在政治性总罢工的形势之下采取这样政策
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衰落和斯大林主义的机
会主义的特性。

16. 社会党左派，特别是在它的青年运动中，和于某种程度上
在工会里，有一个时期，显然产生了一种左倾的趋向，但是没有能
够赶掉旧有的领导。这一部分人尽管提出看来比较激烈的口号，但
也同样地不能突破难关。它的根本弱点在于没有建立起和显然没
有建立起另外一个领导。这样的领导虽然人数不多，但有战斗工
人的支持是能够取得公认的权威地位的。这种革命的骨干力量在
罢工中能够起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缺少这样的骨干，是因为左
派对于中间派的批评纯粹是形式上的批评。罢工前后，所谓左派
的行动方式，共本身就完全属于中间派的性质。实际上，它也是主张施加压力，它企图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通过下层群众或直接地灌输给如雷纳德那样的工会领导人。左派和雷纳德显然建立起一种以便利为基础而不是以真正关于战略或方针的同意为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雷纳德向他的“朋友”表明，他准备只是推行（并且不是很有力度）左派纲领的一部分——与社会党最低纲领相一致的“机构改革”纲领。

17. 虽然左派可能得到了一些支持并且由于经历了罢工而有所发展，但分析起来，它显然对于罢工的失败负有一部分责任。

18. 以《左翼》①为中心的左派的经验，从本决议所提出来其他各观点看来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围绕着《左翼》那个集团的方针和活动是一群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和战术的具体表现。事实上，这一派自1953年以来，就一贯赞同并实行压服和甚至清除在传统组织（布列主义者）里边的中间派中的革命骨干。这显然带来了一系列的妥协，在这些妥协中，为了取得所谓“有影响的”地位，就失掉了原则上的和纲领上的明确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但在政治上无可避免的命运就是成为中间派的俘虏，看去越来越像中间派，直到只剩下形式上的区别——语汇的不同和比较分析地对待问题的方式。此外还意味着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罢工的形势下不能担任领导，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方针的错误和在罢工期间采取一个最低的纲领。特别是，他们失掉了和工人阶级一起经历斗争从而使工人阶级取得高度觉悟的机会。通过一系列既符合于罢工者当前需要又提出政权问题的具体的过渡时期的要求，这是能够做到的。不这样做而支持改良主义的“最低纲领”，不

① 《左翼》是社会党左派的机关报。
論有什么保留，都是对于革命责任的背叛。这种经验，一方面证明了反对改良主义的过渡时期要求的基本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第四国际有必要反对那些导致1958年分裂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各种修正，这些修正最后表明基本上是中间派的修正，在政治上完全不适合于这一时期。

19. 比利时事件給我們的最一般的教训是，首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革命的骨干。我們不能因为考虑当前策略上的成功和为了取得中间派和其他派系的赞同而逃避这一工作。如果不提出重要的理论问题来加以讨论，或者只是努力取得联合而把原则性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就不能开始这一工作。支持中间派的“人物”或者建立包括原则性的让步在内的关系也不能开始这一工作。比利时运动从这些事情上取得教训还不算太晚，特別因为那里现在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相当影响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存在。

20. 这些教训对于国际比只是对于比利时无产阶级更为重要，对于这些教训作全面讨论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须从事理论准备的一部分。

4. 殖民地革命

（1）一般原则

1. 每一个落后国家的解放斗争必须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总危机的一部分。各阶级和各党派的作用必须以帝国主义在总危机中的需要为背景来予以估计。工人阶级革命者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产生自这种全面的估计。
在每一个过程中都有临时的和在特殊情况下局部的例外，帝国主义世界的某些部分甚至有在一定限度内的上升时期，虽然总的趋势是衰落。任何国家里的帝国主义政策如果以“特殊”现象为根据，那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作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殖民地革命的一般基本特征一直是只有工人阶级能领导群众跳出帝国主义的泥坑。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策略，从而建立起具有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纲领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2. 殖民地群众的反抗迫使帝国主义政府把政权交给了参加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殖民地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大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非洲的殖民主义者的意见，反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战略（在它的直接目的上）。在南非和中非，这些分子的保守主义使建立为非洲人民所能接受的当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希望不能实现。结果就发生了大陆上的内战，在这个内战中，平常的领导很快就势力衰竭。不但是已经给当地政府以宪法上的权利，或者是反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军事冲突在进行中，或者是联合国组织及其代理人正在“保证稳定”，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特别致力于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担负起领导任务。

3. 尽管国际垄断资本家关于经济开发谈的很多，但是它们在不发达国家里既没有实现工业平衡发展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这种发展的可能。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并没有阻止得了它们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临时妥协以不断地增加投资。先进国家的政府也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以作为和平政府的政治谈判的一部分。但是，不平衡的发展一直在继续加深，因为在出产宝贵原料——特别是石油和一般的矿产物——的地区，投资在迅速地进行着，而“第三世界”人口稠密的广大地区则因为忽视和经济停滞——由于
世界物价变动而更为严重——而受到严重的伤害。一方面在大部分世界上，长期存在的贫穷和剥削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益却在世界上已经发展了的地区进一步促成更快的发展。收入和发展程度的悬殊，显然日益加深。

民族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受着帝国主义掠夺和破坏的伤害，他们不能和旧社会腐败堕落的封建势力和拥护资本主义分子——地主、放利为生者、部落酋长等等——断绝关系，并且默默地接受或者甚至支持作为经济上决定因素的垄断资本家的继续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立场使我们难以想像它会为了群众的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4. 帝国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认为在殖民地和新独立的国家中必须有一个所谓“投资前阶段”。这是希望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做一些基础工作以便后来实现工业化。肯尼迪主张解放一切非洲商业，放弃旧有的殖民地优先的政策，以便资本最后可以自由活动和建立起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广大消费者市场（这里另外一个目的是使拉丁美洲的主要产品比较容易地进入欧洲市场以缓和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西半球的特殊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仍然妨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理想的解决）。负责管理这个投资前阶段的工具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担任“独立”政府和国际机构，如国际金融基金团、国际劳工局等等职位。

5. 新政府的政治作用不能根据任何形式主义的标准或者根据它所表明的政治主张来判断。事实上，帝国主义者承认基本工业和服务事业的国有化是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予以支持，因为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这里再一
次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先进国家里的作用是支持帝国主义。正如社会民主党在集权的西方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寻找新的根据地以支持帝国主义一样，它在落后国家里也使自己正好符合于这样一个官僚机构的需要。这个官僚机构一般是一个政府官僚机构，因此现代金融资本完全承认，在发展的现阶段，由国家控制经济是必要的。

6. 正如社会民主党左右两派都欢迎这个殖民地统治阶段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袖，认为他们是一个进步力量一样，斯大林主义者对于这些领袖也表示欢迎。斯大林主义者忠实于“在一个国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欢迎在目前形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因此，他们根据某种假设的独立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来对各阶级和各党派估价，而不是根据它们对于帝国主义和作为一个国际整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和往常一样，这些理论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歪曲，而是工人运动中的一定阶级派别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先进国家里的工人贵族和官僚机构经验主义地使自己适应于帝国主义的机构改革，并且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同时，苏联官僚机构——它的小资产阶级利益阻碍着苏联工人实现可以完成十月革命的世界革命——通过苏联共产党改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纲领以符合于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情况，符合于“和平竞争”的现阶段。

7. 这些机会主义派系的客观影响是导致殖民地工人和农民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的失败。在中等阶级领袖与垄断资本家和银行妥协的同时，共产党由于接受实现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时机尚未成熟的学说而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事实上，这在印度尼西亚、埃及、印度、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就导致了新兴统治阶级的强大，并在许多情形下导致很多先进工人丧失生命。斯大林主义
者和社会民主党在先进国家里的背叛对于阻碍正是殖民地工人所
需要的那种支持在这些国家里的发展也有它们的影响。法国共产
党对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8. 帝国主义者注意在先进国家里集中投资、科学和技术的加
速发展、新的合成原料的生产对于落后国家产品市场的破坏，所有
这些都增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一定会使落后国家和先
进国家里的斗争步骤加速。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日子没有多久了，
他们不能长期在军事独裁制度的危机下维持下去，这种制度是
在几年“独立”之后的一股趋势。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的
任务是抓住机会建立具有工农委员会纲领的无产阶级的党作为
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一切“发现”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在本身能完成社
会主义阶段革命的学说不仅是错误的和浮浅的，是以暂时的和局
部的现象为根据的，而且在效果上是造成一种危险的修正主义倾
向。

9. 对于这些民族主义政权做一种正确的阶级分析对于了解它
们在世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强大苏联的存在使
这些统治者中的某些人在他们自己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取得了比
较稳固的地位。他们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在国际外交上起举足轻重
的作用。“中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过是他们在国内的阶级作用
的一种发展。所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都在助长
一种幻想，认为通过有影响的政治家的善意可以保证世界和平，认
为这些政治家会使战争贩子们恢复理智。在1981年不结盟国家
会议上，一切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问题都因为“和平倡议”的“主要任务”而被搁置在一边。社会民主
党——即使是“左派”——和斯大林主义者自然欢迎任何阻止群众
本身通过推翻帝国主义来解决战争问题的行动方针。这些“中立
主义者”，只要他們的命运还沒有受到决定性的威胁，他們将在大
国集团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但是，他們基本上是全世界资产阶
級的一部分，并且将和資产阶级站在一起。

10. 很显然，在落后国家里支持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方针、国际舞台上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先进国家里的“和平走向社
会主义的道路”、苏联集团的“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学
说，这些都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一种反革命的政治倾向，这
种倾向已經完全固定下来，所以必須以最坚决的态度来加以反对。
这里任何等待着斯大林主义的方针在某些“客观力量”压力之下自
动改变的倾向也都是修正主义的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独立和取得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只
有建立起具有革命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11. 最后，我們再度強調把殖民地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国际革
命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殖民地革命没有在先进国家里的革命胜利
是不能完成的。把殖民地革命看作是在它自己推动下的自动的发
展是对于我們討論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的支持。没有马克
思主义的党的领导，沒有把革命扩展到先进国家里去的希望，而来
談不断革命的理论已經得到了“证明”，这是沒有意义的。没有无
产阶级的领导，经济问题将更为严重而政治制度也将越来越专横。
革命斗争給落后国家带来的工人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前途只能靠着
工人阶级革命在先进国家里胜利的帮助来保证。这不是一个通过
殖民地革命建立起越来越“进步”的政权以最后改变外交上均势的
问题。那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只能为民族主义統治者本身、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和一切中间派的舆论所接受。第四国际对
于不断革命的纲领有坚定的信仰。落后国家的工人必須取得政
权，并和他們欧州和美洲的兄弟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然后共同取
得胜利。在此之前,不会有脱离帝国主义的独立,也不会有和平。

(2) 古巴革命的例子

1. 自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以来, 接着卡斯特罗政府就在这个岛屿上实行了美国财产的国有化。古巴革命运动有许多特点值得我们详细研究和作出评价。

2. 古巴革命有三个特点和以前一切拉丁美洲大陆上的革命不同: (1) 广范围的土地改革; (2) 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 (3) 武装民兵的建立。

(1)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到现在为止是我们在西半球所看到的一种范围最广泛的措施。不论玻利维亚或危地马拉都没有像卡斯特罗这样做过。这个改革把土地分配给十万多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农业工人), 给像占有约二十万亩以上大片土地的联合果品公司那样的美国大垄断资本和作为巴蒂斯塔政权主要支柱的离开当地的地主以重大的打击。

尽管如此, 这个改革在内容上和动机上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革, 并没有超出农村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范围。即使卡斯特罗也承认, “这不是一个十分彻底的改革”, 因为没有影响到一千亩以下的土地和牧场。

虽然土改法规定, 属于农业合作社的土地不能被分割, 但在古巴遭到严重的农业衰退打击时, 就不能保证全部合作社都不会流于破产或者甚至把土地出售给其他合作社或农民私人。

这样一种影响对地租同时保留级差地租的土地改革不仅可
以包容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而且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

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没有取消农村债务和不使农民提供低利贷款的便利——所有这些都在制造新的农村社会分化的条件。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分割——造成农业不发达的原因——和出让将继续存在并且在缺少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情形下将在农村为更深刻的阶级冲突开辟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社的前途至少可以说是靠不住的。

（2）国有化

美国公司的收归国有，像土地改革一样，其目的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但是它们不是根据事前想好的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来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把一切资产阶级财产收归国有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对于美国政府减少古巴糖限额的一个回答。

像纳斯尔没收苏伊士运河一样，这种没收在半殖民地世界构成了“国家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托洛茨基关于墨西哥的铁路和油田国有化所说的：“这是一种在落后国家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这样做为的是一方面在外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本国的无产阶级面前维护自己”。

没有任何关于工人监督的立法，除了少数例外，不许工人在没收的企业中有管理权和由国家对国有化公司进行官僚主义的经营，更不必说这个政权还用公开的和隐蔽的策略，通过代替原来穆哈尔③官僚的新工人官僚来训导和统一工会——所有这些都肯定

③ 据巴蒂斯塔的工会领导。
地表明了这个政权及其社会政策的资本主义性质。

因此，我們不應該把这些没收和工人国家的没收混同起来。革命政府的改革是为了更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更平衡地进行资本主义投资和在现有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体制之内的适当扩大国内市场。

（3）民兵队

三十五万人民民兵队的建立是古巴革命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和这个政权的最可靠的保障。由于这个民兵队的警觉性，一切反革命企图都遭到了镇压。

但是这个民兵队的将来却决不是有保障的。随着阶级冲突的扩大和矛盾的加深，在民兵队中将发生拥护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分化。政府将企图解散民兵队或解除其武装——像玻利维亚那样——或者更可能的是把它编入军队和警察机关，像埃及改编敢死队那样。

起义军控制弹药库保证了资产阶级国家对于民兵队的控制。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为民兵队的组织上独立和隶属于工会与农业合作社而斗争。

没有生气勃勃的革命领导沿着阶级路线来影响、组织和领导民兵队，那就太可能消灭了。

3. 卡斯特罗政权在组织上是军事独裁，在构成上是小资产阶级。一切重要政策都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周围的一个小集团决定，而只是在这个政权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例如哈瓦那宣言——才和群众商量。民族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和与此相反地工

1. 在英国人占领苏伊士运河地区基地的最后阶段组织起来打击英国人的队伍。
人阶级的比较有力量和能够团粘，使任何想要在人民权力机关的基础上来巩固一个受欢迎的真正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权的企图完全成为幻想。

因为缺少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所以这个政权能够在敌对的阶级力量之间站稳脚步，既利用右派又利用左派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一切打击到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权力和财产的有决定性的和根本的问题上，这个政权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的。由于企图建立一个“革命的单一的党”，由于攻击“7月26日运动”的左派和由于拒绝在秘密和普遍投票的基础上召集全国会议，卡斯特罗政权越来越表明了它在贯彻民主革命上的阶级局限性。对于革命工人党\(^1\)进行攻击是这种倾向的另一个证明。

因此摆在古巴革命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前进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或者是后退回到军事—警察的独裁制度，一个带来饥饿和贫穷的政权。

不管怎么样，卡斯特罗的领导只能是一个追求彻底消灭托邦——和实用主义的——目的的过渡现象，它试图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基础正在发生动摇的时期建立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国家。

4. 保卫古巴革命是极端重要的——但也要求得它的发展，一方面在深度上通过建立一个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政权，一方面在地区上要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有同样问题和显然受着美国大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中南美国家，提出同样的问题。无疑地，古巴革命已经在整个西半球有很大的影响。它在策略方面给了我们——

\(^1\) 革命工人党是属于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党，主张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
們很多教訓並且正在證明美國是可以反抗的。但是，從這上邊說
說卡斯特羅的古巴已經是一個工人國家或者甚至說作为一个政權
能以現在的形式存在下去，那就離題太遠了。

5. 古巴革命對於美國的急進分子特別容易有號召力。因為他
們第一次能夠這樣切近地觀察一個獲得絕對成就的反帝運動。古
巴工人和農民的信心與熱情，領導者們的坦白直率，不僅和其他每
一個拉丁美洲政權成為對照而且也和美國本身腐朽的、冷酷的
和為金錢支配的風氣成為對照。這說明了為什麼他們有時過於熱
情地接受古巴革命的現在形式。但是，我們仍有必要詳細核對事
實和可能性。

6. 古巴革命的孤立和因此而造成的卡斯特羅對於蘇聯的必然
依靠，導致了斯大林主義的人民社會黨的強大。這個黨在“7月26
日運動”的最初成就中并未起任何作用，並且事實上有一個時期和
巴蒂斯塔政權是妥協的。但是，它現在卻能因此而在政府中取得
地位和發生影響。它毫不遲疑地用它的權力來打擊其他黨派的獨
立報刊，惟恐它們走上不僅妨礙卡斯特羅而且妨礙蘇聯政府的道
路。1938到1939年期間在西班牙征服的毀滅了西班牙革命機會
的那種斯大林主義者的手段現在又一次地發生了作用。蘇聯官僚
機構非常喜歡與受到共產黨“壓力”的卡斯特羅——正如尼格林在
西班牙一樣——打交道，而不喜歡和在組織上真正代表並緊緊依
靠工人階級的領導打交道。

7. 卡斯特羅領導缺少稳固的理論基礎並不是一个優點。它導
致了並且將導致在困難問題面前的臨時應付主義和折衷主義。缺
少理論基礎意味着沒有教育广大群众充分了解國內形勢和這種形
勢與國際間的複雜關係。對於一個領袖的信任並不能代替這種了
解，相反地，這種信任把過去已經取得的成就放在了當前刺的子
弹的支配之下，它也能导向欺骗与退却。在革命虽然有群众基础，而群众却并未控制或领导这个革命的时候，这种情形并不是什么意外。卡斯特罗的领导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是由于当前的必要，并没有没收资本的明确纲领。将来究竟是哪一种经济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开展一个建立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的运动，由这个领导根据工农委员会接收经济的纲领进行斗争，同时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展开一个保卫和扩大古巴革命的运动。保卫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者在整个美洲的首要任务，而它的前途则在于美洲社会主义合作国口号的实现。

5.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苏联

1. 自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遇到了一个敌对的取消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关系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经济方面的成就与革命在新国家里边的成功，特别是在中国的成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一大部分世界人口和生产资源现在已经不在资本主义掠夺或扩张的范围以内。这种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初步成就之间的必然冲突不会轻易地消失在“和平共处”的气氛中。根据苏联官僚的解释，“和平共处”不过是他们和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一种理论上的掩饰，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与革命的工人阶级发生决定性冲突的一种理论上的掩饰。资本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只能在国际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得到解决。提出“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另外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觉悟、国际组织和
国际行动的问题。赫鲁晓夫不此之图，却重视越来越多的现存国家或政权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结果，在资本主义和前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就受到“压力”政治的途径而不是去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反对垄断资本的联合”“广泛的和平同盟”这些理论的根本意义。

2. 苏联、中国和东欧的经济高涨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结果。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们更为迅速的和平衡的发展证明计划经济优于私人企业的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论点。这样的论点是危险的和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承认这种论点就意味着承认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极端措施，承认它的政治上的镇压和社会的与经济的歪曲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具有的特点。虽然这种镇压已经不是那么残酷和明显，但这里仍存在有一切以“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掩饰的——从背叛革命产生的矛盾。收入的不平等和官僚们的社会特权，在制定和实现国家计划上没有来自下边的有效监督——所有这些都造成不协调从而拖累着经济，阻碍经济以计划的方式来充分发展生产力。这样就不仅在官僚中间而且在工人和农民中间鼓励了个人主义倾向。只要工人阶级被官僚控制的国家和党机器严厉地排除在政权之外，这种矛盾就无法解决。社会主义的基础建立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形式上，但是这种国有化的财产和集体农庄一样，并不构成社会主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各级苏维埃充分参加国家职权的行使和经济的民主管理。社会主义还意味着一定会趋向于收入平等和国家镇压职权的衰落。今天的趋势与此相反，是加强官僚国家和继续存在着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即使没有官僚在苏联窃取工人阶级的权力，在击败帝国主义
和达到很高的物质生产水平以前，也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是工人阶级国家，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十月革命所直接或间接建立起来的财产形式为基础的，这种财产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并没有控制生产，也没有决定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

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只发生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结果造成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掠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官僚机构站在工人阶级之上和工人阶级之外，并且是寄生于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形式的。这并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可避免的特点，而是产生自俄国革命孤立的特殊情况，并且在历史上将为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所代替。这个革命的准备工作决定于革命的工人阶级力量在全世界上的战略。

3. 因此，我们认为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都是畸形的或者已经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它们现在的形式只能是暂时的，这些暂时被歪曲了的形式造成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或者不可避免的阶段是错误的。我们主张保卫这些国家正如保卫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果一样；这些国家回到被帝国主义掠夺的地位上去，将是对于社会义前途的一个重大打击，而它们的继续存在将是对于帝国主义安定的一个长期的挑战和威胁。但是，我们保卫苏联、东欧和中国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批评的权利。革命者有责任对于官僚机构的反革命作用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个官僚机构事实上是在反对保卫革命。不论是在苏联集团内或者是在全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官僚机构都在通过共产党的影响阻碍着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我们号召用政治革命推翻官僚机构，并不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在工人运动中进行的“解放”宣传。我们主张政治革命，是保全而不是推翻国有化的财产关系，是保证这种关系不再回到
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第四国际号召用政治革命推翻工人国家里的官僚机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战略的一部分。

特别危险的是那个把苏联描写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小资产阶级派系。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用表面比较的方法，认为苏联官僚通过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并且已经消灭了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以此为根据，就逃避了在帝国主义攻击面前保卫苏联的一切责任并且否认了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的必要性。这种派系表面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权主义”和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掩盖；在政治斗争的紧张时期，如朝鲜战争，它们对帝国主义者提供了支持。这些派系是直接代理机关，通过它们，革命运动中的某些分子，在发生尖锐阶级斗争和极端需要无产阶级纪律与原则性领导的时刻，投降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从抽象的政治标准的观点，如“民主”和“自由”等来讨论苏联的性质而不是以生产关系为根据，就是这一派的阶级性的明显的证明。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它们都是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传声筒。

4. 斯大林的极端措施曾经用“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证明其正确。这种措施以最鲜明的形式表现出官僚机构的反动作用。在斯大林死后的那一时期，官僚机构本身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保安机关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这样，官僚机构的权力不是告一结束而是被放在了一个不同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是在使官僚机构内部关系合理化和试图给人一种和斯大林时代的野蛮镇压完全决裂的印象，藉此来回答苏联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斯大林死后所发生的一切疑问。赫鲁晓夫成功地渡过了苏联共产党领导内部和东欧国家里的各种危机，最后成为了人所公认的新时代斯大林的继承者。
虽然赫鲁晓夫政权表面上不似斯大林政权那样严峻和野蛮，但弊端和民主的范围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和党实行集体领导的政策——对于受过教育的觉悟越来越高的工人阶级群众的反抗是唯一必要的回答——并没有实现。个人崇拜即使和斯大林时代相比已经消沉下来，但仍然存在。官僚主义的统治集中表现在个人统治上，由一个最高的决定者任命他所提名的人担任各高级职务并由他为一切国内国外事务做出重要决定。这种个人统治适合于官僚主义类型的拟定计划，这种拟定不是根据民主的决议和查定而是根据中央发布的命令。赫鲁晓夫也常以政治煽动的经验主义的方式把一系列政策的改变和思想意识的修正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能够在官僚机构和人民的关系中保持某种稳定。他对农民作出了让步并相当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他答应将来还要提高以防止他们的不满。赫鲁晓夫把他个人的精力用在这些实际问题上并巧妙地在官僚机构的内部缓除了他的反对者，因此使他的首领地位得到了确认。这样得来的稳定必然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包围和集中在单一人物身上的个人权力是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相矛盾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个人统治是在为将来酝酿着更深刻的矛盾。自赫鲁晓夫在紧急情况下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议“秘密报告”以来，整个方针是把基本矛盾掩盖起来而不是解决基本矛盾。

在匈牙利和波兰，1956年的起义没有能够推翻官僚统治。这里旧日的警察统治也有一些修正。但是在匈牙利，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人仍然被监禁着，1956年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受到残酷的压制。在波兰，哥穆尔卡的领导使官僚机构顺利渡过1956年从波兹南和华沙事件产生的难关。但是，从那一年的第八次中央全体会以后，关于工人委员会的立法和对于不同意见的镇压手
段就一直被用来压制青年和工人阶级的进步力量。1958年对斯大林主义者或纳托尔集团让步之后，随着镇压机器的许多成员的恢复职务，工人委员会被限制成为仅仅是工厂中的咨询委员会。这种官僚权力的恢复和对于工人阶级活动的压制鼓动了如罗马天主教会那些分子的政治宣传。

5. 赫鲁晓夫现在认为资本主义包围已经结束并且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两种说法都没有说明了客观形势。必须从事大量军备生产对于经济的不断压榨和与军事需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由于先进工业国家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围而继续加强重工业和放任消费品的生产——所有这些都反映苏联仍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尽管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但苏联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远不具有进步经济的面貌。消费品生产、住宅、公路和汽车运输的相对落后，在为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经济中，必然都是不相称的，并且不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利益。但是，他们却骗人说，已经开始进入共产主义。

官僚机构既不能认清也不能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因为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寄生的存在和机会主义路线。赫鲁晓夫必然会遇到使苏联经济三十年来感到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享有特权的管理人阶层对于计划制度的强调，这些管理人和生产者脱离，所依靠的是从不受监督的中央发布命令的制度。中央及其周围的管理人阶层不必把经济计划提交民主讨论并且不受来自下边的任何监督（这种监督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赫鲁晓夫本人的一再诉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奖励制度和个人对于生产定额负责制度，助长了国家及其企业的有计划的不忠实和欺骗。贪婪、无效率、掠夺国家财源、行骗、“提出”不兑现的诺言——所有这些并不是经济计划本身或“人类天性”的不可避免的
結果而言是产生于统治阶层处理事务的官僚主义方式。我們当然不
应该根据这些例子对苏联做片面的估计，但是同时这些发展却一
定会是苏联经济的障碍，而继续把它們归之于“資本主义残余”也
是可笑的。尽管口头上做些“工人参加管理”和实行非物质奖励等
官样文章的表示，但事实上继续支配工人阶级生活的物质奖励制
度每天都在养成資本主义残余特点所代表的那样落后的个人主义
作风。官僚机构成员及其家族显然享有消费特权的现象助长了这
种个人主义作风。

6. 赫鲁晓夫特别关心的是苏联农业上一再发生的危机和与之
有关的问题。事实上生产落后现象主要是在农业方面。尽管有“处
女地”计划和各种农业改革，但农民显然没有受到官方代言人劝誘
的多大影响。农业部分看来特别给官僚机构的墮落和弊端提供了
广阔的天地。在工业方面，主要是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比例问
题而不是一个继续发展的問題。但在农业方面，在新的生产工具
上不断增加資本投賄并不能以同样的程度保证产量的不断増加。
这种増加只能靠着在同样的規模上开垦新的土地来实现。其他必
要的条件是：畜牧业的改良、收获量的提高，农民中间的技术知識
的傳播和他們在完成經済计划上的积极合作。显然，这些方面的
成就不是很均衡的，既需要对农民作出许多让步也需要赫鲁晓夫
本人的不断关心。同时，收购和分配农产品的制度曾經受到官僚
机构本身的严厉批评，认为它是經濟制度改革中薄弱的一环，像原来一
样地容許有很多舞弊和投机机会的存在。官僚机构的性质一直威
胁着工人国家与农民之間的关系，农业問題始终沒有得到解决。
将来的情况形式和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同样的不确定。把拖拉机站
出售給大集体农庄那样的措施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关系受到
人們严重的怀疑。

* 312 *
7. 苏联官僚机构企图和帝国主义者达成和平裁减军备的协议，不仅因为要保证本国特权的继续存在而且也因为军备计划对于苏联经济是一个重大负担。但是认为有必要反对任何革命发展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存在使这种裁减军备成为一种危险的幻想。和平共处的理论是企图粉饰这个根本矛盾。

和平共处的理论是苏联官僚现有思想意识的总结。它建立在关于现代世界阶级力量性质的一些主要假设上。苏联政治家的声明和经济学家的著作表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有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他们认为这种危机是那些包括失业日益扩大和生活水平降低在内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的逐步发展。事实上，这种描绘严重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恢复力量，这种力量当然需要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工人阶级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直接合作。因此，苏联经济就从统治阶级在国际间的政治背叛所造成的曲解上受到了损害。这个同样的官僚机构现在又主张加强这个同样抱有幻想的和背叛的政策。在殖民地革命方面，同样地，说殖民制度的历史已经告一结束固然很好，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者能够在这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以保持帝国主义者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利益。这种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仍然是因为没有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起作为代替的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而这种失败的责任可以完全归之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因为它在反帝运动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领袖不加批判地予以支持。

在此同时，如 1960 年一个共产党的声明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必然衰落——在此衰落期间，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将逐渐“证明”其本身优于资本主义——的那种机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导致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的潜在力量的过高的估计。
工人士阶采取独立革命行动的实际可能性由于这种机械地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与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等同起来而遭到了否认。这种想法是与和殖民地甚至和先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的“爱好和平”的部分结成联盟相结合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对苏联友好的联合政府，或者像在东欧那样，建立为共产党所支配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近已经对于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政策的一切理论上根本假设发生了怀疑。中国人认为和平共处暗含着愿意承认现状，因而也就是放弃反对蒋介石和收复台湾的斗争，同时暗含着愿意放弃对殖民地革命的支持以换取裁减军备的协议。中国的领导也是起家于官僚阶层，和俄国的领导同样地抓住权力和特权就不放手。但是，中国的领导与革命力量的渊源较近，在国内遇到了些困难问题，对于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强行规定一些不利于其本身的政策抱有反感，因此它很快地找到了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用来反对“修正主义者”。任何人都会看到，集中这种火力对“铁托主义者”进行攻击另有它的真正目标。中国人在这场争论中，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对于世界力量划分的估计比较现实而他们的思想也“比较纯正”，但不能因为这一事实就承认他们的整个立场。他们采取这种立场同样是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原则为根据，并且其中还包括某些冒险主义的危险的观点，如认为在一次核战争中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等等。

中国的立场产生自苏联集团的一个特别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具有极高的威信的强有力的成员，因此它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争论的全部结果。一个共产党和以后苏联的声明表明，在口头上采用了一些中国人所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但在策略和方针上并没有重大改变。这就使人们看到，苏联领导人利用中国人在国内遇到的困难，所主要关
心的是在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保持他们的支配地位。他们事实上达到了这个目的。结果八十一共产党的声明和其他声明都采取了甚至比这类声明所一贯采取的更为折衷的态度。这些声明中包括所有各派别的某些意见并使之有可能事先就几乎把赫鲁晓夫所决定的任何方针都包容在内——因此使各国共产党除了遵循这个方针外没有其他选择。

9. 斯大林主义内部危机的根本原因在1960到1961年期间，和1956年一样没有得到处理。这些根本原因的解决，由于使用蒙混、压制和制造一些掩饰分歧的折衷声明的手段而被再一次地搁置起来。在现在正在开始的巨大的阶级斗争中，这个危机必然要加深。共产党内部的和国际间的“磐石般的团结”仅仅是表面现象。随着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危险的被揭露和下层党员的开始寻求一个更接近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将造成共产党进一步的分裂。最初这些派别必然是散在的和不协调的。苏联官僚机构的被推翻和资本主义国家里旧领导人的政策的改变不会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运动所担负的巨大责任是建立一个新的群众的革命的党并从共产党中争取革命战士和在他们影响之下的那些工人阶级部分以促进这个过程。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里，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工具。或者在共产党组织内部或者在外部可能再发生1956年的回到列宁道路上的运动。不管是在党内或在党外，都不是一个改造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党以作为具有政治革命战略的第四国际的一部分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回到左派反对派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和政策上去，而尤其重要的是以这种精神教育青年。在促进这一工作上必须不失掉任何机会，虽然开始是细小的和不足道的。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
利事件表明，在工人国家里缺少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会带来悲惨的后果。这些事件指出，如果将来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就迫切需要建立这样的党。只有把革命的真正力量组织成为深深扎根在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并以此和官僚机构相对抗，才能给官僚机构带来历史上的灭亡命运。在苏联、东欧和中国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和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无条件地保卫这些国家以及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国际就是我们对于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政策的根本精神。

10. 在斯大林采用“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三十六年以后，现在的世界形势明确地告诉我们将来的革命是一个世界革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各大国的核武器装备给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说以最尖锐的反对。只有一方面是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新的关系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工人国家范围之内，也还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一种有计划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随着先进国家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必能在它的真正客观基础——高度生产率的物质基础和资本主义本身所发展起来的国际分工——上得到发展。

6. 第四国际

1. 在全世界上建立革命领导的主要任务牵涉着第四国际的改组问题，所以也就牵涉着对于巴布洛集团的研究。从这个集团的文件和活动上看，巴布洛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试图从数量上来估计所谓“客观因素”。“
并以此降低在革命领导指挥下的群众所起的作用。这种在“客观”力量面前退却的主张使人们常常谈到“无可挽回的”和“不可抵抗的”过程。在苏联的情形下，它使人们得出关于群众“压力”的极端的结论，认为这种压力会迫使官僚机构自动地趋于“开明”和恢复苏维埃民主。巴布洛主义者就是使用“政治革命”这一名词也与建立革命领导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巴布洛主义者倾向于对斯大林主义者势力的过高估计，并使人们相信在某种情况下，群众压力将同样地起作用以使共产党掌握政权。事实已经使人们很难相信这种预测，但是它仍然意味着对于无产阶级信任的保留和对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的轻视。在早期，这个同一的空想主义曾制造世界大战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和即将到来的学说。这个同一的理论体系今天表现在下列的公式上边。

“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在历史上的迟到来是领导的叛叛和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发展之间彼此辩证地互相影响的结果，通过这一事实，殖民地革命就和工人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一起在客观上成为了世界革命的动力。”

2. 我们的分析与评论家所特有的这种抽象混乱的词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评论家脱离事实并把这些事实随便归之于某些人所起的主要和次要作用。在目前的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研究社会矛盾和工人阶级本身所起的作用，其目的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建立领导。例如，宗主国家里边的稳定，如已经表明的，与一系列强烈反抗资本主义和使帝国主义根本矛盾复杂化的世界力量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决定于这种力量。五十年代的经济上升，其本身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原来是健康的或者在牢固的基础上恢复了它的旺盛的精力。此外，这种上升一直是工人阶级组织加固的基础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削弱。
3. 革命运动所遇到的最大危险就是产生于或者向帝国主义者力量投降或者向工人运动中的官僚机构力量投降或者同时向二者投降的取消主义。布哈洛主义, 现在甚至比 1953 年更明显地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代表着这种取消主义的倾向。根据布哈洛主义, 先进的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上的先锋队, 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马克思学说和战略的中心, 而是以抽象的方式来加以研究和估计的“世界历史因素”的玩具。布哈洛分子国际会议的决议草案对于这一点是不讳言的。根据他们的看法, 世界革命现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工人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殖民地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在先进国家里的斗争,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 而被完全贬低到次要地位。这里否认了革命运动的一切历史任务, 一切都服从于周围环境的力量。苏联官僚机构的作用问题和殖民地革命的阶级力量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是自然的, 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工人阶级在先进国家里所起的作用和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上的危机。

现在迫切需要对于这些问题确定一个正确的革命方针, 因为在日本和英国已经开始的巨大斗争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面前直接提出了阶级领导的问题。在每一种情形下, 这些问题都是帝国主义最近的危机在这些特定国家里的特殊表现所强迫造成的。围绕这些问题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加剧, 而且要扩展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任何从工人阶级政治独立和建立革命的党的战略上的撤退, 都意味着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方面要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4. 第四国际各支部必须特别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认识到只有通过不断地为正确方针而斗争和与其他派系展开竞争才能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 而不是去寻求一个共同基础。每一个
国家里的支部都要从国际的纲领出发，从第四国际的过渡时期纲领所总结出来的策略和基本概念出发。如支部认识到，这里并没有个别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国，殖民地和以前的殖民地以及在苏联范围以外的所有斗争都是互相依存的。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工业处境都受整个世界趋势的影响。

5. 在任何国家里建立革命的党都必须从坚持国际纲领和战略出发。但是，我们参加斗争的战术和方式必须产生自从那个国家里的阶级关系开始的具体讨论并考虑到一切有关的问题。因此，从一个由整个世界趋势中概括出来的普遍有效的战术出发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例如，我们不能以这种办法在一切有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或者共产党存在的国家里都规定使用”打进去”战术。每一种情形，都必须根据那个特定国家的历史因素、阶级斗争的步骤、群众的需要和运动本身的情况来加以考虑；”打进去”战术也许非常正确，但是它必须建立在这种对于形势的全面考查上。

6. 革命者必须把他们的活动和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因为工人阶级本身是决定形势的因素。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坐下来像公正的观察家那样从旁观察，他们本身是促成事件发展的参加者。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工人阶级中的一切其他倾向都是以帝国主义胜利和工人阶级失败为根据的非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所造成的结果。

7.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里的运动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于阶级斗争的研究制定一个提出过渡时期要求的纲领，这一纲领将为一切与政治党派和工会的官僚机构展开斗争的那些支部提供一个斗争中心。我们必须用一个根据阶级斗争路线的统一纲领，以工人阶级自己的经验向他们证明：如果不摆脱官僚主义的领导，他们
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就不能获得胜利。在参加提高工人觉悟的一切运动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思想意识的统一。这种参加的整个目的是为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个领导将得到一个群众的党的承认并领导这个党走向发展。

8. 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人数不多，但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与工人阶级共同取得主要经验。这种参加并不是根据要和“主流”在一起的观点，促成这种参加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到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不管这种参加是否牵涉到加入一个有广大群众的党的问题，它都永远是一种独立地参加斗争。事实上，为了加强在各传统的党里边的工作，这是一项首要任务。

9. 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是为了把这些党改造成为革命的党的这种想法必须予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党的战术与压力集团或者新政府派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这就使他们与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工人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权”可以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或者它的“准备阶段”——处于反对的地位。在这些党控制着工人阶级群众的地方，如在法国、意大利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随时正确地提出“夺取政权”作为中心的口号。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种加入的想法当作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提出来。这个号召不是为了支持改良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而是作为突破他们对于群众运动控制的一个步骤。这些政权和它们的妥协政策与背叛是教育工人阶级和引导他们建立革命政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10. 工党官僚——在帝国内主义国家里掌握政权和靠着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那些工党官僚——不能由于自然发展或者由于中间派那种广泛的宣传布置而被从革命运动中清洗出去。英国工党
在1960到1961年两次年会期间的经验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渴望保持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所以他们的狭隘利益和群众利益发生了冲突。即使他们被迫领导斗争，或者为了维护特权而被迫维护工人阶级取得的成果，他们也是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方式。这些方式是不惜一切代价以避免动员工人群众的阶级力量。

11. 1963年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表明，在关于世界战略和建立革命的党的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可调和的派系。巴布洛主义代表离开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中同派。虽然在有些问题上它的路线表面看来和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路线相似，但实际上它的方针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自分裂以来，政治上的根本分歧越来越多。我们同作为一个政治派系的巴布洛主义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相反地，只有对于巴布洛主义究竟代表什么进行彻底的讨论，然后才能使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特别是现在在各国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年干部受到教育。

12. 1953年的尖锐而突然的分裂在有些国家里造成很大的混乱。甚至现在还可以看到这种混乱存在的一些迹象。这一问题必须尽快地予以解决。但是，完全用组织上的手段来重新统一这一运动的任何企图只能造成进一步的分裂。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并不反对统一，但是它反对那种不是以通过国际间充分讨论之后而取得的政治上的根本同意为基础的假统一。只有通过这种讨论才能重新改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成为一个单一的世界的党。所以我们不认为如1958年所看到的那种“平等委员会”的提议能够再被用来作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针。

13. 托洛茨基于1938年建立的作为一个世界组织的第四国际已经不存在。它已经为巴布洛的修正主义所破坏。惟一继承第
四国际理论传统的是那些属于国际委员会的各支部。因此必须立即着手改组第四国际，其方式是准备进行一次彻底的讨论，由属于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的各支部在讨论中提出决议案和意见书。并尽可能广泛地把这些文件散发给整个国际运动。这次讨论必须于1962年1月以前开始，并且必须建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委员会负责组织这次讨论。这个小组委员会应包括来自两派的同等数目的人员，其任务是广泛散发各种资料并使各支部的基层党员都有机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一年之后必须召开国际运动的筹备会议以确定从讨论结果产生的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然后就可以为国际运动提出新的党章。

14. 对于“打进去”的战术问题和各支部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组织内部进行工作的经验做彻底的研究将是这次讨论的一个特点。这种讨论对于整个运动一定有极大的教育价值。

15.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把本决议提交国际讨论。我们主张在有无限美好机会的时候改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些机会可以过重新建立一个权威性的世界领导来实现。我们要求所有支部对此予以密切的注意。
战争与第四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 1934 年 6月通过的提纲草案）

引言

(本提纲出版时，正当战争的危险以山雨欲来的形式笼罩在欧洲的上空。裁军会议已经变成了缔结新的军事同盟的战场。墨索里尼和魏刚将军正在呼吁增加军备。昨天遭受新的世界屠杀的考验的是奥地利，今天则是萨尔和满洲。在整个世界，用作人们谈话题材最多的莫过于空中动员、加强航空与军舰、化学战争、工业动员，等等。)

和 1914 年一样，第二国际的爱国主义领导者又在作为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人而准备为未来的战争提供炮灰。

无能为力的第三国际的领导者，正在把群众引入歧途，他们用像假面跳舞会那样喧闹的代表大会来代替反对战争的动员。

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须在不顾两个国际和反对两个国际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斗争必须给予一个新的基础和一面新的旗帜——第四国际的旗帜。不管第四国际的干部在人数上多么少，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明确性将会使他们起决定性的作用。牢记着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心
問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分化过程的焦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组织的性质将在这个斗争中暴露出来；可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干部，将在这场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

只有对本提纲以严肃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会在反战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装。但是，尽管对本提纲的学习、讨论和批评是有用的，可是还不够。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以本提纲的精神，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列宁的精神，进行战斗。

本提纲经过某些增补和修改后，已于1934年2月在我们的期刊《问题与讨论》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布了。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将本提纲公诸无产阶级大众。

1934年7月10日，日内瓦
国际书记处

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益衰弱，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时代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的论断。

1914—1918年的战争，正式地宣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到今天为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世界各国人民可怕的灾难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危险，都是由于1917年的革命没有在欧洲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得到胜利的发展的结果。

在个别国家内，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死胡同，表现在慢性的失业现象，表现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现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表现在议会国家的解体和腐败，表现在以所谓“社会的”和
“民族的” 蟑螂宣传来涂意毒害人民，即实际上取消了社会改良并
把旧的统治政党抛在一边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军事警察机构（资本主义衰弱时期的波拿巴主义），表现在法西斯主义的滋长，表现在
每个无产阶级组织的当权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样的过程正在冲走国际关系稳定性的最后
残余，使各国之间的每个冲突都濒于剑拔弩张的境地，暴露了和平
主义的各种企图的无用，使军备在一种新的、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增
长，从而导致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战争
的一贯的推动者和组织者。

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反抗腐朽透顶和掠夺本性的暴露，民
主主义、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破灭，无产阶级对寻求一条避开当
前灾难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国际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
来了。

只有通过起义的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使人类免于
一场新的对各国人民的毁灭性的屠杀。

一場新战争的准备

1. 与现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样
事件，现在已经达到了远比 1914 年 6、7 月间严重的紧张局面。对
于一場新的战争的后果的恐惧，是束缚帝国主义意志的唯一的因
素。但是，这种遏制力量的效用是有限的。内部矛盾的压力，把一
个个的国家先后推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法西斯主义本身，除了
准备国际性的爆发外，还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各国政府都害怕战
争。但是哪一国政府都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不经过又一次无产阶
级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2. 欧洲，一个历史上离开我們最近而规模最大的战争的战场，
無論是戰勝國和戰敗國方面，都在繼續走向衰減。根據正式的綱領以當“和平的組織者”為己任的國際聯盟，事實上是力圖使凡爾賽體系永久化，使美國的領導地位中立化，並且建立起一個對紅色東方的堡壘，但它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沖擊。只有最冷酷的社會愛國者（漢德遜、王德為等）才仍然力求把裁減軍備與和平主義政策的前途同國聯聯系在一起。事實上，國聯在帝國主義聯合的棋盤上變成為一個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本進攻後進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尋求軍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說，是熱狂地準備一場新的屠殺。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軍備的不斷擴張，法西斯的德意志這方面已經作了一次最新最巨大的推動。

3. 國聯的崩潰，是因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法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實力，正如人們所預料的，異常薄弱，不適于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基地。具有優良的軍事裝備和顯然帶有“防御”性的法帝國主義，只就它是根據合法的協議而不得不來維護它的搶劫和掠奪成果來說，實際上仍然是新的大戰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國的資本主義受到嚴重不變的矛盾和戰敗的後果的壓力，已經被迫掙脫了民主的和平主義政策的束縛，而現在卻成為凡爾賽體系的主要威脅了。歐洲大陸的國家聯合，基本上仍舊遵循着戰勝國與戰敗國的路徑。意大利處于一個背叛性的中間人的地位，在決定性的關頭，它會把自己的友誼出卖给強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大戰中所表現的那樣。英國希望利用歐洲的各種敵對關係，利用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矛盾以及遠東的即將來臨的衝突，以圖保持自己的“獨立”——這是它過去“光榮的孤立”的遺影。但是，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對
的摇欲坠而惊慌失措，他们要用麦克唐纳和汉德逊的令人作呕的“伪善精神”来弥补他们贪婪而怯懦的观望与权宜政策，而这个政策反而成为今天的普遍不稳定和明天的大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在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的国内外地位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美国对欧洲的完全统治世界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使美国资产阶级在战后的最初时期能够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门户开放”的保卫者而出现。但是，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以可怕的力量显示出原来在国内市场找到充分支持的旧的经济平衡状态，已经受到骚扰了。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当然，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并不是已经消失，相反地，由于欧洲的进一步的分崩离析，它甚至已经以潜伏的形式增长起来了。但是，这种优势所表现的旧形式（工业技术、贸易差额、稳定的美元、欧洲的贷款）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意义；先进的技术不再使用了，贸易差额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贬值，债务尚未清还。美国的优势必须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出一条只有战后才能打开的道路。

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口号，在少数的几个日本基地面前，就显得无能为力。华盛顿在执行远东政策时，力求在最合适的时刻，掀起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冲突，削弱日本和苏联的力量，使战争的结局而制定出进一步的战略计划。在依照习惯继续讨论解放菲律宾的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准备为自己在中国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阶段与英国有更大的冲突，提出“解放”印度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着曾经把1914年的德国推向战争道路上的同样的问题。世界不是瓜分了没有？它还必须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必须“组织”世界。历史正在使人类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

5. 依靠落后、贫困和野蛮的桨汁生活的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
正在被国内不堪忍受的溃疡和脓疮所驱使，走上了不断的海盗性掠夺的道路。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基础，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安定，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最富于侵略性和肆无忌惮的。但是，未来的历史会表明，在这种贪婪的侵略后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无几的。日本可能首先发出战争的讯号；半封建性质的日本虽然被曾经袭击过沙皇俄国的各种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从这个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从别的国家，可能发出革命的号召。

6. 当然，如果确切地预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会打第一枪，那未免是太冒险了。在苏美协定以及国内困难的影响下，日本可能暂时退让。但是，恰恰相反，同样的情况也可能迫使日本军阀利用时机加快进行攻击。法国政府会不会决心来一次“预防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的援助下这种战争会一会转变为一种普遍性的战争呢？或者相反，在观望和策划的同时，在英美的压力下，法国会不会走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道路从而为他开辟向东方进攻的道路呢？

巴尔干半岛会不会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或者这一次将由多瑙河国家采取主动？因素有许许多多，各种冲突力量又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排斥了具体的预测的可能性。但是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绝对清楚的，这就是：战后时期已经简直变成了两个大战之间的休整时期，而这个时期就要在我们面前消失。计划化的劳资协会式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同极权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或法西斯主义国家，密切地配合行动，只就它的官方任务是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进行一种和谐的国民経济来说，它仍然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谎言。但是，既然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的一切经济力量以准备一场新的大战的问题，那末，它也是一种危险的现实。这个工作目前正在全力开展。一场新的大战已经在到处敲门。这幕大
战比起以前的战争将更残酷，更富于破坏性。正是这个事实使对待日益迫近的战争的态度成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

苏联和帝国主义战争

7. 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的尖锐化程度是依工人国家的演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的惊人发展和劳动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败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义对外政策，也只会减少世界资产阶级的不安。最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重新加剧，迫使欧美各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同苏联接近起来，这不是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种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出发，而是着眼于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协定和华盛顿政府的承认苏联，等等，是这种国际形势的明显标志。希特勒为了使德国重振军备合法化，以“东方的危险”为名作了苦心孤诣的奋斗，其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反应，特别是法国及其它附庸国方面的反应，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危险，尽管还有可怕的危机，但已丧失了它的锋芒性。因此，苏联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于国际革命的极端衰弱。

8. 但是，如果认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完全从议程上取消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纵横捭阖的关系即使有所缓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仍然会全部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衰退会促使资产阶级政府作出断然的决定。每一次大战，不管它最初的动机如何，终归要提出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以便向资本主义硬化的血
管中輸送新的血液。

苏联国家明显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义臭化以及它的对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苏联作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社会性质。各种各样的民主的、理想主义的、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都无视苏联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在趋向性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否认或避而不谈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们不可避免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时，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结论。

不管形势如何，不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保卫苏联免于资本主义敌人的攻击，是每个忠诚劳动者组织的基本的和应尽的义务。

“保卫国家”

9. 在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地方割据现象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活动场所。但是，民族国家刚刚形成，就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障碍。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同生产力与生产手段私人占有的这个主要矛盾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危机。

10. 如果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能够一下子废除的话，那末，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是能够继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的（这当然要作许多牺牲）。正如苏联的经验表明，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要是废除了，那末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生产力也可能获得较高的发展。但是，只有废除了私有制和国与国之间的障碍，才能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11. 保卫民族国家，首先是在割据成许多小国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发祥地——是一个十足的反动的任务。设有边界、通行
证、货币制度、关税以及保护关税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废除民族国家。

12. 如果现在的民族国家果然能够代表一切进步的因素，那么，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问是谁首先”发动”战争，它是一定要加以保卫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对于一所适于居住的房子，难道人们只是因为它主人不小心或意图不良而引起的火警就拒绝抢救吗？但是这里所谈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民族国家的结构必须彻底改变，才能使各国人民生活下去。

13. 进行保卫国家的战斗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经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调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做到不以战争的图谋为重，而以阶级斗争的图为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力，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袭。这就是说，只有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

14. 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民族(nation)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历史把民族的命运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阶级才拒绝把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工作委托给帝国主义，事实上，帝国主义”拯救”民族的结果，只能使民族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在将来遭受到新的危险。
15. 資本主義雖然曾經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沒有完全地解决有关民族的问题。凡尔赛的欧洲的边界，是脱离现存的民族集体制而划定的。重新划定資本主義欧洲的边界，使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一致的主张，是一种纯粹的空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场新的战争，也只会按照战争的地图，而不是与民族的边界相适应，来重新划定欧洲的边界的。完整的民族自决和欧洲各国人民和平协作的任务，只有在扫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欧洲的经济統一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欧洲联邦”的口号，不仅是拯救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各族人民的口号，而且也是拯救德法两国人民的口号。

16. 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问题，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还是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的。它们的斗争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它们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亞細亞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縛，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须预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是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新时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的插曲，正如在同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俄国的后起的民主转变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17. 在南美洲，兴起了但已开始衰退的資本主義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间的剧烈火并暂时停止了。引起了各国内部连续不断的大转变，也引起各国之間相互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資产阶级能够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联合而成为美洲大陆北部的一个联邦，因而它现在已经可以利用他们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权力，来瓦解、削弱和奴役他們...
的南半部。南美和中南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 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 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 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 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钱买的代理人, 而是年轻的新美无产阶级, 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 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 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 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

无论在什么地方, 民族问题都是同社会问题同时发生的。

保卫民主

18. 保卫国家的虚伪性，到处都是以保卫民主的补益的虚伪性来加以掩饰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随时准备击退法西斯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进攻, 难道在战争的情况下, 无产阶级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吗?

真是奇谈怪论！我们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方法来保卫民主,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 我们决不把这种保卫委托给资产阶级国家 (“Staat, greit zuj”归国家负责!)。如果说在和平时期, 我们同“民主”的政府就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 那末, 到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和罪行都采取了最残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战争时期, 难道我们对它还应担负丝毫的责任吗?

19. 大国之间的一场现代的战争, 决不意味着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 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同时, 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的性质, 在两个阵营中都既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 拿破仑主义的, 等等)国家, 也会有“民主主义的”国家。法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形式在过去并没有防止
它在和平时期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军事资产阶级专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时会恢复奥匈帝国的作为反对奥地利与德国统一的障碍一样。最后，在法国本身，今天已经相当削弱的议会民主政府，如果在战争开始前还不予以推翻的话，毫无疑问会成为战争的首批牺牲者之一。

20. 一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而且还要继续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险时，它怎样不费多大周折就能使议会的统治形式变成极权的、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战争期间，国内和国外的危险，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阶级利益；这时，它就要使这种变化来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是对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的放弃和沙文主义的道德败坏，也就是说，毁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 战争时期“保卫民主的斗争”，首先是意味着争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组织以反对敌肆的军事检查和军事当局作斗争。革命的先锋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22. 帝国主义战争，远比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形式的问题更为重要。它在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提出了民族资产主义的命运的问题，在各国的资产阶级面前则提出了一般资本主义命运的问题。无产阶级也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保卫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

23. 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
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这些国家不能执行独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赋予国界的保卫以无可辩驳的绝对的寡头主义的性质。但是，仅仅以比利时为例来说，我们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么自然地会被帝国主义公约的体系所代替，“保卫国家”的战争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合并主义的和平。战争的性质，不是决定于战争本身所采取的发端的步骤（“中立的破坏”、“敌人的入侵”，等），而是战争的主要动力，战争的整个发展以及战争最后导致的结果。

24. 不难理解，瑞士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毅然决然地首先发动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都具有远为充分的理由来谈防御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于事件发展的进程而拖入战争的时候，它就会为了追求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目的而参加世界强国的斗争。中立地位要是破坏了，瑞士的资产阶级就会同进攻的双方中较强大的一方联合起来，而不管哪一方对于破坏中立应负有较大的责任，也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里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战期间，比利时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国，但它决不止于同盟国的阵营，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又感觉到破坏希腊的中立是有利于图的了。

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农民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正如上次大战扫除了比利时的中立一样，新的战争也不会给瑞士留下任何独立的痕迹。即使没有独立，瑞士在战后是不会继续保留国家的地位，还是会被德、法、意三国瓜分，这个问题要依一系列欧洲的和世界的因素为转移的，其中瑞士的“保卫国家”一项只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
由此可见，就中立的、民主的瑞士来说，尽管它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而且在我权看来这里的保卫国家的概念似乎是最纯粹没有的了，可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还是没有例外。对于资产阶级的要求："参加保卫国家的政策"，瑞士的无产阶级必须回以保卫阶级的政策，才能在下一步向着革命前进。

第二国际和战争

25. 保卫国家的戒律是从这样一个教训推论出来的，全国各阶级的团结高于阶级斗争。事实上，有产者从来不是在一切条件和任何条件下都这样地承认保卫祖国的，而是利用这种说法对保护自己在祖国的特权地位进行掩饰。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变为"被打败者"，也就是说，他们准备通过外国的武装援助来恢复他们的特权地位。

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愤于忍受牺牲的被压迫阶级，是从表面价值来接受"保卫国家"的口号的，也就是说，把它看做是高于阶级之上的绝对的义务。第二国际各党的基本历史罪行，就在于他们培养了和加强了被压迫者的奴才习惯和传统，挫折了他们的革命义愤，用爱国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如果说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大战的末期不曾在资产阶级推翻，如果说人类今天饱受危机痛苦的折磨，如果说一場新的战争有可能把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那末，第二国际应对这些罪行和灾难负主要责任。

26. 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能为力。如果说在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弃阶级斗争，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的时代，也就需要丢开"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为害性并不少于战争。远在1915
年4月，罗莎·卢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话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革命，阶级斗争在战时也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规律……
革命，在平时，阶级斗争也是违反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一种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思想，已经通过法西斯主义而转变成无产阶级的锁链和镣铐了。

27. 德国的社会主义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对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推走的时刻为止。法西斯主义最后取代民主主义的事实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会民主确保它的利益和特权，社会民主就能保持它的爱国主义性质。前普鲁士王朝的爱国主义者，一旦侨居国外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准备欢迎法西斯资产阶级反对希特勒的防御战了。第二国际毫不为难地大批了威尔斯（Wels）之类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日，只要德国资产阶级的小指头一动，召唤它们回来，他们就会重新转变为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28. 法国的、比利时的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德国事件的反应是，在“保卫国家”的问题上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公开的联盟。法国当局正在同摩洛哥进行“小型的”、“意义不重大”但非常残酷的战争，与此同时，法国的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则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一般战争的惨无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国方面的复仇战争。在仅仅发生新利益问题的地方对掠夺殖民地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地予以支持的政党，在一桩涉及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自身命运的大战中，一定会闭着眼睛来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 今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同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夕比较起来，是空前地深刻化和尖锐化了。反对群众的爱国主义偏见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中派主义与战争

30.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国际这个革命政党，从而产生了创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共和国“革命”，某些国家选举制的民主化，受惊的欧洲资产阶级战后最初几年在社会立法方面所作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和列宁主义的追随者的灾难性的政策一起，曾给予第二国际这个不再是革命的政党而是一个和平改良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工人党以大量的喘息时机。可是，曾几何时——最后与上一次世界性危机的来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终于完结了。资产阶级转而采取反攻。社会民主党背叛性地放弃了一个个的成就。近年来，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议会式的、工联式的、地方自治的、劳资协作的“社会主义”，都已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和灾难。正因为这样，在新战争的准备面前，第二国际感到沮丧灰心了。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褪色的过程。始终一贯的改良主义着上了新的色彩，它变得沉默起来或是分裂开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样的中派主义所取代，有的表现为旧的政党内部的无数派别，有的表现为独立的组织。

31. 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伪装的改良主义者和右翼中派主义者（伦勃・勃鲁姆，亨利・德・曼，罗勃・格里姆，马丁・特兰梅尔，奥托・鲍尔等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词句，企图一面安抚资产阶级，一面愚弄工人阶级。他们提出了经济“计划”或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许诺在保卫祖国免于外部“法西斯主义”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这样地提出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掩盖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获得政权的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幌子下，提出保卫资本主义祖国。
32. 左翼中派主义者本身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荷兰的独立社会党、英国的独立工党、法国的齐罗姆斯基和马柯·皮特维特集团，等等），他们在口头上的放纵中还不能得到必要的具体结论。他们的国际主义，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话，是带有柏拉图式的纯精神的性质。他们不敢摆脱右翼中派主义者，他们在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名义下，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拒绝为革命的国际而战斗，继续呆在以国王的信从王德威尔得为首的第二国际里。中派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刻也能表达群众向左转变的趋势，但归根结底他们是阻挠无产阶级内部革命的重新集结，从而也阻挠反对战争的斗争。

33. 中派主义在实质上意味着半心半意和犹豫不决。但是战争的问题最不利于犹豫不决的政策。对群众说来，中派主义永远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日益加剧的战争的危险，将要促使中派主义各派别内部的分化日益尖锐，尽管它们今天还在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头脑摆脱中派主义的束缚，就会越有效地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调和地提出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

苏联的外交和国际革命

34. 在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本身就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场。但是从这时起，这个公式获得了崭新的历史内容。孤立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实体，而仅仅是一个为世界革命所用的工具。无产阶级在保卫苏联时，不是保卫国界线，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线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
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在国内的范围内达到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一切成就都注定要归于失败；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这个深入到血液和髓髓的坚定的信念，才能为战争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创立可靠的基础。

35. 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出发的苏维埃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问题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军和互不侵略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维埃政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得不采取纯粹形式主义的说法，这是有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这些由于国际革命的软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苏维埃政府本身摒弃的错误所强加给自己的迁就敌人的方式，是决不能变成一种普遍适用的体系的。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论，长久以来超越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许切实可行的妥协的界限，而这种行动和言论居然已被规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经变成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的根源。

36. 裁军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经验证明，插曲性质的裁军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军备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罢了。重新发动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军备的可能性，是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普遍”裁军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较强大的工业国的军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军”决不是完全裁军的道路，而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重整军备的道路。把裁军说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为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结成共同阵线而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37. 苏维埃政府在同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协定中有权就侵略一
詞的涵義以最大的精确性加以闡述。我們对于这种权利，我們决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个有条的法律主义的公式轉而用作国际关系的一种最高調节者，那就是要利用保守主义的准则来代替革命的准则，而把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归纳为保卫现有的兼并和用武力建立起来的边界了。

38. 我們不是和平主义者。我們认为革命战争既是一种起义行动也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一种手段。我們对待战争的态度，不是取决于对“侵略”的合法主义的公式，而是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战争的问题。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也同样在阶级斗争中一样，“防御”与“侵略”仅仅是实际权宜措施的问题，而不是法律准则或倫理准则的问题。单单一个侵略准则只能为勃鲁姆、王德威尔得等人的社会主义政策创立支持的根据，这些人是由了凡尔赛条约才能在保卫和平的幌子下保卫帝国主义的掠夺物的。

39. 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也不放棄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极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侵略性质中維持现状的保守主义的綱領。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民族国家的反动作用的模糊，导致对民族国家的调和，对民族国家的理想化，减弱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

40. 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以工人阶级的国家必須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为理由，来为苏联外交政策辩护。这种論断本身固然无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体化。

每个阶级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說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須辨别和利用国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那么，仍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就必須知道如何辨别和利用国内敌人阵营中的矛盾。第三国际原来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
改良主义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使它面临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以苏维埃外交政策为转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违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违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各种联合

41. 苏维埃政府现在正在改变它的关于国际联盟的方针。同过去一样，第三国际还是依样画葫芦地重复苏维埃外交的词句和姿态。各种各样的“极左分子”利用这种情兄再一次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间排斥苏联。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虑为转移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苏联同国联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证据，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国联以及一般地说是整个和平主义者思想意识的更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评价都没有共同之处的。

我们对待国联的原则上的态度，和我们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在国联之内或之外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敌对集团之间的策略，也是以对待国联的策略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国呆在国联内，国联就有可能变成为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强盗达成牺牲苏联的协定的场所。日本和德国——苏联最直接而主要的敌人——退出国联之后，国联一部分变成法帝国主义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团，一部分变成法、英、意三国间火并的舞台了。同国联这样或那样的联合，都可能加强在苏维埃国家的身上，由实质上都是同苏维埃国家敌对的帝国主...
义阵营所操纵。

42. 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对当前的形势作出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同时，还必须把下列的考虑放在首要的地位；

1) 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后，苏联仍然需要寻求同国联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义公式来遮饰这种和解，这正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衰弱，从而是苏联国际地位的极端衰弱。

2) 苏维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义的措辞和它对国联的恭维话，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对它们不负任何责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们的肤浅和虚伪，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现实的力量和真正的对抗矛盾的基础上，更好地动员无产阶级。

43. 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者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不能认为是会有的。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暂时的结盟十有八九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外革命的最大的危险。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个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绝保卫苏联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于苏维埃外交，从而也不依赖于第三国际的官僚机构。

44.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坚决而忠实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一个同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整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意。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情
爭形勢而產生許多差異。譬如說，在蘇聯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時，假若美國的產階級阻撓美國的軍火運送到蘇聯，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就义不容辭地可以采取罷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

45. 産階級對蘇聯的帝國主義盟國的不可調和的反對活動，必須一方面根據國際階級政策，另一方面根據該國的帝國主義目的，來揭發這個“盟國”的背叛的性質，揭發它在蘇聯進行資本主義傾瀆的投机活動。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党的政策，應當以對資產階級实行革命的推翻和奪取政權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同蘇聯的真正的聯盟，才能把第一個工人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

46. 在蘇聯國內，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的戰爭，毫無疑問會激發起轟轟烈烈的鬥爭熱情。一切矛盾和敵對看來都能被克服，或者無論如何會達到不顯著的地位。從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年輕一代的工人和農民，將會在戰場上顯示出巨大的能動力量。集中化的工業，尽管有缺陷和缺点，可是將在滿足戰爭的需要方面，發揮巨大的优越性。蘇聯政府毫無疑問已經建立了大量的糧食儲備，足以應付戰爭初期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當然會清楚地知道，他們會發現紅軍是強大的對手，同這個對手鬥爭需要很长的時間而且要對軍隊進行異常嚴格的訓練。

47. 但是，正是戰爭的曠日持久的性質，將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與官僚主義計劃的矛盾。在許多情況下，巨大的新企業竟然變成了同様巨大的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響下，農民經濟的個人主義傾向將得到極大的發展，集體農庄內的實力力量將隨着戰爭逐月增長。不受監督的官僚主義的統治將要變成一種戰爭的專政。缺少一個生氣勃勃的黨作為政
治上的监督者和调节者，就会导致矛盾的极端积累和加剧。在如
火如荼的战争气氛中，人们将能看到的，是朝着农业和小手工业方
面个人主义原则、朝着吸引外国的和“盟国的”资本的大转变，是外
贸易垄断制中的破坏，是政府对联合企业的监督的削弱，是联合
企业相互间的竞争的尖锐化，是它们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在政
治方面，这些过程意味着垄断主义已臻于完整的地步，在所有制
关系方面将发生相应的变化或一系列变化。换句话说，假使帝国
持久的战争继续以世界无产阶级的消极被动，则苏联的内部社会矛
盾不仅可能而且一定要导致一场资产阶级拿破仑主义的反革命。

48. 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明显的：

1) 在帝国持久的战争下，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
苏联这个工人阶级国家。

2) 只有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摆脱苏联的官僚主义而达到完全
的独立，在“友好的”、“结盟的”以及敌对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
的准备，才是可以指望的。

3) 无条件地支持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队的活动，必须同
进行对战争和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密
切地配合起来，必须同在苏联国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
宁主义革命党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来。

第三国际和战争

49. 第三国际既已在战争问题上放弃了原则性的路线，就在失
败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犹豫不决。在德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
斗争，转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竞争。同“社会解放”的
口号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号，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
失败主义没有任何区分。在萨尔问题上，共产党一开始就屈从于民
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而摆脱了这种思想。

第三国际德国支部在战争时期将要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呢，“希特勒的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吗？但是，如果说民族解放的口号在“法西斯分子”弥勒和勃鲁宁的统治下是正确的，那么，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它怎能就不适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只适用于平时而不适用于战时呢？的确，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曾经竭力使他们自己和工人阶级陷于彻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 第三国际虚弱无力的革命主义是它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在德国的灾难之后，那些所谓共产党，在所有它们经受过考验的国家里，已暴露出它们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国支部根本不能动员哪怕是少少数万工人来反对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掠夺，在所谓“民族危险”的时刻，它无疑地将会遭到更多的破产。

51. 没有城市广泛的劳动群众的革命动员，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个斗争还要求直接影响陆海军以及运输业。但是，不通过对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影响，是不可能影响兵士的。运输业方面的影响，是以工会中一个坚强的据点为先决条件的。在这里，由于工会国际（Profintern）的帮助，第三国际在工会运动中已经失去了一切阵地，使自己断绝了接近劳动青年的一切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反对战争的侈谈，就好像是痴人说梦一样。幻想是万万行不通了，要是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进攻，第三国际就要化为乌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义和战争

52. “左翼”和平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种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证，从这种前提出发，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
竭力进行“厌恶战争”的说教，支持自觉的反对者，宣传反对战争的
d制和总罢工，或者毋宁说总罢工的神话。更“革命的”和平主
义者有时甚至不厌其烦地谈论反对起义的问题。但是对于起义和
革命党的阶级斗争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什么，他们无伦是
全体或是个别的人，都是一窍不通的。对他们说来，起义只是针
对统治阶级的一种字面上的威胁，而不是一个长期坚持奋斗的
事情。

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利用群众对和平的天生的热爱，使这
种热爱和平的情绪脱离了固有的途径，终于转变，双重主义不自
觉的拥护者。要是发生战争，绝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同谋者”将加
入资产阶级的阵营，并且利用第三国际作为一种异常不吉利的东
西赋予他们的权威，以爱国主义的思想来迷惑无产阶级先锋队。

53. 反对战争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及第三国际组织的反
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会都是以自鸣得意的示威、炫耀的游行以及
波将金村社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典型实
例。通过后台的操纵，人为地拼凑起来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对
一般的战争抗议一番之后，将会向四面八方溃散，对特殊的战争连
一个小指头也不会举起来表示反对。

54. 用共产主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集团（其中每
一个真诚的惊慌失措者配合着数十个野心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
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组织的战斗协议，那就会导致完完全全的
策略问题中的折衷主义。巴比塞-美因兹堡代表大会（Barbusse-
Muenzenberg congresses）认为它們的特殊功效是，它們結合了反战
“斗争”的各种类型。人道主义的抗議，个人拒绝服兵役，”舆论“的
ed育，总罢工甚至起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
实际上只能互相冲突的一些方法，象成是一个和諧的整体的组
成
成分。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宣传“综合策略”（自由主义者、个人恐怖和群众斗争的联盟）的俄国“社会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团的鼓舞者来是一批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们必须记住，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民粹派的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小资产阶级和战争

55. 战争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灾难并不比对于无产阶级为少，他们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同无产阶级靠得很近。一般地说，只有这样才能用起义的方法来制止战争。但是，用抽象的理论、现成的公式和简单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农民，甚至会比工人少而又少的。1923—1924 年间在“面向农民”的口号下造成共产国际中的一次大失败的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显示出不仅完全不能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而且连农业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农民国际第一次出殡前演也未举行就不声不响地埋葬了。曾经大肆宣扬的各国农民的所谓“成就”，原来都是昙花一现的，甚至简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国际在农民政策方面的破产具有特别生动的性质，虽然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决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有在实践中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领导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农民才会走上这一斗争的道路。因此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商店和工厂。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变成一支真正的力量，农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紧密地团结起来。

56. 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最低阶层，即最贫苦的农民、半无产阶级、低级公务员、小商贩以及被剥夺了一切生活条件而不能进行独立奋斗的被压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们之
上的一个广泛极力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倾向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类型的野心家。当他们在野党时，这些先生采用最放肆的蛊惑宣传，作为以后在大资产阶级眼中提高自己身价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国际的罪恶，在于它以自己同小资产阶级虚伪的和平主义领导人的戏剧性联盟来代替向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即向它的广大下层群众施行革命影响的斗争。第三国际不但没有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来加强他们的威信，使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的下层成为背信弃义的上层的政治牺牲品。

57. 农民的革命道路要通过工人阶级。要取得农村的信任，必须使先进的工人重新取得对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信任。这一点，只有通过一般正确的政策特别是正确的反战政策，才能够办得到。

“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58. 假如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问题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绝为了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利害，因为这种利害归根结底是与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一致的。列宁的公式“失败是革命的祸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败要比敌国的失败的祸害轻，而是意味着由于革命运动增长而发生的军事上的失败，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好处，远远胜过因“国内和平”而得以确保的军事胜利。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战时的无产阶级政策提供了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自己的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改正由于失败而引起的祸害，而且也会建立起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失败的最后保证。对待战争的这种辩证的态度，是进行革命训练从而
也是进行反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

59.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全部工作所必须服从的总战略任务。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果以及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结果（巴黎公社、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若干交战国中的起义运动），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现代战争会带来每个国家内部的阶级之间的战争，而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在后一种战争中进行无产阶级胜利的准备工作。

60. 1914—1918年的情况还证明，和平的口号同“失败主义”的战略公式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战争情况下，它能发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号只有当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来进行欺骗的时候，当牧师们进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杀的祷告的时候，当“人类的博爱者”，包括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内的，大批地敦促政府在“正义的基础”上迅速媾和的时候，它才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亦即欺骗、麻痹和涣散人心的性质。但是，如果和平的口号能使工人阶层从营房和战壕里走出来，并且同作战双方兵士携手友爱、团结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同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了。采取日益广泛而大胆的形式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战争、法西斯主义和武装无产阶级

61. 战争要求“国内和平”。在当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用法西斯主义来赢得国内和平。因此，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对战争的斗争要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先决条件。要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胜利地击退法西斯主义，那末
反斗争的各种各样的纲领（"失败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就要变成空洞的东西。

要求资产阶级的国家解除法西斯匪帮武装，正如斯大林分子做的那样，是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是威尔斯（Wels）和奥托·鲍尔“要求”这个国家解除纳粹的武装，确保国内的和平。的确，当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民主”政府是能够解除个别法西斯集团的武装的，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加凶残地解除工人们的武装和防止他们的武装进行武装。昨天才“被解除武装”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资产阶级国家就会让他们加倍地武装起来，并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对准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向国家，也就是向资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意味着散布最恶劣的民主幻想，意味着麻痹无产阶级的警觉性，意味着腐蚀无产阶级的意志。

63. 从武装法西斯匪帮的事实出发，正确的革命政策，在于建立自卫的工人武装队伍，在于不知疲倦地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就是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重心。社会民主党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欢重复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词句的人们，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武装工人的问题，便是公开地宣告这种任务是“妄想的”，“冒险的”，“浪漫主义的”，等等。他们不但不（！）武装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间推行他们事实上不实行而且也不能实行的种种宣传。机会主义者之所以需要谈谈军队工作，完全是为了要避

63. 竞取军队的斗争无可争辩地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间进行坚持不懈和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义务。在党的总政策正确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执行这个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党的土地
铜锭以及有关过渡时期各种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触及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为他们开辟了得救的前途，在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里，这对于军队工作的成功，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64. 可是如果以为单单靠宣传就能把整个军队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军队是异己的军队，军队的异己分子是被纪律的铁箍束缚起来的。宣传工作能够在军队中创立革命的细胞并在最进步的兵士当中培养同情的态度。宣传和鼓动只能做到这一点。依靠军队以求主动性来保卫工人组织免于法西斯主义，甚至保证把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用甜蜜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严酷的教训。在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本身在行动中向军队表示甘愿和能够为取得政权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才可能转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这种斗争必须以武装无产阶级为先决条件。

65. 资产阶级的任务是防止无产阶级争取军队。法西斯主义用武装支队来解决这个任务，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无产阶级当前迫切的紧急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保卫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受法西斯匪帮（在他们背后的一定距离有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谁要是肯定工人没有武装自己的可能性，谁就是拿这个预言家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必谈社会主义了，不必谈无产阶级革命和反战斗争了。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纲领就应当收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取消了。

66. 可能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无能为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将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投降的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武装任务本身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假使工人们真正地懂得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末他们就会获得武器。向工人
們讲解政治形势，不隐瞒，不缩小，驱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谎言，这是革命党的首要职责。的确，如果不是用两把刀子对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两支手枪对付每一支手枪的办法，人们怎能保卫自己抵抗死敌呢？别的答案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 应当从哪儿获得武器呢？首先是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对资产阶级警察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可耻的口号。对革命的工人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目标。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厂并非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有着千百万条自卫的途径。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工人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各种各样武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务必清清楚楚地懂得，我们不能规避自卫的任务。一个革命党必须毅然决然地采取主动，把战斗的工人支队武装起来。为此，在武装工人的问题上首先必须清除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犹豫不决和和平主义的议论。

68. 工人民兵或自卫队的口号，只就它是一个武装民兵的问题来讲，具有革命的意义，否则，民兵就要变成一场戏剧性的表演，变成一次炫耀，从而成为一种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队不一定要有榴弹炮，也不必有坦克和飞机。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一些用手枪和绑在木棍上的刺刀武装起来的队伍，几乎攻占了巴本皇宫的宫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类似的一些队伍，就能够抢劫无产阶级（原文如此）的报馆或工会的总指挥部。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人多势众。群众手里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会创造出奇迹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最原始的武器可以为更优良的武器开辟道路。

69. 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以宣传和实际运用反法西斯斗争的明确办法来补充的话，就要蜕化成为中派主
义的词句。在创立地方的保卫委员会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统一战线。保卫委员会所以需要，是为了建立和团结工人民队。这些支队一开始就必须搜集武器。自卫队只是武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阶段。一般地说来，革命是没有别的道路的。

反对战争的革命政策

70. 成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训练党的干部，使他们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条件，正确地理解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而发生的一切政治上的变动。在这个万分火急的问题上，还只是逻辑一般的词句和抽象口号的党，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将会压到它的头上，把它压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专门小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战争的政治经验（帝国主义者对战争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准备；军事总指挥部如何通过爱国主义的报刊来迷惑舆论；反对提纲的防御进攻的作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各个集团；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孤立，等等）。

71. 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宣战的时机是特别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报刊，同无线电广播及电影配合起来，向劳动群众大量灌输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是富有革命性和久经锻炼的党的，也不能是全体党员都抵抗得住这种毒素的。目前关于各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彻底彻底捏造的历史，对于先进工人进行有现实意义的考察的准备毫无作用，而是拿一种杜撰的理想形式欺骗先进工人陷入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状态。

对于沙皇俄国，本来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做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是一个文明国家，也不是属于实行自卫的一方，但是社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一起却不顾这个事实，在一开始就发表了一个充满粉红色的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社会爱
国主义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不久之后采取了更富于革命性的立场，但在审讯该党团时，除穆拉诺夫外，所有被控诉的代表和他们的理论指导加米涅夫，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列宁的失败主义理论。在开始时，党的地下工作几乎断绝了。革命的小册子是逐步地开始印行的，它们把工人们团结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然而没有提出失败主义的口号。

战争的头两年，大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且使党向左转。但是，把俄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新的强大潮流。布尔什维克党的绝大多数的领导，甚至在那时也难以抵挡这个浪潮。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党的中央机关发出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指示。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组织的和解，在多数城市里，发生了直接的合并。为了开展党的国际主义战线，需要最坚决的革命者，主要的彼得格勒各先进地区的革命者的抗議，需要列宁回到俄国，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最优秀、最富于革命性和深人锻炼的党的情况，就是如此。

72. 对于先进的工人来说，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經驗，具有无可估量的教育意义；这种研究向他们指出他们不得不经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巨大压力，同时教育他们，尽管在战争开始时完全孤立也决不要绝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来，不要灰心丧气。

需要同样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阵容，不管这些国家是已经参战还是保持中立。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经验，具有特别的意义，那里发生的事件尽管在进程方面与俄国不同，但归根结底，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必须学会逆水游泳。

73. 必须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酝酿的当炮灰的爱国主义的准备
活动，以推销责任为目的的外交上的谬言支吾；公开和隐蔽的社会。
爱国主义者为给自己准备一条由和平主义到军国主义的桥梁而提出
的叛变性的公式；“共产党”领导人空空洞洞的口号，这些人在战
争的第一天就惊慌失措，正好像德国的“领袖们”在议会纵火的当
天夜里所表现的那样。

74. 必须仔细收集政府官员和反对派发表的论文和讲话中最
能说明特征的材料，拿它们同同上次战争的经验进行比较；预测愚
弄人民的进一步工作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然后以一系列的事实
来证实这些预言，教导无产阶级在事变中善于独立决定自己的方
针，而不至于措手不及。

75. 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力鼓动工作，不应从抽象的
公式出发，而应从打动群众心弦的具体事实出发。不仅需要苦心
孤诣地揭露公开的军事预算，而且需要揭露军国主义的一切伪装
形式，抗德战争的布署、军事的设备和定货，等等。

工人们经过优良的训练，必须在无产阶级所有一切的组织中
以及劳工报刊上提出关于战争的危害性和关于反战争的问题，
要求领导人清楚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办？

76. 为了赢得青年的信心，不仅需要向道德腐败的社会民主主
义和第三国际的令人沉闷的官僚主义宣布战斗到底，而且需要真
正地建立一个以年青一代的批斗精神和革命主动性为基础的国际
组织。

必须唤起劳动青年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文事化的各种各样的
形式。与此同时，为了革命的利益，必须把劳动青年动员起来，实
行文事化（组织反法西斯主义的保卫委员会、红色战斗支队、工
人民兵、争取武装无产阶级的斗争）。

77. 为了在工会和在其他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占领革命阵地，
必须同官僚主义的极端作风毫不留情地断绝关系，在有工人的地方争取他们，领导他们从局部性的任务前进到全局性的任务，从防御转入进攻，从爱国主义的偏见进到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既然大多数国家的工会官僚机构的上层实质上是资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组成部分，那么，一个革命者就必须知道如何同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要把合法的活动同非法的活动结合起来，要把战斗的勇气同谨慎的策略结合起来。

只有采用这些互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才能顺利地把工人阶级，首先是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才能打开通向资本主义兵营的道路，才能唤起一切被压迫者。

78. 只有女工和农村妇女也参加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个斗争才能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的蜕化以及第三国际的官僚主义的变质，向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深、权利被剥夺得最多的阶层，也就是说，首先是劳动妇女，发出了最沉重的打击。要唤醒她们，要赢得她们的信心，要向她们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着要把社会中受蹂躏最厉害的一部分人们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以便反对帝国主义。

妇女中间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证做到以革命的女工来代替被动员起来的男工。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党和工会的一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转由女工去接办。

79. 万一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无力用革命（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来防止战争，那末，工人就要同全体人民一起，被迫参军和参战。拒绝服兵役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消极抵抗、开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厂中的先进工人感觉到自己是资本的奴隶而随时准备解放一样，资本家军队中的先进工人也应感觉到自己是帝国主义
的奴隶。今天他是被迫出卖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决不肯抛掷自己的革命意识。他要继续作一个战士，要学会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战争里都要解说战争的阶级意义，要把有不满情绪的人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宣传党的主张和口号，要密切地注意群众情绪的变化。爱国主义浪潮的低沉、义愤的增长，并要在危急关头劝导兵士来援助工人。

第四国际和战争

80. 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以斗争的革命工具——党为先决条件的。现在既没有一国规模的党，也没有国际规模的党。必须以过去的全部经验（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验在内）为基础，建立一个革命党。拒绝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斗争，意味着对两个现存的国际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支持；在这两个国际中，一个将要积极地支持战争，而另一个则只能瓦解和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

81. 当然，继续留在所谓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忠实的革命工人，为数还不算少。他们继续支持第三国际，在许多场合下，只能解释为他们的革命热诚被引错了方向。能把他们吸引到新国际的旗帜下来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不是取消他们的偏见，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官僚的中派主义）的有害的国际作用进行系统的揭露。因此，必须明确地果断地提出战争的问题。

82. 同时，必须密切地注意改良主义阵营中的内部斗争，把向革命方面发展的左翼社会主义派别及时地吸引到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来。衡量一个组织的各种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实践中、在行动中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特别是在本国资产阶级拥有的自己的殖民地奴隶的情况下的态度。只有在"保卫祖国"的最
紧急的问题上同官方的舆论完全而真正的决裂，才意味着从资产阶级观点向无产阶级观点的转变，或者至少是转变的开始。在同这一类型的左派组织接触的时候，应当对他们的政策中的一切犹豫不决的表现进行友好的批评，并在有关战争的一切理论与实际问题上共同研讨。

83. 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头上承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失败，但他们同时认为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这还不是时候”。这种观点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者的观点，而是幻想破灭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或悲观失望的改良主义者的观点。革命斗争是不容间断的。在今天，革命斗争的条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于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个革命者。认为建立新国际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说法，就如同宣布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一样。在新时代，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得不把国际任务提到自己的面前来。国际任务不得不要求国际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除非向帝国主义投降，否则这项工作是违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 当然，谁也无法预言战争爆发的确切时间，也无法预言在战争的什么阶段会建立新的政党和第四国际。我们必须竭力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准备工作走在新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前头。然而很可能帝国主义也在这个时期赶上了革命。但是这难道预示着有重大牺牲和灾难的道路，也决不能使我们摆脱立即建立新国际的义务。我们的准备工作越向前开展，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革命干部越是坚定不移，他们在参战国中的工作进行得越是系统化，他们的工作越是扎扎实实地建立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那末，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就会进行得越快。
85. 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打第一炮，就会粉碎第二国际腐朽的脊背，就会瓦解第二国际的各国支部。战争将会彻底暴露第三国际的空虚和无力。但是到了那时，帝国主义战争也不会能将优柔寡断的中派主义集团的，尽管这些中派主义集团规避有关共产国际的问题，一味追求民族基础，不使任何问题得到一定结论，同时缺乏长远的计划，暂时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骚扰和混乱过日子。

即使在新战争开始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我们丝毫不怀疑，在这个时候，群众转向革命道路，会比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来得更快，更果断，更坚决。一次新的起义浪潮将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胜利，而且必然要获得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以国际原则为基础并加入无产阶级世界党的队伍中的组织，才能在本国的土壤中扎下根，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今天，反对战争的斗争就意味着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